传媒制度论丛

主编 金冠军 郑 涵

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项目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s of Media Institu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陈钢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巍巍交大　百年书香
www.jiaodapress.com.cn
bookinfo@sjtu.edu.cn



责任编辑／黄强强
封面设计／陈燕静



ISBN 978-7-313-07514-7
9 787313 075147 >
定价：35.00元

传媒制度论丛
主编 金冠军 郑 涵
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项目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

陈 钢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为了能对传媒制度有一个不同的考察切人点，使得原来以革命、政治、经济或社会阶级等为焦点的分析，让位于“技术”这个思考的出发点，本书通过论述晚清时媒介技术发展对媒体内部制度（包括内容生产机制和经营管理制度）、媒体外部管理制度（传媒法规）和传媒制度的形成环境（社会传播习俗）的影响，试图对晚清媒介技术发展和传媒制度变迁的整体形势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解析晚清传媒制度变迁的基本诱因、前提条件和影响因素等，从而对媒介技术影响下晚清传媒制度的变迁有个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本书的读者对象：新闻传播类专业师生、研究人员和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陈钢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传媒制度论丛/金冠军，郑涵主编）

ISBN 978-7-313-07514-7

Ⅰ. 晚...　Ⅱ. 陈...　Ⅲ. 传播媒介—研究—中国—清后期　Ⅳ. G219.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1642 号

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

陈　钢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6　字数：281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7514-7/G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63812710

序

戴元光

科学技术对传媒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似乎没有人提出质疑，如人类在有了基本的生产工具后，就出现了刻划文字和图画，而当人类有了造纸技术后便有了书籍等平面媒体。因此也可以说，媒体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科技发展史。但技术的发展能不能武装传媒也不一定。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但活字印刷使用最早的是西方，或比中国早百年以上。为什么？专制主义和统治阶级是害怕传播发展的，是害怕传媒成为自由之物的。

20世纪是世界新闻传播技术发展最快的100年，人类从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明走向现代的工业文明，人类获得的传播权利比过去几千年总和还要多。尤其是中国。

21世纪则是人类传播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技术给了人类全新传播手段，从而给了人类全新的传播观念，传播的垄断时代即将过去，人类真正可以“日穷万卷”、“天涯若比邻”。更重要的是，新的传播手段赋予了人类新的能力——自由的传播和文明的实现。尤其是中国。

在我们享受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憧憬未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传播哪里来，传播哪里去，人类为了传播的努力，以及传播给人类带来的不愉快与焦虑。我们有更多的研究命题。

陈钢博士《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一书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视角考察晚清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制度变迁可能产生的影响，阐释媒介新技术如何重塑人类传播行为，影响传媒制度的生产和供应，并对传媒制度又如何反作用于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一探索是新鲜的和有创新意义的。

陈钢博士是一位勤奋好学、学风踏实的年轻学者，他作为我的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布置给他的研究任务，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去做，遇到困难也尽量自己去解决。而他找你最多的是他对问题的新想法或不同看法。因此我曾对他讲他适合做研究工作。

在陈钢博士的专著要出版的时候，他要我为他的著作写序，我就写了以上的文字，让我们共勉。我也期待陈钢博士更多的成果问世。

目　　录

绪论　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的研究渊源

本书的研究动机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中国经济的疑问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the Needham Problem)。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探讨中国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① 另一位英国学者李约瑟(Needham)在比较了中国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后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在15世纪之前的科学技术是领先于西方的,但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的革命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在欧洲呢?

同样值得思考的是:15世纪恰恰是活字印刷术在西方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那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关联?早在宋代我国就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如果《梦溪笔谈》的记载确凿无误的话,②可

---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87.

②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并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一介布衣,至于其籍贯等情况都不得而知。在中国目前已发现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转述沈氏原文。一些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比如1847年法国著名汉学家茄莲把毕昇译为法文Forgeron(铁匠),此后很多外国学者就照译为Smith或Blacksmith,连新版《大英百科全书》也将其译为Alchemmist(炼金术士)。其实这些外国学者也只是根据沈氏《梦溪笔谈》有关内容所推断而已,因为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不过这位老铁匠是否就是发明活字板的毕昇,尚待发现新的文献进一步佐证。学者张秀民还进一步分析指出:第一,毕昇与毕升,音同字不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第二,铁匠毕升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已经年老,而毕昇的发明则在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一个老人再活上几十年,不是快近八九十岁或一百岁了吗?这样高寿的老翁,是否能发明活板,是值得怀疑的。张秀民先生还根据《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毕昇死后,其苦心发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这一点,推测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参见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184-187.

为何我国古代长期占据主流的都是雕版印刷？但在晚清我国的媒介技术又为何能在短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电报、电话、西方印刷技术等西方近代媒介技术是如何进入晚清中国的？它们兴起与发展的经过如何？它们又是如何逐步替代旧的媒介技术的？这些新的媒介技术与传统社会的关联如何？它们对哪些社会观念产生了影响？再往深处推，媒介技术的巨大发展对20世纪初晚清政府一系列传播法规的出台是否产生了作用？推而广之，对当时的整个传媒制度是否产生了作用？如果产生了作用的话，这些作用是如何可能以及为何可能的？

以上这些问题，是思考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之间勾连的底线，每一项均需深入思考也许才会获得基本答案。然而，做这方面学术检索的时候，竟未发现有对晚清时期社会媒介技术与传媒制度的互动进行比较全面系统考察研究的成果，似乎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这也进一步促发着笔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就学术研究而言，概念和术语的厘清对学术研究的有效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长期纠缠不清的争论，很多源于学者间对同一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各种概念并不简单地反映“现实”或无意中命名物品，它们在一种特殊语境中建构现实以使之符合于各种特定的权力关系。

1615年，英国的巴克爵士创造了Technology①一词，表示技术原理和过程，既可以指人类发明的产品和人工制品，也可以表示创造这种产品所需的知识体系，还可以表示技术知识的产生过程以及技术产品的开发过程。美国学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也认为：“即便一项技术的软件成分通常不太容易被观察到，我们也应记住技术通常是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混合。”②我国学者高亮华认为技术的内涵包括多个方面：技术知识、规则与概念；工程或其他的技术实践，甚至包括对应用技术知识的特定职业态度、规范与假定；由这种技术实践所生产或制造出来的物质工具、装置与人造物；将技术人员与工艺建构到技术系统与体制中的组织活动；由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的技术状况或特点等等。③ 金周英则把技术分为“硬技术”与“软技术”：“硬技术”即指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是指人类为了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用以改造、适应(有些自然规律只能是适应)和控制自然的技艺、技巧、工具和规

---

① 技术概念的多重性还有另一个原因：欧美学者往往用不同的词来表达技术概念，比如埃吕尔用technique，芒福德用technics(只把technology视为现代技术)，而且欧美以techno为词根出现了许多新词，如technocracy、technophobia等，这也使技术的含义更为错综复杂。

② 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4版)[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3.

③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0-11.

则，而且多是来自自然科学的操作性的知识体系。“软技术”即来自社会科学等非自然科学，来自非（传统）科学知识的操作性知识体系。[①] 综合上述观点，本书“媒介技术”这一概念中的“技术”一词主要指可操作性的知识体系，是人类为了达到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目的，用以改善、改造或适应自然界的各种技艺、工具、规则和方法。

传之无物，则传之不远，媒介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②] 那么，何谓媒介？在汉语中，媒介和“媒”是紧密相关的，即婚姻介绍人，如《诗经·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后来引申为中介、导致、招引之义，再引申为居间的工具。媒介的英文单词 Medium 一词源于拉丁语 medius，意为中间，引申为介质、手段、（生物的）生活环境以及通常用作复数形式的传播媒介等义项。

根据以上对“技术”和“媒介”两个概念的理解，可以认为，从广义而言，媒介技术是指人类为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是指一切在表达、存贮和运载信息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物理形式，包括物质实体和物理功能；从狭义而言，媒介技术是指大众传媒为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信息传递系统的手段和方法。本书主要从狭义意义上讨论媒介技术，不过鉴于部分广义意义上的媒介技术与当时的印刷传媒之间密不可分的勾连关系，在行文中必要之处也对其加以论述。

和“技术”类似，“制度”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技术是人对自然的利用工具和方式，那么制度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可或缺的规则。[③] 可“制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在中国官方乃至大众语境中，制度问题曾是个异常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随着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终于意识到，制度问题并非仅仅是关于国家政权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其实制度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制度及其变迁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尽管制度一直是历史哲学、政治学说和法律理论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对当前文献稍作浏览就会发现，要想形成统一的关于制度的理论显然是件极其困难

---

① 金周英. 软技术——创新的空间与实质[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99.

② 初看上去，在人类发展早期最重要的技术是石器的打磨、弓箭的制作、人工取火等，这几类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使人同动物界分开，确立了人类社会。但是原始人的能力终归有限，只有采取群居这种方式，既然是群居，那么彼此间的信息传通的重要性便是不言而喻。而文字的产生更使人类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当事情变得有据可查时，知识和技术的累积效应对于人类的发展开始起决定性的作用。

③ 当然，如果按照科斯（Coase）定理所阐述的观念，制度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重要的，比如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制度就不再重要。不过在现实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

的任务。

国外学者对于制度的界定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学的解释。文化人类学往往从文化意义上对制度加以理解，法律规章、社会规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凡是能给人的行为加以规约的社会文化形式都被界定为制度。

第二，心理学的解释。这种视角不把制度仅仅视作一种纯粹外在的社会规范或规则，而把制度视作经由社会化内化为行动者社会角色的人格、气质等个性心理特征，认为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形成的。比如哈耶克(Frederic Von Hayek)就将制度与人的心理预期相联系，认为制度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能够根据各自的专有知识形成对他人的行为预期，这种预期使得人们在互动中的相互调适成为可能。

第三，功能主义的解释。帕森斯(T. Parsons)把社会行动看作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默顿(R. Merton)则认为社会制度规定着未达到目标所能采取的手段，对行动者产生着两重作用：一是对行为的外在约束；二是对行为的激励和压制。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制度的研究首先要分析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

第五，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解释。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政治学家把制度纳入到主流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新制度主义，在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尤为关注制度的作用。①

第六，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旧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和康芒斯(John Commons)等人也从最一般意义上给制度下过定义，②但真正使制

---

① 这一方面的研究以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两人合著了《重新发现制度：政治学的组织基础》和《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两人合著了《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以及寇尔芭尔等人为代表，而且他们进一步将新制度主义分为三种，即：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在运用制度主义分析工具研究社会实际政治运行问题方面，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通过对意大利地方民主制度建设的分析，对民主制度建设及实际绩效深受社会资本制约进行了深刻论述。

② 康芒斯很早便对制度理论作出了系统论述，他认为“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制度可以解放个体行动。参见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上)[M]. 于树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81.

度成为经济分析兴趣中心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学派把制度因素分析引进经济学理论范畴，从而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① 其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②认为，制度由正式的成文规则以及那些作为正式规则之基础与补充的典型的非成文行为准则所组成。③

当然，以上的分类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而是犬牙交错互相勾连的。综合以上的各种解释可以认为：制度是社会公认的维系团体生活和人类关系的法则和社会行为模式，既包括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比较稳定的、成文的、理性化的正式社会规范体系，也包括风俗、习惯、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等非正式的、不成文的、非系统化的表现形式。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也有不少学者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了对制度的研究。汪丁丁在《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一书中认为制度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或契约关系。这种形式或关系包括：规则，或正式的规则；习惯，或非正式的规则。④ 他还把全部制度现象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叫人际关系；第二类制度现象是"物的秩序"；第三类是符号，包括语言、思想体系、宗教和数学曲线。与此相应，他认为制度分析也包含三个维度，即物的秩序、人际关系、精神与价值。⑤

在《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一书中，国内较早对经济学进行制度研究的张宇燕在旁征博引后对制度进行了简要诠释："实际上，制度的本质内涵不外乎两项：即习惯和规则，而其他特征或属性或附带说明均不过是它们的派生物。"⑥黄速建则将制度看作是与市场主体相关的制度与制度环境的统称，认为制度是一种制度体系，

---

① 如 T・W・舒尔茨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人的规则"（T・W・舒尔茨. 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M]//R・科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刘守英，胡庄君，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253.）。日本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概括了其他人对制度的三种定义：一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参与者，尤其是组织；二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规则；三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均衡解。参见青木昌彦. 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J]. 周黎安，王珊珊，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6).

② Douglass C. North 被译成"诺思"和"诺斯"的均有，本书为了统一，除了引用别人原文中的表述，其他一律表述为"诺思"。

③ 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

④ 汪丁丁.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3-4.

⑤ 汪丁丁. 制度分析基础[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1-56.

⑥ 张宇燕. 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20.

而不仅是某一种制度，它是市场主体以及涉及市场主体的一系列制度和制度环境的统称。① 张旭昆则把制度定义为关于人们(个人及组织)行为的规则，是关于人们的权利、义务和禁异的规定。②

陈创生认为，制度的每一次安排都是无数次博弈的结果，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制度的变迁史。③ 韦森在其著述中一直坚持把 institution④ 翻译为“制序”(即制度规则调节着的秩序)，他认为应该用“制序”一词取代“制度”。在他看来，“制序”是一个从习惯到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制度的动态的内在逻辑发展过程。⑤ 林红玲概括指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形成人们之间相互交易的约束，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它们的实施方式构成的。制度变迁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机制的结合所作的边际调整。制度变迁的动力是个人期望在现存制度下获取最大的潜在的外部利润。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与组织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⑥

关于制度的内涵本就见仁见智，对其下位概念“传媒制度”的讨论更是充满分歧。因为“传媒制度”包含了一组让人极易混淆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概念：传播制度、媒介制度、传播体制、新闻制度、新闻体制等等。即使时至今日，我们给“传媒制度”定位时仍需依靠十分复杂的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a)。如何定义传媒制度，将直接反映研究的基本立场，直接关系到制度研究将如何解释人类传播进程中的矛盾、冲突与困惑。由于这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纷繁复杂，只能就

---

① 黄速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39.

② 张旭昆.制度的定义与分类[J].浙江社会科学，2002(6).

③ 陈创生.论制度及其社会意义[J].现代哲学，2001(3).

④ 据韦森的归纳，在中国经济学界一般都将其译为“制度”，而中国英语学界(如姚小平、顾曰国教授)和哲学界(如陈嘉映教授等)一般把“institution”翻译为“建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三度讲演》中译本中，张绍杰教授将所有的“social institutions”全部翻译为“社会惯例”，而将所有的“convention”全部翻译为“规约”，杨国荣教授则在《伦理与存在》中全部把“institution”翻译为“体制”。事实上，正如韦森指出的，哈耶克、科斯和诺思在使用“institution”一词时，所涵指的现实对象性也实际上是不同的。哈耶克倾向于把他的研究对象视作为一种“order”(秩序)，科斯则把“institution”视作为一种“建制结构”(有点接近英文的“structural arrangement”即“结构安排”或“configuration”即“构形”)，而诺思则把“institution”视作为一种“约束规则”。

⑤ 详情参见韦森.语言、道德与制度[J].东岳论丛，2004(3)；韦森.文化与制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 之注释；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31-133.

⑥ 林红玲.西方制度变迁理论述评[J].社会科学辑刊，2001(1).

其中几个较为常见的稍加分析。

"体制"一词的使用频率颇高。学者徐耀魁在《世界新闻传播体制的四种类型》,将大众传播体制分为商业经济型、政治宣传型、社会自治型、社会服务型四种。①《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中认为,大众传播体制是"大众传播媒介所有制形式、机构设置、经营方式、管理控制以及传播的最终目的的总称",并认为从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和传播的最终目的这三个决定体制类型的基本要素来看,大众传播体制实际上主要有三种类型:商业经济型、政治宣传型和公共传播型。② 在《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一文中,潘忠党认为:"体制"代表了社会学中所指的"机构"及其稳定关联所形成的结构,以及这种关联所遵循的原则和规范。当这两方面固化于某种社会实践中时,便指这一实体为"体制"或"系统"。③ 在《传播体制选择与经济机制效率》一文中,韩强认为传播体制就是"社会传播系统的控制结构,是传播的活动规范模式、文化规范模式和制度规范模式的集中反映"。④

肖燕雄使用了"新闻传播制度"和"传播制度"这样的概念,并认为:新闻传播学研究包括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思想和新闻传播制度三个方面,但新闻制度方面一直被忽视。他在系列研究中,从传媒监管法律制度(宏观制度)、媒体经营制度(中观制度)和新闻生产制度(微观制度)分别着手,力求形成新闻传播制度研究的大致理论框架。⑤

"传媒制度"这一概念亦较为常见。郑涵和金冠军在《当代西方传媒制度》一书中认为,其中"制度"一词,也即英文所谓的"institution",意指一整套价值理念、规则系统、组织机构、人员构成、人际关系、制度环境等。政治、经济、技术因素的互相影响对于传媒制度具有关键作用,文化意识也是极端重要的变量。他们在书中还论述了泰勒(Lisa Taylor)与威利斯(Andrew Willis)对西方传媒制度的定义:其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传媒制度是制造传媒商品的工业或者商业;其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传媒制度属于社会较大的组织机构或结构。⑥ 李艳华也用了"传媒制度"这一概念,并指出由于传媒外部性的存在,世界范围内的媒介产业都是政府规制的对象,还分析了由于

---

① 徐耀魁. 世界新闻传播体制的四种类型[J]. 新闻学刊,1988(1).

② 邱沛篁,吴信训,等.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Z].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0-41.

③ 潘忠党. 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

④ 韩强. 传播体制选择与经济机制效率(上)[J]. 当代传播,1997(2).

⑤ 参见肖燕雄系列研究:肖燕雄. 新闻传播制度研究[M]. 长沙:岳麓书社,2002;肖燕雄. 中国传媒法制的变革空间[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肖燕雄. 传播制度与实务[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肖燕雄. 微观新闻制度论[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⑥ 郑涵,金冠军. 当代西方传媒制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2.

我国媒介产业的独特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特点，政府怎样依据成本选择传媒制度。[①] 也有论者认为，传媒制度的形成和维持涉及三个方面的利益：政府、传媒（包括传媒主体和传媒客体）、受众（社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媒制度就是一定社会中政府、传媒、受众（社会）三种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或表现。[②]

本书中"传媒制度"主要指 media institution 而非 media system，[③]是媒体运行的内外部规则，包括媒体的内容生产机制、媒体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政府对媒体的管理制度。与此相应，传媒制度变迁则指传媒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也就是传媒制度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被替代的过程。

那么，传媒制度的变迁是否受到了媒介技术的影响？抑或反之，传媒制度是否影响了媒介技术的发展？本书尝试以晚清[④]为剖面，探讨当时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其中重点思考晚清媒介技术发展是如何影响以及如何可能影响传媒制度变迁的。当然，媒介技术与传媒制度的互动关系并不始自晚清，本书之所以选定这个时段主要是考虑到：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困顿局势，

---

① 李艳华. 传媒制度选择的经济学分析[J]. 国际新闻界，2008(3).

② 张伟. 关于传媒伦理问题的制度学思考[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3).

③ 因为 system 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所说的"体制"，是所谓的宏观的"大制度"，和 regime 更为接近；而 institution 这个词的含义较为复杂，既可以指一整套价值理念、规则系统，也可以指组织机构、人员构成等。

④ 学界关于"晚清"的讨论层出不穷，可何谓"晚清"？据《辞海》释义："晚，时间上将近终了。"依照字意，"晚清"应当是指清朝的晚期。可从何时开始才算清朝的晚期呢？要具体落实到何年何月开始，以何种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标志，其实还缺少一致意见。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标志比较合理，但太平天国之后，又有所谓的同治中兴，既称中兴，自然不能算是晚期。因而，所谓"晚清"，似乎至早应从同治以后，也就是光绪初年（1875 年）算起，至清朝灭亡（1911 年），这样，整个"晚清"便只有不到 40 年时间，似乎太短。但这只是我们从字面上所作的一种推论，事实上，一般谈"晚清"并非自同治以后开始，比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就将晚清的起止时间界定为 1800 年至 1911 年。从"晚清"这一概念的使用情况看，它已经变成一个类似库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范式"，主导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以致在许多人心目中"晚清"几乎与"近代"同义——大体上是指从鸦片战争到满清倾覆的 70 年左右的时间，即自道光二十年（1840 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学术研究本不嫌其细碎，细分本无可指责，只是这种阶段的划分虽然便利了学者们的研究，却容易切断历史本身的连续性，也遮蔽了史实的丰富性。因此，以 1840 年作为"晚清"的起点确需重新考量。本书将"晚清"所指之争暂时"悬搁"，只是根据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时间为其所指做一个工作性界定：起点 1815 年，而终止时间则于清王朝垮台的 1911 年。不过，晚清媒介技术与传媒制度均非平地而起，亦非骤然中辍，为了阐释问题的需要，必要的时候将回溯晚清以前或突破 1911 年的下限，以期透过拉长的时间和事件之间的细微关联，来凸显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制度变迁的影响。

为了应对这一困顿局势先后登场的诸多见招拆招式的改革措施[①]使得媒介技术发展和传媒制度变迁的互动问题进一步凸显。

尽管国内外关于技术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其中关于媒介技术和传媒制度的关系的探讨却为数不多，总体看来既不深入也不集中，尚未形成系统的媒介技术与传媒制度关系的理论，而专门论述晚清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制度影响的研究更近阙如。

在国外，有不少学者对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指向。这部分成果的研究倾向和本书宗旨未必入弦入扣，但其中很多理论作为本书思考和论断的逻辑起点，不得不略加交代。

媒介技术主义理论。[②] 传播学诞生伊始就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打上了强烈的实证主义烙印。关于媒介技术主义的研究在传播学史上也长期偏于一隅，直到哈罗德・英尼斯[③](Harold Innis)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出现才扭转了这一局面。英尼斯的媒介技术理论主要体现在《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这两部著作中，他认为媒介技术的进步有助于一定社会阶级的知识和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原因是传播媒介具有偏向性，[④]社会组织的变化、主体性的形成以及知识的组织化都受到媒介技术的影响，媒介技术是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模式的决定性因素。从而，英尼斯对媒介技术的作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并找出了媒介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对应关系——媒介技术形态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这是传播学史上较早对媒介技术进行的相对系统化的理论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麦克卢汉先后出版了三本传播学专著：《古登堡群英》、《理解媒介》和《媒介即信息》，在这些著作

---

① 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修律新政、"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运动等。

② 本书没有采用常见的"硬媒介技术决定论"、"强媒介技术决定论"和"软媒介技术决定论"、"温和的媒介技术决定论"等说法，比如麦克卢汉常被人称为"硬媒介技术决定论"，但实际上麦氏的理论已经超越了纯粹技术决定论的解释，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了，给其冠以"硬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帽子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本书统一以"媒介技术主义理论"加以概括。

③ Horold Innis 有英尼斯、殷尼斯、伊尼斯、因尼斯等多个译名，本书中除了引文中的"伊尼斯"和参考文献外，其余的表述中均使用目前最普遍的译名"英尼斯"。

④ 传播媒介或偏向于时间，或者偏向于空间。偏向于时间的传播媒介易于长久保存但却难以运输，比如一些重型的材料：羊皮纸、粘土和石头等；偏向于空间的传播媒介易于远距离运送但长久保存性比较差，比如轻便的纸莎草和纸张等等。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前者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有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后者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中的贸易，便于帝国领土的扩张，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不强的社会体制。参见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与帝国[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中，麦克卢汉提出了一系列大胆新颖的媒介理论，其奇特的媒介观和媒介研究方法震动了传播学界，以致诞生出"麦克卢汉主义"这一新词汇。正是麦克卢汉的出现才真正确立了媒介技术主义理论在传播学研究领域里的应有地位。尽管麦克卢汉谦称自己只是在为英尼斯的理论作注释，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媒介技术理论研究历史上的决定性地位。亦如学者张咏华所指出的，"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①] 但正如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波特(William E. Porter)所评论的，"他的论述方式使得他的观点难以捉摸"，"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态度是有些玄妙的……他发出的讯息可以作种种不同的解释"。[②] 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麦克卢汉遭到愈来愈多的批评——主要指向两点：一是他无所不包的媒介定义；二是他反实证、反经验的研究方法。如果说英尼斯和麦克卢汉较为迷恋技术理性和逻辑原则的话，那么保罗·利文森(Paul Levinson)和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等人更侧重于媒介技术和事物产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影响着媒介技术的实现。利文森在1997年出版的《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③]中认为"人类所发展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④] 他承认媒介技术决定社会的发展，媒介技术的进步是自发的，也承认社会的诸方面对媒介技术的制约作用，强调媒介技术进步来源于整个社会对变革的渴望和追求，要依赖于社会的"选择"和使用。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甚至自创了"技术垄断"(Technopoly)一词，用来意指在技术社会中技术被神化并将它的控制力量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在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一书中宣称当下社会已经超越了技术专业化而走向了技术垄断。[⑤]

---

①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0.

②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36-137.

③ 从书的命名大致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倾向。

④ 保罗·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M].熊澄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3.

⑤ 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媒介技术情境论。20 世纪末，因为媒介新技术的发展，麦克卢汉那些被学界斥为毫无逻辑的臆想和狂言成为举目可见的事实。于是，媒介技术的研究价值再一次自然而然地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大批媒介技术主义理论的专门的研究者及其著作。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 1985 年出版《消失的地域》一书，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与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相结合，提出了对媒介技术新的研究视角：情境理论的视角。他将传统的情境理论拓宽，认为情境不仅仅是传统概念中的人们表现自己行为时所处的自然情境，由媒介造成的信息环境同样重要，在确定情境的界限中应把接触信息的机会当成关键因素。因而媒介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后者决定人们的行为。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nis McQuail)认为，"每一种媒介都可以从技术、物质形式、典型模式、文类、功用以及制度环境的观点来讨论"①。他因此特别重视媒介技术在媒介制度中的影响作用，甚至认为技术因素和政治、经济因素一样，是构成媒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传播体制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性，关键在于它的行动无法摆脱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并且非常依赖技术的不断变化"。②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理论挑战了媒介技术主义的核心理论。他坚持认为应该把媒介的产生、应用和发展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透视，把大众传播当作重要文化现象来研究。他还指出，媒介技术是在一定的意图和已知的社会需求指导之下发展出来的，机构的利益取向以及机构对新技术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技术如何"被发现"。他的一系列力作——《长期的革命》③、《传播学》④和《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⑤都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探索。美国学者布里恩・温斯顿(B. Winston)认为，在传播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上存在着两种观点——

① 丹尼斯・麦奎尔.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 崔保国，李琨，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6.

② 丹尼斯・麦奎尔.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 崔保国，李琨，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59.

③ Williams, R.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1975.

④ Williams, R. *Communicaitons*. London: Penguin, 1970.

⑤ Williams, R.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1974；雷蒙德・威廉斯. 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M]. 冯建三，译.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R・威廉斯. 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J]. 陈越，译. 世界电影，2000(2)；R・威廉斯. 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二)[J]. 陈越，赵文，译. 世界电影，2000(3)；R・威廉斯. 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三)[J]. 陈越，译. 世界电影，2000(5)；R・威廉斯. 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三)(续完)[J]. 陈越，赵文，译. 世界电影，2000(6).

即"技术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者,他们视技术无所不能,如同在历史真空中发挥作用,倾向于认为技术对传播内容的影响是压倒一切的。文化决定论者,他们把技术牢牢地放在社会背景中,认为社会背景才是决定媒介技术和媒介内容的主要因素"。他自己似乎更倾向于社会环境对媒介技术的制约,"是社会环境决定了传播方式的内容,而不是技术"。① 法国学者帕特里斯·费里奇(Patrice Flichy)在《现代信息交流史》一书中引入了社会史和技术史的要素探究电报、电话、照相机、唱机、电影、广播、电视等巨大的信息交流体系的起源,详细描述了电报的发展与交易所的发展的关联以及现代交流的工具是怎样逐渐地从公共领域蔓延到私人领域的过程,讨论了从光学电报到无绳电话的发展历程中,人们的交流关系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②

媒介技术批判论。在西方学术史上,伴随着媒介技术主义理论的提出,就有学者在文化层面上对媒介技术提出了诘难。20 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注意到了媒介技术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媒介进步实际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该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亦译为阿多尔诺或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③ 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代表人物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制形式。"④ 也就是说,媒介技术不但受到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技术本身就预先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设计出来的,设计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

媒介技术文化论。这方面较具代表性人物的当属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他认为传播有两大含义: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transportation)的隐喻,指的

---

① 布里恩·温斯顿. 技术发展的原因及其对传播内容的影响[J]. 来丰,编译. 新闻大学, 2001(冬).

② 帕特里斯·费里奇. 现代信息交流史[M]. 刘大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③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④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研究[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0.

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它源自人类古老的梦想——超越时空，自由翱翔。欧洲基督教徒当年远渡重洋到达美洲，为的是拓展上帝的领地、传递上帝的福音；因此，在教徒们的心目中，万能的上帝为了传教开通了铁路，电报的发明更令教徒们欢心鼓舞，因为福音可以传得更快、更远。传播的仪式观则截然不同，它并非指讯息在空间的扩散，而是指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它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对信息的表征（representation）。若从其宗教隐喻看，它强调的是祷告、圣歌和典礼的重要性，因为它让人产生精神上的共享感和团体感。因此，从仪式观看，传播的起源及其境界，并不是指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包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文化社群。传播的本质并不在于控制，而是一种文化仪式。媒介是文本的呈现，是供人类参与其中的戏剧舞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凯瑞不是像麦克卢汉那样，对媒介技术作直觉式的断想，而是把它放进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的经验和实践中，进行多方位的阐释"，"在凯瑞叙述的'电报故事'中，技术与文化这对'孪生演员'的表演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① 英国学者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在《理解媒介文化》一书中认为，"麦克卢汉最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观点：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植根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传播的技术媒介"②，而"口语社会的在社会和感觉上均已被整合的世界被印刷的理性化冲击所彻底改变。这导致了一种少数、等级和专业化的精英文化的产生"③。他进一步指出，"许多现代文化是依凭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这已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④ 美国学者丹尼尔·杰·切特罗姆（Daniel Czitrom）在《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一书中从整体上探讨了与现代传播媒介的影响有关的三种主要传统，讨论了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人对于理解现代传播影响的努力是如何演化的，这些努力曾经又是如何与美国社会思想的更大领域相契合的，这些思想与不断变化的传播技术和制度曾经是什么关系以及在新传播媒介形式的发展中早期的公众反应又起何作用诸问题。他认为，文化和传播的范畴不可避免地会重合，现代传播已成为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观念和现实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⑤

① 丁未. 电报的故事[J]. 新闻记者，2006(3).

② 尼克·史蒂文森. 认识媒介文化[M]. 王文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85.

③ 尼克·史蒂文森. 认识媒介文化[M]. 王文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3.

④ 尼克·史蒂文森. 认识媒介文化[M]. 王文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

⑤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 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M]. 曹静生，黄艾禾，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媒介技术影响论。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将印刷术视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工具,指出15世纪末和16世纪,正是印刷术的扩散撕裂了西欧的社会生活结构,并用新的方式把它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模式的雏形。[①] 在她看来,印刷术无异于一场"革命",不但增加了图书的产量,改变了出版的方式,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的学习、认识和思考方法。[②] 马尔坦(Boris Martin)和吕西安·费夫贺(Lucien Febvre)的《印刷书的诞生》是书籍史领域的另一部经典之作,与上述 Elizabeth Eisenstein 的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同享西方早期书籍史的"双璧"之誉。这是一部关于世界(以欧洲为主)图书的断代史,聚焦于1450年至1800年间活字印刷术发明后的早期图书史,探究了印刷书如何诞生以及西方文明从手抄本迈入印刷书籍的革命性转型。[③] 欧美汉学界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印刷出版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如周启荣(Kai-wing Chow)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④]周启荣和包筠雅(Cynthia Jannne Brokaw)合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书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⑤]《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则于1996年就推出了"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印刷文化"(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专号,[⑥]里面收录了弗里德曼(Friedman, Jill A.)、贾晋珠(Lucille Chia)、包筠雅、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启荣、贝尔(Bell,Catherine M)六位作者的六篇文章。包筠雅的《文化中的商业》一书,[⑦]不仅介绍了17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著名的雕版印刷中心之一——闽西四堡的印刷与书籍贸易情况,还讨论了清代印刷文化的扩散及其对士大夫、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影响,认为书籍在向不同阶层的大众进行着社会渗

---

① Elizabeth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Elizabeth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6.

③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M].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④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⑤ Cynthia J. Brokaw & Kai-wing Chow.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⑥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7,No. 1 (June, 1996), pp. 1-200.

⑦ Cynthia Joanne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sia Center, 2007.

透。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古登堡在上海：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1876～1937年》(*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①一书，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吸收了不少灵感，来讨论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和印刷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建构作用。该书内容涉及面很广，从印刷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到上海石印技术的黄金时代(1876～1905年)，从印刷技术到印刷的组织模式，乃至印刷对文化、对教育、对政治的影响，都有较为详细的讨论。美国学者卡特(T. F. Carter)在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 Ward*② 一书中利用了大量史料对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世界的传播情况作了全面的叙述，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中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这些发明对欧洲及世界各国的造纸印刷事业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印刷术的第一部著作。美国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亦译为贾吉)在《印刷与政治》一书中以清末民初《时报》为核心、以报人作为主体的改革者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建设性的努力方向，形成20世纪初晚清历史的独特轨迹。③ 书中描述了晚清末期各式印刷出版物在为人们构思、描述着理想的社会、理想的政治，支撑传统专制的政治观念因之瓦解，其他一些传统观念也逐渐被人们淡出、抛弃。政治性报刊书籍的大量流通，成为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瓦解清朝专制统治的极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力量。④ 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和美国学者特里·N·克拉克(Terry N. Clark)认为，"即使到大革命的末期，快速传播的缺乏，仍然是公众生活激情和普及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报纸送达读者手中每周只有两三次，在巴黎出版后要一周才能够送到法国南部，它们怎么能够使人觉得近在咫尺、同步一致呢？没有这样的感觉，读报和看书又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等到20世纪，由于完善的交通工具和远距离瞬间的思想传输，各种公众才得到了无限延伸的可能，正是这种延伸使公众与群众构成强烈的反差"，"三种互补的发明——印刷术、铁路和电

---

①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 Vancouver，Toronto：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

② 192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出版，1928年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早的中译本，书名为《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中文版另参见T·F·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M]. 吴泽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③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④ 王敏. "中间地带"：晚清上海报人与立宪运动[J]. 学术月刊，2003(11).

报——联手创造了报纸令人望而生畏的威力，造就了令人惊叹的电话，它异乎寻常地放大了过去演说家和布道师拥有的听众”[①]，“约束现代交谈的最强大力量是书籍和报纸。书籍和报纸泛滥之前，交谈的地区差异很大；再也没有比这种变异更加突出的现象了，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话题、语气和风格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与此同时，再也没有比这种交谈更加单调枯燥的了。如今的情况刚好颠倒过来。报纸使人们的交谈在内容上统一，使交谈更加活跃，使之空间上异质、时间上多样”[②]。美国学者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电话的社会影响》一书中指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少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电话，或者一旦提及，电话就被断言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情况并不如此简单明了。书中的论文主要讨论了电话的社会影响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并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电话诞辰百年的系列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③] 在海外华人学者当中，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是研究中国媒介技术史的重要人物。他的博士学位论文 *The pre-printing records of China: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books* 经过多年补充和修改后以著作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形式于 1962 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④] 他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等书对中国古代媒介技术发展也作了深入考察和详细论述。

在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了晚清的新闻传播活动，亦有不少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关注到当时的媒介技术或传媒制度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有不少成果分析了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媒体内部机制变革的关联。

丁淦林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指出，晚清新式报纸的版式、插图、副刊都是邸报、京报等中国古代报纸所没有的。报馆有明确的机构设置与专业分工，从出报到营销能有序地运作，办报成为独立的社会职业。[⑤] 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方汉奇论述了随着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报刊广告情况，“资本主义的商业广告，在报刊的版

---

①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传播与社会影响[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16.

②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传播与社会影响[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41.

③ 伊锡尔·德·索拉·普尔. 电话的社会影响[M]. 邓天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④ 此书 1975 年香港中文大学周宁森博士译成中文本，题为《中国古代书史》，大陆一般译为《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004/2006 年版)。

⑤ 丁淦林. 中国新闻事业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0.

面上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古代的报纸如邸报，如报房京报，都从来不登广告，利用报纸刊登商业广告完全出于大规模地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需要，是中国报纸‘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标志之一”①。无疑，这是新闻媒体经营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

许正林在《中国新闻史》中论及传教士报刊的意义与影响时指出，传教士报刊不仅带来了西方近代印刷技术、设备和近代报刊的形式，还传来了近代报刊采写编译等业务模式，“他们重视新闻采访工作，不少报刊创刊不久就广泛征求新闻稿件，这种崭新的新闻理念对中国当时报人的影响是重大的”，“传教士报刊已经意识到传播过程中的‘反馈’非常重要，报刊开始重视读者的反馈与互动，这几乎是报业史上的重大突破”②。

孙瑞祥指出了媒介技术发展促进了新闻文体与传播形态的历史变革。他认为除了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文化思潮外，新兴的电报技术对客观报道形成发生着直接影响。同样，“倒金字塔”这一新闻文体结构方式，也与电报技术相关。③ 王润泽持类似观点，认为有线电报、无线电报、电话等信息传输技术本身对新闻信息的传输有积极意义。在各种现代通讯技术中，电报技术比较成熟，成为最重要的新闻传输手段，颇受各报馆重视，尤其是新闻专电改变了中国新闻业的价值判断，以往的“论说”开始让位于成本相对比较昂贵的“新闻专电”，促成了中国政论报纸时代的完结。④ 李庆林指出，电报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它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的活动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而电话则占据了家庭信息的入口，并且在无形中打破了个体间适当距离的规则。因为媒介技术的介入，被传播的经验表现了对原始经验的一种改进，这种人工的改进（编辑）产生了一种被扭曲的经验，从而形成我们常说的“媒介环境”。⑤

其次，不少学者讨论了晚清媒介技术发展对政府传媒管理法规的影响。

孙藜在《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中，“首次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就电报技术与晚清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做了有益探索，开辟了新闻传播领

---

①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7-58.

② 许正林. 中国新闻史[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66-70.

③ 孙瑞祥. 对传播技术作用力的社会学认识[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

④ 王润泽. 技术、制度与新闻的互动[J]. 国际新闻界，2007(11).

⑤ 李庆林. 传播技术塑造文化形态——一种传播学的视野[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7).

域的一个新的研究面向，不仅比较生动、具体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电报从‘官督商办’、‘商股官办’直至‘收归国有’的轨迹，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中间所牵涉到的利益群体各自对于电报技术的看法和认识”①。

包羽在博士论文《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技术》中指出，电报作为一项新兴的事业，对清代原有的法律制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电报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具体情况。② 黄继光考察了电报技术发展和晚清“裁驿设邮”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电报创办初期，建立了庞大的电报网络，但骨干是军政事务通讯专线，以“官设官用”为主。在清代国家邮政官局开业后，“京中与通商各省一切公私文函亦可寄递”，做到“京中各衙门与各省大宪互相通知一切事宜，或用邮局，或用电线，均称甚便”。古老的驿传体系逐步完成了历史任务，“裁驿设邮”也在这个功能转型过程中较为平稳、顺利地实现了。③

王鹤亭和苏全有认为，自从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为了便于在华扩张，纷纷向中国提出设立电报的要求，清政府由于对国际法的无知，缺乏领海权意识，只立足于陆地电信权的完整和坚持，丧失了海上通信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晚清后期，西方各国或施加外交压力，或强行、私自在中国沿海各口敷设海底电报，或违规收发电报等，在中国沿海及内陆扩张电信利益，侵犯中国主权，不断冲击晚清政府中外海底电报交涉的政策和原则。④ 田露汶指出，就在国外许多地方已在享受电报这一新科技的方便和快捷时，晚清中国的邮驿，已是台站疲累、积久弊生。中法战争后，上至朝廷下至各方臣将，均倍感电报的先进，很快电报、电线便纵横全国，不仅运用于战事，还逐步走人民间。⑤

在传媒制度的变迁当中，社会和政府的博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博弈当中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否影响深远。很多研究成果尝试从媒介技术与公共领域发展的关联性来探讨媒介功能，刘增合、方平、吴燕等人的研究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刘增合的《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一文在以往近代中国公共领

① 黄旦. 序[M]//孙藜. 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序.

② 包羽. 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技术[D]. 沈阳：东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③ 黄继光. 中国近代电报与“裁驿设邮”[J]. 集邮博览，2004(8).

④ 王鹤亭，苏全有. 晚清中外海底电报交涉述评[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

⑤ 田露汶. 电报进入晚清朝廷[J]. 紫禁城，2004(6).

域研究的基础上，从广义媒介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舆论空间的扩张问题，论述了近代文化和精神系统对开拓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着重从大众媒介和辅助媒介两方面入手，研究了它们与近代公共空间不断扩张的有机联系。他认为，晚清以降，封建皇权控制社会的力度逐渐松弛下来，作为"舆论之母"和文化载体的民间传媒，在型塑公共舆论方面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承导控的职责。按照信息传递的标准来看，晚清社会基本上属于一种"前信息社会"，语义信息流转的速度较慢，信息识别的能力较低，受众文化层次不一。①

方平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个人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一个自主性社会领域。这一领域的孕育与发展，就其外部环境而言，需以社会与国家的分立为前提；就其内部体制建构而言，有赖于公共媒介的沟通与制度化。清末十年中，上海地区日趋繁盛的民办报刊，作为一种非官方的大众传媒，在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民办报刊改变了传统的官民文化格局，在文化层面上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与对峙。一方面，民报以近代机器印刷业为技术支撑，使文化复制更加方便、快捷，从而在速度与数量上使文化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②

吴燕在《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一文中指出，作为一种非官方的公共媒介，晚清印刷出版文化的空前繁荣促成了民间文化的繁盛，加剧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同时，中国传统士大夫也随着传播媒介的商业化与工业化而逐渐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和价值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而租界特殊的政治格局则为印刷出版文化提供了批判专制国家的舆论空间。由此，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所荷载的公共舆论呈现出独立性、公共性、批判性等特点，对这一时期上海公共领域的体制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③

再次，有不少成果分析了媒介技术发展给社会传播习俗带来的变化。

桑兵在《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一文中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经验材料表明，没有教育、通讯、交通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发展，经济增长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变革。清末民初，中国的大众传播业迅速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民间化态势。作为经济与政治的中介环节，这不仅促成政体形式由帝制向共和剧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④

---

① 刘增合. 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J]. 近代史研究，2000(2).

② 方平. 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兴起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

③ 吴燕.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J]. 江海学刊，2004(1).

④ 桑兵. 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J]. 近代史研究，1991(6).

台湾学者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一书考察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各种媒介技术与传播形式对晚清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和效果。在他看来，这一时段“在技术上有铅印的西方技术的引进，在社会关系上媒体与各阶层的关系都有所变动，在文化形式上，晚清传播媒体展现的语言与意义结构与以往相比有强烈的意义”①。

杨师群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指出，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的新闻报刊观念和技术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国人民间办报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中国民众新闻事业的发端。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报纸的国家，但其“邸报”只是皇家统治的工具，没有任何现代新闻舆论的概念及其相关文化。外报以其自身的实践告诉中国人，办报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发表各类文章，使中国人对此有了一个观念上的革命。②

在新近出版的《中华印刷通史》中，张树栋等人指出，近代印刷术是以机械操纵为基本特征，采用机械、光学、电器、化学等新发明的先进科学技术研制出来的，较之中国传统印刷术更为先进的工艺技术。它的传入直接导致了中国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的迅速发展和重大变革。同时，由于印刷术是与文化出版事业息息相关的工艺技术，也由于它的传入既是以宗教传播为基本特征的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又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向外扩张、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它的传入在促使中国近代印刷业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③闾小波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一书中，通过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甲午战争以前）中的传播媒介的梳理和分析，考察了《时务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历史地位，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④

在《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一书中，刘兰肖认为，随着报刊的多样化发展，它在近代初期所具有的单一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发表政治主张、促进意识形态领域变革的武器，同时也成为文化交流与学术争鸣的论坛。报刊的主办者，往往既是新的政治思想潮流的领导者，也是新的学术思潮的倡导者。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如果没有各种报刊为之提倡传播，那是不可想象的。⑤ 在《制度化儒家及其

---

①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M].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15.

② 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8.

③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中华印刷通史[M].台北：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2004：485.

④ 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⑤ 刘兰肖.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绪言.

解体》一书中，干春松指出："就传播形式来说，以报纸和杂志为代表的新的媒介的出现，不仅有了普适性的传播方式，而且媒介以读者需要为存在之本的特性使得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具有排他性和权威性的经典传播系统大异其趣。"①

蒋宝林详细考察了我国第一条向公众开放的电报电路——津沪电报线的社会背景、创建过程和经营设备，并着重指出了津沪电报线建成的六点重要意义：第一，打破西方垄断；第二，起到先导作用；第三，促进信息交流；第四，改变信息观念；第五，促进新闻事业；第六，加强对外交流。② 关于电报技术发展所受的阻碍，雷颐认为：当把"顺风耳"变成现实的"电报"在近代真的要来到中国时，却遇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巨大阻力，不仅没有被当作明察远见的"仙卿"，反而被顽固派斥责为会污染中国文化、破坏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奇技淫巧"而遭到强烈抵制、反对。他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不从技术层面论证、反对"新事物"，而是将是否应当兴办电报、兴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来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说明了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识形态传统的深厚。③

印刷出版技术的发展对整个社会传播习俗影响极大，诸多研究成果可被视为对这一点的反映。早在 1931 年，净雨就在《文华图书馆季刊》第 3 卷第 4 期发表《清代印刷史小纪》一文，重点论述西方印刷术的传入、盛行和社会影响，其中对印刷术输入中国后的发展情况梳理尤为详细。贺圣鼐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一文对印刷术的种类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作了详述，反映出中国近代出版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过程。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则在 1932 年 7 月的《申报月刊》上撰写了《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论述了石印铅印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印刷与出版的关系。④

---

① 干春松. 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91-192.

② 蒋宝林. 我国第一条向公众开放的电报电路——津沪电报线[J]. 上海档案，1993(1).

③ 雷颐. 晚清电报和铁路的性质之争[J]. 炎黄春秋，2007(10).

④ 另外，20 世纪 60 年代，张静庐先生以一己之力、穷 20 年之功辑注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七卷，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版，收录了 1862 年清廷设立同文馆到 1918 年"五四"运动前夕计五十余年间有关图书、期刊的编译、出版、印刷方面的史料 31 篇)和《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版，收录有 39 篇史料，时间从 1896 年起到 1918 年止)两卷中有不少史料反映了晚清出版印刷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相关研究更是日益增多，主要有《中国出版史概要》(张召奎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1991 年版)、《中国出版简史》(吉少甫主编，学林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国出版史》(张煌明编著，武汉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国出版史话》(方厚枢著，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和《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4 卷本)(叶再生著，华文出版社 2002 年版)。

从广义的角度而言，铁路亦是媒介技术的一部分，而且由于铁路和电报技术以及整个邮政系统（这两者和当时新闻传播活动的关系不言而喻）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①]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变，思想的觉醒，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演进无不与铁路问题相关。所以铁路与晚清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也能为本书的研究主旨提供侧面佐证。[②]

尽管以上诸多研究成果为本书的讨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这些成果依然有值得进一步延展的学术空间。

首先，鲜有成果将技术对传媒制度的影响作为讨论对象。已有研究成果中讨论媒介技术的居多，而且讨论 20 世纪诞生的媒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占了多数，数量不多的讨论传媒制度的文献大部分也是聚焦于当下，缺少对史实的关注。而且，即使讨论传媒制度，大部分研究只是着眼于传播体制、传媒法制，只有少数关注到媒体机构的内部机制，更鲜有研究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讨论传播习俗，以期对传媒制度有更完整的观照。

---

① 邮政必须借助铁路之快捷、运量大、运费低廉；而电报则须借助邮政现成的网络与人力进行，电报虽然“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时效远胜于文书传递，但电报终需投递这一环节，所以晚清时出现“凡铁路设站、电报设局之各处，均添设邮政官局”这一图景也就不难理解了。另据詹姆斯·凯瑞考证，电报技术最初就是运用于铁路调度的。

② 姜益在《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一文中从近代中国城市数量的增加、原有城市功能的变迁及人口向城市集中等几个方面，探析了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认为：铁路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城镇人口的增加、市场的扩大，并导致近代中国一批新兴城镇的煽起。李光耀在《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中论述了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变化的轨迹，他认为铁路在中国初兴之时，遭到农民的反对；到了 20 世纪初年，因铁路作用的显现，政府鼓励商办铁路，农民转向铁路投资；到清末之时，农民为捍卫铁路权益，投入保路运动。这种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农民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认同过程，也反映了学习西方与反帝爱国的辩证统一。朱从兵在《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对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从多个角度的考察认为铁路与社会经济之间是一种双向需要互动关系。李占才在《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一文中利用地方志中的相关史料对此进行探讨，认为铁路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延伸引起民俗的嬗变、各地民俗心理的更新、礼仪风尚的进化、生活娱乐和习俗的变迁。另外主要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金士宣和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凌鸿勋（《中国铁路志》和《中华铁路史》、《詹天佑与中国铁路》、《中国铁路概论》）、王开节（《我国铁路发展简史》）、谢彬（《中国铁道发展史》）、徐器（《中国的铁路》）、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等人的研究当中。相关资料主要集中在《铁路奏折》、《苏杭甬铁路档》、《粤汉铁路交涉秘密档案》、《轨政纪要》、《芦汉档》、《中国铁路借款合同汇编》、《交通史路政编》、《交通史总务编》、《申报有关铁路资料择录》、《海防档·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当中。

其次，诸多相关研究对政治史、思想史的亦步亦趋，导致了新闻传播研究本体意识和主体意识的缺位。分析视角和研究内容比较单一，讨论问题较为分散，忽视了研究对象的系统特征。相关研究往往只向人们提供一个其原因和结局都易于理解的进程，而对构成历史趋向的特殊问题，那些偶然事件和一系列并非人为的机遇，却宁愿使其埋藏起来。也就是说，大部分相关研究是分散的"不同片段"，未能描述晚清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制度影响的相对完整的图景。

再次，关于晚清的传播活动，现有文献涉及领域虽广，但以资料呈现和现象描述居多，讨论不够深入，前提假设与分析结论往往与史实有着较大距离，很少能够厘清事情发展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线索。许多晚清传播史研究由于和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过于同步常常出现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同样的弊端。

复次，在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中，我们关注的只是传播的内容，对媒介技术本身对人类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生活形态的重要影响更多地只是经验式的感悟，缺少系统的理论综合和提升。许多研究往往只注意了各个时期的媒介宣传报道了什么以及是如何宣传报道的，而忽略了媒介技术对传媒制度的影响。虽然媒介技术与传媒制度的互动格局已逐渐被认识，但已有的研究还缺少相应的理论规范，滞留经验层面较多，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将技术与社会完全割裂开来，没有看到两者共同演化的关系。很多文章持二元对立观点，或者持制度决定论观点，或者持技术决定论观点。

最后，若想深刻把握晚清媒介技术对传媒制度的影响，绝不能在观念上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理解为是一体的。内地与沿海、一般城市与通商口岸、城市与农村的传媒制度变迁上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而目前的相关研究对这一点明显重视不够，研究大多指向以上海等为代表的大都市或通商口岸。

鉴于此，本书力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一些针对性的拓展和挖掘。

第一，在史实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理论辨析。"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①。笔者查阅了大量关于媒介技术和传媒制度的文献，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使得本研究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思考问题。在史实分析的基础之上，对晚清媒介技术发展和传媒制度变迁的整体形势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解析晚清传媒制度变迁的基本诱因、前提条件和影响因素，从而形成对媒介技术影响下传媒制度的变迁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本书采取一种年鉴史学所谓的"趋势"(conjuncture)的视角，来检证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制度变迁的影

①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中文版自序.

响过程。比起考察短暂的事件史，拉长考察的时段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宏观的基础视野，同时更可能超越偶发性造成的判断失误。这样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割裂的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的两条线索，而是在活生生的历史中发生的媒介技术对传媒制度的影响史。

第二，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不单从 media system 而是从 media institution 的角度出发界定"传媒制度"的内涵，将传媒制度分为媒体内部制度（包括内容生产机制和经营管理制度）和媒体外部管理制度（传播法规），并将它们视为在传媒运作过程中起约束作用的一整套规则，不仅包括正式的成文规则，也包括那些作为正式规则之基础与补充的典型的非成文行为准则。在具体章节中，分别论述晚清时媒介技术发展对媒体内部制度（包括内容生产机制和经营管理制度）、媒体外部管理制度（传播法规）和传媒制度的形成环境（社会传播习俗）的影响。试图对晚清媒介技术发展和传媒制度变迁的整体形势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解析晚清传媒制度变迁的基本诱因、前提条件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因素等，从而形成对媒介技术影响下传媒制度的变迁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

第三，在系统的动态分析方法框架下，结合社会建构论和创新的扩散等理论，既分析媒介技术对晚清传媒制度的影响，亦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形成视角对媒介技术的制度选择以至整个社会选择展开分析。采用"问题导向"而不是"方法导向"原则，力求摆脱单纯的"制度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观点，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建构视角入手，认为媒介技术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社会行动中形成的。当然，社会对媒介技术的建构只是部分的，因为媒介技术具有"可塑因"与"不可塑因"两部分。作为社会因素的一部分，传媒制度自然也参与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

第四，多重视角的比较研究。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没有比较，就不能认识和区别事物，进行归纳，找到共性；没有比较，就不能确立认识的范畴，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找到个性。比较可以更好地把握事物之间的实质差异，廓清影响传媒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同时，为了更好地对演绎结果进行验证，也需要在不同背景下对事物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媒介技术和传媒制度变化前后的不同情况，我们可以避免只从一个角度解释的危险。基于此，本书采用了多重比较的视角：第一，纵向比较，以时间为维度，将研究对象嵌入在历史进程当中，探讨晚清传媒制度变迁前后的差别，探讨不同时期特定事物的演变或人们认识的变化；第二，横向比较，以空间为维度，说明不同区域中某个特定事物的演化路径。文中不仅关注了上海等大都市或通商口岸，也把目光投向了四川、西藏等中国腹地，以期对当时的传播事业发展情况有一个相对更为客观的认知；第三，交叉比较，从时空等多

个维度对事物的发展进行比较。相对于纵向和横向比较，交叉比较能更为全面地反映事物的演化规律。

第五，采取案例研究方法，希望最大限度地弥补比较研究方法可能的漏洞，力求发掘"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佐证，因为它们真正构成了媒介技术和传媒制度发展的基盘和底线。书中试图从汪康年、包天笑、王韬、孙宝瑄、李鸿章等具有"私域"色彩的材料，以及《点石斋画报》、晚清部分小说中寻找佐证，探求"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背景下的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制度变迁的影响。事物是复杂的，事物的演化取决于各因素的关系。关于媒介技术对传媒制度的影响，也要探究演化的机理和效应，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做到这点，可以通过"解剖麻雀"来反映对象与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六，要使新闻传播学研究有所深化，只局限于新闻传播本学科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需要拓展研究领域，也需要转换观察问题的视角。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仅是拓宽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也是孕育新观点的契机。本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探讨媒介技术对传播习俗的影响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事实上，传播习俗并非只是传媒制度的简单附庸，探讨媒介技术对传播习俗的影响可以更完整地反映出晚清时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制度变迁的推动。

第一章　晚清媒介技术的革命性发展

人类传播活动必须以可供参与的物质条件的存在为前提。在口头和书写传播时代，说话的发音器官和书写工具决定了传播的形态，也深深影响了社会行为的模式，或许"不能真正分开传播手段和传播关系，它们在一起组成传播模式"①。人类发展史也是媒介技术发展史。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世界面貌越来越新。② 人类一直在为寻求更及时、更有效和更生动的信息传播方式而对媒介技术不断加以改进，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导致了传播形式的更新重叠，拓展着人类的生存时空。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电力技术实际上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好像是覆盖全球的一张膜"③，"电力传播使万物恢复到一个无所不包的此在(an inclusive present)。新技术使人人相互联系，它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延伸，它把原始社会的形象转换为一种普适的背景，这种背景把过去的一切外观埋葬起来"④。由于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引进，加上电力和蒸汽动力的使用，晚清的媒介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突破。这种突破对晚清的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那么，晚清时媒介技术究竟取得了哪些新的突破？本章即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回答。

当然，在剖析晚清媒介技术的突破之前，先简要勾勒出晚清以前一些重要媒介技术的发展轮廓，以期比较之下能对晚清媒介技术发展情况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

① 陈卫星. 传播的观念[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

② 当然，所有重要的发明和发现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少数发明和发现对人类文明史进程而言却是至为关键的，比如印刷术、电报、电视、互联网等，相应的我们应该给予其更多关注。

③ 马歇尔·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精粹[M]. 何道宽，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4.

④ 马歇尔·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精粹[M]. 何道宽，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3.

第一节 晚清以前媒介技术发展简述

在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系统中，传播媒介担负着重要的作用。它承载、传递信息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活动的整体流程。虽然依靠大众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只是近代的事情，但人类的传播活动早就有之。在语言发展成为系统的传播符号之后，文字也出现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使传播由听觉扩展到视觉，原有的建立在语言媒介基础上的信息传播世界得以大范围扩展。较之语言媒介，书写媒介突破了传播活动中时空条件的限制，具有易保存、歧义少、范围广等优点，使传播活动具备了异域性和异时性。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类远距离的信息沟通主要靠手抄传播。手抄传播速度慢，而且也极易出错。纸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送的成本，为传播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而印刷术的发明、改进更是加速了传播活动的发展，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驿传系统和民间信房传递技术的不断改进，则对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递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保障。

一、从印刷技术到印刷术

人类的历史，大部分赖于文字记录才保存至今。“中国人对于思想与活动的记载方式和技术，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譬如现代世界上通行的书籍和读物，其基本特质是将文字用黑墨印在白纸上。在制作材料和生产方法的演进中，中国的贡献可以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①。

正如西谚所云，“Printing，the mother of progress！”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原始传播媒介，语言的产生可以归结为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生态需要，多少带有些自发和被动的意味。而印刷物的出现是技术进步结出的硕果，更多源于人类的自觉和主动。

任何重大发明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印刷术亦如此。正如钱存训先生所指出的：“上自公元前14世纪，今日所见最早的中国文字起始，以迄公元700年左右，即印刷术发轫时期。这二千多年是中国文字记录和书籍发展的滥觞时代，所有的各种书写材料、内容、记载方法、编排，以及若干中国书籍所特有的形式，皆于此时期逐渐形成。印刷术发明以后，这些特色乃被继承，成为中国典籍和文化传统的重要部

---

① 钱存训. 书于竹帛[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

分。印刷术的发明是书籍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它只是改变了生产的方法和增加了产量，至于书籍的实质、内容和形式，与采用印刷术以前都没有重大的分别。"[①]从甲骨、金石、竹帛，到纸写本、雕印本、活印本，再到机械复制本……印刷技术的每次变化都对中国古代社会信息的流通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里还要交代一下"印刷技术"和"印刷术"在本书中的区别。从字义分析，在承载物上施以痕迹谓之印，涂擦谓之刷，所谓印刷技术就是用刷涂、捺拓、拍压等方法着痕迹于其他物体。而印刷术是指运用雕版或者活版技术大规模复制的技术。从简单的印刷技术发展能够大规模复制的印刷术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刻印器械；二是纸墨等物质条件；三是掌握反文印刷等原理。古代的印章和拓印技术可被视为雕版印刷的雏型，"由反体取得正文的原理，是中国人最早设想的一种巧妙构思"[②]。

印刷术在中国的发展与宗教息息相关。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异常兴盛，从而也引发了对佛教典籍的大量需求。《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等佛经不仅宣称佛经教义，还鼓励人们书写持诵佛经以求福祉回报。信仰这种因果报应的不少人便对佛经进行扩写，以"抄书为业"的经生与佣书也相应而生。然而，手写毕竟是费人费力的活动，人们对更为便捷的复制技术的渴望不言而喻。同时，佛教徒还非常追求偶像崇拜，他们不仅需要复制经文经咒，更迫切需要将图像复制下来，以达到图文一致的效果。为完成这一任务，佛教徒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与探索[③]。

除了佛教和印刷术的勾连外，亦有论者指出，道教对我国早期的雕版印刷术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晋时期的道教徒使用的符咒之印使得我国传统印章的雕刻工序向雕版印刷的雕刻工艺过渡的两个障碍[④]得到突破，从而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奠定了技术基础；二是在晚唐五代时期，道教徒雕版印刷

---

① 钱存训. 书于竹帛[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5.

② 钱存训. 书于竹帛[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7.

③ 现存《金刚经》所用的捶拓与印章便是雕版印刷的结果，7 世纪前期出现的佛像雕印是雕版印刷术的最初形式，8 世纪出现的经咒印本表明了雕版印刷术的长足进步，而 9 世纪出现的图文并茂的整部佛经《金刚经》印本更加说明了雕版印刷术的日臻成熟。

④ 雕刻印刷是我国印刷术的最早形式，是印章盖印和拓石两种方法的结合和逐步演变，所以印章和拓石为印刷技术的发明准备了技术条件，是印刷术发明的先驱。拓印术东汉熹平年间即已出现，也就是说东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具备了相关技术条件，那为何在几百年后才出现雕版印刷术呢？王小蓉认为，因为传统的印章在雕刻工序方面存在着向雕版印刷工艺过渡的两个障碍：一是印章雕版的材质一般是石头，比雕版印刷所用的木材要硬得多，难于大量雕刻；二是印章的面积很小，不便用于雕刻有大量文字的书籍。参见王小蓉. 道教与我国早期雕版印刷术关系浅探[J]. 宗教学研究，2005(2).

了大量的道教典籍，从而为我国初期的雕版印刷术走向成熟做出了贡献。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书籍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思想文化得到更快捷、更广泛的传播。

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是现存有纪年的最早雕版印本，其经文扉画刻印具精，是雕版印刷在唐朝已经成熟的实物证据。而五代冯道刻《九经》，历时 22 年，为我国官刻之始，开大规模刻印之先河。不过，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指出的，“雕版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雕版印刷虽是我国隋唐以来的一大发明，但宋代才是书籍传播由写本向印本全面转化的时期。个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唐代适合大批量复制的印刷物并不是很多；[①]二是当时印刷技术尚未成熟，正如唐代柳玭在《忠训・序》中所言，“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存在字迹漫漶，模糊不清的状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本书籍的传播，尤其是儒家经典的制作是十分郑重的，不容墨影漫漶的现象出现。[②] 自唐代初期至晚清约 1 300 年间，中国一直以雕版印刷为主。

如果说雕版印刷是一种单纯、保守的文化复制方式，那么活字印刷则是复制和更新相结合的一种传播手段，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③] 不过遗憾的是，尽管活字印刷技术早在宋朝即已出现，但在漫长的时间里它始终未能成为我国书籍印刷的主流，倒是在欧洲率先成为主流传播手段——藉此，欧洲诸国扬起文艺复兴的大旗，拉开了世界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序幕。活字印刷带来的绝不仅是一种快速复制书籍的方法，更是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加快了文化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并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从而“彻底地改变了西方文明”[④]。培根（Bacon）在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了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后曾格言式地宣称“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⑤]。

---

① 比如，需求量很大的数书、小学这些印刷物，在唐代虽已出现，但并未大规模地采用雕版印刷，采用雕版印刷最多的主要是历书、佛像、佛经等，所以可以说唐代还是写本时代。

② 清飏．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宋代出版传播方式的变革[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5)．

③ 肖三，王德胜．从传播技术视角解读文化的发展——兼论李约瑟难题[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2)．

④ 比尔・盖茨．未来之路[M]．辜正坤，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

⑤ 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03．

但我国直到明代，官报才在形式上取得了重大发展——“邸报”改用活字印刷。邸报的活字印刷是我国媒介技术发展的重要一步，也是世界新闻传播史上的大事件。“这一变化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变更，更说明报纸在此时的读者增多，需求量增大。这在新闻传播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①。当然，并不是自明代起邸报全部采用活字印刷术了，之后还一直是抄写与印刷形式并存。

回顾历史，可以说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造就了印刷术的社会环境和客观需求：陶器的制作中孕育了图形印刷技术；金属冶炼中出现了铸造制模技术；绘画和雕刻完善了印版的制作技术；纺织和造纸技术的发展不断发明出新的承印物；墨和颜料的生产则为转印材料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造纸术

纸质媒介，主要是以文字为符码来反映现实的。其白纸黑字一方面增加了其传递信息的清晰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信息进行再次求证的可能。② 和口耳相传相比，文字记录便于保存而且富于逻辑的优越性不言而喻。“纸的消费常常被看作是一个民族进步程度和文化水平的标志”③。中国古代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书面化，对书面形式的利用超过任何一个国家。④ 民族文化的兴衰存亡，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同它的文化传播及文化积累方式分不开。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过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是和中国文化特有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的。⑤

在世界各民族，人们都在为寻找适合文字记载的介质而孜孜努力。在国外，文字主要记在埃及莎草、羊皮纸或贝多罗叶上；我国古代则主要利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材料。殷商以甲骨刻字为主，也有的刻在青铜器上，形成钟鼎文。周代主要用铜器铸字或刻字记事。春秋、战国时期常用竹简，间或使用缣帛。⑥ 我

① 方晓红. 中国新闻史[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

② 孙发友. 传播科技发展与新闻文体演变[J]. 现代传播，2004(1).

③ Tom Bolton. 纸[M]. 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8.

④ 孙旭培. 华夏传播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1.

⑤ 沙莲香. 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85.

⑥ 1957 年，在西安市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 2 世纪的纸，这些纸的原料主要是大麻和苎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史称“灞桥纸”。20 世纪 70 年代，在甘肃居延的肩水金关汉代遗址中，再次出土了公元前 1 世纪的麻纸。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就已发明了造纸术。不过早期的西汉麻纸还比较粗糙，不便书写。

国小篆里就已出现“纸”字，这说明早在秦代就有了关于纸的说法。

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其制作过程是把煮过的蚕茧铺在席子上，浸到水中敲打，在敲打过程中蚕茧中的胶质会混杂一些碎丝附着在席子上，取下丝绵之后，这些留在席子上的残絮经晾干就形成薄薄的丝绵片，古时称之为“赫蹏”，其书写功效类似于帛。这些可能给人们发明造纸术以直接的技术上的启示。这种叫“赫蹏”的薄片如果仅仅停留在丝绵加工中，那它充其量只是丝织技术的副产品。也就是说，纸的出现还需要强大的社会需求加以推动。秦汉之后，大一统的国家需要尽快传递中央政府的各项指令，因此由掌管皇家工场的尚方令蔡伦①来完成造纸术的改进，②也就不足为奇了。

纸的出现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大大减少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误差。正如古语“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所言，文字成了人们最为信任的信息符号。和印刷术的发明一样，造纸术的发明既是传播科技史上的一次飞跃，也是整个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从此信息传播不仅超越人际间口头传播的方式，而且超越了笨重的竹简、昂贵的缣帛与笔墨相结合的手抄传播方式，出现了印刷传播，从而使传播范围更广，效率也大为提高”③。

汉以后造纸术继续发展。三国时出现了用稻草制的草纸、用木材造的壳纸和用旧鱼网造的网纸。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藤为原料的藤纸，工艺技术日趋精细，原料也趋于多样化。并采用帘床设备捞纸，既提高了工效，又使纸张有了一定规格，便于运输、贮藏、书写、装订。唐代竹纸的问世，表明造纸技术已相当成熟。

---

① 据《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记载：“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始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从这段简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蔡伦的成功绝非偶然：因为从“暴体田野”可知他经常参加农业劳动，从“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可见他具有高超的制作技能。

② 蔡伦对造纸术的改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形成了新的原料来源，而且成本较低，破布、破网等皆可变废为宝，至于用树皮做原料更是开近代木浆纸制作之先河；二是原料的物理性能相对较稳定，批量生产时维持相对类似的品质；三是便于运输和存贮；四是技术上的革新，造纸术经蔡伦改进后形成了较为定型的工艺流程。汉以后虽然造纸工艺不断完善，但四个步骤基本相似，即使现代的湿法造纸生产工艺仍与其相似。

③ 吴廷俊. 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64.

两宋时，纸与笔、墨、砚一起被列为“文房四宝”，成为读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①宋代的竹纸品种多样，单是上品就有“姚黄”、“学士”、“邵公”三种。明清的宣纸莹润如玉，达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

但总的来讲，“关于印刷术对人的感受力的影响所作的明确的评论和了解，实在是寥若晨星”②，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史学家对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似乎仍不够重视，以致在所见的历史文献中相关的具体记载、描述和评价甚少，甚至连这些发明的“专利权”属于谁、具体产生于什么时间都还有争议。③ 漫长的历史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作用和意义都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肯定。

三、驿传系统

在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国家，权力中心运转状况是政治控制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正如孔飞力(Pilip A. Kuhn)所指出的，“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④。信息传递的功能和目的是消除不确定性，通过信息传递，接受信息者可以了解信息发送者的状态、行为、属性、需求等，为实现政治控制做好准备。所以在政治控制中，信息传递是否迅捷与通畅是一个关键问题。

古代驿传系统⑤作为政治信息传递的载体，与各种公文制度共同构成政治信息传递系统，为实现政治控制的目的提供条件，在政治和军事生活中具备重要作用。驿传系统是以驿站为主的信息传递方式的总和。从功能上讲，驿传系统集官员接待、文报传递、物资运输于一身。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官员出行可以看作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交通运输在很多情况下也能被视为信息传递的结果。作为

---

① 当时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讨论纸的优劣的著作，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米芾的《十纸说》。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9.

③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时间，肖东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印刷术始自6~7世纪之交。参见肖东发. 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5；张秀民综其荦荦大端，总结出六种不同的观点，即东汉说、晋代说、六朝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

④ 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 陈兼，刘昶，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69.

⑤ 之所以称“驿传系统”而不采用“邮驿”、“邮传”等说法，是因为中国古代的“邮”一般专指为传达官方政令与文报而建立的通讯方式，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国家通讯。直到近代邮政才接受私人通讯与私书传递，以民间信息传递作为依托，而不再是单纯的国家通讯。

一个体系，它还包括驿站以外的台、站、塘、铺等信息传递组织。①

驿传自西周始，秦王朝的中央集权下发达的交通、书同文、车同轨促进了沟通全国的驿传系统的建立。汉初将周秦广义的“邮”改称为“置”，到汉武帝前后，文献中正式出现“驿”。以后各代对驿传均相当重视，有关法律制度严密完备、馆驿传递多种多样、驿路水陆相兼四通八达，均为了保证信息传递的迅速、准确和安全。如唐朝在全国设驿 1600 多处，其中陆驿 1200 多处，水驿 260 多处，水陆兼办的 80 多处，形成传递官文书的庞大通信网。② 元时，驿传之制最为发达，有站赤，有急递铺。③

驿传系统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王权政治的四处延伸互为表里，王权所及，驿传必定跟随而至；驿传所到之处，也意味着王权统治的建立。况且孔子又有置邮而传命之说，使后代的统治者在发展驿传系统的实践上更是争先恐后，趋之若鹜。“皇华天使往来其间，朝贡述职，奔趋其道，络绎不绝”④。

驿传的正常运转是保证中央与各地方之间信息传播的必要条件，唯有信道通畅，才能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般自如。如果驿传壅滞，统治者则政令不畅，难以号召地方。宋代吴昌裔在讲到当时京城与四川之间的驿递弊病时说：“近年以来，旧规寖废，军中之递，不以报边警，而但为交贿之驿。川中之递，不以通脉络，而徒为寄书之邮。”⑤在几千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驿传系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组织与制度，具有官员接待、文报传递、物资转运三项功能。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媒介技术发展情况远未被重视，即使在中国当下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对中国古代媒介技术发展的考量也处于低度开发的境域。这种状态使得媒介技术迟迟无法成为检视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着力焦点。

---

① 刘文鹏. 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

② 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诗中曾这样描写：“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③ 站赤是驿。急递铺是邮。站赤，有陆站，有水站。陆站，用马，用牛，用驴，或用车，或用轿，或徒步，而辽东又有用狗者。水站，用舟。准予发给驿传的玺书，叫作铺马圣旨；遇军务急时，以会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官有驿令，有提领。又有所谓脱脱禾孙者，置于关会之地，以司辨诘，俱属于通政院和中书兵部。参见白寿彝. 中国交通史（插图珍藏本）[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171-172.

④ 钱振龙纂修.（康熙）隆昌县志（卷二）[M]//仇润喜，刘广生. 中国邮驿史料.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9：398.

⑤ 吴昌裔. 论救蜀四事疏（卷二）[M]//仇润喜，刘广生中国邮驿史料.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9：264.

第二节 晚清媒介技术的革命性发展

一、印刷术的剧变营造出新的出版文化生态

尽管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出现很早,但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活字印刷术长期未能成为主流,也未被真正应用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去。① 不过时至晚清情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版业"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大发展"②。

1. 印刷速度

首先我们看到,印刷速度在晚清有了明显的提升。如戈公振先生所言,"咸同间,始多铅印,但印机甚陋,每小时只印一二百小纸;光宣间,石印机与铅印机输入日多,报纸每日可出数千大张"③,大的石印机构能够"四五部印刷机同时开印,并且每部机器能够印出更多的页数"④。

在上海,文人们最早亲眼看到的大机器,除了轮船轮机以外,应当就是墨海书馆的印书机器。墨海书馆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上海开埠时设立的新式印刷出版机构。该馆用机器印刷书籍,以牛为动力。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手工的印书机器,吸引了中国读书人的兴趣,在江浙士林中传为奇谈。⑤ 其使用的印书车"以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⑥。

王韬的父亲在墨海书馆初创时即在此助西人译书,王韬初次来沪,就在墨海书馆亲眼看到了机器印书的情景,并为之惊叹不已。他写道:"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

---

① 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统计,所录历代善本11000多部中活字印本只有150余部,不到总数的1.5%。

② 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5:357.

④ 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57:88.

⑤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43.

⑥ 王韬.瀛壖杂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8-119.

而捷矣。书楼俱以玻黎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①

因此，墨海书馆的机器印书房，成了来沪的文人学士争相往观的一处奇景。目睹西洋印书机器后，游之者无不啧啧称奇，或叹为妙绝，或叹其机轮巧妙，不少人还挥毫写下了咏叹的诗文，比如"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不解，不耕禾陇种书田"②。

蒸汽机更为媒介技术的发展插上了有力的双翼。《北华捷报》1889 年 5 月 25 日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石印业"的报道中，就说"石印使用蒸汽机，已能使四五部印刷机同时开印"，上海则是中国"最早采用蒸汽机印刷的地方"③。该报 1892 年 12 月 23 日的"杭州通讯"中也有类似记载："本城使用蒸汽机的石印工厂，是我最近看到的一桩新鲜的事情。"这位通讯员还曾到一家这样的石印厂参观，看到"他们有印刷机两台，由一台小发动机发动"④。1893 年，同文书局失火，"厂中有发动机、锅炉与印刷机，全部焚毁，估计损失约一万五千元"⑤。蒸汽机这样的先进技术的广泛使用，不仅触发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也为报刊出版向工业化大生产方式过渡奠定了基础。

1897 年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引进了世界先进的凸印、平印、凹印等设备和技术，同时还开办铁工厂仿制各种印刷机械，甚至能做到"日出一书"⑥。上海印刷业于 1898 年始用日本仿制的欧式回转印机，印刷工效大为提高，1906 年开始使用华府台单滚筒机，每小时可印 1 000 张。1908 年商务印书馆起用铅版印刷机代替石版，每小时可印 1 500 张左右。

2. 印刷数量

申报馆 1882 年翻印了《康熙字典》，印制精美，定价合理，先后印行两次共计 10 万部，销行数量可能为当时之最。1884 年起申报馆专设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用活字版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历时四年告成，共 1 628 册。

1880 年，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时间最长、译书最多的傅兰雅在总结该馆成就时指出：近十年间共译出书籍 98 种，计 235 册，每册约 60～100 页，共出售 3 111

① 王韬. 漫游随录・扶桑游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51.
② 王韬. 瀛壖杂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9.
③ 孙毓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008-1009.
④ 孙毓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010-1011.
⑤ 孙毓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006.
⑥ 闵大洪. 对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多写几笔[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部，合计 83 454 册。此外还用铜版印刷地图、航海图 27 种，售出 4 774 张。① 这样的印刷数量在晚清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3. *印刷质量*

从印刷术角度看，石印与铅印都属于中国以外的印刷传统。这两种印刷技术在质量上都比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更胜一筹。

就石印技术而言，其忠于原作的特性使得画面的精准复制成为可能，据黄式权《松南梦影录》记载，“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细若牛毛，明如犀角”②，石印之术不仅快速，而且避免了描摹雕刻过程中的变异，蝇头小字笔划清楚，印出来的作品纤毫毕具，能把画家的细致笔触与恢宏场景逼真再现，自然远胜雕版，因此带来了画报和石印书籍在晚清的繁荣。1904 年，文明书局始办彩色石印，雇用日本技师，教授学生，始有浓淡色版。其印刷图画，色彩能分明暗，深淡各如其度，殆与实物仿佛。③ 此后，彩色石印技术大量运用于小说书籍的封面制作。

从铅印技术来看，在凸版印刷中，纸型可以多打几副，印刷一定次数就更换，大大保证了印刷的质量。凹版印刷的显著特点就是印刷精美，图文并茂。晚清最早的科技期刊《格致汇编》即用此法印成，其中不少插图用“铜板镂镌精细”，在当时的出版物中还不多见，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申报馆采用铅字和机器印刷相结合排印了《申报聚珍版丛书》。铅字比起木制雕版字体要小得多，但同时清晰度也高得多，更便于携带和阅读。《申报》创办人安纳斯脱·美查(Major)甚至还在报上发表了题为《铅字印书宜用机器论》的社论，鼓动江南地区的书商们购买新式印刷机器。

相较而言，石版与铅版印刷的纸张容易受潮而伸缩率高，光绪初年在我国已经出现的珂罗版印刷解决了这一难题。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的“圣母”等教会图画印刷品就是珂罗版的。后来商务印书馆在 1907 年使用彩色珂罗版印刷就更加精美了。④

4. *印刷版料*

尽管晚清的首批中文近代报刊是木板雕印的，但很快就出现了石印和铅印，

---

① 傅兰雅. 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M]//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21-25.

②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79.

③ 贺圣鼐.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M]//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271.

④ 吉少甫. 中国出版简史[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263-264.

"嘉道间,报纸多木板印刷;咸同间,始多铅印……光宣间,石印机与铅印机输入日多"①。

石印是指以石头为制版材料的平版印刷术。其主要方法是用药墨将文字写在药纸上,再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板上,然后滚刷油墨便可把字印在纸上。早在鸦片战争前石印技术即已传入中国,譬如1838年创刊的《各国消息》即为石印。由于石印技术对印刷质量和数量的保证,价格自然低廉,而且印刷时又可随意缩小,方便舟车携带,传入后受到国人的热烈欢迎,为信息走向大众奠定了基础。

再来看铅活字印刷在晚清的发展。尽管有论者认为中国使用欧洲铅活字印刷术是在1590年,②但毋庸置疑的是,直至晚清铅活字印刷才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1834年美国传教士将一套汉文木刻活字送往美国波士顿,复制成铅铸活字后送回中国。1834年法国传教士也在巴黎复制了一套汉文铅字。19世纪50年代,外国人办的印书馆又制成电镀汉文字模和以24盘常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这些成果,逐渐为各报所采用。③ 到了19世纪70年代前后,多数中文报纸已经改用铅字印刷。差不多在80年代,金属活字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国人在改进印刷版料方面也一直在孜孜努力。比如,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同儿子发增、一棠、一杰、一新,以三十年的心力用毕昇遗法制成泥活字十万多个,排印翟金生自著《泥版试印初编》等。翟氏把他这套泥活字印本书自称为"泥斗板",还叫"澄泥板",也叫"泥聚珍板"④。

5. *印刷字体*

尽管字体问题常被研究者忽略,但晚清印刷术的变革确与字体的发展息息相关,字体也带有鲜明的技术烙印。傅兰雅(John Fryer)认为,"中国刻板法,将书以宋字写于薄纸,反糊于木板,则用力剞劂。书中所有图画,则有画工摹成,同糊板上镌之"⑤。傅兰雅所谓的"宋字",就是我们今天普遍采用的宋体字。这种字体出现于明朝万历年间,"明季始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⑥。这种字体非颜非

---

①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357.

② 陈燕. 超越时空——媒介科技史论[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4.

③ 丁淦林. 中国新闻事业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1.

④ 魏隐儒. 中国古籍印刷史[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39-240.

⑤ 傅兰雅.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M]//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18.

⑥ 贺圣鼐.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M]//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262.

柳、非欧非赵，却糅杂了各体的长处，横轻竖重，适于写版，美观实用，很对中国旧式文人的口味。

因为印刷新技术的传入，延续数百年的字体发展脉络遭到冲击破坏。"从功能的层面来看，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新技术的局限性对于字体功能的阻碍，进而是通过技术上的改造对局限性所造成的后果进行预先调整和修正，使功能得以实现，这个过程是机器的技术与人使用机器的技术相博弈的过程"①。

晚清时西方的先进技术的传入客观上推动了活字字体的丰富，使活字字体随着兴起的报刊出版业变成传播活动中的重要因子。对当时的印刷出版人而言，如何以适合于西文活字的技术来解决有着庞大的字数量的汉字系统，并提升汉字印刷的工艺品质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两道难题。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一些出版机构不断改进技术，采用国外新机器新方法，创制楷书体、隶书体及黑体活字字模，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宋体字独据版面的局面。

6. 印刷形式

晚清印刷形式明显丰富起来，由铅字铜模的凸版印刷术，到石版印刷术等平版印刷以及后来发展的凹版印刷术，晚清的印刷术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为后来印刷出版的现代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凸版印刷是在机器上的油墨滚子滚过时，只有凸起的部分着墨，以原状印在纸面，纸面的墨迹和印版着墨部分相一致。凸版印刷以铅活字印刷为主。至于凹版印刷，则有照相凹版(影写版)和雕刻版的区别。雕刻版主要就是雕刻铜版，为意大利人腓纳求赖(Maso Finiguerra)于 1452 年发明。我国的王肇鋐在日本游学始知此法，并著《铜刻小记》介绍雕刻铜版的方法，但并未引起时人的注意。到 1905 年，商务印书馆聘用日本技师传授，雕刻铜版印刷在我国日渐增多。

平版印刷是指印版的图文部分与非图文部分在同一平面上，其印制原理是利用水油相互排斥的作用在版面上的化学处理。② 作为平版印刷的一种重要形式，珂罗版印刷在光绪初年已经出现，而且印出来的作品清晰美观，远胜雕版。

二、造纸技术的发展为印刷能力的扩容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 70 年代，有相当规模的大出版社在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相继出现，书籍、报纸、杂志的发行数量不断增加。由于它们采用的都是西方先进的印

---

① 李少波. 黑体字研究[D].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166.

② 陈燕. 超越时空——媒介科技史论[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2.

刷技术，纸张、油墨和印刷设备都要从外国进口。1798 年，法国的路易·罗伯尔发明造纸机，机械造纸代替了手工造纸，手工造纸业也就此衰落。1880 年以前，采用西方印刷术的许多大出版社都是用大量的白银买进机制纸。1880 年以后，机械造纸技术传入中国，中国自造的机制纸先后在上海机器造纸局和广东宏远堂造纸公司产生，标志着中国近代机械造纸的诞生。但自造的机制纸数量很有限，不能满足大量的需求，绝大部分纸张还是靠进口。

1902～1910 年的晚清十年是新式媒体在晚清开始活跃的十年。各种白话报刊创办，各种类型的印刷厂开办，纸张等印刷器械和耗材进口量大幅度增加。当时的铅字印刷用纸，大多依赖进口，从光绪年间开始大量输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海关开始有详细的记载，每年大约为几十万元，1912 年高达到 3 446 547 元。[①] 这些用纸在依靠进口的同时，国内造纸业也为印刷提供了很大的支持。1884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机器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厂建成投产，能日产漂白施胶的洋式纸两吨。19 世纪 90 年代，广州出现了能年产纸 800 余吨的造纸厂。1904 年，中国第一家官商合办的龙昌机器造纸公司在上海创立，主要生产书刊印刷用毛边纸和连史纸，达到日产 10 吨的生产能力。1907 年，官办武昌白沙洲造纸厂建立，年产连史纸、包纱纸、印刷书刊用纸 530 吨，1910 年，志强造纸厂在东北吉林建立，主要生产书刊印刷用纸，年产 500 吨。此外，重庆、济南、广东、贵阳、上海等地在 19 世纪初叶都有大量机器造纸厂建成投产。[②]

这些生产条件的出现也为印刷大于出版格局的持续出现准备了条件，为印刷和出版的关系，出版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带来重大转变。印刷能力的迅速扩大，为各种新生政治社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带来了几乎是决定性的变化。[③]

三、电报技术的出现使得时间战胜了空间

经典信息理论将一般信息过程简化为"信源—信道—信宿"的模式。从纯技术的角度看，传播技术和手段正是信息的载体和流通的管道，是信息传输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千百年来，人类为打破传播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进行了不懈努力。

---

① 贺圣鼐.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M]//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278.

②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 简明中华印刷通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54-259.

③ 雷启立. 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79.

19世纪初，轮船、火车的相继发明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速度，但依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844年美国莫尔斯(Morse)首先试验成功了电报通信。由于是利用电磁波作载体来实现人类远距离传输与交换信息的通信方式，电报技术可使信息瞬间即达，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让时间战胜了空间。电报作为日后大众媒介的先声，对当时的社会有着石破天惊的冲击。正如《万国公报》所赞，“今泰西各邦皆设电报，无论隔厂阻海，顷刻通音，诚启古今未有之奇，泄造化莫名之秘，富强之功实基于此”①。

外国电报的到来以及它在当时战争②、外交中的运用，使中国传统的驿传系统相形见绌，并成为影响国家之间战略优劣的主要因素，使得当时的统治者看到了传统驿传系统根本无法与电报相提并论，对发展电报事业不得不认真地加以考虑。于是从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以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清朝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电报线网络，基本上担负起国家军政要务的信息传递。“中国电报创造未及十年，现已东至东三省，南至山东、河南、江苏、浙、闽、两广，缘江而上，至皖鄂入川黔，以达云南之极边；东与桂边相接，腹地旁推，交通几于无省不有，即隔海之台湾，属国之朝鲜，亦皆遍设”③。关于电报线路的架设，清政府在与外国的交涉中遵循了这样一条原则：外国只能设海线，陆线则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然轻易地丧失了中国的海上通信权，把海线登陆权无限期地奉送给外国，但毕竟为中国保存了陆地通信权，为今后中国自主兴办电报创造了条件。这一点，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④

电报网络的逐步建成，对于改变传递军政信息的传统格局有重大意义。“有此电报，不独军机密事，瞬息可达，而有一处电报，即不啻添一处屯兵。若本有防营，更通电报，则一营兵卒可抵数营之用，一处兵卒可作数处之用。故两国构衅，均藉电报以征调，有者多胜，无者多败。此减得保护国家之要图也”⑤。

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朝已经将京沪、长江沿线至广州至龙州的电报线建成，在中法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但非常有利于军报传递，而且改变了过去“奏

---

① 参见《论中国兴电报之益》，《万国公报》第39册，1892年4月，第20本，第12715页。

② 比如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清廷由于通讯工具落后，消息闭塞，军机迟误，注定了不利的战争结局。这给总督沈葆桢以极大刺激，使他从最初反对铺设电报线，转而坚决支持发展电报业。他甚至将电报比作万里长城，还提出了铺设福州—马尾—厦门—台南这样一条电报线的建议。

③ 李鸿章．拟办山陕商线折(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M]//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六六)．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2490.

④ 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48-49.

⑤ 参见《论中国兴电报之益》，《万国公报》第39册，1892年4月，第20本，第12716页。

折往返须五十余日"的局面。李鸿章对此非常自豪:"自光绪六年创始,先从天津上海设局开办,逐渐推广。十年将通州电局移设京城,联为一气。自是沿江沿海边远各省,次第接设电线,绵亘至一万数千里。"[①]尽管李鸿章的奏报不无溢美之词,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当清朝统治者获得了一种比传统驿传系统更有效率的信息传递方式之后,当军政事务的处理因此变得迅速、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因此变得更加易于把握时,喜悦之情不禁溢于言表。自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清朝外侮日深,但国内一直没有太大的动乱,在一定程度上与以电报为信息传递工具、信息传递迅速、能够闻讯立动、消患于未萌有很大关系。[②]

在晚清电报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提的是1873年华侨商人王承荣与王斌合作,制造出了专传汉字的电报机,这是我国第一台国产电报机,在中国通信史上具有重要意义。[③] 他还呈请清政府自办电报。这在中国电报史上无疑是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可惜由于清政府拒不采纳,二王的名字长期湮没无闻,他们自制的电报机也未传于世。

因为汉字不能以声音笔划收发电报,一个字需要使用四个数码来代替,传输电报较之西文字母复杂费时,在接收国外电报时费用增加,积月累岁,遂成一大漏卮。黄遵宪的弟弟黄遵楷经过刻苦钻研将四码改进为三码,这样每字可省钱二元四角三分,不仅节约了大量的费用,而且还比原来的四码省工、快捷、准确。[④] 这亦是中国电报史上的重要事件。

中国使用无线电报始于清朝末年。1905年,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同时购置无线电收发报机,分别安装在北京、天津、保定和北洋海军的舰只上。1880年清廷在天津创办了津沪电报总局,两年后该局迁址上海,并更名为中国电报总局。继之各省也陆续建立了一批电报局,从而形成了贯通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现代电讯组织系统。1906年,清政府设立邮传部,内设电政司,掌管无线电和电报、电话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1908年),上海与崇明岛之间的海底电缆毁损,江苏省用公款

---

① 李鸿章.京沪电报请奖折(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M]//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四).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2724.

② 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86-287.

③ 吴廷俊.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123;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68.

④ 参见《湘报》第134号,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购买无线电收发报机代替之，上海淞崇无线电报局建立，开始用长波无线技术通电报。最初的无线电通讯主要应用于船舶军舰之间，以后逐步取代了电线电报。[①]这则是我国民用无线电报的开始。

四、流通技术的丰富大大拓宽了传播渠道

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物质文明的进步，包括食品、服饰、住房、日常用品诸多方面，就其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影响显著性而言，大概没有任何一项可以与交通现代化相比。[②] 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使更多更大规模的信息交流和书报传递成为可能。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铁路、电报、邮政等新的交通、通讯方式与各种军事技术一起，被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看重和接受，并力图仿效。这些新事物的传入为中国在当时寻求信息传递方式的改进提供了新思路。

1. 驿传

作为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不仅建立起了一个有着稳定疆域的帝国，也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推向完备。清代建国伊始，便开始着手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控制体制。清代皇权政治自始至终的发展过程都能在驿传系统的发展中找到回应。军机处秘而不宣的运作方式，廷寄的密发，最终要靠驿传的严密性加以保证，所以才有对驿传文报密封、交接、反馈等程序的反复斟酌与改进。以奏折制度和军机处的创建为基础，皇帝个人被置于权力运转的绝对核心，其他所有可能存在的威胁都被排除在外。“乾纲独断”的政治风格要求所有政治信息的传递必须直达御前，他人不得随意介入其间。[③] 承担国家紧要文报的传递是驿传系统最重要的一项功能，所以自明代始，驿传管理属兵部，所有军政要务无不由之。清代则有军机处之廷寄，地方大员之密折，且有 400 里、300 里、600 里之分，以显示其紧急程度。不过，随着晚清电报技术的应用与发展，驿传系统的各项功能逐渐被新兴的电报、邮政及公路、铁路交通所取代。

然而，电报并不能完全取代驿传系统。因为电报费用昂贵，简约的电文使得事务的商讨无法充分展开，而且电报网络的发展非一时之力即可办成，清政府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使之初具规模，但边远地区尚需与驿传系统互为补充。同时，作为一个

---

① 史革新. 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367.

② 丁贤勇. 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

③ 刘文鹏. 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

新生事物，统治者对电报虽很倚重，但也一直心存顾忌，甚至连李鸿章也遭到质问："有人奏该大臣于前敌各军电报，往往改易增损字句"，"臣历次电奏，原牍具在，可以复按"①。

随着 19 世纪末驿传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国内要求裁汰驿站、兴办近代邮政的呼声日益强烈，驿传系统传递寻常公文的功能逐步被近代邮政所取代。1896 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驿站事务改归邮传部管理，驿站作用逐渐消失。

2. 铁路

中国最早的铁路出现在北京。1865 年，英国商人杜兰特在北京城宣武门附近修建了一条 500 米长的铁路，"以小汽车驶其上，迅急如飞"。当时北京市民所见西洋器物不多，乍见之下，不明其理而"诧为妖物"。1876 年 6 月 30 日，吴淞铁路上海至江湾段正式建成，并试行通车，该段全长 5 英里，有 7 节客车车厢，一次可载 150 人。《申报》对当时通车情况做过详细报道。为了扩大影响，《申报》馆还特地请人拍摄了火车运行的照片出售。1876 年 8 月 17 日《申报》刊登照片时称："火轮车铁路业经筑就，每日搭坐之客往来如织，此诚中国之创举，而为别埠所从未见者。本馆因特请照相者拍成一图，俾妇女孩童以及远处人未经见有火车者共得传观，如身亲其境，当亦所心许而亟欲观之也。"到了 1877 年 10 月，这段火车正式运行不到 1 年，已载客 16 万人次，可见铁路火车已广为人们所接受。②

《万国公报》曾刊载大量关于铁路的改革建议，认为"铁路为今一世界中必不可少之利器"③，"当斯时也，凡心乎为国者，欲变弱而为强，务必创造铁路"④。并将铁路的好处总结如下：

第一，可救岁荒。"如遇旱干水溢，野无青草，室如悬盘，地方收成歉薄，若有铁路之制，外省粮米分道并运，数日之间，即可毕集民间，自无饥馑之患、流离之苦"。

第二，可救兵端。"两国相争，惟有铁路者，独操胜算。不独征兵筹饷，朝发夕至，至若敌人压境而无铁路，非但兵不易集，粮不易征，即使部署有方而防不胜防，终觉仓皇莫济矣"。⑤

---

① 李鸿章. 汇复铁路电报等事折(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M]//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九).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2914.

② 王瑞芳. 近代中国的新式交通[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4-59.

③ 参见《论铁路之利中国急宜扩充》，《万国公报》第 2 册，1889 年 3 月，第 16 本，第 10216 页。

④ 参见金珖：《富国要策》，《万国公报》第 646 卷，1881 年 7 月 2 日，第 13 本，第 8218 页。

⑤ 参见《论今日谁能助我》，《万国公报》第 24 册，1891 年 1 月，第 18 本，第 11700 页。

第三，可便商贸。“铁路成而货物之转运速，则销售广。商贾既多所赢余，则关税亦可充溢”。①

不过，中国早期铁路数量虽多，却大多是零散的支线，并未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且，由于各国的铁路技术标准不一，所筑铁路之轨距有宽有窄，互相之间并不匹配，难以通行各处。这种混乱局面，极不利于铁路行业的发展。②

3. 邮政

除了印刷术之外，邮政制度的建立是近代报刊出版业诞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近代邮政系统可以说是近代传媒产业的神经系统。正如《万国公报》所指出的，古时泰西各国与中国固然，只有驿报而已，“迨至三四百年之后，各西国渐改古法而通今法，设立书信局，均归国家经理，通行全国，不论省城乡镇，莫不相通，不误时日，不争信资，其利益岂浅鲜哉”③。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通信组织是多种多样的。有官办驿站、报局，有商办民信局、侨批局；有帝国主义国家私没的“客邮”；有租界当局、洋商、投机分子等办的“本地邮局”、“书信馆”；有半华半洋的“海关拨驷达局”；还有“华洋书信馆”，等等。就形成清代通信事业的复杂局面。④ 随着列强侵略势力由东向西逐步推进，“客邮”⑤也由沿海湾入中国内地，遍置于新疆、西藏、云南、黑龙江等地。即使中国自 1896 年正式成立国家邮政管辖机构以后，“客邮”数量仍然有增无减。⑥ 外国邮政的侵入大大刺激了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外国邮政的先进性，因此极力呼吁借鉴西方邮政经验，建立本国邮政体系，改进传统驿传这一已经步履维艰的信息传递方式，以抵制外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海关开始介入邮政管理。海关介入邮政，试办邮政，仍以传递官方文报为主，从这一角度看，它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邮政，而是在特殊背景下对中国传统驿传系统的补充。

1906 年，清朝实行立宪改革，中央设邮传部，负责铁路、公路、轮船、邮政四项

① 参见《论铁路之利中国急宜扩充》，《万国公报》第 2 册，1889 年 3 月，第 16 本，第 10220 页。

② 朱勇. 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56.

③ 参见《天下光景》，《万国公报》第 639 卷，1881 年 5 月 14 日，第 13 本，第 8099 页。

④ 邮电史编辑室. 中国近代邮电史[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27.

⑤ 世界近代邮政发轫于 18 世纪的德国，之后迅速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及美国兴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为保持与国内的通信联系，他们在所居住的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地方，设立邮局，以通信息，这些邮局被称为“客邮”。

⑥ 以英国为例，1870 年，它在中国设置邮局的数目为 2 处，1918 年则为 140 处。后经北洋政府与列强各国反复交涉，才最终清除“客邮”，统一邮权。

事务的管理；驿传事务则由兵部划归陆军部，新成立的邮传部必须从总税务司接管邮政。此后，大清邮政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与管理体制，开展多项新式邮递业务，邮路遍布全国，集中统一，效率较高，逐渐被民众所信任。与此同时，具有四五百年历史的民信局，则日趋衰落。

4. 铁路、电报与邮政的相辅相成

为什么“凡铁路设站、电报设局之各处，均添设邮政官局?”这是因为邮政必须借助铁路之快捷、运量大、运费低廉；而电报则须借助邮政现成的网络与人力进行，电报虽然“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时效远胜于文书传递，但是当时电报并不能做到当天拍发、当天就可送到收报人手中的，弄不好也会出纰漏。[①] 而且，所有的电报最终还得经过邮政系统的人工投送。

中国近代电报创办初期建立了庞大的电报网络，但骨干是军政事务通讯专线，以“官设官用”为主。由于电报费用昂贵，电文必须力求精简，中外交涉、军政文牍、商务洽谈仍须以文函传递实现。“遇有紧急要事件，虽可先行电闻，然得电后，仍须俟奏报或咨文到来，始能为据。”所以，驿传和文报局在此期间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晚清是中国铁路邮政的启始时期，1896～1901 年，铁路邮政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直到 1902 年中国收回铁路邮政权。1903 年制定了《大清邮政局铁路公司互议章程》奠定了铁路邮运的基础。据统计，1904 年北京邮政总局经办的邮件共达 3 565 000 件，包裹为 59 770 件之多。邮政部门对铁路相当重视，在《1905 年邮政事务总论》中指出：“惟是邮政之基，与铁路最有关涉，凡铁路开行之处，其邮递必见盛兴，是铁路无异邮政之铺”，并将当时已通行、已开筑未竣工和已定议未开及甫议办之铁路分别详列。到了清末，火车邮政已达 8 500 公里。[②]

台湾的一个事例也可以典型地说明其时铁路和邮政之间的呼应关系。台湾邮路分南北两线。以台北总站为中心，南行到恒春，共十四大站(计费站)，长 667 华

---

① “滇案”即 1875 年 2 月马加理在云南边境被杀案，赫德(Robert Hart)在中英“烟台会谈”刚结束就拍电报给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但仍比新闻记者慢了几天！1875 年 7 月 24 日金登干经恰克图发给赫德的电报被恰克图电报局送到了德国驻京公使馆；而同时将一封给德国公使馆的密码电报错送至赫德。这就涉及明码电报容易因错投而泄密的问题。所以后来赫德要求金登干传递重要消息时要使用密码。1875 年 10 月 30 日，赫德经上海致信金登干的电函中就说：“今后中国字密码采用威妥玛——西利那发音表号码加上 2 万 5 千，例如 25259 为‘潘’。”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八卷)[Z]. 北京：中华书局，1995：59.

② 尹铁. 晚清铁路与晚清社会变迁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300-301.

里；北线经基隆到宜兰，设三大站，长 202 华里。全省邮路共长 869 华里。台湾邮政总局规定了各站出发到达时间，要求每个时辰（即两小时）走十九华里，准时到达。[①] 有趣的是，据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记述，台湾邮票“照章缴付另加的费用之后，这些邮票被用作台湾铁路上的火车票”。[②]

五、其他光电技术上演了传媒现代化的前奏

1. 摄影术

摄影形象因为具有真实、直观、可视等特点，因此成为人们在社会联系、思想交流和信息传播中的共同语言。摄影术诞生后，信息传播在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等方式之后，又步入了影像传播的新时代。由于照片具有形象性、纪实性、瞬间性和传播迅速等优点，因此独立于语言文字之外，成为一种全新的传播符号。形象性是指用摄影手段记录信息、发送信息时，图像符号所代表的是真实可视的直观形象，受众从这些直观形象中获取信息。这与文字符号有着根本的不同。

摄影术问世之前我国已普遍应用暗箱和各种光学器具，在此基础上清代科学家郑复光于 1835 年完成了应用光学著作《镜镜詅痴》的手稿，系统地总结了光学原理和光学器具的制作方法。在光学原理部分，他论述了色彩常识、色与形的关系（“原色”）；论述了发光体、光的强度和种类（“原光”）；景物的显现、隐晦、透视关系（“原景”）；并以人的视觉器官构造说明透镜成像原理（“原目”）；以及各种“镜”的性质、材料、种类和用途（“原镜”）。在第二部分，他介绍了光学器具的制造方法，其中与摄影术有直接关系的是“绘画暗箱”和“放大器”。[③]

中国的第一部照相机是在 1844 年诞生的。这一年，晚清科学家邹伯奇[④]在《梦溪笔谈》相关文章的启发下，经过反复试验制成了我国第一部摄影器，并成功地拍摄了照片。[⑤] 同年，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Théodore de

---

① 邮电史编辑室. 中国近代邮电史[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22.

②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M]. 张汇文，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63.

③ 吴廷俊. 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95.

④ 邹伯奇（1819～1869），字特夫，广东南海县泌冲人。他于 1844 年完成了两部有关摄影光学的著作《格术补》、《摄影之器记》。《格术补》对各种透镜、望远镜、显微镜的作用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摄影之器记》则是记录作者自己试制绘画暗箱经过的笔记著作。在邹伯奇去世后，这两部书稿和他的其他著作被汇编成《邹征君遗书》在 1873 年付梓刻印，这是一部集摄影技术之大成的著作。

⑤ 陈红光. 中国自制第一部照相机[J]. 岭南文史，1993(1)；吴廷俊. 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95-96.

Lagrené)谈判时，曾将自己的照片分赠给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四国官员。[①]

大约在1846年，法国达盖尔(Daquelle)的银版摄影法传入中国。这种能够收人影入镜、将人像原貌清晰地印于纸上的照相技术，使初见者不明所以，王韬就曾赞叹道："一照即可留影于玻璃，久不脱落。精于术者，不独眉目分晳，即纤悉之处，无不毕现。更能仿照书画，字迹逼真，宛成缩本。近时，能于玻璃移于纸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版，用墨搨出，无殊印书。其便捷之法，殆无以复加。法人如李阁郎，华人如罗元祐，皆在沪最先著名者。或云，近来格致之学，渐悟摄影入镜，可以不用扫光，但聚空中电气之光照之，更胜于日，故虽夜间亦可为之。技至此疑其为神矣！"[②]湖南的进士周寿昌在当年写作的《思益党日札》中，也论述了他在广东游历时见到的"一种套器"和"画小照法"的摄影情况。当时，香港的报纸有一则广告："香港银版摄影和锌版印刷公司有香港及中国彩色与黑白风景相片出售。"[③]

1860年以前，摄影术仅在广东沿海一带流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英法侵略军的铁蹄，摄影术由外国随军摄影师带到了北方，很多中国人学会了摄影技术，其中甚至还出现了很多技艺高超者。[④] 王韬在咸丰八年(1858年)10月25日的日记中，就记述了他陪同一位外地来沪的友人到西人处照相之事："同往法人李关郎舍，关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这位友人当即"照得一影，眉目毕肖"[⑤]。以致有人作《竹枝词》咏道："添毫栩栩妙传神，药物能灵影亦新。镜里蛾眉如解语，胜从壁上唤真真。"[⑥]19世纪70年代的《申报》上，时常可以看到文人墨客为妓女的"小照"或"小影"题写的诗篇，有的还附序，着力描绘当事人的容貌。不过《申报》在刊登这些作品时并不配发原图，读者也只能凭借文字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

---

① 给耆英拍照的人是与拉萼尼一同到达澳门的埃及尔(Jules Itier)，其时他的身份是法国海关总检察官。

② 王韬.瀛壖杂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2.

③ 吴廷俊.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96.

④ 例如广东人赖阿芳(Lai-Afong)于1859年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一家"摄影社"，专照人物肖像，店门挂出"摄影家赖阿芳"的巨幅招牌。他雇佣了一个葡萄牙人帮忙，招徕欧洲籍游客，为他们拍照。他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修养甚至得到了英国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的高度评价。赖阿芳创办的摄影社在他去世后，由其后代经营至1941年，长达82年之久。参见吴廷俊.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96.

⑤ 王韬.王韬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23.

⑥ 王韬.瀛壖杂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2.

作为晚清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孙宝瑄在日记中不仅记述了学习西学的心得，而且经常作诗吟咏包括照相机在内的西方器物，比如《照像器》一诗云："微尘色相镜中虚，烛见须眉画不如，天为幻生留幻影，不随面皱变纤徐"①，《映相术》云："清影可怜甚，依稀即是君。此影无灭时，化作千百身。"②

清朝末年纪实摄影流行，它反映现实情况，记录事物，内容广泛。例如1876年，由英商建造的上海至江湾镇约7公里的铁路完工，定于7月1日举行通车典礼。《申报》即委托上海日成照相馆拍摄通车现场，但当时报纸还不能刊印照片。将纪实摄影运用于政治斗争，改良主义者容闳是一位杰出的代表。1873年，他受李鸿章之托，赴秘鲁调査当地华工的处境。容闳拍摄了24幅照片，这成为华工在秘鲁受到歧视与虐待的真实写照。在清政府与秘鲁政府的交涉中，容闳的照片成为揭露秘鲁政府罪恶、维护侨胞利益的有力武器。③

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冒险者纷纷进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曾猎奇般地拍摄了不少民族风土人情照片，但已罕见流传。不过1985年，在法国乡间的一个地窖里，人们发现了一批批百年前中国西南部的旧照，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保存之完好，世所罕见。④ 这批照片是晚清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于1896～1900年间拍摄，共30余张，涉及云南的有红河的哈尼族、昆明的撒梅人、楚雄的彝族及滇南的苗族等，形象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上述民族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面貌服饰特征，尤以皈依天主教的少数民族最为传神。这是国内已知最早、数量最多的民族学、人类学图文资料。⑤

1900年前后，照相铜版制版技术传入中国。1901年8月，上海《万国公报》刊登《醇亲王奉使过上海图》是目前所知在中国报刊上最早出现的新闻照片。1904年，上海《东方杂志》等期刊开始刊用照片，该刊第8卷第4～9号连载了杜就田《摄影发明之略史及现今之方法》一文，为中国人主办的杂志上最早系统介绍摄影技术发展史的一篇文献。1906年起，国人办的报纸也开始刊登照片。当年3月29日，《京话日报》刊登了"南昌教案"中被法国传教士杀害的死难者照片，开创了中国报纸运用照片开展涉外斗争的先河。1907年7月，广州《国事报》发表了《粤路正式会摄影图》，8月发表了《女界流血者秋瑾》等时事照片。这些照片编发及时，新闻

---

①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63.

②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71.

③ 吴廷俊.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96-97.

④ 海蒂,肖桐.昆明晚清绝照[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74.

⑤ 海蒂,肖桐.昆明晚清绝照[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75.

性较强。1907年创刊的《世界》画报，由我国留法学生组织“世界社”在巴黎编印，是当时行销国内唯一的一种摄影画报。姚蕙女士主编，吴稚晖等人也曾参与其事。画报每期共采用一二百幅照片，有的介绍时事及科学、文化发展情况；有的介绍国内时事。《世界》画报宣称是“东方第一次出版之美术画大杂刊”。它总共发行了两期；由于出版周期长，很多照片失去了新闻性。①

进入20世纪后，照相术甚至开始被官方运用于人事管理。光绪末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改革学制。宣统年间，学部作出规定，凡参加各类考试的考生必须在考前拍照，否则不准参加考试。外务部在录用人员时要求持照片前往面试。主管全国官员人事的吏部在人事管理方面也作出了必须使用照片的规定。② 这些举措极大地推进了照相技术的实用化，使其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2. 电话

电报传播程序繁杂，如果内容较多传输就更麻烦。因此人们需要寻求更为快速便捷的远距离传播工具。这种工具就是继电报机之后问世的电话机。电话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极大地推进了传播活动的发展，实现了简易可行的远距离双向传播。电话不仅减少了“译码”、“破译”等中间环节，只要没有语言障碍便可以采取直接通话，而且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交流，使得单位时间交流的信息量成几何级数地增加。

在人与世界的联系中，我们无法想象一场比电话带来的更具革命意义的变化了：电话出现前，空间和时间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概念，但电话改变了一切。当然，其他社会变量塑造了这种新发明强大效果的使用过程。③

我国开始有市内电话是在1881年（清光绪七年）。当时上海英商瑞记洋行在上海租界内开办华洋德律风公司，架设市内电话线路，免费租用磁石式电话机给用户，3个月后每机收月租费1元。1882年2月，租界内有二三十家用户先用上了电话，4月又有英商的电话交换所开业，有用户三十多家。④ 由于用户日益增多，电话月租费也跟着涨价，光绪末年，月租费涨至每机5元，但用户仍然有增无减。⑤1900年，买办官僚盛宣怀督办电政，以经营电报的盈利，在南京电报局开办市内电

① 吴廷俊. 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97.

② 葛涛. 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J]. 史林，2003(4).

③ 伊锡尔·德·索拉·普尔. 电话的社会影响[M]. 邓天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导论.

④ 李长莉. 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86.

⑤ 吴廷俊. 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127.

话，这是我国自办市内电话的开始。随后，中国一些大城市先后开设市内电话，其中有官办的，也有商办的。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北京电报局开办了市内电话。我国最早的长途电话，始于1900年。丹麦人璞尔生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机，擅自从天津租界架设电话线，接通北塘和塘沽。第二年又接通京津线路，私自营业。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才由我国赎回自办。这是我国自办长途电话的开始。1909年(清宣统元年)我国又收买德国人所设天津至塘沽的电话线路，合并后统称京津长途线路。①

3. 电影

电影是多种技术最后结合起来的一种设备，它的发展依赖于三种技术的出现：图像投影技术、静态图片的快速连动技术和摄影技术。电影技术发明之后，人类的信息传播进入到音像传播阶段。电影用连续、活动的图像展现事件的完整过程和人、物的完整面貌。电影按其本质而言是摄影的外延，但它突破了照片的瞬间性，连续、动态地反映现实生活。正像"形"和"声"统一于汉字之中而大大丰富了它的表现能力和传播功能一样，声音与图像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不可低估的感染力。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影片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杂耍节目中。自此以后，徐园就经常放映电影，多为法国影片。② 1897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先后在上海的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1897年9月5日，在上海出版的《游戏报》第74号上，曾刊登过题为《观美国影戏记》的文章，记载了8月间雍松在奇园放映影片的内容和作者对这些影片的印象，认为"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这是我国电影观众首次发表的对电影的观感。

1902年1月，北京也开始放映电影。1903年，华商林祝三自欧美携返影片和放映机，借天乐茶园放映影片。这是中国人在国内放映外国片的第一人。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贡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当在宫内放映时，仅放映三本，磨电机炸裂，影片停映。慈禧太后以为不祥，清宫就此不再放映影片。③ 不过，从此京中放映电影增多起来，受到观众欢迎。在前门外大栅栏大观楼有电影园，每晚座上均满。"但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④。

---

① 吴廷俊. 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128.

② 杜云之. 中国电影史(第一册)[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1-2.

③ 杜云之. 中国电影史(第一册)[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2-3.

④ 吴廷俊. 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109.

当1906年天津最早的权仙电影院在法租界开始正式投入使用的时候[illegible]价不非,仍然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看,"就以外国人而论,亦结队来观,车马不绝于道"①。《湘报》也曾报道九江城内的电光影戏,"所演各戏系用电光照出,无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加以留声机器所唱各戏,亦皆音韵调和,娓娓可听"②,观众都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无不鼓掌称奇。这是电影传入中国的较早记录。③

刚诞生的电影很快就成了都市人争相趋之的娱乐方式。《大公报》则紧紧跟随这一潮流,以多种方式报道包括天津在内的各地电影放映情况,折射出这一新兴的休闲娱乐方式对民众生活、观念的影响。在电影刚刚出现的时候,《大公报》就刊登出欧洲人欲在天津租借电影放映场地的广告,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关注此事。④

4. *磁录机、留声机*

随着西方各种新奇的电器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大公报》也不断报道它们带来的便利。1906年磁带录音机传入中国后,《大公报》大力宣传它的优越功能,"美国美术家新制造一种留声机器,专备学习各国语言之用,现已装以英、法、德、西四国会话,听之娓娓清楚,如亲承教员之授课也。有志方言者,无待负笈以游矣。闻此项机器,现已运津,由日界旭街小林洋行专卖"⑤。而对于美国可伦布厂制造的马蹄牌留声机等的宣传,更是图文并茂。⑥ 留声机不仅可以把演员演唱的声音放大,使人感到"比台上更觉响亮数倍"⑦,而且还能够不断播放,让人反复欣赏。

本章小结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⑧ 纵观媒介发展史,如果我们根据早期原始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这几个发展过程,将媒介变革发展的历史轨迹划分成相应阶段来描述的话,不难发现其与人类文明史是同步的。当简牍将甲骨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文化载体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

---

① 参见《大公报》,1907年4月13日。
② 参见《湘报》第174号,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③ 董贵成.《湘报》与科学技术的传播[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1).
④ 参见《大公报》,1905年7月19日。
⑤ 参见《大公报》,1906年12月20日。
⑥ 参见《大公报》,1910年6月18日。
⑦ 参见《大公报》,1910年3月7日。
⑧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8.

放的文化大发展；而大唐盛世的文化繁荣和雕版印刷的广泛应用应该是密不可分。同样，晚清时传媒文化的新局面自然与当时媒介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密不可分。

1. 晚清时媒介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

国外近代化机械和先进的印刷术的传入使得我国近代出版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以印刷技术而言，雕版印刷术只是占了很次要的位置，这时已由凸版、平版和凹版印刷术取而代之；以印刷出版的版料而言，则主要为铅印和石印。由铅字铜模的凸版印刷术，到石版印刷术等平版印刷以及后来发展的凹版印刷术，我国近代出版事业从此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时期，并且为现代化印刷出版工作奠定了技术基础。① 不过，很多论者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第一批中外文近代报刊，主要从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作出评价，却忽视了他们带人的印刷新技术对于激活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作用。

印刷技术和印刷材料设备的引进，使印刷复制技术从手工生产到机械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书报刊等印刷媒介的印刷质量和印刷速度，增加了书报刊的数量，降低了印刷的成本，使书报刊由少数上层人士的专有品变为广大民众都可以看到的读物，并使其内容扩大到各个领域，使知识信息得以大规模交流，各类新思想、新学说广泛传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②

晚清以来，无论是电报还是邮政，都已与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传递体系接轨。在传递市场信息中，电报的优势更是凸现无疑，商贾贸易中可藉电报以通达市价，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物畅其流与人畅其行交互影响，加速了人口流动，加快了专业分工，增加了就业机会，扩大了城市规模，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有利于移民垦殖，开发边远地区，有利于加强地方与地方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增强国防实力，增强国家凝聚力，进而加快了人的空间、时间、伦理、价值等观念的变化，促进了人自身的发展”③。

总的来讲，晚清时媒介新技术取得的革命性突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印刷技术对印刷速度与质量的提高；二是，造纸技术为印刷能力的扩展奠定了基础；三是，电报技术对时间和空间的高度压缩；四是，交通技术带来传播的四通八达；五是，其他光电技术上演传媒现代化的前奏。

① 吉少甫. 中国出版简史[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262.

② 陈燕. 超越时空——媒介科技史论[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9.

③ 丁贤勇. 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

2. 军事创新"高压锅"催生出媒介新技术

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小册子特别是新闻书与动乱和战争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动乱与战争是新闻的发动机。[①] 许多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最初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发展起来的。[②] 然而，这些产生于军事创新"高压锅"中的新技术，却常常为后来媒体的应用提供了机会。晚清时情况亦然，比如，中俄的纠纷使电报得到采用，中法的战争使铁路的建筑得以开始。[③] 电报在军事上用途极大，"诚以两国构衅，赖电报以传递军机，则有者多胜，而无者多败。"在战场上"一迟一速之间，即胜负所由决矣"。军事上的作用才是清廷下定决心引进电报技术的初始动机。

3. 媒介新技术营造出传媒制度新环境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一方面是书写媒介历史的人本身的文化所构建的信息，与受众对书写媒介历史的人的影响，构成了一种复杂的辩证法，而媒介史正是以这一辩证法直接涉及集体精神的演变；另一方面，媒介史还涉及政治生活，因为政治生活深受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书面新闻或视听新闻的影响。[④] 近代通讯事业在晚清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程，尽管起步晚，但很快投入应用，在军事情报、公文传递和民间活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很多人已经充分意识到科技发展使社会性质发生的巨大变化，由此衡量一个国家富强的标准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古代，一个国家富足的法子只有"种田、畜山坡几件事"，但随着时代发展，判断一个国家富足与否更重要的是要看"制造厂多不多，铁路电线密不密，货物精不精，销路广不广"[⑤]。也正如《孽海花》中指出的："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他。"[⑥]

西力在东渐过程中带来的媒介新技术和传媒新观念在晚清社会形成了一个新场域。这个新场域形成了广阔的现代色彩的社会文化基础，造就了全新的受众。新的传媒制度环境的形成已是不争的事实。

---

① 马凌. 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64.

② 戴维·巴勒特. 媒介社会学[M]. 赵伯英，孟春，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81.

③ 于德利. 中国进步的标记[M]//张雁深，摘译. 载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 洋务运动(八).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451.

④ 让-诺埃尔·让纳内. 西方媒介史[M]. 段慧敏，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⑤ 参见《湘报》第 82 号，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本。

⑥ 曾朴. 孽海花[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9.

第二章 媒介技术发展引发媒体内部机制的变革

19 世纪下半叶，电报、电话均已出现，但应用范围尚窄，还达不到成为传媒普遍工具的程度。大众传媒机构主要仍限于书局、报馆、期刊社等印刷出版[①]机构。随着媒介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各种新式报刊和书籍在晚清迅速普及开来，两者之中报刊更成为大众传播的利器。那么，当时媒介技术的进展究竟对大众传媒机构的传播理念、内容生产机制和经营管理制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第一节 媒介技术发展促进媒体传播理念变革

正如迈克尔·埃默里(Michael Emery)等人指出的，"蒸汽印刷机这一自动印刷术的先导以及造纸术的完善，帮助改变了报业的性质"[②]。作为传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媒介技术的进步不仅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更新，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导致了传播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采写编评等结构性要素上，甚至还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深嵌于媒体的各项规章制度之中，型塑着传播从业者的日常惯习。

---

① "印刷"和"出版"这两个概念的所指虽然甚有差别，但是二者经常被同义交叉使用，本章中也未硬作区分。正如陆费逵所言，"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就是我们同业，也很不容易分清它到底是出版业或印刷业，习惯上统称书业"。参见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M].济南/武汉：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415-416.

②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九版)[M].展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40.

一、媒介新技术推动报刊传播理念的更新

多年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曾对中国的印刷术加以过讨论，“印刷术是中国早就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才得以问世”①。虽然早已有“邸报”，但中国近代②意义上的报刊事业是从外报开始的。传教士将西方近代媒介技术与报刊观念一并带入中国，促成了中国近代意义上报刊的诞生。近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的出现以及新式报纸、期刊的繁荣，改变了中国报刊出版事业的传统格局，对媒体从业者的传播理念产生了直接影响，从而带动了整个传播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1. 外报带来新技术与新理念

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伦敦布道会派来的另一个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出版了一份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③《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创办于境外，却是我国近代化报刊的肇始。④

---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6.

② 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时段划分常常湮没于政治史的模式之中，很多人单向线性地认为1840年是一个界线，之前就是传统中国，之后则为近代中国，其实不然。毕竟中国的近代化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历史本不存在什么严格的分界线。而且，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整体转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更难以某个时间点截然二分。所以除了引用或转述别人的理论，本书尽量避免将1840年视为“近代”的起点。况且，刨根追底的话，连“近代”本身都不能算作严谨的学术概念。身处公元2011年的今天，回首那尚不遥远的1840年，称它一声“近代”尚无可厚非；但若将眼光拉长，站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坐标再来回顾1840年，“近代”这个概念显然不再适用。

③ 1807年，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1813年，伦敦布道会的另一名传教士米怜来广州协助马礼逊。当时广州是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但即便在通商口岸，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活动仍作出种种限制，尤其是对传教和办报限制更严：“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马礼逊给伦敦方面的报告中写道：“鉴于在中国境内从事翻译印刷等等工作之困难，以及居无定所之事实，因而设中国差会本部于附近之基督教国家的领土内，以作将来中国开放之后加倍努力之准备，实系必要，而最适当之地点，无过于马六甲。”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进行传教的同时，于1815年8月出版了中文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参见麦沾恩.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J].近代史资料，1979(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1；陈玉申.晚清报业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2.

④ 一般将出版于19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作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但是据许正林先生《中国新闻史》的论述，《消息日报》于1807年6月4日创办于澳门，尽管其是葡文报刊，但它是中国境内第一份现代报刊。参见许正林.中国新闻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附.

其创刊号序文中写道："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名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种人，方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考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这就是报名"察世俗"这三个字的由来。[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采用木板雕印，中国书册式排版，每月一期，每期五页，约两千余字，由马礼逊和米怜分别执笔。在南洋一带华人聚居地区免费赠阅，其中的一部分还由专人带往广州，和其他宗教书籍一道，分送给参加县试、府试和乡试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米怜曾发表"告帖"，欢迎索取。起初每期印 500 本，后增至 1 000 本。此外，每年出版合订本（全卷），印数少则 500 本，多则达 2 000 本。到 1821 年，因米怜病重而停刊时，《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共出版 7 年，计 7 卷 80 多期。[②]

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的最初目的是宣传宗教、传播教义。这一主旨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即有十分鲜明的体现。[③] 马礼逊在《出版自由论》中曾说："人之为理性的造物，异于不会说话、没有理性的牲畜，就是因为上天赐与语言。而且，聪明人在社交上谈吐风雅，妙趣横生，所以智者认之为远胜于肉体上的任何享受。既然这样，各国政府就无权压缩个人的智力活动，正如不能剥夺他在肉体上的安舒或自然饮食一样。根据这个原则，除了最危险的罪犯外，任何人都有纸笔墨的自由。在这方面，印刷机不过是效率较高的写字机器罢了。在上帝的安排下，不论时空相隔多远，它仍能使心灵相互沟通，而它给与理性造物的舒畅和效益，亦非身体上的快乐可比。因此，任何按这些正义而公平的原则办事的政府，都不能禁止自由使用印刷机。没有兴趣阅读的人可以不读；但他们不能因为碰巧掌权，就去剥夺别人的乐趣。"[④]米

---

①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2.

② 丁淦林. 中国新闻事业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6-37；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2.

③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因此，它以绝大部分篇幅宣传基督教。它刊登了大量传播教义的文章，如《神理》、《圣经之大意》、《耶稣主义之大要》、《万人有罪论》、《神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论》；有时也采用对话的形式解说基督教理，如《张远两友相论》；还刊登批判异教的文章，如《论不可拜假神》、《真神与菩萨不同》等。除宣传宗教外，还有伦理道德说教、浅显的科学知识介绍、世界各国情况介绍，以及寓言、比喻和诗。米怜认为，要引起读者兴趣，光有枯燥的说教是不够的："但人最悦彩色云，书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使众位亦悦读也。"参见陈玉申. 晚清报业史[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3；赵晓兰. 19 世纪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演变及其近代化进程[J]. 世界宗教研究，2008(1).

④ 未亡人. 马礼逊回忆录（全集）——他的生平与事工[M]. 邓肇明，译. 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8：529. 未亡人即马礼逊夫人艾思庄（Eliza Armstrong Morrison），原书名为 *Memoirs of Th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怜也在文章中说,"善书乃成德之好方法",《察世俗》要成为"善书",使得"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志,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从而达到"成人的德"之目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登载的宗教以外的文章,只是米怜所说的"彩色"——使刊物不要过于枯燥。其中,"真正称得上新闻的文章只有一篇,是 1815 年 9 月的《月食》,这是中文近代报刊的第一条新闻"①。

为了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基础上实现更好的印刷效果,西方传教士在印刷技术的改进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就有美国和法国传教士在波士顿和巴黎制造并带入了中文铅活字,50 年代外国人办的印书馆中又开始使用电镀汉文字模和以 24 盘常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为各报所效仿。到了 70 年代前后,多数中文报纸已经改用铅字印刷,差不多在 80 年代,金属活字已经在中国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虽说西方传教士办报目的在于宣传他们的宗教思想,而且他们所办的印刷出版机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出版企业②,但我们应该承认的是,西方传教士把西方近代的印刷技术和出版方式引入中国,撒播下传播新观念的种子,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传媒事业和社会文化的进程。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在 19 世纪乃至整个中国新闻史上,也应该占有不该被忽视的位置。

随着外国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发展,外国的商办报刊也逐步发展起来,并逐步取代教会报刊成为了外国在华报刊的主要力量。外国商办报刊的发展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过程相呼应的。这些报刊大部分办在外国侵华基地和一些重要的商业城市,如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北京、福州、沈阳、旅顺等地。创办较早的是 1861 年 11 月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新报》。它是上海第一张近代汉文报纸,八开型篇幅,用白报纸两面印刷。③

在华外商与传教士办报目的不同,其经营动机主要是追逐利润。他们所经营的出版机构伊始就是作为近代化的出版机构而存在的,无论是设备使用、管理方

---

① 赵晓兰. 19 世纪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演变及其近代化进程[J]. 世界宗教研究,2008(1).

② 因为其出版物早期皆免费派送,即使后来收取一定费用——但纯粹是为了维持教会活动,目的仍不在营利。

③ 由上海英商字林洋行主办,英美传教士主编。初办时主编为华美德,后由傅兰雅编辑,第三任主编是林乐知。《上海新报》创刊时是周报,1862 年 5 月 7 日改为每星期发行三次,到 1872 年 7 月 2 日才改为日报。参见梁家禄,等. 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35.

式,还是商业理念与经营模式等,都颇值得国人借鉴。比如,自古以来,中国的出版者都是集编辑、印刷和发行于一身的。这种前门开店、后院生产,自产自销的经营模式导致中国的报刊出版长期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而这种情况的逐渐改变就和在华外商出版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按近代报刊理念创办起来的外报,每一家外报都有明确具体的宗旨,并公之于世。很多报刊在创办伊始便就办报的目的、方法、内容以及其他有关问题向读者进行说明。主要为商业贸易服务的《上海新报》在发刊词中就说道:“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类如上海地方,五方杂处,为商贸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观此新抵即可知某货定于某日出售,届期亲赴看货面议,可免经手辗转宕延,以免买空盘之误。”因此,这张报纸每期都刊登广告、行情表、船期表。①

安纳斯脱·美查创办《申报》之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营利。他公开宣称:“本报之开馆,余愿直言不讳焉,原因谋业所开者耳。”②美查是把报纸作为一种商品、把报馆作为企业来经营的,所以《申报》一创刊就强调自己是“新闻纸”、“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新闻纸之设,原欲以辟新奇广闻睹冀,流布四方者也,使不事遐搜博采,以扩我见闻,复何资兼听并观以传奇新异”③。创办初期,美查又多次发表论说文,反复说明“新报”与旧式《邸报》、《京报》的区别,“夫京报以见国家之意”,而“吾申新报一事,可谓多见博闻而便于民者也”④。1872 年 7 月 13 日,《申报》发表《邸报别于新报论》,认为“西洋各国之新报亦系传述各国国家之事,上自朝廷下至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中国之邸报与之各别者,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⑤。1873 年 7 月 18 日又发表论说《京报异于西土新报》,说“新报是合朝野之新闻而详载之,京报仅有朝廷之事,而闾里之事不与”。1873 年 7 月 20 日,该

---

① 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35.

② 参见《申报》,1875 年 10 月 11 日。

③ 参见《申报》,1872 年 4 月 30 日。

④ 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8;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9.

⑤ 参见《申报》,1872 年 7 月 13 日。

报继续发表论说:《论各国新报之设》,文中说道,凡是西方兴旺的大国,如英、美、德、法,"新闻纸亦为最盛"。"盖自二百数十年以前,各国之新闻纸之未没,而各国亦无如此兴旺。"文章还谈到了新报的作用,说"各国新报之设,凡朝廷之立一政也,此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无益;彼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有损。朝廷即行更改。必待各处新闻纸言其尽善尽美而后为。……所以有一举动,必经数十人之智。及其成功,则莫能为敌。"还说:"朝廷立政,小民纵欲有言,未免军民分隔,诸多不便。一登于新闻纸内,则下情立即上达。至关闻阁行制器,或远隔重洋,或另在他国,信函相商,多劳往返,一登新闻纸内,则千里如同面谈。泰西新闻纸,其有益于朝廷闻阁也。"

这些论述反映了《申报》的办报观点,也是我国报纸上最早的关于报纸作用的论述。[①]《申报》的问世,标志着这种每日刊行的、面向社会公众的、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纸,开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传播媒介。在上海,与《申报》齐名的还有《字林沪报》和《新闻报》。[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停刊于 1951 年的《字林西报》,它先后出版一百零一年,最高发行数字达 7 817 份,是在中国出版的时间最长,发行最广,最有影响的一家外文报纸。[③]

19 世纪 40 至 80 年代的半个世纪,是外报发展的高峰时期,外报数量占当时中国报刊总量的 70%以上(不包括邸报、京报)。各通商口岸和京城的外报,还向中国内地扩散,成为中国境内影响最大的新闻传播媒介。在此期间,外报在内容、形式、刊期以及结构类型等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与鸦片战争前大不一样。[④]"日报之设始于泰西,至各口通商始流传至中国。先是只澳门、香港或一月一出,或七日一出,杂载华洋交涉之事,文理尚不甚详明。嗣是而上海、而汉口、而宁波、而广州、而天津,报馆如林,后先继起,而议论渐求其宏富,事迹争尚夫新奇。各省风行,几如布帛粟菽之不可一日缺"[⑤]。当然,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⑥]

从 1815 年到 19 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 200 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 80%以上。[⑦] 在 1911 年以前,在中国境内共出版过 136 种外

---

① 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36-37.

② 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3.

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37.

④ 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4.

⑤ 参见《申报》,1891 年 7 月 5 日。

⑥ 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6.

⑦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0.

文报刊，其中54种由上海出版，占总量的39.7%。在54种外文报纸中，英文34种、法文10种、德文3种、日文7种。[①] 除日报、周报、晚报、专业报刊外，上海工部局、上海海关等部门还发行机关年报或月报。所有这些借助西方媒介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报刊，也都深深地打上西方传播理念的烙印，并为国人自办近代报刊提供了示范作用和专业人才储备。

2. 国人自办近代报刊

在华外报不仅将近代报纸的实物展示在中国人的面前，而且把近代西方媒介技术、媒介经营方式和传媒文化观念引入中国，以成功的实践成为国人的启蒙之师，使国人自己创办近代报刊有了可能。

中国人自办近代报纸发端于洋务运动时期。国人自办的最早报纸，一说是1872年在广州出版的《羊城采新实录》，但是这份报纸早就失传，有关情况已不可考。所以，一般认为第一家国人自办报纸是《昭文新报》，1873年8月8日由艾小梅创刊于汉口。该报初为日刊，由于读者不多，后改为5日刊，装订成书，内容上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因销路不畅，不到1年便停刊。该报也早已佚失，详情难考，只有《申报》对其略作介绍。另外亦有学者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发现一份名曰《飞龙报篇》的华文报纸早在1866年就已出现在伦敦并行销中国、朝鲜和日本等东亚地区。[②]

大众传播基本功能之一便是监测环境。环境监测又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就是对别国的报道，以便能够准确及时地获得国外最新的时事动态和发展趋势。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为加强边防就曾组织译抄《澳门新闻纸》，虽然其侧重于“了解夷情”和“采访夷情”，以便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国人传统办报理念向近代的转型。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国人自办报刊，到90年代出现国人办报热潮，其间不过20多年。这段历史充分证明，中国需要近代报刊，中国人也能掌握和运用近代报刊。虽然邸钞（阁抄）、京报等仍然存在，但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影响日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信息沟通的主导媒体。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的起点，与近代报刊相辅而行的是近代出版事业的出现。[③] 1896～1898年间出现的首次国人办报热潮，初步具有全国性、多样性和进步性等特征，在中国

---

① 汪幼海.《字林西报》与近代上海新闻事业[J].史林，2006(1).

② 黄瑚，范书杰.新发现的欧洲第一份华文报刊《飞龙报篇》考[J].新闻大学，2004(春).

③ 李侃.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M]//龚书铎.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377.

近代新闻传播史上，这是首次出现国人办报热潮。这次热潮，产生了著名的报刊和报人，提出了中国人的办报理念，革新了文风，为我国报刊的发展开拓了道路。①1897 年严复等人创办的《国闻报》和上海的《时务报》遥相呼应，成为宣传维新派思想和主张的重要舆论阵地。1902 年 6 月 17 日，一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产生巨大影响的《大公报》(法文名字为 L'Impartial，即无私之意)于天津正式出版发行。《大公报》在办报过程中以实践活动以及推动创办阅报社、宣传介绍社会文化的新变化。它不仅记录和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民意心声，而且还积极推动着社会文化的转型。等到革命派登场以后，报刊更是成为与整个宗法体系作战的武器，第二次办报高潮也随之兴起。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维新派的《新民丛报》关于国家体制的论战已经触及体制核心，直指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

除了民间办报的形势风起云涌，统治阶层中也兴起了开办近代报刊的热潮。早在 1896 年，官书局就曾出版《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尽管它们的内容极为简单，"印送各路电报，只选择有用者，照原文抄录，不加议论，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②。也就是说，它们只登奏章和译文，不发表论说，亦无自己采写的新闻。但戈公振先生将其与《京报》相比，认为"不能不谓其有进步也"，故许多新闻史书把它作为清政府发行官报之始。

1901 年 1 月 29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变法"的上谕，从此揭开了"新政"的序幕。随着新政的实施，种种官报也开办出来。最早出现的是《江西官报》和《湖南官报》，均在 1902 年上半年创办。这一年 10 月 25 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办《北洋官报》，以抵制私家之报"诡激失中之论"，"陷惑愚民"，"以讲求政治学理，破锢习，瀹智识，期于上下通志，渐致富强为宗旨"③。它们虽然形式上变化不大，但在内容上有了很大进步，不只是官府的喉舌，也传播了不少信息和各种知识，在社会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北洋官报》随着袁世凯当时在政坛上影响力的扩大，甚至成为官报的样板。

从官报发布的谕旨、电文、奏议、公牍、札文、章程、专件、调查中，可以看出国家政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度比邸报和《京报》扩大了许多，不单是有限的动态报道，也有很多对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地方自治等的实施情况的报道，以及反对迷信、禁止种

① 丁淦林. 中国新闻事业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7.

②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43.

③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55 注释 5.

植、吸食鸦片，女子放足、鼓励留学等的宣传，甚至有些涉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信息，亦不加掩饰地纳人官报发布范围，如《御史齐奏财政困难亟宜开源节流以裕国帑折》、《督宪奏库储奇绌减免扣折协饷折》、《度支部奏遵章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并沥陈财政危迫情形折》、《度支部奏调查各省岁出入款项总数折》。这些奏折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财政窘迫，而且也反映出人民大众的疾苦，要求朝廷"早定政策，以维持全面"。

人们从官报上不但看到有限的动态消息，还能看到更多的内容，再加上地方新闻、国内外新闻，扩大了阅读的空间和范围，尤其是印刷技术的先进，使官报摆脱了传统的模式，完全取代了内容贫乏的《京报》，而且正在向现代报刊过渡。[①] 当然，由于其文牍色彩过浓，许多有益的内容彰而不显，官报的社会影响依然十分有限。

当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物质性的技术惯性会内在地产生出文化生产的要求。小报在晚清的兴起恰恰为这种文化生产的要求提供了最好的诠释。小报与大报的不同不但在于内容，亦在于外型，"它的纸张，大小最有分别，小报只有大报纸张之半；大报每份都有数张，小报则每份仅有一张。再说：大张都是靠广告，广告越多，纸张越加多。小报则靠发行，往往仅有半张的纸，却能与大报数张的纸的价目，并驾齐驱，这便是短兵相接的，也有它的足以胜人之处了"[②]。这些小报"篇幅较小，一般为八开或小于八开的小型报纸，它以消遣性为主旨，内容包括新闻、小说、随笔、游记、小品文、新旧体诗词、掌故、影戏舞动态、社会知识和生活话题等。一言以蔽之，小报是休闲性的小型报纸。版面是小报的物质形态，休闲性是小报的精神实质，判断是否小报须同时考虑篇幅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③]。它们的生存策略是以中下市民为接受群体，与大报展开竞争，"补大报之不足"，坚持自己"简便"的、"以小为本"的方针，将色情（所谓"花"）、笔战（所谓"骂"）两相结合，"软""硬"兼施，走趣味化、民间化、平民化的办报路子。[④] 报纸的内容、版面都呈现平面化展现的态势，不规避俗语和方言，加强图像化。但小报也是依托新闻而存在的，只是在刊载新闻方面，与大报相比自有其特殊之处，一般专载琐闻碎事，而无国内重大电讯记载，常用侧面或透视的方法来观察社会，即使新闻也偏重趣味性，以软性为多，甚至新闻记事都变得章回小说化。这些小报可谓早期《申报》向下的延伸，是市民文化在商业文明吹拂下发生异化的必然结果。当然，它们与维新运动并非完全游离，不少小报文人与维新人士一样也接受了西方新的传播理念，把报纸作为

① 王绿萍. 四川近代新闻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66.

②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445-446.

③ 李楠.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插图本)[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2.

④ 李楠.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插图本)[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9.

表现自己价值观念的工具，同时也以不同的言说方式参与了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实际上，小报乃当时聚集于上海的中下层文士主要的读物，影响之深广、反映出的集体心态不下于政治刊物。小报能将旧主题以新形式表达出来，在看似陈腐的地方，不知不觉中表达出新意，新旧交杂间更显出士人的真实心态。

掌握了足够的媒介技术与印刷出版工具之后，即使位置偏远亦可大量而快速地生产印刷品。进入 20 世纪以后，省城以外的许多城镇也开始有士绅商人购进印刷机器，成立印刷局。如 1903 年保定从日本购进机器，苦恼于无人会用；[①]同年王子余成立绍兴第一家铅印厂绍兴印刷局；1904 年郑州马超然、马昂然成立文亦可印刷所，从事石印铅印；1904 年湖南常德有人因要办报，托日本朋友购买印刷机器；扬州亦有人订购铅字机器，开设印书局；镇江魏小甫则接手《南京日报》馆的印字机器开设印刷局。[②]

报纸之外，各种期刊杂志也相继编辑出版。其中专业学术刊物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戈公振所评价的"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③]。还有多种大众化的娱乐杂志和画报，例如，《点石斋画报》以石印技术，采用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及时报道各种新闻时事、西学新知以及平民趣味，"因点石斋画报之起，上海画报日趋繁多，然清末数十年，绝无能与之抗衡的"[④]。而大量新式文学期刊的出现，以及报刊连载小说形式与稿酬制度的建立，培养了职业的报人和作家，改变了编辑与作者、读者之间的传播关系，促进了近代新文学的发展。一些出版社也同时经营多种印刷媒介，如商务印书馆先后编辑出版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杂志，与图书出版相互补充，扩大了经营规模和市场竞争优势。

再从期刊的印刷方面来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铅印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远胜雕版。比如包天笑曾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学会，叫做励学会，并出了《励学译编》的月刊，"每期约三十页，内容大半译自日文"[⑤]，因为当时苏州没有铅字印刷所，他们只得送到苏州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采用木刻出版，"毛上珍刻字店

---

① 编译局之印刷事业[N]. 国民日日报，1903-9-25.

② 参见《沅报开办》，《警钟日报》，1904 年 2 月 26 日；《创兴印书局》，《警钟日报》，1904 年 3 月 30 日；《印局将开》，《警钟日报》，1904 年 5 月 27 日. 常德此报似乎没有办成，在《中国近代报刊名录》中没有记载。

③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185.

④ 阿英.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M]. 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92.

⑤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66.

也很努力，刻字和排字一样的迅速，这三十页木板书，尽一个月内刻成”[1]，而当时的铅印技术已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这样的效率自是木刻所不能媲美的。

20 世纪以来，在上海以外的地方发行的中文期刊大量增加，即使上海出版的中文期刊无论从数量或质量而言仍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就总类而言，上海发行的期刊占全部中文期刊的比率从 1875～1894 年的 41.4%降到了 1906～1911 年期间的 22.9%。这并不意味着上海中文期刊数目减少，实际上后者的数量是前者的 7 倍之多，而是在上海以外创办的期刊数量大幅增加而已。

回顾媒介技术对晚清报刊传播理念的影响，不难发现，当一种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强调投入、产出，形成某种生产、销售（消费）和再生产的文化生产机构确立以后，它对于劳动的组织、生产的速度和效益要求就内在地生长出来。在这个新的机构和组织内部，原有的知识理想、人际关系、劳动伦理、价值取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渐渐会改变，进而形成新的文化组织和观念认同。[2] 这种局面的出现不是传播者的独出心裁或行事风格所致，而是由于新式媒介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展现的结果。

二、媒介新技术促进书籍出版的工业化进程

鸦片战争后，首先进入中国的是与中国传统出版有着显著差异的传教士出版机构。据统计，19 世纪 40 到 90 年代之间，有 17 家基督教出版机构先后成立，并且遍布全国各地。这些机构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石印技术、铜活字、铅活字等也纷纷被引入中国。西方印刷技术和中国汉字的结合，改变了沿用千年的旧的雕版技术和简单的手工扑刷操作，为出版印刷业摆脱传统印刷方式提供了可能。

新式图书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载体，也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产品。新式图书以近代印刷技术为物质手段，把近代出版奠基于新的机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将近代出版拉入到机器文明的时代。[3] 19 世纪中叶以后，新式印刷机器和洋纸大量涌进中国，对传统的装订技术和装订工艺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有用手工制作的连史纸和毛边纸印书的；也有用洋纸的。中国纸是对折单面印刷，洋纸是单页双面印刷，因用纸的变化，书页的装订由折页齐栏线订的形式变为大张连折的装订，这成

---

①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67.

② 雷启立. 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72-73.

③ 王建辉. 出版与近代文明[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3.

为现代平装书形式的开端，同时，已开始有了所谓的精装。平装、精装乃西式装订，它的采用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线装书地位开始发生变化。①

洋务运动兴起后，印刷出版机构纷纷出现，印刷设备逐渐机械化，并形成了一定的出版与销售规模。同治、光绪时期，官方大规模兴办书局，大量刊印传统经史典籍，以恢复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受到重创的图书出版业，维持"文教"的传统。例如左宗棠设局宁波刊经书，是为了使"经史赖以不坠"，而"在 1894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出现了变化，即由为刊刻经受读本之类而设置转向为译刻西学书籍而设置"。在经营方面，"官书局活动经费包括刻书、购书成本，人员薪水等，主要来源于公款"，此外也有官绅捐款、设置者本人出资等形式。因"经费充裕，刻书亦多"，总的说来，"书局之目的系为普及教育，造就人材，其经费并不追求赢利"②，因此官书局作为出版机构，在保存与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这一时期的官书局已将编译、刻印、发行等部门统筹起来，形成了较大的规模，"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1871～1880 年就出售 8 万余册汉译图书"③，从而与以往的官方编辑刻印图书的活动有了很大区别。

书籍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天生带有经济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的双重关系。一般而言，印刷出版机构一方面要通过印刷品的生产和传播获取最大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又具有服务公众、传播文化的义务。然而晚清时的官书局为了服务特定的政治目的，片面强调社会效益、忽视经济属性的角度看，这一点与教会出版机构倒也有类似之处。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出版企业大量兴起，经过上千年漫长时期形成的传统手工雕版和刻字技术日益衰落，尤其是以宗族化伦理道德为价值观组织起来的印刷生态和销售系统受到了巨大冲击，传统印刷出版结构被重新调整。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叶圣陶，曾经表达过自己对近代机器文明的切身感受："高大且阴沉的厂屋在路的两旁，喧响而单调的机器声振荡得人心烦乱，机器油的气味散布于空间，充满着劳工生活的感觉。我向前进行，环顾围绕我身的境界，只觉得我的——也许是人类的——微小和无能。这是那个书局的印刷部。我从窗外望进去，每一架机器都在那里运动。屈伸的杠杆仿佛我们的臂膀，但是运动的迟速却绝对的均匀，没有倦怠的意思。一张白纸被铁板翻过去，翻转来时什么都印上了。站

---

① 来新夏，等.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2.

② 梅宪华. 晚清的官书局[G]//程焕文. 中国图书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66-376.

③ 邵培仁，海阔. 宗法颠覆论纲——传媒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3).

在旁边的工人似乎是全没用处的。"[①]这样的描写无疑表现了机器文明对人们视野的影响。

按照陆费逵的记述，萌芽时期的铅印业，"殊不足道，所印的书既寥寥，每年营业也不过数十万元"[②]，清末书业营业额"大约每年不过四五百万元"，到了民国初年"约一千万元"[③]。仅上海一地，就有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扫叶山房等80余家书店先后开展石印业务。点石斋为英国人美查于1874年所办，他在上海既办《申报》，又开图书集成局和申昌书局，石印与铅印兼营。点石斋石印的《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又不数月而售罄"[④]，也就是说，不足半年便销售十万部，开创了中国图书史上的一个纪录。此外，点石斋还大量刊印《十三经》、《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图书，获利颇丰。不过，由于石印原料，如石板、油墨等都需要进口，中国普通人开始时无法接触到这些技术，因此无论石印、还是铅印，前期大部分都为西方人所垄断，10年之后，直至1881年才有浙江人开设拜石山房、广东人开同文书局。

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民营出版业的龙头，也是中国近代出版机构的典型。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由夏瑞芳等人在上海集资创办，最初以经营印刷业务为主，1903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自己的编译所，健全了以编辑部门为中心，编辑、出版、发行综合运作的体制。张元济作为编译所所长，既有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文化眼光，又有经营管理和商业运作的有效手段。在他的主持策划下，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大量新式图书，其中包括新式教科书系列、新式工具书和翻译西方名著等，这不仅推动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为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当时的图书市场中占了很大的份额。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刷出版得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版机构数量的空前增多：1900～1911年间光出版小说的书局、书坊就有近300家。[⑤] 据郑士德考证，光绪三十三年(1907)，仅上海一地出版小说就有一百二十余种，整个清代后期全国文艺类小说超过一千种，其中《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施公案》、

---

① 叶至善，等. 叶圣陶集(第5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35.

② 陆费逵. 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M]//张静庐辑注.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275.

③ 陆费逵. 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M]//张静庐辑注.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279.

④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91.

⑤ 黄林. 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5.

《彭公案》、《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都成为畅销书。而这些品种，90%以上采用铅印，大幅降低流通价格，保证其畅销不衰。[①] 除了小说外，各地书坊在学堂集中之地大量销售《革命军》、《黄帝魂》、《警世钟》等书，不少书庄暗中翻印，学生争相购取。这一盛况与戊戌时期维新派《中外纪闻》派送时“送报人惧祸，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其中最有影响的图书当属邹容的《革命军》(1903 年出版)，“在上海租界印刷二十多版，总发行量超过 110 万册，离上海远的地方，因为不易得到此书，竟然卖到十两银子一部。来上海贩书的人，把书夹杂在放满衣履、食物的箱笼中，虽有清兵盘查，也不易发觉”[②]。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上海还成立了以出版雕版书、石印书、翻印古书为主的书坊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公所，同年又建立了以出版新书为主的书店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商会，另外还先后成立了上海书业商民协会和上海新书业公会等组织。据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一期，仅就入会的出版业来说已有 22 家。[③]

中国近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是以近代化为目标走向的，实质上是一个近代化的过程。它既是此前，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图书出版业多年积累和发展的结果，也成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逻辑起点。在这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初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④]

印刷技术革命是引起中国近代书籍出版深刻变革的导火索，“它把千百万个私人刻书、印刷系统赶出图书链条，代之而起的是专业化的编辑出版机构、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销售体系”[⑤]，书籍与其他日常消费品一样，被硬生生拽进大工业化生产的轨道之中，随之引起中国传统出版文化生态的整体改变。

第二节　媒介技术发展促变媒体内容生产机制

媒介形式影响甚至规定着内容，一定的形式与一定的内容相连，以至难以将特

---

① 何明星.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68.

② 陈正宏，谈蓓芳. 中国禁书简史[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269.

③ 李泽彰.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M]//张静庐辑注.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59：384.

④ 黄林. 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89.

⑤ 何明星.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69-170.

定媒介形式与其所传递的特定信息或内容相分割。① 每种媒介都有其特有的传播手段，就书籍报刊而言，其装帧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蕴含着丰富的叙事机制和信息。近代报刊正是凭借一系列印刷的视觉符号作为传播手段来传播信息的——这种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报刊与其他媒介区分开来，也使得近代报刊在传统邸报的基础上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一、媒介新技术促成报道新规则

1. 电报的使用与“倒金字塔”文体的形成

每一种传播技术的进步，都会以自己的媒介个性，通过不同的方式，不断地向人类展示信息的特质，从而不同程度地强化、完善着新闻文体的自觉意识。② 信息报道形式成熟以前，信息的报道主要采用的是文学记叙文的形式。此种形式的信息受众理解起来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电讯稿出现是晚清时期消息写作中的一件大事。1883 年底，天津到上海的有线电报创始。1884 年 2 月 23 日，《申报》刊出天津发来的朝廷谕旨四道，全文如下：“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五、六日奉上谕，着礼部左侍郎张云卿调补；来到任以前，着徐郙兼署。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着孙敏汶补授；未到任以前，着徐郙用仪署理。徐用仪所署都察院付御史着孙驤署理。钦此。”

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的第一则电讯稿。实际上用新闻形式转发上谕。电讯的出现对报纸改革、对新闻写作改革，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国内重大事件中，《申报》、《字林沪报》都纷纷用电报拍发消息。例如《字林沪报》1885 年 3 月 3 日两条电讯：“上元之夕十二下钟时接得甬江来电：悉法提督孤拔乘坐巴夏尔兵舰闯入宁波海口。镇江防营所伏之水雷并不烈轰，防营统带急饬将海口填塞，余船皆不得进”，“昨又接宁波西友来电云：顷有法兵舰四艘游弋于镇海口外虎蹲山洋面，旗昌行之江表轮亦泊彼处”。

当时，电报费用贵得惊人。从天津到上海，每字一角五文，从宁波到上海，每字一角二文。这逼得报社对电讯稿特别慎重，不是重大事件不发电讯；逼得记者对电讯字斟句酌，把一切空话废话，一切议论统统去掉，只简洁朴实地叙述事实。③ 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倒金字塔结构的消息文体的出现。当然，除了费用问题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也促进了倒金字塔结构问题的形成：一是当时电报机很少，

---

① 何道宽. 媒介即文化——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批评[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4).

② 齐爱军. 新闻文体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探讨[J]. 新闻界，2006(4).

③ 李良荣. 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1.

而且电报信号难以保证，时断时续，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必须在发送新闻时首先要报道最重要的事实；二是战争当中报道的持续性难以得到保证，只有先报道最重要的事实。

倒金字塔结构把最主要的信息以五要素齐全的形式全部放在导语里，其他次要信息则按照重要性递减的顺序依次安排。这种信息形式安排符合受众的认知心理，使受众一看文章的开头即一目了然，有利于受众阅读和收看信息时掌握重点，迄今仍作为一种最基础的信息表达形式被媒介使用。

实际上，不仅仅是报刊上面的文章受到电报技术的影响，应该说整个晚清的文风都趋向简朴，这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电报费用昂贵，人们不得不在电文中去掉冗词赘句。这种文风甚而在政府文书中也有所体现——政府文书中出现了“电牍”这种新格式，其特点是“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清政府从 1884 年 3 月在军机处档案中专列了“电寄档”(上谕)与“电报档”(往来紧急信)。后来由于电报的广泛使用，连清朝实行二百多年的“廷寄”(即朝廷寄发谕旨)也逐渐废除了。①

新文体逐渐取代旧文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体形式的改变，其中隐含着价值观念的更新和转变。与采用公历一样，形式上仅是历法的改变，可实际上它却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2. 电讯的产生激发了新闻时效性的追求

电报发明之前，信息的传播只能与传输工具同速。电报的发明给人类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飞跃，这对新闻报道的写作就有了时效性的追求。

随着电讯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电报之被利用来传递新闻稿件，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新闻专电。报纸上有“电讯”，在我国是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当时以上海为中心，有两条和国外联系的有线电报线路。一条由上海经厦门、香港至欧洲，一条由上海经长崎至北太平洋各地。早期的电讯就是从这两条线路传来的。1871 年 1 月 30 日《申报》刊载的报道英内阁改组消息的那条“伦敦电”，是中文报纸上刊载的第一条新闻电讯。不过在当时，这一类电讯，大部分是从洋行往来电报存底中抄来的，发表时只含糊地标出“伦敦电讯”、“纽约电讯”、“电音汇录”等字样，一般不注明出处。很明显，还不是新闻记者直接拍发的。②

中国最早的海底电缆出现在 1871 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擅自铺设的香港和日

① 邮电史编辑室. 中国近代邮电史[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70.

②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1-52.

本长崎到上海的电报水线，其传输路线是从吴淞到川石山——香港——关岛——新加坡——欧洲，通过该线路，欧洲的电报通讯，在上海当天，最多不超过一天就可以收到。

1880 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并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委托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建设津沪电报线路作准备。1881 年 4 月，从上海、天津两端同时开工，至 12 月 24 日，全长 3 075 华里的津沪电报线路全线竣工。1881 年 12 月 28 日正式开放营业，收发公私电报，全线在紫竹林、大沽口、清江浦、济宁、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立了电报分局。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电报诞生后，很快成为中国各界信息交流的新宠，新闻界也开始利用这一新技术。1883 年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的海底电线从香港延伸到吴淞，也开始了中国的国际电信业务。①

1882 年 1 月 16 日，《申报》首先刊出该报驻京记者经由天津拍来的一条关于清廷查办一名渎职官员的电报消息，这是见于当时报纸的，由报社记者亲自拍发的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当时，电报只通到天津，这条消息是 1 月 14 日由那个驻北京的记者用快马送到天津，发至上海的。收到电报的时候，版已排好，来不及在 15 日见报，晚了一天，但和过去北京的消息往往要七八天乃至半个多月以后才能传到上海的情况比较起来，已经是快得多了。此后，随着国内各路电报线路的陆续铺设成功，新闻电报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效率也越来越高。1882 年 10 月 24 日顺天乡试在北京发榜，《申报》驻京记者将江、浙、皖三省上榜者名单当日送到天津，转电上海，次日见报，距北京发榜时间仅 24 小时。中法战争期间，越北谅山一带的战讯，由该报"随军访事人"送至广西的龙州，转电上海，使这一类消息的见报时间，由以前的 40 多天缩短到 1～3 天。1885 年 6 月 9 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越南条约》，《申报》驻津"访友"于 6 月 10 日得到条约全文，连夜拍发到上海，第二天就全部见报，这在当时，都曾引起很大的关注。②

由于电讯来得快，一些重要的消息，急于刊布，等不得第二天见报，于是产生了"号外"。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中，最先发行"号外"的是在上海出版的两家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和《晋源报》(The Shanghai Courier)，时间

---

① 不过，中国国际新闻的收发长期仰仗外国电信公司，直到 1931 年 2 月交通部国际电台在上海的建立，才打破了外国电报公司对中国国际电信事业的垄断。

②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2.

是1883年，内容是有关中法双方在越南交战的消息。①

初始，电讯主要用来传“上谕”，自己采访的新闻并不多。不过随着竞争的加剧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很多报纸皆辟“本报专电”，以电讯多而快作为竞争手段。有些报纸无力承担电报费用，就用偷窃、假造办法。到了武昌起义前后，《民立报》、《申报》等报已经整版刊登电讯，每天多到三、五十条。

3. 电报使得新闻的合作采集成为可能

电报显著地改变了新闻界，增强了现代的新闻观念，“解决了现代报刊最基本的技术需求，也就是说，它把报纸由个人的记事工具（报纸立场完全由个人风格所决定）和党派的喉舌，改造成以报道新闻为首要任务的信息传播者”②。同时，电报也改善了现行的新闻采集方法，使报纸有了国内和国际性的新闻，使报界有系统地合作采集新闻成为必要和可能。在此背景下，通讯社应运而生——通讯社是专门搜集和供应新闻稿件、图片和资料的新闻机构，是其他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

从19世纪70年代起，外国通讯社和外国报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派记者常驻，向中国报刊发稿。最早是英国路透社，于1872年派柯林斯（Henry Collins，亦译作科林兹）来华，在上海建立远东分社。③ 这是外国通讯社同我国发生的第一次接触，上海在我国城市中首先被连进国际通讯社网络。

路透社上海远东分社刚刚成立时，主要是采访中国新闻向总社发稿。其次是单独向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稿。首先采用路透社电讯稿的是《字林西报》。随后，除外文报刊采用该社电讯稿外，许多中文报刊也出现了“路透电”。④《字林

---

① 1884年8月6日晚七时，《申报》也出版了它的第一份“号外”，刊布了半小时以前刚刚接到的、该报驻福州记者发来的，关于“驻榕法舰尚无动静”的专电。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报纸还陆续印发过报道以下内容的几期“号外”：《传基隆失守》（1884年8月9日）、《基隆守军大捷》（1884年8月10日）、《中法谈判破裂法使下旗回国》（1884年8月22日）、《闽海将有大战》（1884年8月23日）、《台北淡水大捷》（1884年10月15日）、《镇海大捷》（1885年3月2日）、《法舰炮轰宁波小港炮台》（1885年3月14日）、《龙州大捷》（1885年3月30日）、《中法立约画押》（1885年6月11日）。其中《闽海将有大战》这一期“号外”，出版于中法马尾海战的当天（马尾海战爆发于这一天下午的1时45分，历时三十分钟，南洋海军在这次海战中全军覆没），相当敏感地反映了这一地区双方一触即发的战斗势态。这也是这一时期中文日报所发行的第一批“号外”。参见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2-53.

② 支庭荣. 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20-21.

③ 丁淦林. 中国新闻事业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7；胡道静. 新闻史上的新时代[M]. 上海：世界书局，1946：50.

④ 丁淦林. 中国新闻事业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7.

西报》刊登的路透社电讯，都印有“特别供给字林西报”这几个字，说明该报享有路透社电讯的独占权。上海英文报纸《文汇报》为了打破《字林西报》对路透社电讯的独占权，经常转登《字林西报》的路透社电讯。《字林西报》向英国法院提出控告，结果《文汇报》败诉。经过这一事件后，1900 年，上海远东路透分社才开始向上海的外文报纸普遍发稿。路透社开始向中文报纸发稿是 1912 年。当年有 18 家中文报纸订阅路透社电讯。

二、媒介新技术促进了把关人机制的演变

1. 编辑成为专职的把关人

无论是记载文字的物质材料的演变、图书生产手段的进步，还是复制技术的变革和发行方法的变化，都对编辑工作有着深远影响。简言之，编辑业务的每一微小的变化和进展，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一变化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轨迹。

中国古代负责编辑整理旧籍是被称为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①]。历代学者则不断以笺、注、疏等著述形式，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唐初已经有了“九经”的名目，后来又增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逐渐形成了十三经及其笺、注、疏的丛书系列。这些丛书被官方以石经、雕版等形式不断出版，也被民间书坊不断翻刻，成为中国古代累计出版数量最多、传播最为广泛的编辑出版物。[②] 而这些出版数量最多、传播最为广泛的典籍因为都是重复翻印，所以很少涉及编辑问题。

清代京报以前的报纸，实际上只能说是一种新闻信性质或政府公告、公报性质的原始形态报纸。[③] 邸报运作属官方行为，没有专设的办报机构，刊行京报的报房只是出版与销售的商业机构，报房中没有实际上也不需要专业的编辑人员。

但这种情况在晚清有了彻底改变。纸质媒介的生产从此便成为了一项社会事业，作为把关人的编辑成为了一种专门职业，编辑也成为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中介活动，出版传播业初现雏型。跟所有其他大众媒介一样，“报纸也是一个结构严密、经过精心组织且极端复杂的机构。每天都有数百万个词从许多渠道逐字输入大都市日报。这些词都必须加以分类、挑选、核对、评估、编辑、重写、排版、版面设限、编排

---

①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自序.

② 于翠玲.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40.

③ 刘家林. 中国新闻通史(修订版)[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35.

成页、印刷并发给读者"①。

机械化印刷使得出版周期大大缩短，报刊等时效性强的印刷品得以大量发行。这些出版物各具特色，需要采取不同于书籍的那种编辑方法，使得编辑业务更加丰富多彩。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各地报刊均有针对时局的议论，有人便将散见于当时报章杂志上的政论搜集起来，编辑成集出版。②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出版物，它的资料来源是报纸和杂志，一般不署编者姓名，在事变发生后很快出版，时效性比较强。要是当时没有能够提供支持的媒介技术，这类新型出版物的产生显然是不可能的。

书籍的工业化生产，不仅改变了线装书的古老面貌，而且也改变了出版社手工业化的组织结构。过去一个老板几名伙计组成一家编校、刻印、发行三位一体的书铺，此时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建立起来的近代出版社，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编辑部从发行部和出版部中相对地独立了出来，而且改变了千百年来编校合一的局面。这一时期，科技文化发展很快，出版方向已经从翻刻古籍转移到以印行时人著述为主，编辑工作的重点也从编校和选注转为选择书稿和帮助作者提高书稿的质量。由于高功率的机器印刷，出版物的复制量以千万计，出版物成了面向全国销售的商品，这样，编辑工作中的选题、组稿、审稿等环节便直接关

---

① Ray Eldon Hiebert, Donald F. Ungurait, Thomas W. Bohn. 大众传播媒介[M]. 潘邦顺，译. 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376.

② 例如 1894 年 9 月，中日两国的海军在黄海血战方酣的时候，就有《绘图扫荡倭寇纪要·初集》出版。该书不署编者姓名，为六十四开，连史纸石印本，共四册。全书约十二万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排日记事的体例，节录 1894 年 3 月 21 日至 8 月 21 日间发表于报纸上的新闻，凡是与中日战争有关的消息，无论国内国外一概收录；第二部分为《朝鲜考略》；第三部分是政论一卷；第四部分为插图八幅，有的是单幅一图，有的是双幅一图，都是与中日战争有关的时事画。政论一卷，收发表于报章上的关于中日战争政论十二篇，篇目为：《论中日衅端为大好机会》、《论时局宜战而不宜和》、《论防日本宜留意台湾》、《论日本五条要款》、《和战两权说》、《论中与日战有必胜之理》、《纪西友论堵塞吴淞口事》、《论出于战必持之以久》、《论和议之失》、《论中国为朝鲜事不可不与日本一战》、《论和议决不可从》、《论时局必当一战》。这卷政论是目前见到的报章政论文章的首次结集。它代表了甲午战争初期，主张坚决对日一战的爱国舆论。次年又有寄啸山房主人陈耀卿编的《时事新编》和曲阜鲁阳生孔氏编的《普天忠愤全集》出版。《时事新编》共六卷，巾箱本，五号铅字排印，全书约二十五万字。卷二、卷三为论著，专收有关中日战争的政论，其要目有：《中国宜以持久敝倭论》、《论日本不足为中国患》、《论中国海军大东沟之战》、《防倭论》、《论南洋宜亟防倭船》。《普天忠愤全集》共十四卷，巾箱本，石印。卷四至卷十为议论门，收集政论九十九篇，鲁阳生自叙说："今夏和议既成，余因搜集《普天忠愤》一书，贵自士大夫而贱至布衣。以及泰西洋士，绣阁名媛，凡其绪论有关时局者辄录之。"这些政论大都主张继续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反对和议，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决御侮宁为玉碎的英雄气概。参见姚福申. 中国编辑史（修订本）[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62.

系到出版社的盛衰,成为整个出版机构中最关键的部分。① 在媒体中,编辑成了专门的把关人。

2. 记者成为专业化的把关人

新闻传播活动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邸报是当时的主要新闻传播媒介,但邸报内容大多是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章,只是反映皇帝活动和朝廷动态的"宫门钞",它们本身并非新闻文体。只有在华外报创办后,才出现近代新闻文体和新闻写作,报纸上刊登的各类新闻稿件都着眼于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短小活泼。② 中国古代报纸没有报人自己采写的消息,自然也没有新闻采访业务(当然,宋代"小报"的"探报"可以看作中国记者、通讯员的祖先)。

方汉奇先生指出,所有关于在《京报》内看到某某事件和信息的记载,其源盖出于报内所收刊的各类题奏折件,而并非《京报》发行人自采自编自发的报道。认为《邸报》中刊有自采的一些灾祸、怪异、公案、传闻等社会新闻,纯属误会。③

报社比较注重采访工作,尤其是改良派所办的相关报纸更比一般的报纸更加注意新闻采访工作。采访的重点,也由"记载琐故","剿撮涂说","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无补时艰,徒伤风化"的市井新闻和黄色新闻,转移到时事政治方面。一般改良派报刊都派有专人负责采访新闻,期刊以政论为主,派得少一些,日报新闻报道的比重大,就派得多一些,而以《国闻报》最为突出。这个报纸为了"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在国内外的许多城市都派有记者,"访事之地,大小凡百余处;访事之人中外凡数十位"(《国闻报缘起》)。这个数字出于它自己的宣传,很明显的有夸大,必须打很大的折扣,但也多少能够反映出改良派报纸重视采访工作之一斑。由于重视了采访,记者在第一线掌握了较多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情节比较生动文字比较活泼的新闻报道。④

三、媒介新技术引发编排新机制

媒介新技术引领了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印刷术对文字陈述、文法规则的影响甚大,许多崭新的意义因此产生"。⑤ 印刷上的字模板是对物理空间的系统安排,

---

① 姚福申. 中国编辑史(修订本)[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9.

② 吴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7.

③ 方汉奇.《清史·报刊表》中有关古代报纸的几个问题[J]. 历史档案,2007(2).

④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50.

⑤ 李仁渊. 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M]. 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13.

版面及其尺寸是既定出版物内部的一个常数，对空间的不同安排则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视觉效果。

版面是刊登各种新闻、评论、图片和文章的地方。版面是报纸最基本的信息载体和传播手段。报纸所有的文字、图片信息只有通过版面才能得以传播。版面是报纸发言的重要手段之一。报纸不仅要传播客观的事实信息，而且时常要对各种新闻事实作出分析和评断。这种分析和评断，可采用直接方式，如发表评论，也可用间接方式，就是运用版面。报纸可通过稿件在版面中的不同位置、稿件的组合以及花线、标题、字号、套色等编排手段的运用来表达编辑部对新闻事实的态度、立场和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版面是一种语言，是表达编排者意见的一种手段。版面是形成报纸风格和特色的重要因素，报纸的风格和特色，既表现为内容的独特性，也表现为形式的独特性，而两者都集中体现在版面的编排上。富于个性的标题样式、稿件形状、栏目设置、排版原则等版面特点，是报纸风格和特色形成的重要标志。[①]

在印刷技术的支持下，更为自由的编排方式很快就开始出现。传统的排版以竖式构图为主，字号也相对单一，横式构图的出现并不意味竖排方式的消失。在19世纪末采用木刻字技术印刷广告标题后，横行的标题，竖行的正文几乎成了统一的广告排版格式。因此，编排的变化实际上是丰富了版面语言，也从形式上将文字元素的不同作用以及表现进一步细分出来，使广告的功能更加完善。而字号对比加强之后，不同字号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则从视觉效果上使广告变得更醒目美观。据记载："甲戊3月21日开始，《申报》第五版上的广告标题改为木刻字，3月22日起，《申报》上的广告标题全部使用木刻字，标题排版由竖行改为横行，正文仍然是竖行，并改用五号小字。"[②]这充分说明，字体在本身字形不断发展的同时，在版面上的应用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1. *从书册式到单页式*

中国古代报纸形式，直到京报仍然是很简陋的书本式、无标题、无版面、无栏目、无插图、无照片。"最初报纸之形式，无论每月出版，或二日以上，几一致为书本式"[③]。

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最初创办的一批中文报刊是书本式的，这种形式是由当时的条件决定的，因为晚清报纸多数是用土法制造的纸张印刷的，纸张小，字体大，单面印刷，装订成册自然像一本书。外国传教士最初出版中文报刊时，只能按照中国当时的条件，采用中国生产的土纸，雇用几名刻字工人，雕版印刷，因此也只能印成书本状。

---

① 袁军. 新闻媒介通论[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68.

② 王儒年. 中国近代广告的最初形态[J].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5).

③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5：356.

随着西方石印技术、机械印刷机、机制白报纸等的传入，晚清报纸的形式也相应地有了改变。1828年创刊的《天下新闻》开始突破中国古代报纸的书本式，用铅字单张印刷；1833年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第一个登载行情物价表，并首创在新闻后加编者按；1853年创刊的《遐迩贯珍》首次运用新闻图片，首次开辟广告专版，开中文报刊登广告之先河；1872年《上海新报》首次用白报纸两面印刷，1870年率先采用新闻标题；1876年《申报》第一个刊登新闻图画；1897年《字林沪报》的附张《消闲报》为中文报纸的第一个副刊。

完全打破书本式而成为单张报纸版式是从《中外新报》开始的。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采用四开白报纸单张印刷，改变了过去的书本式。《中外新报》是由《孖剌报》社印刷的。英商《孖剌报》是采用西方的印刷机及白报纸印刷的。《中外新报》交由《孖剌报》印刷时，也采用了西方的报纸形式。只是在编排上还是按照当时中文书写的特点，由上到下、由右到左、直行栈栏编排。1861年11月在上海创刊的英商《上海新报》，是采用八开白报纸两面印刷的。这是我国最早采用两面印刷的中文报纸。①

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进行编码，通过将事件置于赋予它们以不同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语境之中，媒体赋予事件以不同的阐释。② 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部分日报的版面，由书册式改为单页式。③ 从书本式改为单页式后，"报"开始摆脱书册的痕迹，与"刊"也开始分家，从而使报纸的特点和优势得到不断的发挥。到戊戌前后时报刊编排有了一些改进，"改变了一排到底的形式，每版分成三至四栏，句读加点，以清眉目，同时对一些过长的文章，进行适当的压缩"，当然，"这些改进主要表现在日报上，一般的期刊，多数仍维持书册状，封面加题签，类似线装书，变化较小"④。

汪康年首倡我国报纸版式改革，是中国近代进行报纸改革的第一人。他将《中外日报》版面"分三层，俾阅者少省目力，句读加点，以清眉目。首页开明目录，告白分门别类，以便检览"。而同时期的许多报刊都采用书本式，油光纸单面印刷，版面编排简单，整版按谕旨、论说、说事从右到左依次排开，读来费劲耗时。汪康年首创了"版面分刊，新闻分类"的编辑方法。《中外日报》每天出2张，4开8版，用白报纸

①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M]．上海：世界书局，1946：10.

② 黛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8.

③ 不过这种单页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有书册式的痕迹，即每张只印一面，分上下左右四个版，每版高约27公分，宽约25公分，对叠起来，相当于一页书，整张报纸经过折叠裁剪仍然可以订成一本书。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49.

④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49.

两面印刷，每版 3 个横栏，短行编排，并加句点。题文的字号有区别，大小眉目清楚。《中外日报》的首页上还“开明目录，告白分别门类，以便检阅”。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开风气之先。汪康年的改革措施加快了出报速度，提高了印刷质量，方便了读者阅读，美化简洁了版面，为增加发行量创造了条件。① 戈公振评论说，汪康年的这一举动“开我国日报改进之机”②。

1904 年，上海《时报》在我国报纸中第一次采用对开形式的两面印刷。《时报》在报纸的评论、编辑、版面方面敢于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第一，首先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创造的“时评”这种新的报章文体移植于日报，升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三个栏目，聘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分别主持评论国内大事、外埠新闻和本埠新闻。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冷隽明利的时评，很受读者欢迎。第二，首创报纸专题周刊，即在每周固定的日于设立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 7 个专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第三，首先采用 1 至 6 号铅字排版。新闻标题和评论中的主眼，皆加圈点以为识别，版而编排“务求醒目”。第四，最先将一张报纸分为一、二、三、四版，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了书册报纸的痕迹。《时报》的这些改革，后来各报纷起效法，影响深远。③

《中国日报》④在编排方面的重大改革是改直排为横排。当时的中文报刊是长行直排的，《中国日报》采用短行横排，使版面美观，阅读方便。当时有些中英文对照的报刊曾采用过横排，不过这种改革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⑤ 另外，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个别报纸还尝试着采用过加大字号的办法。⑥

这种对开的大报形式当时还遭到一些读者反对，认为面积太大，阅读不方便。

---

① 吴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88.

②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55：140.

③ 丁淦林. 中国新闻事业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8.

④ 《中国日报》社址选在香港是便于在国内发行，由孙中山亲自进行筹备，他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确定报纸名称为《中国日报》。因为香港英国当局禁止孙中山入境，才委托陈少白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日报》在 1900 年 1 月 25 日正式创刊，社址在香港士丹利街 24 号。担任报纸主笔及编辑工作的先后有陈少白、杨肖欧、陈春生等。参见梁家禄，等. 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88.

⑤ 梁家禄，等. 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89.

⑥ 例如《上海新报》从 1870 年 3 月 24 日起，所有标题都改用头号字排印，略大于正文的四号字；《申报》1881 年 4 月 16 日报道慈安太后病死的消息时，也曾用三号字排印有关的“讣告”、“遗诏”及“上谕”，略大于一般新闻，以资醒目。参见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0.

但由于日报要求出版早，印数多，装订成册费工费时，一些报社逐步废弃了书本式，有些报纸虽然仍然采用书本式，但将几个版面印在一张大纸上，由读者自行裁拆装订成册。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后，大部分报纸才废弃了书本式，改为《时报》版式。

再从书籍来看，西方人的书籍“著书多分章节而不分卷数”[①]，与中国文人一般的阅读习惯不同。各章之间以直线贯串，宛如机械各部，观念层层推演，在严整的逻辑下统整相承。这种构成与表达方式显然与中国当时一般著书与阅书的成例不同。中国文人虽在八股文与策论底下重视一篇文章内部承合的结构，但集成的书籍中重视的是文章各自散发出来的灵感与呈示，各卷彼此平行，故可随意披览，因之文集、语录与笔记体一直是书籍出版的大宗[②]。这或许呈现出西方文化思考方式与中国重视整体感与个别灵感启示而表现在书籍编撰上的差异。新的传播形式也从阅读习惯的改变进而牵动中国读书人的深层的心理世界。

2. 新闻专电的编排

电报不仅是一种新的商业工具(tool)，同时也是一个用于思考的东西，一种转变思想的工具(agency)。[③] 电报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带来了信息的选择性控制与传递，使得更为迅捷地搜集和报道新闻成为现实，“新闻专电”成为显示报馆实力和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在版面编排上一般放于新闻版面的重要位置。

新闻专电的出现实际上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种表征。新闻专业主义19世纪末开始形成，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它要求新闻从业者具有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要有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新闻专电取代了以往版面中的许多“论说”，改变了晚清新闻从业者的价值判断。

3. 新闻插图的出现

很显然，在传播活动中，图像性的内容比文字性内容来得更加直观和真实，更少被各种因素所遮蔽，也更具有原生态的意义。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近代报纸上的新闻图像成为重要的传播形式，并经历了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历程。

除了一般的消息和电讯外，其他的新闻文体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也开始受到

---

① 蔡元培，徐维则. 东西学书录叙例[M]//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62.

②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章回小说，不过章回小说形式之成是取自于说书人每回说的故事。故虽然回回直线相承，但不那么重视整体的结构。参见李仁渊. 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M]. 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29-30.

③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62.

注意。中国近代报刊最早刊登的新闻图像是新闻图示。1854 年《遐迩贯珍》月刊第一号刊登了土耳其与俄国宣战的消息。为了使“阅读者可以览之了然”，特绘制了一张两国形势图，附于报道之后。1854 年该刊第 5 号，又在关于清朝官军在上海与英美驻军武装冲突的报道后，附了一张形势图。这些地图、形势图，与文字新闻报道直接相关，是对文字报道的补充说明，属于新闻图示。①

配合文字报道，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出现了早期的新闻图画，部分报纸还增出了定期的画刊。最先在报纸上刊载插画的是《申报》。1876 年 8 月 18 日，《申报》在报道浙江地区一股会党被官军缉获的消息时，在新闻中插刊了一幅会党所用的臂章的图样。这是这一时期报纸上列出的，最早的一幅新闻画。1879 年 5 月 17 日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来华访问，到达上海，《申报》除发新闻外，还石印了格兰特的一幅半身单张画像，于 5 月 24 日随报分送。这是这一时期报纸印发的第一份单张新闻画，也是这一时期报纸上列出的第一幅新闻人物画。

至于画刊，最早的要属 1875 年 3 月在上海创刊的《小孩月报》。这是纽约长老差会的传教士范约翰主编的一份供中小学生阅读的兼有文字和图片的画刊。其次是《申报》编印的不定期画刊《寰瀛画报》，创刊于 1877 年 6 月；还有上海圣教书会编印的《图画新报》，创刊于 1880 年 5 月。这几份画刊所刊载的风景、建筑、仕女等图片，都是从国外旧画报上转载过来的，有的实际上用的就是人家早已用过不要了的旧铜版，没有什么新闻性。《寰瀛画报》刊载的“有关俄土两国之事”的共十八幅一组图片，似乎是新闻画了，但实际上介绍的是 1854 年克里米亚战争前后的历史场景，早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② 中法战争时期，《申报》印刷过《谅山大捷图》、《基隆淡水得胜图》、《台湾得胜图》等，以单张形式在市间发售。这种形式是中国传统的诗画配的沿革。

在新闻图画产生的同时，甚至还产生了新闻漫画，当然，由于受新闻图画的影响，其形式上与新闻图画难分伯仲。应该说，“在民众识字率非常低的近代中国，新闻图画这种具有较大想象成分和主观因素的视觉传播方式，成为近代报刊接近民众、走向大众化的桥梁”③。不过在 20 世纪初，照相制版技术日渐普及，报刊上的新闻照片越来越多，新闻图画也就失去优势，被采用也就越来越少了。

4. 新闻照片的使用

报纸的发展，同印刷术的改进、图片以及最终照片呈现方式的改进有着密切的关联，同工业化引起的劳资关系的改变和新闻价格之战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

① 王文利. 近现代新闻图像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325.

②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4.

③ 王文利. 近现代新闻图像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8.

照片很早就被用于记录重要事物，特别是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记录。① 中国最早用照片记录重大事件是在19世纪下半叶，拍下了上海至江湾镇和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的现实场面，这也是中国采用摄影照片开始纪实报道的初步尝试。② 1902年8月，《万国公报》以半版的篇幅，刊出题为《醇亲王奉使过上海图》的新闻照片。但该报刊登的铜版照片不是自制的，最早刊登自制铜版照片的中国报刊是1902年梁启超等人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上有《檀香山焚烧华人市场惨状图》、《加拿大下议院议事图》、《英国议院图》等。③

1902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和1903年以后在东京创刊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也都刊有新闻照片。④ 当时新闻照片的题材虽以风光和建筑物居多，但也和文字宣传紧密配合，服务于报刊的舆论宣传目的。

国内刊物中最先刊登新闻照片的是1904年在上海出版的《日俄战纪》，这是一个专门报道日俄交战情况的时事性半月刊。同年在上海创刊的《东方杂志》也刊有自制铜版图片。国内日报中刊用新闻照片最早的当属彭翼仲在北京创办的《京话日报》。⑤ 这些照片的出现，说明我国的新闻媒体当时已经具备了摄制和印刷铜版照片的能力。关于新闻照片，特别著名的事例当属"南昌教案"。1906年2月22日南昌知县江召棠被法国教士王之安杀害，法国当局谎称自刎。北京的《京话日报》在3月29日刊登江召棠遗体颈部以上的伤口部位照片，并附编者按，记述事情经过。照片配合新闻，对揭露法国当局谎言起了重大作用。当地人民在盛怒之下，将凶手围殴至死，造成所谓的"南昌教案"。

在一些改良派的报刊上也出现过少量的新闻图片，⑥都起了和有关的电讯报

---

① 在摄影术发明3年后的1842年5月，比欧乌就拍摄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新闻照片。记录了德国汉堡发生的一场大火灾。随后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布雷迪又用照片记录了战争，用照片这种图像媒介进行战场上的报道，被视为最早运用摄影手段作新闻报道的先例。不过，真正把照片运用于报刊上，是在1880年霍根发明照相铜版术以后才得以实现的。世界上第一张见报的照片是1880年3月4日刊登在《纽约每日新闻》上的《山蒂镇风光》。

② 陈燕. 超越时空——媒介科技史论[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46.

③ 方汉奇，李矗. 中国新闻学之最[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59.

④ 方汉奇. 报史与报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09.

⑤ 方汉奇. 报史与报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10.

⑥ 最先编发新闻图片的是1884年创刊的《述报》，它所刊载的《侯相出京》图，以左宗棠奉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一事为题材；《炮轰法舰》图，以中法海军在福建前线作战情况为题材；《刘永福》图，以在越南前线抗击法军的黑旗军将领为题材；它所刊载的《厘卡积弊图》则是对厘税制度的形象的批评，是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舆论的，同样直接服务于改良派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参见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51.

道相配合的作用，弥补了文字宣传的不足。戊戌前后的改良派报刊中，也有一些比较注意图片宣传。① 不过这一时期改良派报刊上的新闻图片，仍然是画家们创作或摹绘的木刻版画，其造型的准确和精致程度类似于《点石斋画报》，不过还没有超过后者的水平。

到辛亥革命前后，不少报刊利用图片来报道各地事变、武昌战事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民立报》出单张的"民立画报"，《时报》出"纪事画"，画上加新闻。在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派兵镇压，上海的《时事新报》刊登过不少照片来配合新闻报道。②

5. 文本图像与图像文本

中国传媒的近代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画报也不例外，这种传媒形式传入后颇受读者欢迎。正如包天笑所言："从前办那种文艺杂志，也很注意图画，尤其是小说杂志。小说时报除了在小说中偶有插图外，每期前幅，还有许多页铜版画图。这些铜版图，有的是各地风景，有的是名人书画，但狄平子以为这不足引人兴趣，于是别开生面，要用那时装美人的照片。"③

画报业作为近代中国传媒的一个分支，因其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受到大众欢迎，故在开民智、传新知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其轨制范式则源于中国画报业的始祖《点石斋画报》。④《点石斋画报》由吴友如⑤主画，采用图文并茂的体式。

"如果文字是缺场和艺术性的媒介，那么形象就是在场和自然的媒介"⑥，中国

① 《知新报》第 43 期就以一整页的篇幅，刊载过俄皇彼得大帝的肖像，和同期发表的介绍俄国变法经验的《大彼得传》相配合，为改良派的变法思想作宣传，起了"图文并茂"的作用。参见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51.

② 李良荣. 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57.

③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359.

④ 裴丹青.《点石斋画报》和中国传媒的近代化[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3).

⑤ 吴友如，名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困，被送到苏州阊门内云蓝阁裱画店当学徒，后来到上海画界正式学习，因为天赋好，又肯用功，逐渐成名，以画仕女擅长。吴友如能够接受美查的邀请，负责《点石斋画报》，不墨守只画山水花鸟的传统，绘画新人新事，说明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绘事当跟时代而变迁，时代有这东西，尽可取为画材。我们瞧了宋元人的画，没有个不以为古雅绝伦，岂知在宋元人当时作画，也不过些眼前景物罢了，那么现在既有新事物和我们接触，为什么要把它拒绝呢！"（参见郑逸梅. 点石斋石印书局和吴友如其人[M]∥书报话旧.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86.）吴友如的思想影响了他周围的一批画家。吴友如在《点石斋画报》上所画的每册不过十之二三，其余部分由周慕桥等十余位画家承担，他们当时在上海也有知名度。吴友如因与美查的意见常不一致，就离开《点石斋画报》，先后创办了《飞影阁画报》和《飞影阁画册》。

⑥ W·J·T·米歇尔. 图像理论[M]. 陈永国，胡文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0.

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但多限于考订形似物象的称谓,或补当时文献之不足,配图解释小说、文章中的难解部分。以《点石斋画报》为代表的画报打破了这种文为主、图为辅的局面,以画幅作为反映新闻的主体,实现了从文本图像向图像文本的过渡,图画在画报中占据主导地位,简短扼要的文字只是用来辅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图画的前因后果。在视觉与文字再现的世界里,画报重写了名与实、可说与可视、讲述与体验之间的转换关系。

《点石斋画报》则坚持"爰倩精于绘事者,择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①的编选原则,打破了精英阶层对信息的长期垄断,促进信息在中国各阶层间的互动,加速了中国传媒近代化的步伐。"它的成功是近代中国传媒中西合璧性的凸现,同时它的存在促成了清末民初画报业的兴盛,从形式上丰富了近代中国传媒的发展"②。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点石斋画报》等晚清画报的解读,虽然可以"侧重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或者可以看好'不爽毫厘'的石印技术"③,但"形象文本的缝合不是一个对称的或不变的关系,而取决于它所属的那种媒介的制度语境"④,所以我们尚需进一步探讨"在晚清这一特定时空中,传统中国的'左图右史'怎样与西学东渐之'图像叙事'结盟,进而汇入到以'启蒙'为标识的现代化进程"⑤。

第三节 媒介技术发展促生媒体营销新机制

采编偏重的是文本,但文本不是书籍报刊的唯一构成,"在它的身前身后,还围绕着一大群相关的因素,它们有的面目清楚、轮廓鲜明,譬如出版机构、作家社团,有的却隐身其后,难以尽述,譬如读者反应、书店销售市场反馈。它们对文学文本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⑥。报刊书籍既是文化思想的物化载体,也是多维线索交错的重要结点。

当印刷技术展开之后,出版行业的运作逻辑完全不是家刻和官刻时期所可以比拟的。它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夹缠着文化的理想和责任、商业利益的诉求等多

① 尊闻阁主人.画报缘起[N].点石斋画报(创刊号).

② 裴丹青.《点石斋画报》和中国传媒的近代化[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3).

③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J].书城,2008(8).

④ W·J·T·米歇尔.图像理论[M].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6.

⑤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J].书城,2008(8).

⑥ 王燕.晚清小说期刊史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9.

重目的的运营模式中。[①] 文化的生产由于技术变革之后的商业利益驱动，得以通过市场等新的传播渠道展开。这些媒介新技术已经逐步进入实用化和普及阶段，在传播活动中引发重大变革，其中既包括制度和产业结构上的调整，也包括传播形式和内容的变化，还包括管理和经营观念的革新。

一、媒介新技术促进媒体竞争机制

1. 媒介技术发展降低了印刷成本

媒介技术的发展对印刷产品的价值稀释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在媒介技术不发达、劳动生产率落后的时代，图书复制主要是手抄和手工印刷，两者造价都相当昂贵，书价因此居高不下。书籍的价格昂贵，使一般百姓无力问津，因此，平民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根本谈不上读书消遣。

唐代时，雕版印刷开始应用于书籍生产，书籍交易开始活跃。长安、洛阳、四川、浙江等地的书肆遍布，买卖兴隆。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载，白居易的诗集被"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②]。可见，当时各地书肆中已同时售卖抄本书和印刷书了。但唐代的书价相当昂贵，甚至被奉为珍品、居为奇货。《新唐书·白居易传》记载：白居易的诗"时士人争传，鸡林（今朝鲜）行贾以白诗售于国相，率篇易一金"。如此小范围内传播的书籍，价格是难以用市价估算的。

据日本伊藤长胤的《盍簪录》记载：永和五年（838 年），太宰少贰藤原岳守"因检唐人货物，得元、白诗笔，奏上。帝甚悦，授位从五位上累官至右近卫中将"[③]。向皇帝进献元、白诗作竟可以加官授爵，其价值恐黄金也难以比拟。可见，唐代书籍"物以稀为贵"，囊中羞涩的寒士是难以问津的，他们获得书籍的主要途径只能靠自己手抄，这种状况直至宋初依然没变，洪迈称，宋初"印板书绝少，文字皆是手写"[④]。

苏轼也说："予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⑤]嘉祐刻本《杜工部集》每部售价 1 000 文。苏轼谪居黄州时，

---

① 雷启立. 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75.

② "缮写"的书是抄本，"模勒"的书则是印刷书。

③ 路工. 访书见闻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16.

④ 焦竑. 焦氏笔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00.

⑤ 苏轼. 苏轼文集·李氏山房藏书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6：359.

“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以此推论，他的月收入仅够买四部《杜工部集》。尽管和唐时相比，宋元刻本待价而沽，市场化销售已成规模，但书价依旧居高不下。范成大《吴郡志》记载：“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诰守郡，始大修设厅，规模宏壮，假省库钱数千缗，厅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部为值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既偿省库，羡馀以给公厨。”①

即使时至清朝，雕版印刷技术已非常成熟，但书籍价格依然居高不下。比如乾隆年间的《红楼梦》以手抄本形式在世间流传了三十多年，“当时好者每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价，得金数十，可谓不胫而走者矣”，按乾隆年间的米价折算，一部手抄本相当于两千斤米的价格。而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程伟元用木活字刊印之后，该书价格低落，“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但仍相当于一百多斤米的价格。②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成本在晚清有了明显下降，书价自然水落船低。同样一部《通鉴辑览》，木板雕印版 20 元一部，而铅印版定价只有二元几角，价格的竞争优势不言而喻，初印 100 部，再印至万余部，其中的利润当然是很可观的。当时出版业的利润，可以在后来走了极端的“一折八扣”书中看得更为清楚。③ 再以商务印书馆为例，众所周知最初其总投资是 3 750 元。1901 年张元济、印有模入股后，原股升值 7 倍。一个不大的投资在养活连亲戚带朋友的一帮人之余，四年之间资本还有这么大的增值。如果不是新的印刷技术带来利润之丰厚，夏瑞芳等再怎么勤勉努力，大约也是难以办到的。④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 1871 年开始出书。在该馆译书时间最长、译书最多的傅兰雅于 1880 年在总结该馆的成就时指出：近十年间共译出书籍 98 种，计 235 册，

---

① 范成大. 吴郡志(卷六)[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50-51.

② 何明星.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68.

③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极端的“一折八扣”现象：批销商预付订货一折，有了预付款资金成本也有了，利润不低于成本的 50%，为了扩大销量，就在这个基础上再打八折。也就是说定价一元钱的书出版商实得 8 分还有赚。不过一味追求降低成本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作用：在竞争中甚至由一折八扣将为一折六扣、一折五扣。这样一来，许多书粗制滥造，错字百出，文字节佚不全引起读者大为不满，结果无人问津，成为废纸。参见郑逸梅. 一折八扣书是怎么回事[M]//书报话旧.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141-142；平襟亚. 上海滩上的一折八扣书[J]. 出版史料，1982(1).

④ 蒋维乔. 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北京：中华书局[M]//张静庐辑注.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下). 北京：中华书局，1959：395-396.

每册约 60～100 页。共出售 3 111 部，合计 83 454 册。此外还用铜版印刷地图、航海图 27 种，售出 4 774 张。[①] 这一数量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一方面由于社会对西学的需求增多；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采用了新的印刷技术，印刷速度提高的同时成本自然降低了。

由于成本的降低，书籍报刊也由知识阶层的专利品降价屈尊，逐渐接近了普通百姓的购买能力，成为大众文化的一般消费品。比如，京报在白本报房时期只能发行数百本，实行刻印以后销数激增，最多的时候估计在 1 万份左右。[②] 此外，报房还利用自己的印刷设备承印各种印刷品，[③]这也为报房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随着报房京报商品化程度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国事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晚清时京报的订户已经不限于诗礼簪缨之家，不少市井商贾也跻身读者行列，甚至连识字极其有限的贩夫走卒也订起报纸来了，这是与以往邸报的发行、阅读完全不同的盛况。

晚清的报刊大都由书局直接编辑、印刷、发行，或者说书局办报成为晚清新闻报业的一大特色，[④]有的刊物名称甚至直接取自书局名称，[⑤]各大报馆、书局往往在异地设有销售点，依靠报馆、书局现有网络进行销售，这也大大降低了报刊的成本。正如论者指出的：晚清书局、报刊、小说“三合一”的特殊组合，集印刷、出版、发行于一身，形成三位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产业。三者之间相互支持，书局为报刊提供印刷设备，报刊为书籍提供免费广告。单行本小说淘汰小说期刊中被读者厌弃的作品，对于热销点则迅速进行市场反馈。反过来，小说期刊的分期阅读导致的审美的延宕，在单行本小说中又可得到补偿。对于书局来说，同一小说，以报刊连载和单行本形式先后推出，只需一次性买断版权，可以节约费用。而当时担任小说期刊编辑

---

① 傅兰雅. 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M]//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21-25.

② 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的估计是 1 万份以上。参见胡道静. 新闻史上的的新时代[M]//报坛逸话. 上海：世界书局，1946：2.

③ 比如，1885 年 2 月 5 日《申报》所刊《辇毂纪闻》中，就有关于北京报房承印银号章程的报道：“此次银号一得开捐消息，即将章程托京报房排印数千张，四处分赠。”

④ 如英华书院编辑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徐家汇土家湾印书馆出版的《益闻录》、《格致新报》、《圣心报》；清心书院出版的《小孩月报》、《图画新报》；广学会编辑的《万国公报》；申报馆印刷部印制的《申报》及其所属的申昌书局印刷的《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寰宇琐纪》，以及点石斋书局印制的《点石斋画报》；上海强学会书局出版有《强学报》；文明书局出版有《华北杂志》、《智群白话报》。

⑤ 如小说林社发行《小说林》月刊；新世界小说社发行《新世界小说社报》；中外小说林社发行《中外小说林》；竞立社小说月报社发行《竞立社小说月报》；新小说丛社发行《新小说丛》；上海白话小说社发行《白话小说》。

的人，又都是该刊的主要作品撰稿人，无形中又为报社节省了人员开支。[①]

对于报馆书局来说，刊印期刊并不困难，而且大有利润可图，如《小说时报》创办者狄保贤“本有一个有正书局的出版所，又有一个很好的印刷所，铅印石印齐备，办一个杂志，也较为方便。又有《时报》上，不花钱，对于出版商可以登广告”[②]。再比如申报馆 1876 年用石印术翻印《考正字源》、《佩文韵府》等，1882 年翻印了《康熙字典》。后者印制较为精美，定价也不高，故销行很好，先后印行两次共计 10 万部，销行数量可能为当时之最。1884 年起申报馆专设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用活字版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历时四年告成，共 1 628 册。《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年间开始出朝臣编写，至雍正年间才完成的一部重要的工具书。申报馆出版的这个版本是《古今图书集成》的一个重要版本，是中国当时铅印本中的巨书。[③] 申报馆凭借技术优势，报业、刊业和书业并举，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也在整个中国出版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

2. 媒介技术发展提高了新闻时效

由于用经商原则管理报纸，报纸业务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信息观念加强了。为了充分体现新闻的时效性特点，用新鲜性占领市场，办报人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报纸与杂志分开、各自向独立发展的方向迈进；并且在时间观念的支配下，报纸的刊期不断缩短……其次，充分运用现代通讯与交通工具进行新闻报道，设‘专电’的目的，是为了‘抢’新闻”[④]。而以电报为代表的先进的媒介技术为“抢”新闻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自有电报，早晚行市，随时皆可通知，操奇计赢，万里无殊咫尺”[⑤]。

刚开始时，电报电话使用成本很高。由上海发往香港、广东、长崎的电报，每 10 字需洋 3 元，由上海发往神户、横滨的更贵，每 10 字需洋 5 元，不满 10 字的按 10 字计。到 1909 年，中国电报局发往湖南、四川的是每字 0.22 元，发往云南、贵州、黑龙江的是每字 0.25 元；大北公司发往香港的是每字 0.4 元，发往欧洲是每字 2.10 元，发往纽约是每字 2.35 元。[⑥] 这样的价钱，一般人固然是不敢问津的，但对于出版商而言，在紧急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因为它能抓住更多的时间和机会。[⑦]

---

① 王燕. 晚清小说期刊史论[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60.

②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358.

③ 王建辉. 出版与近代文明[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20.

④ 吴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9.

⑤ 参见《论中国兴电报之益》，《万国公报》第 39 册，1892 年 4 月，第 20 本，第 12716 页。

⑥ 熊月之，张敏. 上海通史（第 6 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87-88.

⑦ 黄林. 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75-276.

比如，1881 年 12 月我国第一条电报线从上海到天津架设完工，三个星期后，《申报》首先采用了访员从天津传来的电讯(1881 年 1 月 16 日)。

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传递已十分迅疾。为了第一时间“抢”到新闻，有的报馆开始建立自己的新闻信息网络。比如，《申报》办报伊始主要选录京报、香港中文报，译述西方报纸上的新闻，不过随后便着手建立自己的新闻采集网。《申报》先在本埠招聘访员，分别设置法租界访员、英租界访员、美租界访员、南市区访员等，注意“招延访事”。创刊半年后，又开始增聘外埠访员，“到 1875 年，已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武昌、汉口、宁波、扬州等二十六个省会和重要城市聘有特约记者，及时报道当地的有关新闻”①。无访员的地方，《申报》就鼓励当地读者惠寄稿件，发表后付给报酬。随着新闻通讯网的不断扩大，报上的新闻日渐丰富充实。1872 年创刊初期，每期报纸只有几条新闻，10 年后增加到一二十条，90 年代增加到四五十条。再比如《字林沪报》，②因为《字林西报》则取得了路透社电讯的独占使用权，在国际新闻的传递方面具有了垄断性的优势，为了提高竞争力，《字林西报》的中文版《字林沪报》就同日翻译刊登路透社电讯。报纸“不像书本一行一行地展开某种思想，报纸上却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标题和故事，它们并排出现，竞相争取读者的注意”③。

报人汪康年十分注重报纸的时效性。在他看来，办报的话最好是办日报，因为旬刊周期过长，不利于消息传播。对于把《时务报》办成旬刊，他一直耿耿于怀，1898 年《时务日报》的创办终于偿其夙愿。为进一步加强报纸时效，他在报上首设“专电”。《时务日报》章程第五条：“各处如有异常紧要之事，均令访友即行电告，俾

① 方汉奇先生指出，主要有这样几次采访活动：第一，1874 年 6 月，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戮琉球人及日本人，发兵进攻“番社”，载《申报》特派记者前往台湾实地采访，7 月 22 日在报上发表了这个记者发回的第一篇台湾战讯；第二，1882 年 7 月朝鲜发生“壬午政变”，中日两国都派兵人朝，载《申报》特派该报原驻横滨及烟台记者各一人，赶往朝鲜作实地采访，所写有关朝鲜战乱情况的报道，9 月 9 日起，连续在该报发表；第三，1884 年 3 月中法战争进人紧张阶段，法军大举向我进攻，《申报》派出记者分赴海防、香港、广州、宁波。福州、厦门、淡水(台北)等地采访。赴海防的一路，由于受到法方的阻挠，只呆了四天就被迫离越返国。其他几路都发回了不少战报。方汉奇先生进一步指出，这几次采访活动实际上也是中国报纸历史上最早的战地采访活动。参见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1.

② 原名《沪报》，1882 年在上海创刊，是英商《字林西报》的中文版，因为销路不甚理想，方易名为《字林沪报》，内容大部分均从《字林西报》翻译而来。1897 年 11 月 24 日，《字林沪报》还创办附张《消闲报》，随报赠送，以吸引更多读者。梁家禄等人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报纸副刊”。参见梁家禄，等. 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39.

③ Ray Eldon Hiebert, Donald F. Ungurait, Thomas W. Bohn. 大众传播媒介[M]. 潘邦顺，译. 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118.

阅者先睹为快。”为奖励来报专电，无论北京还是其他外省访员拍来的专电，除馆薪外，每条特奖银二元。①

《时务日报》的这种做法，激励了其他各报纷纷仿效，同样也以多付稿酬的办法奖励优质来稿，开设自己的“专电”以吸引读者，在当时报界树立了紧抓新闻时效性的风气。《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后，1898 年 8 月 17 日报上特地刊登启事规定：“本馆凡有紧要事件，皆当发传单，以供诸君先睹为快。”所谓“传单”，实际就是后世所称号外，即在报纸交付刊印后，对发生的重大紧急事件的随时发刊。这些举措都充分反映了汪康年办报实践中对新闻时效性的高度重视。

作为消息工厂、消息批发商，通讯社延伸了报刊媒介的新闻采集手段。此前，许多报刊因财力限制，无法搜集全面的新闻情报。晚清时出现的通讯社以廉价的服务，扩张了报纸的视野范围，加强了近代报业的经营基础。1904 年，广东报人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为中国人在国内办的第一家通讯社，主要向广州和香港的报纸发送新闻稿。1909 年由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随员在布鲁塞尔创办的远东通讯社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海外通讯社，汪康年、黄远生、陈景韩等为其国内通讯员。② 通讯社的设立使新闻信息的传递的速度和广度有了更明显的改观。

二、媒介新技术影响媒体资金筹集机制

技术竞争的背后往往是资本的较量。大浪淘沙中，小本经营的报社、书局不是遭淘汰就是被日渐边缘化。在单纯的印刷技术问题得以解决以后，只有更为雄厚的资本才能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从根本而言，近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也是源于市场经济对效率的追求。

印刷业从分散的零星运作转化为集约化的大工业生产无疑需要资本的支撑，哪怕出版一部作品都需要不菲的资产投入：人员的聘用、厂房的租建、印刷机械的购置、纸张油墨的成本、稿费的支出等。生产之外还要向人们已经成型的雕版书阅读习惯挑战。

以清代图书产品销售的大宗种类来看，市场需求的最大宗是蒙学在内的教学用书、历代古籍、工具书、文艺小说、鼓词、唱本、年画等。教学用书如“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蒙学读物，与此项衔接的还有《性理大全》、《性理精义》、《朱子大全》、《四书》、《大学衍义》等。这些教学用书由于

① 吴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88.
② 杨师群.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6.

需求量大，自然被现代的机械化加工力量所追逐。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所开展的新式教科书大战就是一例，表面上是教科书编辑思想、理念等新式文化产品之间的竞争，实际上竞争的门槛提高到是否拥有现代化的图书生产加工能力。教科书始自1897年，当时只有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等五科，以商务印书馆的《初小国文第一册》、《最新之国文教科书》出版为代表，1905出版首发超过10万册，而白话文的《共和国教科书》1912～1929年先后印刷了2654版，累计销售7000余万册，占商务印书馆总量的60%多。没有机械化的印刷生产能力是难以想象的，而传统宗族化的手工生产方式无法满足这一巨大要求，因之再也无缘教学用书的生产、销售，而恰恰这是图书系统中利润最丰厚的一部分。[①]

印刷技术的革新，社会交往的扩大以及一批新兴职业、阶级、阶层的产生，引致媒体的变迁。中国传统出版组织（书肆、书坊和官书局）长期以家庭作坊式和官办形式进行生产和经营，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没有多大变化。西方印刷术和印刷机的传入同时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印刷业的固有模式。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批新式出版机构脱颖而出，它们一般都采用机器生产和先进的印刷技术，有的还采行了股份制的经营管理方式。19世纪70年代以后涌现出《羊城采新实录》、《昭文新报》、《汇报》、《广报》等一批现代报刊。它们多为民营，广登社会各类信息，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有的还要实行集股经营。比如，中国电报总局由于业绩颇佳，所发行的股票尤受股民青睐。[②]《湘报》也曾刊载不少报纸的招股广告，比如《大同报》因开办经费不敷，就刊登广告准备发售股票100张，每股银20两，并对分红及其他待遇作了说明。[③] 申报馆一直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最雄厚的资金，在技术上对中国近代出版的推进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印刷出版业的门槛抬高了，它转变为一个以技术变革来带动的生产和销售模式变化、资金集中的行业。有学者指出，“光绪前后上海新开设之书店如雨后春笋，均采用西法印书”[④]，石印所需资本较少，约有56家，较铅印多1倍余。[⑤] 与商务印书馆同时代问世的书局，有记载的也有几十家，但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能坚持而幸

① 何明星.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67-168.

② 陈向阳.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变迁述论[J]. 安徽史学，1996(1).

③ 董贵成.《湘报》与科学技术的传播[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1).

④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89.

⑤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90.

存者甚少——即使连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曾在发展中遭遇过严重的资本危机。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利润回报丰厚的行业。许多商人纷纷加入，比如享有盛名的点石斋书坊，其拥有者美查原本从事的是茶叶、棉花生意，也正是看到新的出版技术带来的巨大潜在利益，才投身其中的。

民办报刊有几种形式：个人出资，招聘职员多办报同人分摊或自认股本，经营与所有合一，招股集资，募捐筹款。有时则数法并用。① 1897 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澳门创办《知新报》，这是中国报刊业第一家采用股东制，随后又有一些报刊实行了股份制。体制的改变必然改变经营方式，广泛引入的招股方式，扩大了报刊的产销量，有利于新闻出版事业走上大规模发展之路。

金钱也可以改变传播。它改变力量的平衡，往往把受众变成产品而不是消费者。报纸刚刚产生的时候，办报的资金是从读者那里来的，读者卖报的钱用来支付报纸的出版和发行。② 印刷现代性展开所带来的巨大的读者市场，印刷技术所蕴含的强大生产力，使它成为新兴的资本角逐市场。印刷和出版需求之间的平衡也由于大批资金的进入而打破。出版机构的运作常常因为收到资本逻辑的控制而演变为资本的运作。③

1897 年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具有较大规模并采取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的印刷厂，在初创的 20 多年中，陆续引进了世界先进的凸印、平印、凹印、珂罗版等设备和技术，同时还开办铁工厂仿制各种印刷机械。它能做到“日出一书”，能够办出中国近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决不是偶然的。④ 上海外文报刊的品种和发行量均居全国之首。近代上海报业，无论是其宣传效应还是其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上海报业从个人集股到组织公司，大致于 1906 至 1907 年前后在主要报馆中发生。⑤

晚清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那就是书局办刊。书局办刊的优势在于，它有较为雄厚的资金。我们知道，杂志和图书是不一样的，它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广

---

① 桑兵. 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J]. 近代史研究，1991(6).

② 斯坦利·J·巴伦. 大众传播概论：媒介认知与文化(第 3 版)[M]. 刘鸿英，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5.

③ 雷启立. 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77.

④ 闵大洪. 对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多写几笔——新闻史研究中的一点思考[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⑤ 汪幼海.《字林西报》与近代上海新闻事业[J]. 史林，2006(1).

告收入来维持的，可创办之初由于影响力不够，是很少有商家来作宣传的。书局的经济实力可以为开办初期的期刊提供资金支持。书局一般都有自己的印刷所，铅印石印设备较为齐备，能够保证所办连续性定期刊物的按时出版。书局强大的编辑队伍和作者群体，又将为自己创办的刊物提供源源不断的稿件和编辑人手，不会因某个关键人物的去留而影响到期刊的生存。而书局较为健全的发行网络，打破了期刊发行的地域限制，便于各地读者的购买。[①] 而且，书局办刊在人员和稿源方面也存在天然优势，刊物还可以免费为自己出版的图书打广告。如果办得好，刊物还有可能成为书局新的经济增长点。

除了书局办刊外，也有报馆兼营图书的，比如申报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报业经营自始至终都是《申报》的主业，它兼营图书出版主要在早期，即由外国人作为报馆主人时期（1909 年，尤其是 1889 年前）。1873 年 3 月起，《申报》多次刊登《搜书》《觅书》之类的启事，征求孤本珍本图书。从此图书出版成为刚刚建立起来的申报馆的兼营项目。它出版的第一部书，是一部多达 500 篇分为 4 卷本的制艺文汇编《文苑菁华》。此书是为科举考生备用的，稿件则是通过《申报》发出征文启事一篇篇地征集而来。从征稿到出书仅用两个多月（1873 年的 3 月至 6 月），充分显示了报纸和机器印刷进入图书出版领域的巨大优势。[②] 报馆亦曾用铅活字排印《儒林外史》，也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绅商争购此书，很快就重印，未购到者均感遗憾。

申报馆之所以出版图书，目的不外就是谋利。申报馆出版图书是很经济的，首先，利用报馆现有机器印刷设备来印刷出版图书，是对于报馆剩余生产力的一种调剂，即用剩余生产力来印刷图书。同时，也是书和报的互动与优势互补，是多种营业的互利互动。多种营业互动才能有效地取得利益。[③]

三、媒介新技术冲击媒体发行流通机制

1. 报刊的发行与流通

因“文以载道”传统的影响，以印刷出版为代表的文化生产往往都被理解成承载思想的工具。以往的学术研究也较多地关注印刷出版的“内部”，对“外部”的讨论也多只是拓宽到编辑、出版机构对于作品的编辑选择上，仍然囿于“劳心者”层面。而霍尔（Hall）等人认为，在文化生产循环中，具“劳力者”性质的印刷、运输、销

① 黄林. 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5.

② 王建辉. 出版与近代文明[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17.

③ 王建辉. 出版与近代文明[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18.

售等的“生产实践活动”领域亦是产生“意义”的文化组成部分。一种报纸的流通与流行，除了取决于其自身内在品质以及主导思想、文章内容等方面的因素外，还需要有效的传播渠道，特别是在报纸创办伊始。晚清时出现了多种性质的报纸，其发售与流通机制也殊有不同。

历代官方的邸报都是经过邮驿渠道，从中央发往各地的。因此，邸报又称“驿报”。唐代的报(状)和宋代的邸报(朝报)，都是由进奏院抄录、登记，然后交邮驿递送。在唐代，除了驿站外，还开始出现递铺，速度达到日行 400 里，主要是快递边境文书。宋代的递铺直接为进奏院办事。清代官报的发布方式与明代相似，即经由通政使司、六科、提塘等三个环节。通政使司是收受臣僚题奏的机关，“掌受各省题本，校阅送问”。六科是发抄皇帝谕旨和臣僚奏章的机关，经由六科发抄的主要是明降谕旨和允许发抄的臣僚章奏。哪些谕旨和章奏应发抄，哪些不应发抄，往往由皇帝作决定。在各朝《东华录》中载有大量有关“邸报”发抄的皇帝批示。民间报房刊行的京报，从收集材料、编印或复抄到发行，都是自行办理的。清代内阁每天发布邸钞，报房派人去抄录，随后制作为京报。京报发行有零售，也有按月订的；有整本的，也有按内容分册出版的，如宫门钞、谕旨等都出单行本。

在传播范围和效果上，邸报传递的是官方文书，主要在官吏中传播，范围很小，发布者不需要考虑效果和市场问题；京报主要在北京发行，数量也不会很多，报房主人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商品投向市场，不太重视其传播效果和影响。关于《万国公报》的印刷发行，梁启超后来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发行方式“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①。

新式官报的发行，也是晚清新闻领域发生变迁的重要动向。晚清最后 10 年间，新式官报曾普遍发行。官报是各级政府的喉舌，官报上的政治文书具有法律的效力，这就使官报有着至高的权威，是被称为古代官报的邸报和《京报》所不具有的。不过，官报依然为政府之喉舌，这点没有实质性的改观。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在查封《中外纪闻》报社的基础上，清政府建立了官书局，清政府公开编印发行官报。3 月刊行《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两种官报，形式与京报相似。但它们印送各路电报时只选择有用者，照原文抄录，不加议论。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一律不予登载。当然，其内容除谕折、电报之外，也有

① 梁启超.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M]//李华兴，吴嘉勋. 梁启超选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618.

若干关于各国新事新艺之译文，可算清政府公开发行新式官报之始。不过，康有为认为，其“未能悉用西国体例”，“视各国官报，规模相去远甚”。[①]

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关又陆续创办了一批专门性的官报。特别是在“预备立宪”期间，各种官报纷纷创办，形成了高潮，如商部有《商务官报》，学部有《学务官报》，邮传部有《交通官报》，各地亦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等，一时遍及全国各省。据统计，在光绪二十六年到宣统三年（1900～1911 年）间，清政府办的各种官报共计 47 种。[②]

由于官报的经费专项拨支，实力雄厚，在设备和技术上都很完善和先进，均采用铅印，并聘用技工，甚至还聘用外国技师，或选送人员出国培训。由于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采用，使官报的印刷质量、出版速度大大提高，有利于传播和发行。在报社机构的组织、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了明确的设置、分工和办法，不再是原始的报房操作方式。[③]

官方推动报刊销售往往是采用人为摊派的方式，袁世凯就曾严饬各属，务须广为购阅《北洋官报》，“并照山西《晋报》向章，以代销报数之多寡，核定功过。故所属多来购买，以便转派分销。因之该报销路日见其畅”[④]。这种政府助销行为虽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但终究不是市场行为，对报刊市场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官报不仅在官府内部流通，并且可以派销给单位、团体甚至个人，并鼓励各地绅民、机关办阅报所，摆放官报和其他各种报刊，供人们随便阅览，要避免过去“上下阂阻之弊”，使得“一国之情事，上下得以周知，其相通也犹易”[⑤]，达到启民智的目的，表现出新政中清政府的开放姿态，比起“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这种进步自是不该否认。

落后的体制当然要影响到报纸的发行，但对于报刊的销售而言，信息传输及交通状况的改善也甚为关键。因交通不便造成的报刊图书传递不畅，在当时的发行中是常见现象。比如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人对报刊这一新的传播媒体的接受程度仍很有限，梁启超在分析原因的时候就认为除了“风气不开，阅报人少”之外，

---

① 康有为. 康有为政论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1：323.

② 陈新段，史复洋. 近代公报类期刊简介[M]//丁守和.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5 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81-589.

③ 王绿萍. 四川近代新闻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68.

④ 参见《大公报》，1903 年 5 月 15 日。

⑤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55：55 注释 5.

“道路未通，传布为难”[①]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一点不仅近代中国的出版人看到了，连他们的外国同行傅兰雅也是深有体会：“所售之书，其数虽多，然中国人数尤多，若以书数与人数相较，奚啻天壤。惟中国邮递之法，尚无定章，而国家尚未安设信局，又未布置铁路，则远处不便购买。且未出示声明，又未分传寄售，则内地无由闻知，故所售之书尚为甚少。若有以上各法，则销售者必多数十倍也。”[②]傅兰雅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交通的落后和信息的闭塞制约了图书发行的进一步发展，而同样的困境亦是报刊发展的瓶颈。

戈公振先生曾说：“嘉道间，报纸多系送阅；咸同间，报纸多系挨户乞阅；光宣间，报纸始渐流行，然犹茶余酒后之消遣品也。共和告成以来，报贩渐成专业，派报所林立。”[③]包天笑也曾回忆道：“我对于报纸的知识，为时极早，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对它有兴趣。其时我们家里，已经定了一份上海的《申报》，《申报》在苏州，也没有什么分馆、代派处之类，可是我们怎样看到申报呢？乃是向信局里定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办邮政，要寄信只有向信局里寄。信局也不是全国都有的，只有几个大都市可以通信。江浙两省，因为商业繁盛之故，信局很密”，“我们看上海出版的申报，就是向这班信差手中定的，不独我们一家，在苏州无论何人，要看《申报》，就非向信局信差定阅不可。”[④]从包天笑的回忆中不难发现，即使在苏州，“全城看上海《申报》的，恐怕还不到一百家”[⑤]，其他小城市或农村要想看报更非易事。

再如《时务报》创办之初，中国还未设立自己的邮政系统，各通商口岸的信局均为外国设立。《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销点。代销点的地址刊附在《时务报》的封底（后期刊在封二上）。因人员流动等缘故，各处代销点有增减。[⑥] 在 1898 年上半年之前，代销点的地区分布合计 18 个省，138 处。此外，日本神户均同和泰、大阪均同和泰、东京精神社、新加坡鸿发栈等也是《时务报》在海外的销售点。但这种代派处的显然需要广泛的流通渠道和高成本的支撑，这对出版机构尤其是小型出版机构以及刚成立的出版机构显然是不能承受之重。

---

① 梁启超.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M]//饮冰室合集(二十九).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② 傅兰雅. 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M]//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24.

③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358.

④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05.

⑤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06.

⑥ 闾小波.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83.

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明显改观，出现"凡铁路设站、电报设局之各处，均添设邮政官局"之现象——这是因为邮政必须借助铁路之快捷、运量大、运费低廉，而电报则须借助邮政现成的网络与人力进行，电报虽然"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时效远胜于文书传递，但电报最终还要经过投递才能到达收信人。不过，电报电话、邮政系统和交通系统政出多门，管理混乱。① 为了协调发展，提高效率，1906年清政府设邮传部，下置船政、路政、邮政、电政、庶务五司，统管轮船、铁路、电报、邮信四政。邮传部的设立，使得电报电话等先进的媒介技术和邮政、交通系统能够三位一体，为信息的传递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蒸汽动力被广泛用于陆路客货运输之后，铁路使得原本难以逾越的重重地理阻隔不复存在。即使相距千里的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跟以往相比亦大为容易。

1899年以前大清邮政经办信函、明信片、新闻纸、货样、印刷品(包括贸易契及书籍)、汇兑、包裹等项业务。进入20世纪以后，又以揽运报纸杂志、开办快送信函业务、开发昼夜兼程邮班、增加本埠投送班次等措施，与民信局展开竞争。20世纪初，正当中国民办报纸勃兴时期，全国大小城市共约出版报刊二百余种。这些报刊的运输原来都在民信业手中。大清邮政为同民信局竞争，1905年同《商洋官报》(南京出版)、《北洋官报》(天津出版)、《商务报》(北京出版)协议，由邮局窗口办理代售工作，初期并给这些报纸以免费邮运利益。大清邮政对各报刊订立了优待办法，从收寄、运输、取费、投递等方面，尽量给出版社以便利。大清邮政并于1903年再次与铁路当局(当时已有铁路长8 300华里)拟定章程，规定"铁路只允中国邮政官局运送邮件"，民信局邮件"概不准运送"。民信局不仅不准利用轮船、火车运送邮件报刊，而且一经查获还要罚款。这样一来，大批报刊的运寄，就由民信局转到邮政官局。②

在中国新闻史上，《申报》是最先深入到中国民间社会的近代化传媒。其发行网不断发展，从城市延伸到乡镇。在江南乡间，从晚清到民国的几十年里，人们把《申报》当作报纸的同义语，把所有的报纸都称作"申报纸"。《申报》自创刊的第二年1873年起，开始在上海以外的城市设立分销处，到1887年已有北京、天津、南京等32处。它的日销量也从创刊时的600份，逐渐增加，1875年为1 200份，1877年为5 000份，1897年为7 000多份。③

当时小说杂志的销售已具现代规模，除了设总店外还在重要的城镇设代派处，

---

① 这些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机构最初分属不同部门：轮船招商局归北洋大臣管束，邮政归总税务司管辖，铁路曾隶归商部。

② 邮电史编辑室. 中国近代邮电史[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36-37.

③ 丁淦林. 中国新闻事业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2.

采用各种促销手段扩展小说的传播。新小说社在介绍中国唯一文学报《新小说》时谈到了销售方式："代派至十份者，照例提二成为酬劳"，"海内外各都会市镇，凡代派《新民丛报》之处，皆有本报寄售，欲阅者请各就尽挂号"①。由此可知，《新民丛报》的销售范围已是相当广泛。

再看《渝报》，"每十日约出报二十余纸"，丝线装订成册。开本约大于新闻纸十开本，用土白纸木刻雕版印刷。竖排，每页 26 行，每行 32 字，有边栏线，中缝双鱼尾形，印报名、页码。样式仿上海最畅销的《时务报》。②《渝报》除报馆零售外，还接收订户，其办法在《渝报章程》中有明确规定："先交银十两者，送报五年；先交洋十元者，送报三年"。《渝报》在省内外设有派报处，最高时曾达到 52 处。省内有 26 处；省外有京城、天津、南京、上海等 26 处。发行面遍及全川及大部分中国重要城市，发行量高达 2 000 余份，十分受欢迎。"现在本地及外埠之函购者日益加多，向所刷印之一千五百余份，业已售罄，不敷分派，而索取者仍纷至沓来，亟饬手民，陆续从一册起，再行补印一千份，以应阅报者诸君子见惠之雅"③。还经常在报末公布各代派处人员姓名、地址，以便订购。并给各地公局、信局、商店愿代派报者，"二十份以上只收费九成，五十份以上只收费八成"的优惠。

2. 书籍的发行与流通

再看书籍的发行与流通。书籍流通与传播的可能性靠几种因素支持：一是生产书籍的能力，从机器能生产书籍的那天起，书籍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就日益广泛和快速；二是传播书籍的渠道，传统的书籍传播渠道有学校、图书馆、书店、人群聚集地等；三是政府支持的力度，在某些地区虽然有书、有想读书的人和流通渠道，但也未必能形成有效的书籍传播。④

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对小说戏曲都严加控制，从顺治到同治，几乎每个皇帝都要发布"严禁淫词小说"的谕旨。举其大者便有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年、十九年，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同治七年等十余次。如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便开出了一个多达 200 余种的"小说淫词"禁毁书目。对违反者的处罚也极为严厉，在《钦定吏部处分例则》卷三十《礼文词》中就明确规定："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水浒传》，俱严查禁

① 刘永文. 晚晴报刊小说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139.

② 王绿萍. 四川近代新闻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52.

③ 宋育仁. 时务论[M]//王绿萍. 四川近代新闻史.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56-57.

④ 仓理新. 书籍传播与社会发展——出版产业的文化社会学研究[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

绝，将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但是由于《申报》地处租界，馆主又是英国人，清朝廷诏令形如虚设，所以申报馆可以无视清王朝的法律而大量印刷小说。1875 年 12 月，《申报》从日本购得孤本《快心篇》计 16 册，以上中下三册翻印出版。[①]

到了晚清时，借助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书籍的流通方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痕迹，一整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销售制度、促销方法、折扣规定等经营方式在书籍的发行流通中日渐成型。尤其是“集书局、报刊、小说于一体的文化产业，既注重了经济实体的规模效益，又加强了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彼此合作、相辅相成”[②]。

媒介技术的发展对其时书籍的发行与流通应该有着如下影响：第一，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先进印刷机械的使用，使得书籍出版人员具备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新式知识；第二，书籍迅捷而大量的发行促进了出版机构近代企业组织形式、出版管理制度、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近代化；第三，在整个书籍出版行业中，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出版机构无论在书籍生产能力还是销售渠道、售卖业绩等方面均具明显的优势，甚至占据统治地位。

本章小结

媒介技术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产生社会改造的力量，只有结合特定时期的人和思想的变革后，才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和文化改造力量。应该通过与思想、社会运动相连接的叙述把媒介技术发展放到了社会变革的聚光灯下，把问题的焦点从过去对印刷物的文本解析转向对其印刷、流通的全面研究，从而为研究晚清媒体的传播机制打开另外的空间。

如果将戴元光先生对报纸文化“三重结构”[③]的表述加以引申，我们同样可以将媒体传播机制划分为表层结构、中介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三重结构。表层结构就是在报刊书籍生产中——即从收集资料到新闻产品分享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特征；中介结构就是媒体的管理体制、制约体制及反馈机制；深层结构就是影响媒体文化生产者的文化素质和思维惯例，以及整个媒体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生产方式。

1. 媒介技术降低了印刷出版成本，保证了出版周期与发行速度

媒介技术为晚清报刊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晚清时报刊与传统书籍相比出版周

---

① 申重实.《儒林外史》刊刻、传播说略[J].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7(2).

② 王燕.晚清小说期刊史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60.

③ 戴元光.戴元光自选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05.

期短，发行速度快，如果没有石印、铅印设备提供的技术前提，依靠传统雕版印刷技术是难以运行的。媒介技术的发展也降低了使用媒介的成本，从而降低了受众使用媒介工具的经济门槛。所以，从媒介技术的纵向变迁看，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降低媒介工具的使用成本。比如《申报》之所以长寿，固然有众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创办之初就设立了颇具规模的印刷厂，在于它不断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总之，报纸的创办和发展与技术手段是息息相关的。

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需要政治宣传功能更强大、传播更快捷的媒介，而比图书传达信息更方便、更有时效的报纸、杂志逐步取代图书的主导地位，走到政治宣传的前台，成为最有力的武器。图书文本不再成为唯一选择，报纸杂志取代了图书的信息传播功能，图书逐渐回归深层次思想交流的载体。这个历史时期，各种职业组织、共同体都组建代表自己意志的文化机构，使大量的报社、杂志社、书刊社井喷式的出现。①

这些报刊出版机构能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与政府传播法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但媒介技术对其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小觑。其时，先进印刷技术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用这些先进生产工具武装起来的报馆书局在整个行业中已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还具备了对外来先进媒介技术进行消化后再改进的能力。

2. 媒介新技术促进媒体传播理念变革

我国近代报刊是外来传播媒介和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近代都市上海首先提供了结合的土壤，商业性报纸则是实现这种结合的恰当的类型。② 交通运输的发达商品交流的频繁，人口的增殖，日益滋长着对信息交流和新的传播媒介的潜在需要。产生近代报刊所必需的印刷条件和传递条件，此时也已大体具备。

从报纸的演进过程看，中西新闻史都呈现着一条共同的轨迹，即最早出现的是新闻信（newsletter），继而是新闻书（newsbook），最后才是新闻纸（newspaper）。从唐代的进奏院状到宋代的正式官报，这期间属于新闻信阶段，此后近千年一直都算新闻书一统天下的阶段，直到 19 世纪近代报业勃然兴起，中国报纸才进入新闻纸的阶段。③

---

① 何明星.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52.

② 秦绍德. 上海近代报刊史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29.

③ 李彬. 从传播史到新闻史——唐代的新闻传播及其历史意义[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1).

3. 媒介新技术促变媒体内容生产机制

媒介形式影响甚至规定着内容，一定的形式也总与一定的内容相连。中国古代报纸形式，直到《京报》仍然是很简陋的书本式、无标题、无版面、无栏目、无插图、无照片。

晚清时近代意义上的报刊正是凭借一系列印刷的视觉符号作为传播手段来传播信息的——这种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报刊与其他媒介区分开来，而且把印刷技术、电讯交通、业务采访和有关商业经营办法结合起来，使得近代报刊的采编在传统邸报的基础上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4. 媒介新技术促生媒体营销新机制

中国古代主要是官方报纸，它们借由递送朝廷文件的驿站发行，无须经营。而近代报纸要做好经营，要拓展发行流通渠道，靠技术降低成本，靠内容吸引读者，靠管理增加利润。媒介技术的变革和资本的渗透给媒体带来了从生产方式、人员构成到营销模式和组织管理等一系列的变化。书籍报刊的印刷出版不再仅仅限于出版印刷事务本身，而是从媒介技术发展演变为资本甚至社会文化的变革，这一变革过程中技术因素和商业力量都显而易见。

第三章　媒介技术发展
推动传媒外部管理制度的变迁

传媒制度除了内容生产机制和经营管理制度这样的媒体内部制度外，还包括媒体外部管理制度——其实施主体无疑是政府部门。这里的外部管理制度既包括传媒法规等正式制度形式，也包括管制中的一些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形式。不过正式成文的传媒法规是政府管理传媒的直接依据，显然更需关注。所以本章把考察点主要集中在晚清政府正式成文的传媒法规。

任何社会要想在正常秩序下良性运行，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社会调控系统。“社会调控系统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组成部分”①，正式成文的传媒法规体系是社会调控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为何在20世纪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中国都未出现专门的传媒法，可进入20世纪之后清政府却在短时间内接连出台了数项专门的新闻法规，导致了一系列的传媒管理制度的变迁？接着需要思考的是：在晚清新闻法规的创制和演变过程中，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否产生了作用？若是，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新闻法规的出台又有着怎样的推动？

第一节　晚清变迁前中国传媒管理制度的特点

古代中国与社会发展同时存在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迫使全社会遵守三纲五常，崇尚礼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对于法治精神和效用的完全否定，“实在法（即法）作为自然法（即礼）的具体化，具有道德规范的作用”，一直是古代统治者订立典例自觉遵循的原则，“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典的成文法《刑书》就于公元前6世纪在郑国诞生”②。虽然这部法律

---

① 史革新.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19.

② 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M].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1.

与言论的管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的以法治国的统治意识却由此萌生，并对以后历代统治者控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统治者们采取禁锢思想、钳制言论的文化专制政策，制定了许多镇压言论出版的法令，即所谓“上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是也。①

中国古代的报纸，属于官方的，从唐朝的《进奏院状》，宋明两朝的《邸报》，到清朝的《邸报》、《官书局汇报》和《谕折汇存》等，有近1200年的历史。属于民办的，从北宋的《小报》，明末报房的《邸报》、《急选报》，到清末报房的《京报》，也有近1000年的历史。② 但是，考察中国古代新闻各个历史阶段的新闻内容和形态，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新闻，完全就是一部王权新闻的历史，这是中国古代新闻的重要特点。③正如杨师群指出的，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具有三大特点：朝廷官文书、官报的信息传播方式占绝对主导地位；新闻检查制度与政治统治知情度之间的矛盾；严格控制民间及其他各种内容与形式的新闻传播。④

一、官文书与官报的传播方式占绝对主导地位

从商周时的官文书开始，及至汉唐时的官报出现，官方一元化的信息主导传播方式源远流长。亦如杨幼炯所言，“自秦、汉以降，数千年来法令之更张，制度之兴革，皆缘于君主一人之手。一代之法制，除君主之诏令外，别无法律，自无立法之可言”⑤。政治统治需要“令行禁止”，正如南宋兵部侍郎周麟之所著《海陵集》中《论禁小报》这篇奏章中所指出的，“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

“邸”制起源于西汉，《西汉会要》中有明确的记载。尽管“邸”制的起源非常明了，但对于邸报始于何时，却是长期以来新闻史学界无定论的问题。对于古代报纸的起源看法不一，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因史料不足；二因对现存的史料看法不同。⑥ 邸报的内容主要是官方公文，因为是官报，邸报“其源盖出于《起居注》、《月

① 崔明伍. 新闻传播法[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250.

② 方汉奇.《清史・报刊表》中有关古代报纸的几个问题[J]. 历史档案，2007(2).

③ 王桃.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大众传媒[J]. 现代传播，2006(1).

④ 杨师群.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22.

⑤ 杨幼炯/瞿同祖. 近代中国立法史/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影印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

⑥ 方晓红. 中国新闻史[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

表》、《月历》、《时政记》之类”，“所纪无非皇室动静，官吏升降，与寻常谕折而已”①。那些用木活字排印的《京报》，所载无非也是上谕、奏折、官吏升降之类，发行数量不大。其形式是书本式小册子、薄薄的竹纸每日二三页，多或六七页。字体不大，大小不一，行字歪斜，墨色浓淡不匀，鱼鲁亥豕，几乎每页均有。外里黄色薄纸，盖有朱印木戳“京报”二字，及某某报房字样。

人们对官府发布的消息，不可进一步探听其内幕，也不可进行有关的推测，只能闻而信之，尊而从之。臣民不允许知道的消息是不能发布的。官报从它第一天问世起，就有了如何核定有关消息能否发布的功能。“邸报”由官方控制，发行范围有限，许多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一般是无法阅读到“邸报”的。驻京进奏院的进奏官利用他们工作便利，把弄到一些“邸报”不宜刊载，而社会需要信息，就私下编印，自行发布。②

“京报”这一名称在明朝已经出现，当时还只是邸报的别称。至清朝初年，京报与邸报也是同一种概念，有人把驻京提塘——“京塘”抄发的邸报称为“京报”。“京报”在清中叶以后才逐渐发展成为官报的专用名词。清乾隆十八年(1753 年)，抚州发生传抄伪稿案。朝廷感到由各省提塘分别向地方抄发“京报”，很容易夹入伪稿，决定对抄报制度进行改革。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朝廷决定：“嗣后各提塘公设报房，其应抄事件，亲赴六科抄乃，刷印转发各省。所有在京各衙门抄报，总由公报房抄发。”③此后，由民间报房刊行的《京报》，不仅为封建王朝政府所认可，而且已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报纸的主流，成为清代新闻信息传播的主要工具，上自殿阁大学士，下至知府县令，都依靠京报获知朝政，了解京内外各方面的信息。

京报开始呈现出某些大众传播工具的性质，如传播信息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组织化、信息享用公开化、传播对象大众化以及传播信息的目的具有商业性等。它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的最高形式。④ 不过，虽说京报是中国古代报纸发展得最成熟的一种形式，与以前的同类新闻载体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仍没有质的变化，其内容主要有三：朝廷政事动态(或称“宫门抄”)、皇帝谕旨、官员奏章，偶有一些铨叙、科举和司法案件方面的消息。只有抄录和印刷人员，只许照章抄录，不准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安排版面，也没有近代报纸才具有的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和编辑。报房运作过程中一般能严格自律，遵守当局的禁令，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得

---

①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55：23.

② 马光仁.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2.

③ 宫承波，等. 新闻历史与理论[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16.

④ 方晓红. 中国新闻史[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

到统治者的默许,"所有刊发钞报,乃民间私设报房转向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当然,其编辑、印刷、发行业务亦无法律的正式许可。因此,京报还不是近代传播媒介,还不能进入近代报刊的范畴。①

清代时,统治者也常用榜文、帖示、告示等发布和传播官方消息。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书籍、年画、历书、商业传单等印刷品也大量问世。其中,新闻信息汇编之类不少,如《谕折汇存》、《阁抄汇编》、《邸报全览》、《邸钞汇编》、《时事采新汇编》等,内容大多取材于京报。②

清代的提塘官们还曾经发行过一种小报。小报又称小抄(或小钞),所刊载的主要是提塘官们和提塘报房的刷写报文者们自行采录的消息,目的在为有关省份的官员们提供更多的朝廷信息。不过这些小报,主要见于清初的顺、康、雍、乾四朝。提塘小报受到当局的注意和限制起始于康熙末年。当时曾经以上谕的方式禁止小报的发行,但没有显著效果。直到雍正乾隆两朝一再查处以后,小报才被完全禁止。③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邸报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其受众只限于朝廷官员,其传播目的仅仅为了保证行政统一的效果。在近代报业兴起之后,邸报依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只是渐渐演变成了《宫门抄》、《内阁官报》等,一直演变成民国时期专司发布"国家之制度"的《政府公报》。

二、严苛的传播审查制度

在中国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已经十分发达。因此,历代统治者均十分重视这一现象,并运用法律手段予以严酷的管制,建立了"言禁"、"书禁"、"报禁"等新闻信息传播统制制度,防范与限禁一切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文字、出版活动。这一统制制度,不仅束缚了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成为近代新闻法制的历史渊源。

唐代曾于7世纪中期颁布过一部较为详尽完备的成文法典——《唐律》,被称为"标志着礼与法的精神结合的最终完成"④,它是最早载有限禁言论、出版活动的法典。自唐律起,历代颁行的法典均载有"造妖言妖书"罪的认定与惩罚的条款,并

① 宫承波,等.新闻历史与理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17;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

② 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

③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02-203.

④ 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M].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1.

作为封建政府对付言论、出版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而最早的禁印法令可能出现在中唐时期，史载公元836年1月22日（大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唐文宗曾敕令“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板”。

至宋代，政府允许甚至鼓励民间从事对封建统治有益无害的文字出版活动。宋初巴蜀民间出版世家毋守素将其父毋昭裔所刻《文选》、《初学记》等书传至中原，使这些著作“大彰于世”①。南宋时，文学家洪迈刻《万首唐人绝句》，皇帝称其精博，有茶香金器之赐。哲学家吕祖谦编《宋文鉴》，得到银300两、绢300匹的赏赐。因此，北宋初年起，民间已有以刻书为业者，如临安陈氏万卷堂曾于宋太宗淳化年间刻印《史记》一书。至南宋时，民间刻书成风，“士大夫所至喜刻书板”（陆游语）。② 另一方面，宋代政府对不利于其专制统治的图书的限禁则较前代更为苛刻：对刻印图书实行出版前审查制度，力求将一切于封建统治不利的图书扼杀于襁褓之中。

古代对报纸实施管制有史可查的最早记录应该也是宋代于999年开始实施“定本”③制度——为了控制邸报的内容，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起实行这一制度：“进奏院所供报状每五日一写，上枢密院定本供报。”④对报纸的管制之所以从宋代起开始突出，是因为在宋代朝报、小报的辗转传抄与分送，使过去专供藩镇以及地方官吏阅读的邸报变成人人可以买到的读物。封建统治者不愿将宫廷秘闻和施政内幕变成街头巷尾的谈资，自然要对报纸加以管制。

宋朝对报刊的管理，比较典型的代表了中国古代言论出版的管理制度。它虽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法律条文，但已涉及新闻法规的许多方面，具有新闻法制的一些基本要素。在以后的各个朝代对言论出版的管理，多数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只是因为形势的变化，在管理上时松时紧，处罚时重时轻。如在宋元两代的出版前审查制度已被废弃，“书皆可私刻”，普通知识分子只要有钱就可以刻印。但其前提是不得危害统治阶级的统治，不得触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不得冒犯皇帝的尊严等。⑤

---

① 吴任臣. 十国春秋（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768-769.

②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6.

③ 所谓“定本”，指的是根据进奏官们采录来的各种发报材料，经本院监官编好，送请枢密院或当权的宰相们审查通过后产生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定本”制加强了对邸报内容的管理。参见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第一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0；方汉奇，史媛媛. 中国新闻事业图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5.

④ 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影印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57：2394.

⑤ 马光仁.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5.

元代继续实行图书出版前审查制度，民间虽仍有书坊刻印图书，但限禁甚严，刻书极难。至明代，宋元两代的出版的审查制度已被废弃，书皆可私刻，普通百姓只要有钱就可任意刻印，甚至外国人也可刻印图书。[①]

清朝关于新闻出版的专门法规是在晚清新政过程中才陆续制定颁发的，在一系列报律出台之前，清政府虽没有出台限禁报刊出版的法令，但一直援用《大清律例》[②]来禁锢言论，约束和限制近代报刊的发展，对于私自出版各类新闻报刊，清廷可以任意处罚，执法的随意性极大。对言论出版（包括报刊）的违规行为，则以"造妖书妖言"罪加以重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传）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具体条例含有三点：

（1）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若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人，不及众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至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审非妖言惑众者，坐以不应重罪。

（2）凡坊肆市买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督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买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统，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3）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官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其在贵近在大臣家子弟，倘有滥交匪类，前项事发者，将家人子弟亦不行约束之家主，并照例议处治罪。

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凡被认为犯有"造妖书妖言"罪者，都要受到极酷烈的处罚。被惩罚者不仅仅是撰稿人、编辑出版者，还包括发行传播者、阅读者，以及当地该管官员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③] 另外，地方政府也曾发布过禁止"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和"私自刊刻新闻纸"之类的禁令。民间报刊的出版一直处于非

---

① 明万历初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设立天主教堂. 以后葡萄牙、法国、德国的教士也相继来华。他们大量翻译教内书籍，编印散发，如南京教堂刻印利玛窦的《交友论》等书，杭州天主教堂刻有意大利艾儒略的《职方外记》、《西学凡》等书。参见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52，361.

② 该"律例"是清顺治三年(1646)以明律为蓝本，参考金满旧制制定的一部法典，以后每五年一小修，每十年一大修，成为清法典的集大成者。

③ 马光仁.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8.

法状态，[①]随时都可能被清政府援律查禁。

当然，在晚清传媒管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太平天国严苛的传播审查制度也应被提及。就体制而言，太平天国的出版机构也是官办性质，对书籍出版非常重视，控制也异常严密。1851 年 2 月金田起义不久，太平军在势力尚很弱小时就开始出版书籍。占领永安州的半年时间里，出版书籍更多。定都南京后，正式宣布儒家典籍为“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太平天国对自己所编的出版物作了各种重要修改，凡以前引用儒家典籍和保存鬼神祭祀等内容都大加删削，并于 1854 年 3 月在天京(南京)明瓦廊大街正式成立了删书衙，其主要职能为“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②]。太平天国后期书籍也宣传封建等级制度、纲常伦理和仁义道德，明显地向封建文化妥协。至于将鬼神、祭祀等内容删去，换上个“皇上帝”，实在也并不高明多少。[③] 而且，很多起义农民不懂得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不分青红皂白把大批古籍投入茅厕，用水浇用火烧，带来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④] 其实，历史早已证明，无论什么朝代，不论是禁书、毁书还是删书，都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

①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合法民报的问题，存在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吴廷俊认为中国古代合法民报产生于明代中期，盛行于清代。合法民报的产生，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决定的。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翻印部分官报稿件，公开出售。因而，合法民报在内容上以刊登朝廷“官文书”为主，而在编发上由民间设立报房独立发行；既可以宣达皇命，又可以营利赚钱。因而可以把《京报》看成是中国政企合一报纸的发端。他还认为中国古代合法民报具有四大特征：其一，内容是官报的翻版；其二，形式比较完备；其三，报房自主经营；其四，报房自办发行。参见吴廷俊. 中国新闻传播史稿[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27；吴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1-24. 而杨师群不同意吴廷俊关于明清的“京报”为“合法民报”的结论，杨认为明清时官府对民间报房严加控制。京报虽然主要是民间报房的产品，但是就其操作工序而言，最多只是官文书邸钞的翻版，实为官报的附庸。京报很少有自采新闻，更没有自己的言论，一般能严格自律，遵守当局的有关禁令，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能得到官府的批准。报房只能传抄朝廷审核同意的政事，否则便是非法作业，当时根本不可能产生类似的法律概念，同时它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报。参见杨师群.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21.

② 姚福申. 中国编辑史(修订本)[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42-243.

③ 姚福申. 中国编辑史(修订本)[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44.

④ 法国社会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曾认为：“在 1850～1870 年间，显著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官僚队伍、经济税收、文化生活诸因素的，绝不是西方列强的行为，而是太平天国战争这场可怕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参见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M]. 耿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53.)当然，谢和耐的这番话显然有为西方侵略者开脱之嫌，但是，他提及的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可怕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应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笔者以为，对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文化破坏的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

带来的结果不仅毫无可取之处，甚而是灾难性的。

近代报刊是一种大规模信息传播活动的工具，是近代资产阶级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在中国，近代报刊却出现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晚期。先进的近代报刊与落后的封建文化专政制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既不需要也不允许具有大众传播功能的近代报刊的存在，因此，先进的近代报刊与落后的封建制度处于矛盾与斗争的状态之中，就构成了晚清传媒管理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严格控制民间的传播活动

政治利益对媒介的控制，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促进媒介人性化的发展，如适当的把关保证高质量的传播内容、对弱势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的关怀等。但如果控制不当或过于苛刻，常常使媒介沦为权力的媒介，服务于对受众思想的压制和诱导，而不是为受众沟通信息和表达意见提供服务平台。早在我国古代的周朝，残暴的周厉王就有“弭谤”的恶劣招术，“在当时‘口口相授’还是主导信息传播方式的状况下，对老百姓‘封口’与其说是限制言论自由，倒不如说是直接干预、阻断这一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①。

古代的民间报纸，就是当时人们说的“新闻”或曰“小报”。“小报”和“邸报”一样都不是固定的名称，也不是出于一家一人之手，是当时人们对社会上流行的非官方报纸的习惯称呼。古代小报的出现略晚于邸报，一般指称那些“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的非正式信息通报。古代小报是民间流传的“传单”，是记录“莫知从来之浮言”的“飞报”，戈公振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新闻”载体。亦有论者认为“小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民间私自发行的非法报纸”②。

虽然有论者认为“‘小报’产生于何时，由于资料不足，难以考查”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小报”一词在宋代即已出现，因为周麟之在《论禁小报》中提及“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由于古代小报与生俱来的善于蛊惑众听的功能，妨害了封建统治者“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执政秘诀的施行，所以诞生之始就面临着覆灭的危机。

中国古代的一些非法小报，往往在特殊历史时期伴随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产生。

---

① 庹继光．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44.

② 方晓红．中国新闻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

③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2.

如两宋之交和明末清初，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新旧党争交织激化之下，士人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政治动向与边防实况。每当政治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也就是非法民报出现之时，其所造就的并不是社会在正常运作过程中的民营新闻事业，而主要是在统治紊乱或国家危机之时，商人靠搜列奇闻谋利，党派靠传播不利消息打击政敌，是一种非法且畸形的民营新闻谋利作为。尽管这类小报主要是传播各类消息，甚至也有一些反映民间社会舆论的内容，但是在实质上算不上正常运作的民间新闻事业，而主要是一种通过非法手段对官方新闻进行补充而使其性质有所异化的新闻传播。①

即使在官方内部，除了通过有限渠道有选择性地公布一些政务信息之外，其朝政内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内廷严格控制而隐秘不宣的，况且随意性又是专制政治的一大特征，这样，就有生发有关传闻的莫大空间。刘体智作为当年曾任疆吏高官的刘秉璋的儿子，尝忆及关于乃父当年的有些官场瓜葛，传闻不一，底细难明，感慨“朝政之不易知，人言之难尽信”②。

清政府在意识形态各层面的控制进一步严格起来。大规模禁毁书籍的行为历代均有发生，一向被看作淫辞小调、蛊惑人心的小说在传统文化中，更是难以安身立命。甚至连戏曲、小说、演剧赛会等，都在严禁之例。③“康、雍、乾三朝兴起了一百二十多次大、小文字狱，以乾隆朝为最多。大的文字狱不特作者、编辑、出版家有灭门之祸，有时连刻工、印工、订书工、书贾及买书人，均不免被杀”④。

早在1714年，康熙就下令严禁小说和淫辞，朝廷正式议定“买看例”，即规定“买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的惩罚条例。雍正、乾隆如法炮制，对于小说的禁止更是有增无减。乾隆元年（1736）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写道：“《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例禁”即历来一贯遵循的禁毁小说的禁令。禁毁小说，可以说是历任清朝统治者奉行的惯例。⑤乾隆还借修《四库全书》之际，对全国图书中凡认为对清朝有不利的片言只语，都以“违碍”的罪名列为禁书，被全毁或抽毁

---

① 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

② 刘体智.缓加旗饷传闻种种[M]//异辞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120.

③ 《大清律例》卷三十四《刑律·杂犯》“搬做杂剧”条称：“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父、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其具体“条例”又称：“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不行查拿之地方保甲，照不应事重律，杖八十。”

④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44.

⑤ 王燕.晚清小说期刊史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34.

的达数千种之多。[①] 在《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六部处分则例》等法令中有禁止"讹传"、"捏造讹名"、"招摇诈骗"、"任意捏造，骇人耳目"等规定。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大清王朝江河日下，道光皇帝把国力日衰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小说。1834 年，他曾发布禁毁传奇演义的"通谕"，1844 年再次发布诏令，说"假画地狱，私造邪书，伪传佛曲，摇惑四民……法实在所难容"[②]。于是颁布禁令，这次禁毁的小说戏曲多达 119 种，自元代以来公开出版的几乎无一例外地列入禁毁范围。[③] 1868 年，清政府又发布禁毁小说传奇令："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④]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年五月七日、十三日应诏发布禁毁淫词小说令，他不仅在江苏设立了专门的禁毁机构，还把执行禁令的情况作为衡量官吏政绩的标准，所谓"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辩守令之优绌焉"[⑤]。这两次共开列禁毁小说 269 种，其中包括《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也包括诸如《玉妃媚史》、《绣榻野史》等猥亵小说。[⑥]

1871 年，即《申报》创刊的前一年，同治再次颁布禁毁小说的命令。与以往的措施不同，同治年间禁毁的不仅仅是刊印的书籍，甚至包括书板。书板被毁，再行刊刻的成本加大，出版商冒险刊印小说的经济收益大打折扣，对于刊印小说的兴趣自然大大降低。由此，在清政府不遗余力的禁毁图书的文化政策下，新式出版物的创作和刊印都大受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小说、戏曲都是清廷严令禁毁的淫词小调，其他出版物也难以获得宽松的生存环境。

正如马克思抨击普鲁士王朝书报检查令的时候所指出的，"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都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⑦]。当中国古代的报纸、书籍产生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信息传播方面自然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必然也与封建社

---

①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44.

② 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87.

③ 王燕. 晚清小说期刊史论[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34.

④ 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1.

⑤ 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2.

⑥ 王燕. 晚清小说期刊史论[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35.

⑦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

会一以贯之的文化专制政策产生冲突。因此自宋代起，当中国古代报纸有了一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之际，封建统治者立刻运用法律手段予以调控，对于违反有关法令者，则以相关法律予以残酷的惩治。

第二节 媒介技术发展加速报律的出台

尽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清政府推行的传统法制，包括法律法规、司法机构和执法程序都出现了重重弊病，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有识之士不断对传统法制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抨击，呼吁学习西方近代法律，改革中国传统旧法，如郑观应认为："惟我国尚守成法，有重无轻，故西人谓各国刑罚之惨，无有过于中国者。如不改革，与外国一律，则终不得列于教化之邦，为守礼之国，不能入万国之法，凡寓华西人不允归我国管理云。"①但在 20 世纪之前清朝政府都未制定专门的传媒管理法律，清廷对危害其统治的传媒及其产品主要依照《大清律例》"造妖书妖言"条例进行严厉制裁。

直至"新政"，清政府才颁布了 5 部近代意义上的传媒管理法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906 年 7 月)、《报章应守规则》(1906 年 10 月)、《报馆暂行条规》(1907 年 9 月)、《大清报律》(1908 年 3 月，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新闻法)、《钦定报律》(1911 年 1 月)。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将这 5 部法规统称"报律"。

作为西学东渐之产物，系列传媒管理法规的制定亦是晚清变法内容之一，如实反映了时代的特殊背景，也反映了其时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概况。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新闻传播法规或政策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都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传播法规？而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对官方的新闻传播法规的出台又有着何种影响呢？

中国封建王朝历来文禁如毛，言禁极严，人们动辄得咎。在一些文字狱中统治者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而且相关人员也要层层连带，使得人人自危、层层自纠，造成了无形的新闻检查制度。虽然小报是屡禁不绝，但其数量和影响力毕竟有限，而且严刑苛政下以身试法者毕竟少之又少，显然无法形成对统治者政权的根本冲击，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专门的传媒管理法规也甚合情合理。

不过到了晚清，随着媒介新技术的引进与使用，印刷出版事业得以迅猛发展，

① 郑观应. 盛世危言 · 刑法[M]//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500.

对清政府的统治提出了新的挑战，原先的“造妖书妖言”条例逐渐无法适应传媒发展的全新格局。19世纪末期，铅活字印刷已在中国得到普遍使用，而石印技术在中国更已生根开花，这些新式印刷技术的采用使得报刊生产成本大为降低。成本的降低自然带来了受众数量的增长，无形中又拓宽了印刷出版的发展空间，刺激了人们办报创刊、出版书籍的热情。同时，大量民间商办出版机构的出现，打破了近代官办书局一统天下的局面。据统计，仅翻译一项，1901～1904年间就翻译出版西书和日文书籍533种。[①] 如果放长考察的时段，在1896～1911年间译过来的书就更多了。除了翻译之外，还有中国人自行编著的各类书籍大量问世，比如前文提及的邹容的《革命军》先后发行20多版超百万册，新学书籍的发行总量可见一斑。这些新学书籍中相当一部分分析透彻、语言尖锐、切中时弊，并和反应敏捷、影响广泛的新式报刊形成合力，对清朝政府的旧有法规和统治根基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新闻传媒作为特殊的执政资源，其存在价值，说到底是成为对它拥有支配权的执政者的特殊工具，执政者借以表达自己主张以影响公众。[②] 对于刚刚出现的国人自办报刊，清政府最初的反应也是禁止出版，然而后来愈加力不从心，难以为继。随着封建专制制度与近代传媒发展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废除束缚近代报刊发展的旧法规，建立适应近代传媒发展的新法规已然成为时代的共识。

1898年7月26日（六月初八），光绪帝就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发布上谕。这一上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宣告开放“报禁”的法令。[③] 在之后的“新政”中，“提倡开办报馆”亦是一项重要内容。在清朝最高统治层中，最先提出制定关于报刊出版单行法的是光绪帝。他在“百日维新”期间的一道谕旨中指出，“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④]。此后光绪多次在谕旨中论及报馆，如1898年7月26日在批准改《时务报》为官报的谕旨中指出：“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著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时

---

① 诸宗元，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序例[M]//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100-101.

② 丁柏铨．新闻传媒：特殊的执政资源[J]．江海学刊，2007(1).

③ 1898年6月19日（五月初一日），即“百日维新”开始后的第九天，光绪帝就发布了一个有关报纸的“上谕”：“所有官书局译印各报，著自五月初一起，每五日汇订一册，即按逢五逢十日期，封送军机处呈递。”这一上谕虽未明确宣布开放“报禁”，但光绪帝对报业的重视已粲然可见。

④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Z]．北京：中华书局，1958：4155.

务者由大学堂一并呈览。至各报体例，自应以指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日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8 月 9 日在谕旨中他再次提出，“报馆所若论说，总以昌明大义抉去壅蔽为要义，不必拘牵忌讳，致多窒碍。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9 月 12 日的谕旨中要求有关官员“切实劝办”报馆，“官绅士民”均可申办。他甚至还指示用官费订报，分发各衙门阅览。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总共发布 180 余条上谕，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准许民间创办报馆；准许平民上书言事，官吏不得阻碍；正式承认官报、民报均有合法的地位。于是，“报禁”、“言禁”的藩篱首次被冲破，官绅士民也第一次获得官方准许的办报自由。然而，未久发生了保守派政变，光绪委托康有为起草的“报律”遂成一纸空文。中国近代第一次新闻自由的尝试也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而夭折。不过庚子事件后，国内“维新”、“变法”的声浪再起，关于制定报律、出版律的呼声再次高涨。

奉旨考察各国宪政的载泽等五大臣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重申了制定报律、出版律的问题，其云：“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得自由为幸福……宜采取英、德、日本诸君主国现行条例，编为集会律、言论律、出版律，迅即颁行，以一趋向而定民志。”①

在预备立宪“大权统于朝庭，庶政公诸舆论”原则指导下，清廷开始了新闻法制建设工作。1906 年 7 月，清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传媒管理法规——由清政府商部、巡警部和学部共同拟定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出台，该律分为大纲、印刷人等、记载对象等、毁谤、教唆、时限 6 章，41 条，对包括新闻报刊在内的印刷物的注册登记（实为批准）、印刷物的禁载事项、毁谤与教唆、以及违犯该律的惩罚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三章：记载对象等是有关新闻报刊的专章。该章第一条将新闻报刊定义为记载对象，“所谓记载对象等，或定期出版，或不定期出版，即新闻丛录等，依本律名目，谓之记载对象”。该律详细地列出禁载事项，将毁谤分为普通毁谤、讪谤、诬诈，尤其是讪谤条文十分苛严，给新闻从业人员划出禁区。“虽然具有控制文字宣传的针对性，但比起清朝盛行一时的文字狱，毕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能任意比附和处置”②，而且以法律的形式颁布，也意味着千年冰封的开裂，这不能不视为《大清印刷物件专律》的进步之处。

与此同时，清朝各级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有关报刊业的地方性法规。1906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79:112.

② 朱勇.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94.

年(光绪三十二年)5月,广东南海县令虞汝钧颁布了该县自订报律8条,对论说、公件、驳议、实事、访闻、传疑、录报、来函分别做出刊载规定,要求所属各报一律遵行。① 1907年1月,两广总督周馥颁布自订报律3条:一禁毁谤两宫及亲王;二禁造谣生事;三禁妨碍治安。并严禁香港各地报纸入销广东。② 直隶总督袁世凯也于同年2月发布命令,查禁"悖逆书报",作出"如再贩运,照原价加罚一百倍"的规定。1907年11月,天津议事会还与当地十一家报馆商定出《记者旁听公约》八条。③ 这些地方政府制定的管理传媒的地方性法规,形成了与清廷专门报律相配套的新闻法规体系,标志着晚清传媒管理制度的初步形成。

不过,《大清印刷物件专律》的适用对象是一般印刷出版物,内容涵盖面较广,具有出版法的性质,新闻报刊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由于规定不具体也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然而随着西方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蒸汽机等先进生产动力的引入,20世纪初新闻报刊数量每年都有明显增长,仅革命报刊就有数百种之多。为进一步加强对新闻报刊的控制,清政府巡警部札饬京师巡警总厅又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以和《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并行。该规则共9条,于1906年10月12日颁行,其中前6条为"不得低毁宫廷;不得妄议朝政;不得妨害治安;不得败坏风俗;凡关外交内政之件如经管衙门传谕报馆秘密者,该报馆不得揭载;凡关涉词讼之案,于未定案以前,该报馆不得妄下断语,并不得有庇护犯人之语"。最后一条是有关开办报馆的呈报事宜,新开报馆必须经巡警所同意。④ 很显然,这是一项不规范、不完备的新闻法规,因为只规定了禁载内容,未规定对违者如何处罚。而且,《报章应守规则》是由京师巡警总厅制定颁布的,只具有地方效力,全国其他地区不一定执行,达不到清政府的要求。

1907年8月(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清政府民政部奏请拟定新的报刊法规,并附有《报馆暂行条规》,民政部认为,"东西各国自政府以至庶民无不以报馆为重要,而其对待报馆之法又最严,今日中国报界言论既多不实,而各报主笔亦复良莠不齐,若不明定报律,必至莠言乱政,大为风俗人心之害",现查"京外报馆,日见增益,其开通民智,维持公论者固不乏人。而挟私攻讦,藉端诋毁,甚或煽助异议,摇惑人

---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388;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55.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428.

③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389-390.

④ 报章应守规则[G]//刘哲民.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30.

心”,对此“稽查约束,实不容缓”①。光绪批示后,《报馆暂行条规》于 1907 年 9 月 5 日正式颁行,成为正式报律颁布前管制报纸出版业的专门传媒法规。

《报馆暂行条规》与《报章应守规则》相比较,条目虽相差无几,但内容上已有明显变化:第一,呈请登记批准的报刊均应载明编辑人、发行人、印刷人之姓名地址;第二,对违规者给予不同处罚;第三,通知相关的邮局、电报局等单位进行配合执行;第四,声明只是“暂时条规”。新报律出台后,照新报律执行。② 这几点看似简单,倒也表明了它在原先基础上更进一步。

相较前几部传媒管理法规,《大清报律》的起草和颁布历程要漫长得多。该律是在前几部法律法规基础上参考日本新闻法拟定而成,清政府有关部门最早开始起草是在 1904 年 8 月,直至 1906 年 10 月方才拟就草案四十六条。然清统治者依然十分谨慎,以为“事关法律,非详加讨论,不易通行”,并“以京外报馆由洋商开设者十居六七,即华商所办各报,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间。若编订报律,而不预定施行之法,俾各馆一体遵循,诚恐将来办理分歧,转多窒碍”③,而未予颁布。1908 年 1 月 16 日,民政部会同法部,调研“各国通例”,“参照内地情形”,拟出改定草案 42 条交由宪政编查馆审核。宪政编查馆秉承清廷意旨,增加了 3 条,并对草案中的若干条款进行了修改。直到 1908 年 3 月 14 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大清报律》才奉旨正式颁行。

较之前几部法律法规,《大清报律》内容更为详尽,包括正文和附则共 45 条,除将前些时候制定的报刊法规的内容基本上全部收入外,还参考日本新闻纸法又加入了许多新的东西,内容涉及报刊创办手续、编辑、稿件审查、出版、发行、禁载、违禁处罚、职业道德等方面。尽管《大清报律》有不少条例旨在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和对新闻自由的钳制,如规定报刊发行前的送审制度: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还规定不准刊登“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对违规者加重处罚。但是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完备的新闻法,该律措辞平和,少了峻法的面貌。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律将以前的开办媒体的批准制改为注册登记制加保证金制,这不能不说是传媒管理中的一大进步。

《大清报律》颁行后遂成为晚清管理报刊的一部基本法——即使在民国成立以

---

① 黄瑚.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66.

② 马光仁.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58.

③ 张研. 1908 帝国往事:一幅独特的清末画卷[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5.

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各省，仍有援用此律以压制舆论之事，直至 1915 年（民国四年）7 月，北洋政府公布《报纸条例》后《大清报律》才失去效力。但它对《报纸条例》以及整个北洋政府传媒管理政策的直接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1910 年（宣统二年），清政府民政部再次修订《大清报律》，经资政院复议后，改名为《钦定报律》于 1911 年 1 月 29 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颁布。《钦定报律》保留了《大清报律》的基本内容，但管制进一步变动。①

比较晚清政府出台的 5 部报律，可以说是越往后越是宽松。在报刊创办的管理制度上：由一律禁绝而至批准制、最终采取了注册制。刑事处分的范围和量刑程度也不断缩小，后期甚至对泄露军事、外交机密等也改用罚款这样的民事手段进行处置。从 1907 年开始清政府甚至开放了报界对司法审判、军事活动和重要会议的采访权限。至于报道和评论，只要不是直接号召暴力革命，即使是对清廷内政外交和皇室的尖锐批评、报律也都不加以限禁。即便晚清政府后来所制定的报律，其执行力度日趋“宽松”，但还是遭受各方抵制。各报馆不仅对报律的禁条根本不予理会，甚至连注册的手续也不去办理。②

尽管这个脱胎于旧肌体的婴儿不可避免地遗传了旧式因子。比如，面对蓬勃发展的近代报业，面对民众言论自由的呼声，一些官员仍因循民刑不分的旧有传统，用刑事手段制裁报人，抵制近代报刊，并在实践中制造了起起新闻惨案。但是，晚清报律无论在体系还是具体内容上都体现了相当大的进步性，是我国新闻法制的第一次全方位突破，在几千年一贯的“偶语弃市”、“诽谤者族”的专制背景下以法律的形式给新闻一片天空，“促进而不是阻碍了报业的发展”，“开拓了我国新闻法律近代化的先河”③。

从戊戌维新一直持续到 1912 年，华文报刊由百余种增至 500 种，连同陆续停刊者，共有 700～800 种之多，总发行量仅据 1913 年邮政系统运送的报纸印刷品

---

① 第一，条款有了减少。“大清报律”共 45 条，其中正文 42 条，附则 3 条；而《钦定报律》共 42 条，其中正文 38 条，附则 4 条；第二，把第八条、第九条中的“报纸记载失实”，改为“报纸登载错误”，这两条文字上也有变动。第三，内容做了增减。如《大清报律》的第十三条、第五条，即“凡谕旨章奏、未经阁抄、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等删去，而《钦定报律》增加了“在外国发行之报纸，有登载第十条所列各款者，不得在中国发卖或散发”等。第四，《大清报律》的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被认为与现行刑律有矛盾，作了改动。第五，许多违规条目的处罚力度作了变动。第六，《钦定报律》对违规处罚程序作了规定：“由审判衙门按照法院编制法及其他法会审理。”

② 陈柳裕. 形同虚设的晚清报律[J]. 浙江人大，2003(11).

③ 李斯颐. 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1).

计，就达 51 524 800 份，成为中国报业史上的重要时期。[①] 无论是报刊种类还是发行数量，都可以视作对晚清报律进步性的证明。

如果再对报律颁布前后做个具体的比较更能说明问题——20 世纪初每年都出现不少新办报刊，据不完整的统计如下：1901 年为 34 种，1902 年为 46 种，1903 年为 53 种，1904 年为 71 种，1905 年为 85 种，1906 年为 113 种，1907 年为 110 种，1908 年为 118 种，1909 年为 116 种，1910 年为 136 种，1911 年为 209 种。办报点也已遍布全国，计有上海、北京、天津乃至伊犁、西藏等国内 60 多个城市或地区。[②] 从以上的数据不难发现，从 1906 年以后，新办报刊数量明显增加，而 1906 年恰好是《大清印刷物件专律》颁行之年，显然这其中并不仅仅是巧合。

第三节　媒介技术发展催生著作权章程

古代中国不存在著作权法律部门，没有形式意义上的著作权法，但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著作权法律文化，并且这种法文化在后代得以继承。中国现代社会的著作权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及执法实践上都有大的发展，但其制度、原则、理念的根基均来源于近代资本主义著作权法理的移植。[③] 事实上连“著作权”与“版权”这两个词都并非发育自中国固有法律文化之中，而是来自日文——而日文这一术语又源出欧洲。

“著作权”与“版权”作为专门术语在法学范畴内交叉使用，时而作为同义语替换，时而又存在些许差异。“习惯于使用‘著作权’的人，或者习惯于使用‘版权’的人，又或多或少带有各自的偏重”[④]。1910 年颁布的《大清著作权章程》，采用了“著作权”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法律文件中，时而采用“版权”一词，时而采用“著作权”一词。

不过在中国，除在专门立法中使用著作权即版权的表述之外，图书出版行业中著作权与版权二称谓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所以本书在关键词的使用上遵从立法用语惯例，尽量使用“著作权”而非“版权”，但在涉及史料时从尊重史料原貌的角度出发，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版权”的称谓。

---

① 桑兵. 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J]. 近代史研究，1991(6).

② 史和，等. 中国近代报刊名录[Z].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杨师群.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4.

③ 王兰萍. 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成长(1903～1910)[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④ 李明德，许超. 著作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

一、晚清前为何没出现著作权律

既然著作权律的产生和印刷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那为何中国早于西方四百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为何中国第一部著作权律——大清《著作权章程》却比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律(1710年的《安娜法》)晚出现了两百年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为何长期没有出现著作权律？比较分析后不难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思想土壤。中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统治之下，统治者实行文化钳制，国民无言论自由，没有著作权制度产生的思想土壤。长期实行义务本位主义，强调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导致没有个人权利观念尤其是个人财产权利观念的兴起。著作权属私法范畴，在强调公权力的封建国家不可能出现著作权制度产生的思想基础。我国在清朝政府之前，一直是封建帝王统治，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遑论对作品的权利。

二是经济因素。古代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著作权的产生还在于作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古代中国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国民很少会将作品视为商品进行物质交换。中国古代书籍的成本居高不下，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特权阶层中流通传播。这无疑也剥夺了广大人民的话语权力，使他们不仅在思想言论上只能听命于统治者，而且也剥夺了他们获取信息的权力。正如戈公振先生所指出的："我国报纸，自明以前多系手写，只供少数藩阀缙绅之阅览。后虽改为手印，然为数甚少，极难普遍。"①

三是技术因素。著作权产生的第三个条件是印刷术兴起后复制本的大量出现。中国活字印刷术虽然出现很早，但未得到广泛应用。

四是法律秩序。著作权的产生源于复制技术的革命，但它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一种法律秩序，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制度垄断了绝对的资源和权力，政治权力中心对商人和士绅产生了很大的向心力，昂格尔(R. M. Unger)所谓的独立的"第三等级"②根本无法出现，无法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度性规约。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自古就有知识产权制度，③而且其证据主要集中于著作权领域，比如宋祝穆编写的《方舆胜览》自序后的"两浙转运司录白"就提及"一

---

①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5：357.

② R・M・昂格尔.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 吴玉章，周汉华，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63.

③ 张东刚，冯素杰. 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和变迁[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3).

生灯窗辛勤所就，非其他剽窃编类者比”，而“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见编辑，专一翻版”，故由“两浙转运使司、浙东提举司给榜禁戢翻刊”，如遇有人翻版营利，则祝氏有权“陈告、追人、毁版、断冶施行，庶杜翻刊之患”。

但正如南振兴指出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方舆胜览》史料所载至多是中国宋代官府对版权的个案保护，而且这种保护重在保护实物产品的图书翻印权，此与激励作者创新作品的著作权制度相去甚远。若依此断定中国自古就有知识产权制度显然依据不足。知识产权制度首先是一种把知识产品视为私有财产，从而给予知识创新人一种私有垄断产权以激励知识产品创新的制度。而在 20 世纪前，中国知识产品从来都是公有的，任何人均可以合法地使用他人创造的知识产品，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知识产权制度完全子无虚有。①

美国著名学者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也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17 和 18 世纪，欧洲出现了趋近于知识产权的发展，而与之相对应的东西并未在中华帝国出现。简单地说，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发展出这样一种观念，即作者、发明者和其他创新者对其创造物拥有受到法律保护而可与国家对抗的财产利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社会将因为鼓励这类人从事于这类工作和传播他们的成就而获得益处。这种情形与中国恰成对照，后者仍旧主要是根据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权威的考虑来管理这一领域”。②

二、媒介技术发展对著作权律的催生

1. 作为复制术的印刷术

印刷术的本质在于储存并大量复制信息。这正如麦克卢汉在《传播工具新论》中所言：“重复性是机械原则的核心，它从印刷技艺发明之后，就一直主宰着我们的世界。印刷与排字的信息，主要就是指‘重复性’。”与书写媒介相比，印刷媒介的诞生，实现了人类对传播符号的长久保存与大量复制的欲望，进一步克服了语言媒介承载、传递信息的时空局限性，大规模、远距离的信息传播出现了，第一次在大范围内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望。

---

① 南振兴. 中国历史技术演变与知识产品制度变迁的绩效[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

② 这段话引自于安守廉著的而由梁治平翻译的《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该文载于刘春田主编的《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一卷第 52 页，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该书的原文名为“*To Steal A Book Elegant Off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印刷术发明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印刷商凭借印刷图书产品的技术设施控制了整个图书业。那时候，他们通过在业内限制印刷作坊的数量维持着其优势地位。然而，渐渐地，他们的这种优势地位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拥有复制本的卖书商逐渐控制了图书业，他们控制着对图书出版的权利。有出版事业才有出版法，出版法是随着出版事业的产生而产生的。近代出版法之所以产生，除了出版事业的繁荣之外，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保障个人的权益。

晚清时，西方机械印刷术传入中国并流传开来，逐渐代替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从而为近代出版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对西学知识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译印西书的机构也随之增多。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等翻译出版机构。资产阶级兴起后，为了宣传维新变法，亦创立了大同译书局、广智书局等出版机构。① 而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但使得书籍出版数量大为增加，并且可以将作品当作商品通过复制、销售等手段来获取经济利益，各种复制本动摇了图书业内部原有的利益、结构均衡，对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

2. 从禁止刻印到禁止盗印

梳理中国著作权律谱系的意义是不彰自明的。印刷术导致的印刷品的流行动摇了皇室意识形态的稳固地位，随之，国家开始了对某些书籍的流通的控制。这时候，国家控制的是书籍的发行，而不是盗印。② 正如在电影《华氏 451 度》③中，蒙台格的上司毕特队长在向他的那些困惑的下属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书都要被烧掉的时候说："书曾经在这里、那里和每一个地方吸引过不少人，它们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世界是宽阔无比的；但是，后来世界上充满了眼、肘和嘴。"

早在唐文宗太和九年(830 年)，四川官员冯宿曾上呈"请禁印时宪书疏"的奏文，要求禁止民间刻印日历。五代后唐长兴二年(932 年)，经宰相冯道、李愚等建议，朝廷命田敏在国子监主持校正《九经》，其后"天下书籍遂广"。校正的目的是防止作品中的遗漏和错误。

---

① 张小莉.《大清著作权律》述论[J].学术研究，2005(9).

② 李雨峰.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56.

③ 这是 1967 年弗朗索瓦·特鲁福特以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经典科幻小说《华氏 451 度》(Fahrenheit 451)为背景而改编的电影。影片中描述的是不太遥远的未来，人们必须用记忆的方法来读书，因为拥有书籍是犯罪行为。人们只能在脑子里看书，因为把书拿在手中就是犯罪，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监禁，书也将会被焚烧——华氏 451 度是书被焚烧时的温度。书中主人公盖·蒙塔格是一个救火队员，也一直充当官方焚书人的角色。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中曾记载，“书籍翻版，宋以来即有禁例”①。从《宋史》、《宋会要辑稿》等文献可知，宋朝几乎每个皇帝都颁发过“禁止擅镌”的诏令，各级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审查查禁机构。宋代罗璧《诣造》记载，在北宋神宗继位之前，为保护《九经》蓝本，朝廷曾下令禁止随便刻印这部书（“禁擅镌”），如果想要刻印，必须报请国子监批准。这实质上是赋予了国子监对《九监》专有出版权。南宋先宗绍熙年间，四川眉山王称所写的《东都事略》一书上有牌记：“眉山程舍人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而眉山程舍人宅是当时著名的刻书家之一，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版权实例的记载，它维护的是刻印者的利益，尚未反映对作者权益的保护。

如果我们把宋代对个别刻书家、编辑家的保护算作中国版权保护的源头的话，那时的保护，显然局限在当时仅有的几种活字、活版印刷术所涉及的图书方面。这种格局在此后 700 余年时间里没有变化。

宋代之后，历代政府对民间刻坊的管制与民间刻坊的迅速发展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图书贸易也即形成了一个官方表达与具体实践的逻辑。毋宁说，宋代之后的历代政府尽管在法条中明令对刻坊的擅自发展，而实践中，它却支持着这些刻坊的发展与要求，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在朝廷的重压下民间刻坊及其对盗印行为的主张能够得逞。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史实：明代对出版业全然没有采取出版前的审查制度，而其间载有“翻刻必究”的图书却不乏其数。这些载有“翻刻必究”的图书在市场的流行显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控制思想的结果。②

元代更是开始了书籍雕印前的审查制度。与此相比，明代对出版业的管理采取开放的政策，整个明朝，无论是国史、官史、谏诤之辞，还是市井文字、小说艳曲，都可以由坊肆公然刊行，而清代则大兴文字狱，对雕刻与书籍的流动严加管制。③就内容言，禁止雕印的书籍多为：其一、与经书内容相抵牾的文字；其二、国家颁布的法律、敕令；其三、儒道释之外的经文、天文、图谶、邪说及荒诞不经的文字；其四、为士子求官而编撰的印刷品；其五，伪造官物和文字。④ 另外，为了禁绝他人翻印，保护自身利益，书贾翻刻书籍或私人进行家刻之前，便将待印书版呈送地方官府审查，形成一些简单的保护版权的地方法令。但总体来看，古代书籍出版多控制于官方，文化交流与传播并不广泛，关于版权保护的问题不很突出。⑤

---

① 叶德辉. 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M]// 书林清话.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36.

② 李雨峰. 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57.

③ 李雨峰. 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54.

④ 赵胜. 宋代的印刷禁令[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4).

⑤ 张小莉.《大清著作权律》述论[J]. 学术研究，2005(9).

当然，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受感于同样的不同，盗版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产生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并存，统一的是他们共同对盗印行为的控制预期，不同的是他们对盗印本身的看法。

可能正是借用了国家对这些不能容忍的书籍的流行的控制，一些作者或者刻坊巧妙地抑或是偶然地获得了国家对自己书籍的授权，以禁止他人盗印。这样，“翻刻必究”便构了我国文艺出版界的星星之火。可以肯定的是，国家禁止某些书籍流通的目的在于思想控制，而国家禁止盗印就不能必然地得出这个结论。毕竟，不属盗印的正版发行同样会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构成威胁。当然，从对图书流通的控制到对盗印的制止并不一定是历时性的，更多的它发生在共时性的层面上。[①]

有时候，一种社会制度在改变了其功能后，其性质未必就会因此而改变。[②] 即使封建王朝制止盗印的目的真的是为了控制思想，它也不能垄断对文字作品保护的性质。因为目的是政策制定者愿望的反映，而效果反映的是所有参与人的不同看法。

道光元年刻本李汝珍《镜花缘》书前有：“道光元年新镌，翻刻必究”。自纸张与印刷术出现并加以应用之后，从禁止某类书籍的私刻刊行到对某些书籍授权禁止他人翻刻，这样的变化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意义重大。

总的来说，我国古代书刻专有权的特点在于：第一，书业特权除少数例子来源于国家图书馆国子监之外，其余来源于地方长官，其原因或许正如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所言，要维护帝制中国的统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同样重要；第二，绝大多数乃是由刻坊向政府申请方可获得特权；第三，出版社与作者并驾齐驱，作者的权利更为明显；第四，在外夷干涉之前，中国的版权问题始终是地方性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并无统一的敕令、命令予以规范。[③]

3.《著作权章程》的出台

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规制，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时至晚清，出版技术的进步，图书需求的激增，使得盗版问题十分突出，但当时并无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之加以规范，因此由随意翻印书籍而造成的版权纠纷时有发生，出版者对于版权保护的要求愈加强烈。

广学会是西方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创办报刊的出版企业，被认为是在中国“实为行版权之嚆矢”。其保护版权的意识亦较强，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及较客观的分

---

① 李雨峰.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56.

② 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08.

③ 李雨峰.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56.

析，所出书籍在国内较受欢迎，其编辑出版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等，由于书中“尤多外间未见之秘要，佐以新论，辅以西报，实皆煞费苦心”，受到读者欢迎，“不徒海内风行，且更流传域外”，该书曾登告白“不得翻印”，但仍有书商盗印售卖。林乐知在其《中东战纪本末》刊行后，即呈请美国驻华总领事致函苏松太兵备道，要求保护其书籍版权。苏松太兵备道于 1897 年发布《严禁翻刻新著书籍告示》，再次郑重宣告：“切勿再将前书翻印出售，致干究罚。”

1899 年，上海的东文学社亦禀请苏松太兵备道保障其利益。5 月，该道张贴告示，宣布给予东文学社翻译印行的《支那通史》以及已译未印、未译成之书共数十种书目版权保护，不得私行翻印。南洋公学译书院是早期较有名的编辑出版教科书的机构，为了保护其版权，亦请求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给予保护，其在呈请书中说：“诚恐书贾射利故智复萌，妄行翻印，贻误非浅。为此，禀请批准立案，出示严禁。凡译书院译印官书，均不许他人翻刻，以符奏案，而保版权。……仰书贾人等一体知悉，毋得将该书院立案各种书籍翻刻渔利，致干查究。”①

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版界的盗版问题已相当严重，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广智书局由于盗版问题，几至发生经营困难，梁启超称：“书局所印好书销行稍广者，无不为他局所翻印，贬价夺市，虽屡禀官究治，皆置之不理。故本局每出一书，未能赚回本钱，已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贬价，则一本不能售出，而成本既重，贬价则必至亏本而后已。”②对盗版现象，清政府官员不是不管。但这种管理，大多出于某地方官的一时兴起，有兴趣的地方官管，没有兴趣的地方官不管；而且即使管，也因无法可依无规可循，难以管理之下很多时候只能不了了之。

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版权观念也渗透进来。1891 年，周仪君翻译出版了《版权考》，详尽阐述了世界版权的起源和现状，在文化界颇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版权观念的传播与普及起了推动作用。③ 我国最早使用“版权”一词的法律性文件是 1903 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的版权条款，该条款授予美国有关著作人有限版权。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著作权制度是西风东渐之结果。

清廷在“新政”之后扩大了向西方学习的范围，文化事业开始发展，官方出版机构从以刊刻儒家书籍为主的传统官书局向以翻译东西方书籍为主的官方译书局转化，译印的西方书籍数量与质量也与日俱增。民间出版机构迅速发展，取代了教会

---

① 满清政府保护版权布告举例[M]//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书影目次部分 29-30.

② 鲁湘元. 稿酬怎样搅动文坛[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140.

③ 张小莉.《大清著作权律》述论[J]. 学术研究，2005(9).

和官方出版机构而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这一举措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越是畅销的书籍越容易遭到翻印。于是引发的版权纠纷自然不可避免，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版权纠纷的增多为著作权立法提供了现实需要。因为没有相关法律制裁猖獗的盗版者，出版商和作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他们惟有依靠官府发布公告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办法的弊端不言而喻：一是保护地域范围狭小；二是保护对象特定，不具有普适性；三是保护时效短，对盗版者威慑不够。因此出版商和作者的利益仍然得不到根本保护。

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要求立法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一些大臣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宪政大臣载泽等主张立即制定著作权法，理由是"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如何载以章程，咸纳轨物"①。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亦曾多次提出"参考古今，博辑中外"，"取人之长补吾之短"②，要求加快著作权法在内的所有法律的修订。

为顺应这种潮流，规范繁杂的出版市场，清政府开始改变过去那种以行政干预手段为主的出版管理政策。1906 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逐渐认识到，对于传媒领域的管理，"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规物"③。《大清报律》第一次就版权的保护作了规定，比如第 38 条"凡论说、纪事，确系该报创有者，得注明不许转载字样，他报即不得互相抄袭"，第 39 条"凡报中附刊之作，他日足以成书者，得享版权之保护"。

1910 年(宣统二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著作权章程》，共五章 55 条。《著作权章程》明确了著作权的概念，"凡称著作物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曰著作权"。至于著作版权的范围则包括文艺、图画、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等。凡著作物归民政部注册给照，受法律保护。《著作权章程》还规定著作权归著作者终身有之，身故后，其承继人可继续至 30 年。凡经呈报注册给照之著作，他人不得翻印、仿制、假冒以侵损其著作权，违者准有著作权者，向该管衙门呈诉，由审判机关责令处以罚金，赔偿损失。而且将版权范围，由图书扩大至通过摄影技术复制的照片，以及文艺、图画、帖本、雕刻、模型。

《著作权章程》的颁布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政府对书籍报刊的管理，除控制非法书籍出版印行而外，又增加了保护合法出版印行的功能，确立了现

---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79：112．

② 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M]．北京：中国书店，1990：136．

③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 4 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6．

代版权制度。然而，由于政权更迭、政局混乱，令不能行禁不能施，加之印刷出版业的飞速发展与文学创作的难产、少产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脱节，到民国初年，模仿、抄袭等恶性侵权现象泛滥成灾。[①]《著作权章程》经历了民政部草拟、宪政编查馆复核、资政院决议、最后由皇帝下旨颁布的四道程序才呈现在国民大众面前。虽程序较多，但从制定到颁布不过三个月时间，可见当时社会盼望该法出台的急切心情。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的国家机器连同其管理文化领域的绝大部分法令法规也随之被埋葬，但是《著作权章程》却成为例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发布通告说："本部查前清《著作权章程》，尚无与民国国体抵触之条。自应暂行援照办理。"[②]因此，《著作权章程》的立法理念、法律术语与框架结构被1915年北洋政府的版权法和1928年国民政府的版权法所沿用。

《著作权章程》是中国传统旧律中所没有的法律，虽然未及施行，但它已经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特许专权，向权利主义过渡，不仅实现了中国著作权立法零的突破，还为中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近代著作权制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即将覆亡的政府，在苟延残喘之际还不忘出台一部规范出版行业的法律，可见在此之前复制、盗版以及稿酬观念等已深入人心，相关的法规已到了非制定不可的地步。

本章小结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特别是在造纸术尚未问世之前，缺乏轻便便宜的书写材料，信息传播受到很大的限制，主要的传播方式是口头传播和少量的手写（包括刻、铸等）传播。因而此时对信息传播的法律控制主要是"言禁"，偶有"书禁"。唐宋以后印刷业获得发展，"言禁"、"书禁"、"报禁"等封建法律中先后出现。但由于思想土壤、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法律传统秩序几个方面的限制，我国古代长期未能出现专门的新闻传播法规。直至晚清新政修律时，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新闻传播法规方才出现。简言之，中国古代社会长时期传媒制度的滞后性与媒介技术发展的前导性两相抵牾。

19世纪末期，铅活字印刷已在中国得到普遍使用，而石印技术在中国更已生根开花，这些新式印刷技术的采用使得报刊生产成本大为降低。成本的降低自然

---

① 程丽蓉.大众传播与制度控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4).

② 刘哲民.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G].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50.

带来了受众数量的增长，无形中又拓宽了报刊的发展空间，刺激了人们办报创刊的热情。而报刊的急剧增长给清政府的统治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书籍出版数量大为增加，并且可以将书籍当作商品大量复制后获取经济利益，各种复制本动摇了印刷出版业内部原有的利益格局，对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并迫使统治者加以回应，最终导致官方传媒管理制度的连锁变迁。

尽管从道光到光宣年间，"束手待毙"一直都不是晚清政府的国策，但晚清统治者的趋新总显被动，他们还千方百计为旧制度和旧特权留出空间。不过，时代的滔滔巨浪已经不容他们瞻前顾后和原地踏步，要么顺应潮流改革求生，要么固步自封不变待毙。随着封建专制制度与近代书籍报刊发展之间矛盾的不断紧张，废除束缚近代传媒发展的旧法规，建立适应印刷出版新格局的传媒新法规已成为时代的共识。

但对于晚清统治者来说，传媒法规的变革并非要以新体制替换现存体制，只是在现存体制的基本框架内进行有限的创新。这样一来必然使得晚清传媒制度的变迁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清政府的立法初衷本想禁绝革命报刊、限止新式出版；另一方面由于时势所迫、民心所驱，清政府又不得不作出一些新闻和出版自由的积极承诺。"进步和守旧的冲突、立法和执法的脱节，使得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展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一面是报业借着报律的大发展，一面是报界对报律的大抵制。中国新闻法制的现代化就在这种喧嚣中迈开了它的第一步"。[①] 晚清的报律和著作权律就在这场相互掣肘的博弈中艰难问世。

① 孙季萍，王军波. 清末报律：在创新和守旧的夹缝中[J]. 政法论丛，2001(5).

第四章　媒介技术发展对社会传播习俗的重塑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该民族自身得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生息绵延的密码。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个密码可以理解为传播习俗。传播习俗是指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传播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惯习与风俗。它虽然不是传媒制度的直接组成部分，但对传媒制度却是影响深远。那两者之间究竟有着何种勾连？

汪丁丁在《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一书中指出：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①] 潘忠党认为制度即“定义、制约和促成社会个体行动和互动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②]。诺思也认为，正式规则，即便是在那些最发达的经济中，也只是型塑选择的约束的很小一部分（尽管非常重要）。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不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在外部的社会交往中，还是在事业活动中，支配结构的绝大部分是由行事准则（codes of conduct）、行为规范（norms of behavior）以及惯例（conventions）来界定的。[③]

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公认的维系团体生活和人类关系的法则和社会行为模式，制度既包括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比较稳定的、成文的、理性化的正式社会规范体系，也包括风俗、习惯、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等不成文的非正式规则。尤其是非正式规则，与该社会所由以生长的文化联系非常密切，因而具有整体性和稳定性。任何正式规范的有效性、复杂性、适应性或由此形成的相关问题，都无法脱离非正式规范的基本框架。比如中国古代语境中的“礼”、“俗”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作为制度性存在的条理清晰、责任鲜明的“礼”，往往来源于一般来说对人

---

① 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3-4.

② 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

③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0-51.

们生活起指导性而非指令性作用的规范形态——习俗。

借鉴上述理论可以发现，无论是媒体内部制度（包括内容生产机制和经营管理制度），或者是媒体外部管理制度，它们都既包括成文的正式规则，也包括潜在程序、隐性惯例等非正式规则。而且在传媒制度结构中，非正式传媒制度虽处于底层，但往往是正式传媒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些非正式传媒制度，正式传媒制度往往难以正常运作。同样，非正式传媒制度自然也不是空中楼阁，它就建基于社会传播习俗这个基础结构之上。或者说，传播习俗是传媒制度的社会环境，[①]所以传播习俗本身就是重要的——所以既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传媒制度的附庸，更不能割裂两者之间的关联。

因之，考察媒介技术发展对晚清社会传播习俗的重塑，能够使目光不仅驻留于传媒制度本身，还可以透过传媒制度探寻其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W. G. Sumner）就认为，社会制度是由民俗和民德所交织形成的社会行为体系，这种行为受到社会的规范和制约，得到民众的认可并具有稳定的程序和步骤。而自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农民社会与文化》[②]一书出版后，关于"大传统"和"小传统"[③]的说法更为我们理解习俗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框架。那么，晚清时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影响作为社会软调控系统之一的传播习俗，从而进一步影响传媒制度甚而改变社会结构的呢？

第一节　媒介技术发展加剧传播商业化

晚清是新陈交杂的重要时段，整个社会情状斑驳。随着近代化的报刊、出版机构、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出现，社会舆论传播工具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传播新观念空前彰显且势态强盛。在目睹了西方媒介技术产生的巨大威力的同时，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已日益感受到用机器取代人力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社会发展

① 这里用"传媒制度的社会环境"而没有用表述更为简洁的"传媒制度环境"，是为了避免和制度经济学里面的"制度环境"的所指相混。

②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③ 所谓的大传统指的是社会上层和知识阶层所代表的文化，这些是由思想家或宗教家经过深思熟虑而提炼出来的文化样式。它的体现方式是体现精英意志的制度和被这种制度推崇的经典作品。而与之相对的小传统则指的是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民间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习俗性的生活文化。

的大势所趋。尤其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西方各种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在国内进一步普及开来，知识阶层的启蒙运动已从理论层次落实到行动实践，新式报刊与书籍迅速成为了“开民智、启民德、鼓民力”的主要工作场域。

但同时，“工业化和商业化这两个近代文明的根本标志，在出版业中打下了深深的印痕”①，印刷出版机构也要以营利作为最高目的，对于利润的追求促进了晚清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将其融入了近代经济范畴。

一、媒介新技术引发传媒事业新分工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第一章就是“论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甚至断言，文明的民族之所以比原始民族较为富裕，就是因为前者有分工，后者没有分工。“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他还指出，“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在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节约了劳动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转换工作的时间，简化了每一环节上的操作从而提供了发明工具的机会，使每一环节上的操作成为重复动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操作熟练程度；分工虽然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②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③ 社会关系——确切地说，是社会内部关系——变得越来越多了，它们超出了原来的界线，扩展到了各个方面。因而，能够进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数越多，分工就越发达。如果我们把人们的相互结合及其所产生的非常活跃的交换关系说成是动力密度或道德密度的话，那么分工的发展直接与这种密度成正比例关系。社会的凝聚性是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劳动分工来维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也是由分工决定的。④

---

① 王建辉. 出版与近代文明[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6-7.

②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5-20.

③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19.

④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6.

但借用分工理论来分析中国传统刻书与印书活动却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古代虽有专门的刻工、印工，甚至手写上版的写工也掌握着较为娴熟的专业化技术，但中国古代的印刷出版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中国各种传统的出版机构，长期以家庭作坊形式和官办形式进行生产和经营，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没有多大变化，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印刷出版业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分工。

但到了晚清后社会职业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动。这种变动不仅体现在传统"士农工商"职业结构的异动，而且表现为整个社会职业范围的扩大。整个社会在守旧与革新、传统与反传统、落后与进步、迷信与科学的相互争斗、相互融合中前进，人口的职业构成也在这一过程中剧烈变动。"士之于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封闭结构终于被社会发展的潮流所冲破。中国近代人口职业构成形形色色，[①]究竟有多少种具体职业虽属难考，但肯以肯定的是：非生产性的职业及从事此类职业的人口为数众多。[②] 这种人口职业构成和社会分工形式自然是晚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传媒行业，由于现代化的媒介设备的引进，劳动方式从手工作坊或个体劳动形态不断向机器化的有组织的大生产劳动形式转变，新的职业形式随之产生。1895～1898 年是近代中国传媒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民办报刊和出版迅速崛起，进入"民报勃兴"[③]时期，并开"人民论政"之端。同时，这也是中国报刊业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呈露雏形之时。虽说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涂尔干所讲的"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不甚相符，可其导致的结果，"的确使报刊成为了中国文人的一个主要谋生之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中国传统文人向现代职业报人转变的关键一步"[④]。新的印刷技术与人的结合也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产生了新的文化组织形态，创造出一种新的改造社会的方式。

---

① 《国民日日报》的一篇《箴奴隶》的文章将当时 1 亿左右丁男的职业及人数进行了估算：公私奴仆 150 万，娼优 50 万，衙役 500 万，官亲 150 万，官吏 60 万，读书人 1 000 万，强盗 800 万，兵勇 600 万，农 1 500 万，工 1 200 万，商 1 000 万，各局卡司事 400 万，罪囚 100 万，废疾 30 万，乞丐 500 万，闲民 2 000 万。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 北京史[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356.

② 《忘山庐日记》中罗列了当时的各种人口职业：有业之民 14 种，即士、农、工、商、官、兵、丁、幕、书、差、僧、道、娼、优. 无业之民 2 种，即纨绔子弟、乞丐。此外尚有江湖无赖者 8 种 60 类，包括占课、相命、算命、伪神仙、变戏法、卖艺、私刻印玺、诈骗讹索、以色诱人等。参见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94.

③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113.

④ 黄旦. 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J]. 新闻大学，2007(春).

1898年，上海印刷业已开始使用日本仿制的欧式回转印机，使得印刷工效大大提高。同时铅印技术也日臻成熟，用纸型铸铅版可多次浇铸而不裂，如印刷较多，可多浇复版同时拼印，再加上纸型的发明与使用，使得印刷更加快捷方便，从而大大加速了机器复制的速率，印刷出版的成本大大降低，各种新式报刊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能够购买新式出版物。

新的传播形式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大机器印刷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将资金和有写作能力的文人统统吸纳到相关事业中来，形成了一批专门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人员，进一步丰富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职业结构、壮大了新型知识分子队伍。而且，印刷媒介的迅速发展意味着传播信息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由于有大胃口的印刷机嗷嗷待哺，愈来愈多各种各样的报刊版面开办出来。报馆书局为了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到处征集优秀稿件。稿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稿酬制度自然应运而生。

晚清以前，文学创作者主要是达官贵族和文人墨客，尽管数量上也是多不胜数，但他们基本上都属于业余作家，一般都有比较固定的工作和相应的经济收入，只不过是在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写作目的或是为了藏之名山的"立言"，或是怡情养性的消遣，总之是"著书不为稻粱谋"。1905年9月，清廷诏准停止科举考试，推广学堂教育，历时千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除，从知识到权力失去了简便通道，文人的生存方式不得不随之改变。但文人唯一的特长是舞文弄墨，于是许多人加入写作队伍。1910年清政府颁布《著作权章程》后，进一步给职业作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为失去科举之路无所适从的文人拓展了生存空间，帮助他们从旧式文人的做官、入幕、教书谋生之路中解脱出来，使他们可以安心创作。他们在作品完成之后不是自费出版，而是向报馆书局投稿，靠稿费养家糊口。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报馆书局的稿酬已经成为其收入来源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这样在彻底改变了"著书不为稻粱谋"观念的同时，也促使相当一部分知识群体逐渐摆脱了传统文人对皇权的向心运动及依附状态，职业或半职业的写作者在当时社会成为一个新群体。

晚清时期，我国虽无关于稿酬的成文法律，但在传媒行业，"有关稿酬标准、支付范围及形式等问题，实际上已逐渐达成基本的共识，形成有规可循的惯例"。[①] 近代稿酬制度的形成，是作品高度商品化、社会化的表现，也是我国传媒事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逐步进入近代化运作阶段的重要标志。

---

① 郭浩帆．近代稿酬制度的形成及其意义[J]．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

同时，整个社会对传媒从业者的态度也在转变。19世纪后半叶，报社的主笔访员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左宗棠甚至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①]的评语。直到1901年，梁启超言及"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时，还忧心忡忡地说："由于主笔、访事等员之位置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慨叹"第四种族""何时始见其成立"[②]。然而，数年间形势骤变，《国民日日报》评论道：由新闻记者组成的第四种族，"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故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民众只有以第四种族为代表和引导，"乃足以抵抗贵族教会，而立于平等之地位。"[③]1905年3月，上海《沪报》首倡成立"记者同盟会"。1908年，广东报界为了"发达言权"，率先组织报界公会。颇如梁启超所赞，"夫新闻事业，高尚之职业也"，"唯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无匹"。[④]

从"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到报馆与教育和出版业同被视为国家前途之一线光明，[⑤]并赋予"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的两大天职，[⑥]其间变化不仅反映出报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地位提升，更反映出媒介技术发展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

从报人包天笑当时的薪水情况也可窥知传媒从业人员地位的提升：1906年狄楚青邀请包天笑加盟时报馆，每月要求包天笑"写论说六篇，其余还是写小说，每月薪水八十元"，"大概论说每篇是五元，小说每千字两元。以此分配，论说方面占三十元，小说方面占五十元"[⑦]。连包天笑自己也认为薪水不算菲薄，"八十元的薪

---

① 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J].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7-15.

② 参见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号，1901年12月21日。

③ 参见《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7日。

④ 戈公振.新闻学撮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2.

⑤ 如"呜呼！国是不可问矣！其现象之混浊，其前途之黑暗，无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绝。其放一线光明、差强人意者，惟有三事：曰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也"。参见梁启超.中国之新民·敬告我同业诸君[M]//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164-165.

⑥ 梁启超.中国之新民·敬告我同业诸君[M]//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165.

⑦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317.

水，还比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一只元宝还多咧，因此我也很满意”①。包天笑当时被邀请过去只是担任编辑工作，尚非主笔，但薪水已经超过了青州府中学堂监督。

1910年9月4日，上海、北京、广东、江西、浙江、福建、四川、贵州、安徽、汉口、南京及东三省等地35所“中国人自办之报馆”的代表及各界来宾600余人聚集南京，成立报界俱进会，以“结合群力，联络声气，以督促报界进步为宗旨”。联合规模的不断扩大，显示了同业群体的崛起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从此，一扫往日的世俗偏见，思想文化英才鲜有不与报业结缘者。而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众多进步人士，虽并非直接从事职业性新闻工作，也踊跃撰文投稿。②

报刊的机器化生产使得复制方便、发行迅速，报刊成本降低，定价随之水落船低，例如，《申报》最初一份只卖8文钱，消费的经济门槛大为降低，自然就有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加入到读者行列。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之后，连士大夫阶层都从原先抵制报刊、小说转变为报刊、小说的读者，甚至还有不少人加入了作者队伍，进一步造成了报刊市场的膨胀。

媒介技术的发展还促生了另外一些新生的行业，比如专业照相师的出现。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提高报刊的竞争力，许多报馆、书局在出版物中加入大量插画甚至照片。与插画相比，照片除了高度真实与可靠之外，还具有近代工业产品的特征，能够进行标准化和量化制作，从而降低了制作成本，价格逐步趋向低廉，自然易于普及，因此也越来越为传媒机构所采用。这一点自然在客观上刺激了更多照相师的出现。

二、印刷商业化与印刷物商品化程度的加剧

书籍是记录、保存和传播文化的非新闻媒介。③ 或者说，书籍是传播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思想传播媒介，是对促进变革最有用的传播媒介，也是对教育最有用的传播媒介。英国19世纪的作家和社会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说，“书中藏着所有过去时代的灵魂”，语气里充满虔诚。④ 书籍从产生的那天起，

---

① 为了说明这份薪水的不菲，包天笑特地举例进行了比较：他有位同乡孙东吴，是南菁书院素有文名的高材生，比他还早两年进入申报馆当编辑，薪水只有二十八元，但孙东吴自己已很满意：“就是每月二十八元，也比在苏州坐馆地、考书院，好得多呀。”参见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317.

② 桑兵. 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J]. 近代史研究，1991(6).

③ 仓理新. 书籍传播与社会发展——出版产业的文化社会学研究[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④ Ray Eldon Hiebert, Donald F. Ungurait, Thomas W. Bohn. 大众传播媒介[M]. 潘邦顺，译. 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520.

就具备记录、保存和传播文化的功能，这种功能和作用随着制作材料和印刷复制技术的改进以及社会成员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日益扩大。

“三立”、“三不朽”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一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们是图书刊刻、著述实现的最高目标，也是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人生追求。因此中国古代刻书往往只是为了扬名立万以留存于后世，传播的范围囿于抄写或刻录的份数。然而，晚清时先进印刷技术的运用促使图书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促进了多样化出版格局的形成，也加剧了书籍出版的商业化进程。

1. 私刻

古老的“三不朽”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事实上它本身流传之广就是立言之不朽的最佳证明。它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认为个人的德能、功业、思想和语言能使人永垂不朽。在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目中，立言不朽甚至高于立德立功，而且也是个人实现人生“名逾金石之坚”的身后名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事君事亲”孝义的根本。立言著述，一方面光耀祖先，“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①，个体的追求与祖先的荣耀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承继祖先未竟之业，同时继往开来，启迪后人。因此著述不仅成为传统知识阶层每个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而且成为光宗耀祖、家族兴旺的旗帜和标杆。②

这样的理念导致了中国古代私人编辑出版活动相当活跃，或者编辑自己的文集以传播名声；或者编辑父祖先辈的文集以尽孝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③。私刻被人们看成了使家族声誉“不朽”、世代“书种”不绝的重要手段。有论者甚至认为，“一个确定的结论是，中国图书历史上，所有文集著述、编刊的文化活动，其基本动因大多是为了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理想。”④

而编辑“古人”或“今人”的诗文选本，或者整理古籍珍本，并通过捐资筹款等方式刻印出版，这也是为士人普遍称道的善事。直至晚清，张之洞还劝人刻书：“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之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

---

① 宋刻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Z]. 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7：6.

② 何明星.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 北京：中华书局，2007：24-25.

③ 宋刻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Z]. 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7：6.

④ 何明星.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 北京：中华书局，2007：22.

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①]很显然，张之洞依然延续了传统的立言不朽的思想，把出版作为一种个人行为的宣扬。

不过，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私刻仍是一件奢侈之事。因为其目的不在销售营利，几乎没有刻意的销售，甚至在开始时就不指望销售，刻印数量有限，除束之高阁留于勉励后代之外，持赠送人亦在少数。这等赔本的买卖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不是很多人愿意做——更不是很多人玩得起的。晚清著名经学家陈衍有一首诗《卖书示雪舟》，道尽私刻窘境：“刻书不能多送人，刻成百卷几苦辛。呼仆买纸召工匠，印刷装订商龃龉。一函卌册价半万，辄以送遗吾将贫。无端持赠人亦贱，委弃不阅堆灰尘。街坊书贾为我卖，抬价数倍良可嗔”[②]

2. 官刻

官方刻书要晚于民间刻坊。目前现在最早的官刻图书是五代后唐长兴三年经宰相冯道、李愚等建议，朝廷命田敏在国子监校正的儒家经典《九经》。肖东发认为，五代政府雕印九经是图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第一，它标志着我国书籍流通和文字传播方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印刷方式取替过去的手抄、刻石等笨拙的方式，图书形式的主流进入印刷本时期；第二，五代刻书开辟了雕印儒家经典的先河；第三，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府，从此产生了官府刻书事业，即官刻。[③]

“有一些出版史著作和论文论及官刻时，津津乐道于刻书数量多少，字大悦目，版式大方，纸墨精良，云云，好像皇帝老子真是‘稽古右文’，刻了多少多少种书，关心文化发展。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而没有去看另一面”，“朝廷刻书与读书人关系不大，严格讲是出版资源的浪费”[④]。

官刻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殿刻，要体现的更是皇家的心意，其刊刻大多供皇家收藏、馈赠之用，讲究皇家气派，所谓藏之内府，彪炳千秋。而且由于雕刻印刷的数量、纸张及装订等方面的原因一般只能采用单面印刷，所以殿刻书籍在力求周全的同时自然又大又重，价格自然也相当昂贵，不是普通百姓有机会和财力能够消费的。

所以即使清廷刻书达 3 万余卷，但普通百姓并未有太多实质性的受益。清廷编辑以及动用了很多刻工刻了很多类书，但是除了《渊鉴类函》，因为收入《古香斋袖珍十种》丛书，是小本，康熙乾隆年间内府刻后，到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孔氏翻刻，

---

① 张之洞. 劝刻书说[M]//书目答问.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77-78.

② 陈衍. 石遗室诗集[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213.

③ 肖东发. 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1-182.

④ 汪家熔.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21.

才能在民间流传，其他如赫赫有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印 64 部，其中 9 部与《四库全书》和《四库荟要》配套，其余赐予王公和几个编修“四库”时进书多的藏书家。虽颁发给几名藏书家几部《古今图书集成》，但那是恩赐，要世代供奉起来，不能动的。[①] 光绪年间虽清廷虽再次出资影印《古今图书集成》，但那是为了送给国外交流，仍和普通百姓无甚干涉。直到后来中华书局缩印《古今图书集成》，百姓才有缘见到。

众所周知的《康熙字典》，因为要“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编好后清廷经常刻印，按理说应该进入民间流通了，但《康熙字典》“版藏大内”，普通百姓要印刷如何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翻印《康熙字典》的工程浩大，过程中难免错误——而一旦翻刻有误，“篡改钦定文字”之罪名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长期无人敢随便翻刻。“直到 1875 年湖北崇文书局才开始翻刻，但怕写纸样有误，只敢按原书大小覆刻。以致每页幅面比现在 4 开本还大。这样一部《康熙字典》所要求的阅读和购买条件也就可想而知了”[②]。书籍出版的目的就是促进文化交流，传播文化知识，再好的书籍若不能进入流通环节，那就是对有限出版资源的浪费。像《康熙字典》这样宝贵的文化资源问世 200 年后仍传布极少，难以在文化传播事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即使在造纸技术、雕版印刷及活字印刷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之后，手抄本依然是复制图书的重要形式，在官刻中亦是如此。如清代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先后抄录了七个副本，分别收藏在七处官方修建的藏书阁，其中江南三阁曾经对士人开放，准许士人抄录所需要的图书。[③]

3. 坊刻

在私刻中，除家刻外还包括坊刻，与前者多是以文章学术或扬名立万为目的不同，坊刻倒是为了营利而销售生产。但由于要考量读书人的普遍需要，选书方面就偏重畅销书，一些有市场但需求量较小的书籍就不得其门而刻了。

宋代时，我国印刷业进入了黄金时代，除了四川之外，浙江和福建都成了刻书中心。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地区聚居了很多刻书世家，例如在浙江杭州，有陈氏刻坊四家之多，尤以陈起文子为最；在福建建阳，有余氏刻坊五家之多，尤以余仁仲万卷室出名。[④] 这些刻书世家家族经管，世代刻书，甚至延续数百年。与达官贵人和藏

---

① 汪家熔.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22.

② 汪家熔.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22-23.

③ 于翠玲.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39.

④ 叶树声，余政辉. 明清江南和人刻书史略[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2.

书家注重图书的收集不同，这些坊刻世家更关注的是图书的流通。所以尽管主观上他们是营利之目的，但客观上他们也打破了上层阶级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促进了知识自上而下的流动。

至明清两代，我国的雕版印书非常繁盛，远超宋元，尤以江南地区为最。① 明代万历年间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闽本最下。"明代中期之前，江南印刷书籍中教化性和政治性读物占绝对比例。中期以降，商业化已发展起来，至清代，商业化印刷业已成为江南印刷业的主流。江南出版的图书不仅在本地畅销，而且还远销外地。

总的来看，古代坊刻不仅刻印而且销售图书，刻印前的编辑工作重在选择图书、写版翻版、设计版式等，出版物的种类极为有限。当然坊刻也承揽刻印业务，许多私人编纂的文集著述也是通过坊刻进行的。

中国古代私刻、官刻和坊刻并存的出版格局，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私刻和官刻皆非追求利润，正如钱存训先生所说的"主要不是为了谋利，而是一种道德上的关怀"，因而传播范围大多有限。以"射利"为目的的坊刻成了是活跃图书流通市场的重要渠道，甚至如经济史学家指出的，"我们要强调明清江南民间印刷业的主要特点，即高度的商业化"，②但坊刻总归遭到官方管制和文人批评，而且囿于技术和市场之故，坊刻的数量也是有限，和晚清大规模的商业化出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4. 晚清的印刷商业化和印刷物商品化

和晚清的近代化印刷出版事业相比，古代的私刻、官刻和坊刻都存在明显的弊端。

就私刻而言，其目的或为崇尚学问、嗜学好古，或为缅怀先人、光宗耀祖，或为传播文化、繁荣学术，也就是说，私刻并不重在销售，因此刻印数量自然较为有限，一般书籍大约只存百把几十部甚至几部，再加上代代相传、代有损毁，流传下来的

---

① 在明代，苏常地区的私人雕版印书著名者有100多家，金陵地区书坊主要集中在三山街和太学前，有近百家，杭州地区有影响者约60家，湖州地区最大的特点是刊刻印书籍，建宁地区私人刻书达1000种之多。在清代，苏常地区私刻突出者共有100多家，共刻书达数千种，金陵地区则不如苏常，有影响者只有10多家，最突出的要数李渔的"芥子园"。湖州地区有影响者40余家，最突出的要数乔居于嘉兴的歙人鲍廷博父子的"知不足斋"。徽州地区突出者有30多家，刻书有数百种。参见叶树声，余敏辉. 明清江南和人刻书史略[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2.

② 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86.

很少，和晚清时动辄成千上万的印数根本无法相比。书籍刻印好后，除赠送一部分给家庭后代、亲朋好友、后学门生外，大部分无人问津，销售无门。

就坊刻而言，由于没有形成经济规模，缺少同业共同体的制约和相关学者把关，坊刻所刊刻的书籍普遍勘校不精，间或还有不良书商，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对已有典籍随意删节、篡改，清代有学者苛评云“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指的就是这一类。如此情形在清代也好不到哪里。为生意计，社会新知，偶有著述，要能再坊间刊刻，非通俗而流传者久，亦几不可能。一个社会的文化生产、流通、传播的状况如此确实很难说有怎样的前景了。

就官刻而言，大多数官刻是因了地方大臣的个人对于刻印书籍之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而创办，书局的运营费用要靠国库和地方财政来支持，刻经（包括佛教经书）或者刻典多依官员的心愿，地方官员的职务变动也直接影响到书局的生存，书局刊刻的“政治正确”是毋庸置疑，但知识的更新，思想、知识的系统性、由刻书展现出的文化的计划性就谈不上了。

晚清时雕版印刷术已渐被凸版、平版和凹版印刷术取而代之。以印刷出版的版料而言，则主要为铅印和石印。由铅字铜模的凸版印刷术，到石版印刷术等平版印刷以及后来发展的凹版印刷术，近代印刷出版事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时期。印刷物大规模的生产和流通，带来了知识传播与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 1895 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读书人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间出版活动发展起来。他们开始从救国存亡的角度，设立译书学会，创办新型书刊，大量翻译和编辑出版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书籍。以运用新技术大规模出版社会广泛需求的普及性文化教育书籍为主的民营出版企业逐渐取代官书局和教会书局而大踏步登上历史舞台。而中国传统典籍作为不同于西学（新学）的国学（旧学）自然受到强烈的冲击。随着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逐渐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体系，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也动摇了儒家经典的独尊地位，这促使中国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古代中国曾把图书文字神圣化和宗教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惜字会。[①] 惜字虽然是道教文昌信仰所鼓励的行为，但这个信仰在明清时代已成为围绕着科举制的儒生文化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惜字是以举子业为志业的士人的宗教行为。在明代

① 何明星.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1.

到清最初期，个别儒士以惜字作为修身、积德的一种手段，到了清中后期，惜字渐成为整个阶层的集体宗教行为。[①]

劝人惜字是因为文字有一种神圣性及神秘性，因为“创造字的是天地间的一股神秘力量，不是人所能了解的，因此凡人对字都应敬而畏之、尊敬字纸自然有宗教性的意义；惜字的理由之二是字乃社会运作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官吏治民方面，有不可或缺的实用功能”[②]。从这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古代文人的优越感来源之一——因为他们更擅于舞弄具有巨大支配力量的文字。

而到了晚清时分，在先进的媒介技术的冲击下，传统的义利观伴随着人们传播习俗一并改变了。[③] 早期维新主义思想家在倡言重商、提倡商战的同时就已经把义利的关系重新调整了。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一些人物公开在报刊上鼓动宣传，在社会上形成新的义利观念，实际上是民间百姓们的逐利实践在思想舆论界的反映。比起百姓的实践，这些思想观念已经晚了半拍。[④] 传统中国社会以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设计而存在着的对姓氏祖先、世系血缘等一系列宗法道德、伦理、以及超验的文化情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日益被货币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价值观所侵蚀、融合甚至完全取代。

就连清政府都在 1903 年颁谕说：“能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尽利，为意讲求。”[⑤]从贱商到重商，表现了新的社会心理和新的价值追求。随着风气变化，商人有些扬眉吐气了。有人自豪地说，“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二十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正尊贵得很了”，“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做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四书》里头道：孔子是集群圣的大成。我道这商业也可算集人类的大成了”[⑥]。言论中虽然流露出自高自大的神情，却也道出时代变迁的历史真实。这种心理的产生一方面是经商逐利社会风尚带来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商人地位变动的真实

---

①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93.

②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77.

③ 若是追根溯源的话，这些思想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甚至明清以前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代，那时往往民间重商趋利的风气甚为流行。到鸦片战争前后，阮元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不”字改成“以”字，宗稷辰“利在天地间”的说法，都表现了义利观的变化。

④ 孙燕京. 晚清社会风尚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80.

⑤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Z]. 北京：中华书局，1958：5013.

⑥ 经商要言[G]//张枬，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890-891.

反映。经商逐利之风在晚清时期社会心理中造成的触动由此可见一斑。

哈贝马斯(Habermas)论及欧洲印刷书籍发展时指出的,"即作为商品,它们一般都是可以理解的。它们不再继续是教会或宫廷公共领域代表功能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它们失去了其神圣性,他们曾经拥有的神圣特征变得世俗化了"①。晚清时,伴随图书文本唯一性地位的丧失,失去的还有文本的神圣性、尊崇感,图书由此失去了象征与标志的作用。表面上看仅仅是印刷技术革命带来的印刷出版业的变革,但在深层次社会结构上带来的是无法挽回的文化精神失落。

晚清时传统刻本所遭受的冲击尚且如此,抄本和传统佣书业所受冲击自不待言。一大批京剧、戏曲、鼓词等民间需求旺盛的抄本在近代印刷技术冲击下彻底消亡,预示着从汉代开始的中国佣书业历经几千年,在近代机械印刷技术的四十多年的冲击下彻底绝迹。

三、媒介技术借助资本进一步发力

1. 资本对技术的还原

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在《古典社会学及其遗产的进一步考察》中写道:"这个社会是一个日益建立在经济阶级和经济价值观之上的社会,这种阶级和价值观已不再那么注重传统的等级之分、权力的标志和个人的世袭荣誉形式了。建立在现金交易关系基础之上的阶级体系的出现消除了传统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引导了世俗化的总进程,在以城市生活、民族国家和通讯与技术的新系统起主导作用为特征的社会生活中听任新意识形态的出现。"②

近代传播工具的出生证明是由资本颁发并签字的,它出生后立即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项媒介新技术发明之初,技术垄断或技术权力居于支配地位(如印刷商),此后则是知识和信息的权力起支配作用(如出版商)。在社会意识形态渐趋稳固之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法则主导着新闻传播业的发展。

由于商界日益摆脱对官场的依附以及传媒社会需求量的增长,带动了民间以西洋石印、铅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出版印刷业的兴盛。各种专营印刷或兼营出版印刷业务的书局、印书馆大批开设,保证了报刊独立、快速、大量地印行,成为民办报刊的有力支柱。

一方面固然有时代的召唤,但更多原因显然是利润的吸引,在晚清报刊的迅猛

①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1.

② 苏国勋,刘小枫. 社会理论的开端和终结[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490.

发展中民间资本也纷纷加入。如1905年《大公报》的调查共列出中文报刊302种(含已佚150种,改刊21种),其中说明商、官、外资办的分别为189、11、95种。商办的占62.6%,而在继续出版发行的152种报刊中,分别为98、11、43种,民办者占2/3强。① 另据论者对有明确创办时间的397种报刊进行的统计,1869～1908年间,商、官、外资办的三类中文报刊分别为271、44、82家。民办的占近70%。②

由于资本对技术的还原,报刊出版不但真正成为了一种商业,而且也随之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继承了文字传统的怀有高尚理念的报刊出版,二是继承了口头传统的大众化、通俗化、商业化的出版。

资本的迅速扩张并集中于印刷出版行业显现了印刷出版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也彰显了它在一个时代举足轻重的伟力和地位。但从上述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出版和一个时代的文化所潜藏另一方面的危机,资本的过度参与超出了知识群体的文化追求所具有的掌控能力。资本的本性是噬利的。越来越大的资金需求,弱肉强食的商业竞争,动机不一的股东意见,使得文化生产中的文化坚持会越来越容易被生产文化的商业性所绞杀。当资金越大,文化的多元性就越容易受到破坏。它对于包容异质因素、新生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空间也就被压缩了。③

2. 资本与技术的缠绕

晚清时,国外近代化机械和先进的印刷术的传入,不仅直接促进了印刷技术手段的进步,同时也间接影响到了整个印刷出版业的组织形式,使晚清整个印刷出版市场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印刷技术为突破口,以丰厚的资金实力和科学知识为背景的石印技术、铅印技术之引进和大批量输入,使中国传统几千年沿用的,以一家一户一族之力就能够进行图书文本加工的雕版生产技术一夜之间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规模、专业化的现代生产车间,由此引发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一系列文化生态的巨大变化。④由于生产数量的巨大和发行流通的广泛,新式报纸杂志的影响日益扩大,逐渐取代了书籍长期以来的首要传播文本的地位。从总印刷量、发行量来看,在1899～1905年的七年时间里(不含台湾、香港、澳门等外刊),内地出版报纸种数分别为:

---

① 参见《大公报》,1905年5月11日至5月25日。

② 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2.

③ 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76.

④ 何明星.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5.

16、25、34、53、53、71、84种，总数达到354种。具体见表4-1：

表4-1　1899～1905年国内报纸品种数量

年份(年)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数量(种)	16	25	34	46	53	71	84

光绪30年左右，出版业的重心已由教会和官书局移到民营的出版业，[①]民营出版业取代教会书局和官营书局而成为主流，这是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代表进步的出版业，对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代社会传播网络在空间上是与市场网络体系相重合的，前者的拓展是以后者为依托的。近代市场网络是以中心大都会为核心的，而信息传播网络也是如此，并据此向周围辐射扩散的，同样存在一个梯级次序"[③]，这显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巧合。

传播网络和市场网络的这种重合从雷铁厓[④]的论述中可略见一斑，"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举国之人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吾侪僻属内地，孤陋寡闻，步趋其后，必不失于正轨。以故年来风潮率由上海开其端，是可见上海为举国之导师，关系全国之人心，即关系全国之存亡者也。"上海之所以有如此地位，是因为"夫上海之人，亦岂尽跻于文明？其所以造成舆论者，亦不过握言论机关之报纸耳。故上海为全国之导师，而上海报纸又为上海全埠之导师"[⑤]。

印刷技术大规模的展开，逻辑地带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文化变革。在这个"现代"展开的逻辑中，技术、资本、生产、消费、市场与知识群体对于社会理想、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夹缠在一起，既围绕着新的出版机构的运作来进行，又深刻地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⑥] 也就是说，商业过程绝

---

① 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M]//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385．

② 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4．

③ 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06．

④ 雷铁厓(1873～1920)，原名昭性，字泽皆，初号耆皆，正号铁厓，其名有"用意欲以雷霆之声唤醒国人"之意，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报业巨子、诗人，曾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

⑤ 唐文权．雷铁厓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277．

⑥ 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54-55．

非冷冰冰计算的合理性，它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在印刷出版的商业化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

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出版业内全方位推进，对中国传统的印刷出版格局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从新式传媒知识分子的出现到出版机构经营模式的确立，从资本主义的出版同业组织的成立到商业广告的开发网络的建立都打下了近代文明的深深烙印。

第二节　媒介技术发展促生新式传播时空观

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地存在于活生生的行动本身之中。[①] 在这种种行动中，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于新的时空观的产生至关重要。

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认为："媒介是使我们看到身外世界的窗口；是帮助我们领悟经历的解说员；是传递信息的站台或货车；是包括观众反馈的相互作用传播，是给予指示和方向的路标；是去伪存真的过滤器；是使我们正视自己的明镜。"[②]约书亚·梅罗维茨则认为媒介亦如管道，又如语言，还如环境。[③] 麦克卢汉不仅认为"媒介就是信息"，还把"媒介"看作是人体器官的各种延伸，"由于每一种延伸都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这种尺度最终会影响到人们的感官比率，感官比率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时空概念，形成了新的文化经验，最终必然会对历史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④]。

哈罗德·英尼斯则提出了媒介的空间倚重或时间倚重，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⑤] 传播媒介对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传播的特征，目的是评估传播在文化背景中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

---

①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92.

② 斯蒂文·小约翰. 传播理论[M]. 陈德民，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75.

③ 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 肖志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7.

④ 李庆林. 传播技术塑造文化形态——一种传播学的视野[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7).

⑤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的确，任何一种媒介都会制约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媒介的使用就是感官的外化或者说媒介的内化，每一种媒介对身体感官都具有不同的侧重，不同媒介的运用会造成感官比例上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人体新的感应轮廓，从而使人形成新的知识结构。比如，“报纸是一种文化形态，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并成为一个亚文化系统，包含一系列文化现象。报纸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是文化发展的过程，从语言、文字、纸张、活字印刷、信息采集编码、发行、反馈，这是报纸的内文化，或者说是物质文化。还有报纸的潜文化，就是由于报纸和报纸的传播而产生的文化”①。不同的报纸形成不同的读者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群体，这样一来不仅办报、连读报也成了文化现象或文化行为。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强调的是地域的博大，有度量衡和文字的统一，但是没有时间的统一。晚清时，媒介技术的引进和应用重塑了时空结构，时空伸延的水平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也都相应地延伸开来，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文化变迁。尤其是电报技术的运用能促成一种全新的“传播整合”状态，这种“传播整合”既包括传播时间与空间的整合，又包括不同认知观的整合，而种种全新的传播文化现象也随之出现。

一、媒介技术造成了媒介时间的形成

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均偏重时间。中国人向来持有“华夷之辨”的观念，即将自己作为文明的中心。隔离与优越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行为方式和态度。这一独特的结合对中国历史的文化延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空间的生态龛（ecological niche）成为商业和控制的竞争场所时，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时间。② “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提高速度”③。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媒介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使我们能够突破时间的限制，比如通过文字与先人“对话”。媒介技术对时间的重塑还表现在它通过提高信息和物质传输与处理的速度而节约了时间。

---

① 戴元光. 戴元光自选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04-205.

②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81.

③ 吴国盛. 技术时代的时间意识[J]. 方法，1997(1).

比如晚清时，由于西方先进印刷机器的引入，从人到机械技术的变迁使得印刷出版工作发生了转变。它导致对一个稳固的工作步调或节奏的强迫接受，因此印刷工人的组织安排必须围绕印刷机器的时间表来进行，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印刷工人其他非工作时间的安排。

更为明显的是电报的影响。“我们踏进了新的时间关系之时，却毫未注意到新时间关系对于思考方式与其他业务运用范围的影响”①。时间往往伴随着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在需求与技术的完美结合下，电报改写了旧的时间观念，从而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实践经验意识之中。

津沪电报线是我国自己创设并对外开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它的建成不但打破了西方列强垄断中国电报事业的意图，而且改变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信息传递观念，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正如郑观应所赞，“夫世之至神至速，倏去倏来者，盖莫如电。藉电以传信，则其捷也可知”，②“藉电以行，数十百里间劲气直达，不假书函，如晤对焉”，“虽山阻海深，顷刻可达”。③

电报在大众传播中立即得到应用，电报总局准许各日报发送新闻电报，减半收费。《申报》于 1882 年 1 月 16 日，刊出了该报驻北京访员从天津电报局拍发的电报，报道清廷查办一名渎职官员的消息。此为开中国报纸上刊登“新闻专电”的先声。中法战争时期，《字林西报》、《申报》等外商报纸，经常利用电报传递新闻，为了抢时间，就出“号外”，使读者先睹为快。④

《申报》刊登过不少咏西洋“奇巧”器具的竹枝词，表达了时人对洋货的称羡，题咏的对象包括电报线、手动风扇、望远镜、地球仪等。在这些诗文中，人们对电报“数万里重洋，朝发夕至”的神奇功能表示惊奇：“奇哉电报巧难传，万水千山一线奇，顷刻音书来海外，机关错讶有神仙”，⑤“最是称奇一线长，跨山越海度重洋。竟能咫尺天涯路，音信飞传倏忽详”⑥。

而晚清时人们对电报等西方媒介技术的认识从其时的小说中也可略见一斑，

① Tony Schwartzs. 传播媒介——第二位上帝[M]. 蒯亮，编译.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85：85.

② 郑观应. 易言三十六篇本 · 论电报[M]//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82.

③ 郑观应. 易言二十篇本 · 电报[M]//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09.

④ 吴廷俊. 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124.

⑤ 参见《申报》，1874 年 12 月 21 日。

⑥ 参见《申报》，1874 年 10 月 10 日。

比如《官场现形记》第8回中讲陶子尧和姐夫利用电子报及时互通消息，[①]第9回中讲到“王观察”奉“巡抚”之命，前往东洋考察学务，到了上海又接到电报，叫他“顺便考察农、工商诸事，添派四个委员，大小几十个学生”[②]。另一部小说《市声》第7回提到，“钱伯廉也把儿子托人荐到电报局去学打电报的法子”，[③]第31回写刘浩三与姜春航的谈话，尤为发人深省。浩三道：“外洋已经趋入电气时代，我们还在这里学蒸汽，只怕处处步人家的后尘，永远没有旗鼓相当的日子，岂不可虑？更可怜的，连汽机都不借。春翁没听说赫胥黎说的优胜劣汰么？哼，只怕我们败了，还要败下去，直到淘汰干净，然后叫做悔不可追哩。”[④]

正如吉登斯(A. Giddens)指出的，应该把对秩序的探讨变为社会体系究竟是怎样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的。秩序问题应被看成是时间——空间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问题。[⑤] 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载体，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它们，才能获得跨越时空的影响。所以就媒介技术对受众传播惯习的影响而言，绝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技术的运用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技术影响之下从生产到再生产完成的整个运作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介机构一系列社会功能的变化，当然蕴涵这一系列变化之中的就是受众传播惯习潜移默化的转变。

二、媒介技术发展对空间障碍的突破

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15世纪古登堡试验活字印刷之前，知识的传送要求群体之间的空间极其接近。从媒介与空间的关系来看，媒介通过对空间障碍的突破，加强了文化间的传播，为文化的变迁提供了可能。“通过把人们看来遥远的事物变得近一些、把人们看来是陌生的事物变得可以理解，媒介可以有助于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架设桥梁”[⑥]。

在电报发明之前，communication一词意指物质的运输和利用双足、马背以及其他交通工具进行的信息传送，所以communication这个词长期和transportation

---

① 李宝嘉. 官场现形记[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76.

② 李宝嘉. 官场现形记[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77-78.

③ 姬文. 市声[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45.

④ 姬文. 市声[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180.

⑤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2.

⑥ 韦尔伯·施拉姆.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 金燕宁，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36.

同义。然而，电报的发明终止了物质运输和信息传输之间的同一性，使信息或符号可以独立于运输工具而运动，并且远远快于运输工具。

电报一旦将传播从地理和运输工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就使“传播”和“运输”这两个词分离开来，而且同时改变了人们对传播的基本思维方式。[①] 电报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或者说物理上的空间概念，信息在全世界四处流动，地理上的空间距离已失去意义，人们的生存空间延伸了，人们的生命也相对延伸。

帕特里斯·费里奇甚至认为，电报是大革命修辞学的组成部分，产生于启蒙运动的科学工程应该取代教堂和王权的象征。但为了颂扬理性的宗教，人们没有丝毫犹豫就把科学改编成了魔术！[②] 他还进一步指出，“电报、历法或度量衡体系的历史向我们显示出，在技术与社会之间有一种相互的渗透”[③]。

民间对社会信息的了解程度，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状况关系密切。晚清时社会环境日益复杂，民众分布的总体地域空间很大，但能接触的社会信息空间却很小，人们需要的信息范围在不断扩张。然而，中国“国家版图式廓，各省距京师远或万里，近亦数千、数百里”[④]，中央政府要想及时了解和掌握各地之动态尚非易事，个人要想及时了解他乡异国发生之事更是难上加难，而电报技术无疑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打开了方便之门。

1868 年，外商旗昌洋行由虹口至法租界码头架设了陆上电报线，1870 年，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内也架设了电报线。电报仅用一根细细的铁线，便能用电码远距离传达音讯，使人们虽远隔千万里而能相互传言，这种神奇功能令人们倍感惊奇，文人墨客们更是纷纷作文赋诗赞叹不已，所以，电报也成了这一时期上海报纸上的诗文中常谈论的内容。一位署名“滇南香海词人”的文士在投给《申报》的一首《洋场咏物词》中，对于电报经纬纵横、穿河贯汉的奇特构造，惯传消讯、捷于影响的神奇功能，惊叹为“匪夷所思”和“具大神通”[⑤]。从当时常见的一些咏物诗文中常对电报用“神仙”、“神通”、“天机”、“称奇”、“离奇”、“匪夷所思”、“巧夺天工”这类的词

---

① 丁未. 电报的故事——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札记[J]. 新闻记者，2006(3).

② 帕特里斯·费里奇. 现代信息交流史：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M]. 刘大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

③ 帕特里斯·费里奇. 现代信息交流史：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M]. 刘大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5.

④ 郑观应. 易言二十篇本·电报[M]//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09.

⑤ 参见《申报》，1872 年 9 月 4 日。

语，可以窥见人们对于电报的惊奇赞叹。此后几年间，电报很快推广。1882 年上海与南京间电报开通，次年又架设了至浙、闽、粤各线。此后，南北数万里瞬息可通，上海更是成为了信息汇聚中心。这时期上海街头出现了“电竿林立矗云天，铁线分张真似弦”①之空前盛况。

因为电报技术的新闻报道中的运用，报章信息覆盖地域大为增加，人们的视野也随之扩大。据有关学者统计，1872 年 4 月 31 日至 12 月 31 日，《申报》所发的 892 条消息的信息源空间分布是这样的：上海本埠消息 374 条，占总数的 41.9%；国内其他地区消息 266 条，占总数的 29.9%；国外消息 252 条，占总数 28.2%。国外消息则来自亚、欧、非、澳洲的 22 个国家地区。② 数据至少可以反映两个事实，其一是当时的报人已经把视野主动地从“本埠”扩大到“外埠”，甚至扩大到“世界”；其二是能够看到报纸或能够从报纸上获取消息的人也“被动”地把视野扩大到各地以及世界。人们除了关心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事物，还要关心其他地区的事物，甚至关心世界的事物，于是民族、国家等概念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③

正如凯瑞指出的，“传播媒介的影响都来自于一个简单的技术事实：每一种现代媒介都提高了控制空间的能力。它们通过缩减人与地点之间发送信号的时间（即讯息发送与接收之间的时间差）来实现这一点”④。文化的变迁与不同文化之间持续和密切的接触的程度相关，而这种持续和密切的联系有赖于传播媒介的发明和应用。传播媒介突破了不同民族或国家在地理上的障碍，制造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使得文化的交流和变迁成为可能。随着电报的发展，人们已从最初惊为神奇的旁观者，变为享受其便利的使用者，这种来自西洋的“奇器”就这样逐步融入了国人的日常生活。

不过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西洋奇制层见叠出，人们已不再像先前那样因不明其理而事事惊诧，疑为神工，而是逐渐习闻习见，对西洋的制作之奇巧抱以欣然认可、乐于接受的态度。”⑤1881 年 12 月 5 日，《申报》还刊登了《沪上拟用德律风》一文，介绍上海创办德律风一事，内云：“西报载有外国电线行告白，言上海地方将

---

① 海昌太憨生. 淞滨竹枝词[M]//顾炳权. 上海洋场竹枝词.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428.

② 乐正.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76-177.

③ 孙燕京. 晚清社会风尚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2.

④ 詹姆斯·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05.

⑤ 李长莉. 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86.

通行德律风，工部局已曾核准矣。德律风者所以传递言语，为电线之变相，亦以铁线为之，持其一端，端上有口，就口中照常说话，其音即由此达彼，听者亦持其一端而听之，与面谈无异。不但语言清楚，而且口吻毕肖。"[①]对于这种以电线连接即可远距离通话的奇器，从该篇报道的口气中，已看不到惊诧的意味，而只是客观的描述，随后还以十分轻松的语气推介道："此法一行，无论华人西人皆可置备，相隔数里或为风雨所阻，亦不难遥遥共话，是又一快事也已！"1883 年春，徐家汇天主堂设立电话通达租界各洋行，预报风雨消息。虽然这时使用电话的还多是西人，但中国人知其事者也不再惊诧，而是视以为常了。[②]

再看孙宝瑄与古人气象迥异的谈诗：他家中安装了电话，不必辛苦出门，即可将得意之作念与知音听。谈到得意处，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他也从这种新的谈诗方式中得到了极大乐趣，因成《与二我电机谭诗》一首："自云人我袖，山鸟集其掌。妙语空中闻，精神自来往。"[③]电话谈诗本身也作为新事物，成了文明进化的标志。

第三节　媒介技术发展型塑新型传媒文化观

齐美尔(Georg Simmel)曾提出过一个问题：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人们的回答当然见仁见智。施拉姆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答，"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决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

晚清时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均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影响不仅触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还深入到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核心层面。媒介技术与社会之间呈现出动态互动。就媒介技术对社会传播惯习的影响而言，绝不止是一种生产技术的简单运用——不只是印刷技术为印刷物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是深入到技术运用背后的一整套思想观念、从生产到再生产完成的整个运作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功能组织的变化。

虽然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有着被明确限定了的边界，但是所有这些社会都被

---

① 参见《申报》，1881 年 12 月 5 日。

②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86-87.

③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19.

一些纽带和联系交织在一起，这些纽带和联系贯穿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体系和“民族”的文化秩序之中。[①] 无疑，媒介技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根纽带。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Wiener)曾说过，“社会通讯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②]。詹姆斯·W·凯瑞也不无感慨地指出，“利用印刷机和土木工程的威力，把广袤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凝聚成一个文化整体，或者说的不好听一点儿，凝聚成一种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③]。凯瑞还认为，“帝国”和“帝国主义”两个词出现于1870年并非偶然，因为当时刚刚架设了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④]

那么，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于民族观或国家观到底意味着什么，媒介技术的发展又是如何与当时社会群体的思想行为相互呼应的，最终又是如何型塑出新型的传媒文化观念的？

一、印刷成为“民族主义的建筑师”

正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的，“倘若给印刷术的影响以更多的注意，史学史与其他历史联系的问题就可能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⑤]。火药和指南针所带来的改变因涉及的领域比较局限，因而也较为简单，处在常人想象所及的范围之内。而印刷术带来的却是人类信息存储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逐渐扩展到几乎所有民众的知识获得与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中。这一过程以及所涉及的人类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都似乎漫漫无际。[⑥] 印刷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最强大的杠杆。

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在人类传播和交流史上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利用这种技术，人们可以把同一本书复制成许多册而不需经过耗费人力的手抄过程。一些有影响的书籍逐渐成为许多在一定教育水平以上的人们所共有的知识装备。尤其重要的是，印刷术还使新思想、新信息的传递变得更加易于扩散，也更加

---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2.

② 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M].陈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7.

③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引言.

④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69.

⑤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

⑥ 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

难以控制。[①] 印刷术使文字的机械复制和大规模、远距离传播成为现实，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本国语言的发展，而本国语言的发展又直接导致了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

所以，麦克卢汉曾十分形象地将印刷称为"民族主义的建筑师"，"印刷术的爆炸延伸了人的头脑和声音，在世界规模上更新构造了人的对话，这就构成了连接各个世纪的桥梁……它的作用就是结束狭隘的地域观念和部落观念，在心灵上和社会上、空间上和时间上结束地方观念和部落观念"[②]，"借助口语和语言集团而实现的政治统一，在印刷术将地方口语变成为地域宽广的大众媒介之前，是难以想象的"，"民族主义的到来有赖于印刷术问世之前未曾有过的信息运动速度"。[③]

的确，近代民族主义[④]形成的原因远不止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民族概念中所谓的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得中央政府干涉地方事务成为可能。

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人们交流范围的扩大和交流频率的增加带来社会流动的加快，使得传统社会结构不断被摧毁。人们逐渐摆脱了原先狭隘的空间概念，大大拓展了交往范围。一定区域内的人们同质成分与日俱增，社会成员的团结感和连带感明显增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其形成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印刷新技术和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宿命之间的互动，"促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⑤]

其中作为商品的印刷成为促进民族意识产生的关键，安德森称之为"印刷—资

---

① 支庭荣. 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12.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7.

③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25.

④ 近代民族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起源。在西欧的封建时代，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效忠的感情是地方性的，又因为基督教在信仰和文化领域的一统局面使得人们的忠诚情感同时又具有普世主义。参见李宏图. 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25.

⑤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2.

本主义”(print-capitalism),“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fixity),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之后,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①。它们在拉丁语之下和地方口语之上创造了一种统一的交换和传播领域,进而形成世俗的、特定的却又不甚明显的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也就是说,印刷和资本主义的结合——“印刷—资本主义”是民族意识起源时最关键的因素。

“印刷—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语言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官方地方语言的强力语言,它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重新塑造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印刷术发现了生动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书籍的市场也是由这样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对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这样的情况。② 通过印刷语言,读者们“确实逐渐能在心中大体想象出数以千计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③。在这种特殊的“可见之不可见”当中,读者们通过印刷语言联系在一起,形成世俗的、特定的、不易察觉的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

同时,这种新的固定的印刷语言形式在长期的发展中,有助于形成关于该共同体古代的形象,该形象成为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基础,“印刷—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语言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官方地方语言的强力语言,它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④ 把传播视为社会凝聚力的信念是一种进步的信仰。传播技术是提升政治、文化质量的关键所在。⑤ 意识的结构与传播结构相类似。印刷机创造了新的文化联结形式,对此最好的表达是:它以一种横向的维度(horizontal dimension)进入现代国家、进入国际关系,并带来了社会阶层之意义与关系的改变。⑥

欧洲诸强在 19 世纪用枪炮重绘了世界地图,迫使中国和别的许多国家成为一种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不过,印刷语言与枪炮在地图上各自管辖着不同的

---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3-44.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28-429.

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4.

④ 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0-101.

⑤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12.

⑥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6.

领土。印刷语言的这种管辖能力在晚清得到生动的演绎。

晚清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报刊几乎离不开爱国的主题。广泛的民族利益使得稍有民族自尊感的人都卷入了爱国的浪潮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国民意识,很大程度上是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近代的"国民"不仅有西方近代公民(citizen)的含义,更有民族国家成员(a national)的含义。① 深感国难深重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更加注重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刻而全面的省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要求,开启民智成为救亡图存的话语之一,而任何有助于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的手段莫不受到广泛的关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如何应对"国家再造"②(State—building)这一时代主题的大问题。③

时值国家为难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已经看到了印刷出版事业与民族兴亡的关联。1896 年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说,"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千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④。"我国有报纸最早,而发展最迟。其故有关于教育、实业、交通、与社会之未进步者,而报界人材之缺乏,亦必居其一"⑤。

然而晚清民众的素质,显然与报人理想的国民有极大的差距,因此,与严复、梁启超等思想家一样,报人尖锐地批评长期的专制制度造成了民众的依赖、顺从和奴性等不良品质,使他们只关心自身利益,毫无国家、社会等公共意识。与严复等人有所不同的是,职业报人的身份,使他们能够将思想家的思想转换成可以让民众接受的社会话语,并进一步思索如何提高国民素质的问题。⑥

革命报刊大量出版后,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以前,革命宣传小册子激发了读者们狭隘的民族感情,使不少人"伏案恸哭","废书三叹息,至泣下数行",增加了对

① 陈永森. 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7-78.

② 有关"国家再造"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M]. 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③ 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119.

④ 梁启超.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M]//张静庐辑注.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161.

⑤ 戈公振. 新闻学撮要[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2.

⑥ 王敏. "中间地带":晚清上海报人与立宪运动——读季家珍《印刷与政治》[J]. 学术月刊,2003(11).

清朝统治者的愤恨，反满革命的意志也因而更加坚决。[①] 随着公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市面上越来越多的各类出版物，公众的眼界变得更高了。传播系统的发展达到了办报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程度。[②] 以出版救国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意识。出版人的这种爱国主义"不是空洞的呐喊，除了尺寸之功的积累，他们希望通过缓慢的文化变革如以广印书籍开启民智的实绩外，本着社会良知去分析批评进而采取行动去唤醒民众、制造舆论以达社会进步"[③]。

每种新的媒介技术都会改善"感官的关系"，比如不同的时间延续、影响范围、频率速度，从而结构出人体新的适应性。比如听觉有利于发展人类的情绪和直觉经验，而印刷术的发明则扩大了视觉在知识应用方面的可能性，从而与拼音文字区别开来，晚清新式书籍报刊的出现进一步加重了受众的视觉偏向，改变了受众的心理和思维方式，进而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社会组织。而且，媒介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受众的数量——尽管受众是界限不明、在广泛范围下散在的众多个人的集合，但毋庸置疑他们又是势力很大的群体，他们的阅读特性影响了传播的方式和意义。大量的书籍报刊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也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从而造成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

二、白话报刊开辟新式印刷文化格局

文字的出现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的不仅是正面的积极作用。由于文字本身的特点，也在传播活动中形成了一些以前没有发生过的问题。因为当信息可以被记录下来以后，人们就可以对信息和知识采取行动，从而导致知识（知道什么）和知者（谁知道）的分离，那些能读能写的人可以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④] "在传统社会，文字被视作知识和权力的象征，是令人敬畏的文字符号，在中国自古就有'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能够'写'和'读'的知识分子拥有掌控传播媒介和转述文字内容的特权，是造成社会等级的重要因素"[⑤]。文字自它产生后形成规范体系起至今天一直不是全社会每个成员都通晓的传播方式，而是掌握在社会一部分人手中。那些掌握了文字的统治者和其他社会上层人物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有意识为文字的

---

①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72.

②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九版)[M]. 展江，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40.

③ 郭汾阳，丁东. 书局旧踪·两篇檄文遗精神[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25.

④ 李特约翰. 人类传播理论[M]. 史安斌，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55.

⑤ 崔欣，孙瑞祥. 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56.

普及设置了一些障碍，使文字在出现以后相当长的时期中被人为地控制在少数人手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典型地说明了在中国古代掌握文字的重要性。

当阅读印刷品成为非面对面时的主要传播方式后，人们必须经由阅读来认识世界，而阅读必须识字，知识水准须有教育程度配合，但是对文字的掌握并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能力，没有识字能力的受众就被排除在使用媒介工具之外。也就是说：印刷术的使用带来了不平均的知识水准，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造成了分化乃至两极对立的局面。

不过这种情况在晚清日益得到改变。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但降低了受众使用媒介工具的技术门槛，也降低了受众使用媒介工具的经济门槛，从而满足了越来越多的受众的需求。由于先进的印刷材料和印刷设备的采用，印刷复制技术从手工生产发展为机械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书籍报刊的印刷速度，增加了印刷数量，也降低了印刷成本，使得书籍报刊由少数上层人士的专有品变为广大民众都可以看到的读物，各种信息得以大规模交流，各类新思想、新学说广泛传播，社会发展自然也被大大推动。

晚清时报刊文本无疑是建立在空间结构之上的便于横向知识传播的媒介，而按照哈罗德·英尼斯的理论，传统中国文化注重的是流传“时间”之长而不在于传播“空间”之广。晚清时抛弃传统的纵向历史观念，和书籍与报刊文本传播力量的此消彼长有直接的关系。而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不同媒介背后隐藏的是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西方媒介技术带来的便捷日益激发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他们愈加认识到，民智、民德、民力不开，积贫积弱之中国不可能走向富强之路，“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①。而文言文繁难，言文分离，这是造成中国人民智无从启发的原因。要开通民智，必须使人人通晓文字，言、文不一致的现象便成为最大障碍。为此，戊戌变法前夕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响起了推广白话文、废除文言文的呼声。

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从言文须一致、语言随地而异、随时而变的角度，探讨了普及白话文的可能性。② 1890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多，其势然也”，并希望达到“令天下之农工商

① 严复.原强修订稿[M]//王栻.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5.

② 焦润明，苏晓轩.晚清生活掠影[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1.

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程度。[①] 黄遵宪不仅认为明治维新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提供了成功样板，而且参照日本国语改良的经验，提出语、文合一的主张。

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人物则接过这面大旗，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字和语言的改良。1896 年，梁启超作《沈氏音书序》，并节引黄遵宪的论点，对语言之多变与文字之不变造成“中国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并明确提出了“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之主张。[②]

1897 年 11 月 7 日，《演义白话报》在上海诞生，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份白话报纸。同年，《无锡白话报》(后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创办人裘廷梁尚未开办白话报时，他就曾对汪康年提出建议。他说：“诸君子创开报馆，曾未及岁，每期销至万四千册，可谓多矣，然犹不逮中国民数万分之一”，“以无锡言之，能阅《时务报》者，士约二百分之九，商约四五千之一，农工绝焉”，他估计“商之子弟尽人而读之，工之子弟读者十七八，农之子弟读书者十五六，少者一二年，多或三四年、五六年、七八年、年十三日而后改就他业”。这些略通文字的人，如果“增设浅报”，则可以让他们也通中西知识，“俾天下之为商、为工、为农及书塾中年幼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皆略通中外古今及西学之足以利天下，为大开风气之助”。[③]

1898 年，裘廷梁的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④]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发表，并成为这一运动的指导纲领。该文对比白话与文言的利弊，指出：文言令“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最重要的是，“文言之为害”，致使中国不得为“智国”，人民不得为“智民”。因此，“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文言兴而后实学废”。文中详细列举了白话的八大益处，“一曰省目力，二曰除娇气，三曰免枉渎，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小，八曰便贫民”[⑤]，并考证中国古代成周时及泰西、日本“用白话之效”，得出“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白话行而后实学兴”的结论，旗帜鲜明地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

此后，标明为“白话”(包括“俗话”及各地方言)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竞相面世。[⑥] 甚至连一些偏远或较小的地区，如广西、浙江南浔镇等也出现了白话报。影

---

① 黄遵宪. 日本国志[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811.

② 梁启超. 沈氏音书序[N]. 时务报(第 4 册)，1896.

③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25-2626.

④ 参见《中国官音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第 19、20 期，1898 年 8 月。

⑤ 张枬，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G].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40-42.

⑥ 夏晓虹. 晚清社会与文化[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15.

响所及，用少数民族文字刊行的白话报刊也应运而生，如《西藏白话报》用汉、藏两种文字发行。这些白话报刊互通声气，相互转载文章，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1900年以后白话报刊更是遽增。据统计，1900～1911年，共出版了111种白话报。[①] 事实上，这份统计资料还不完全，在一些报纸的记载中可以另外辑出20份在这个时期内出版的白话报。亦有论者认为：1897～1911年出版的完全采用白话的报刊，至少有130余种。[②]

1906年，四川先进青年办了叫做《鹃声》的白话报，他们说："我们做这个白话报，因为看见他们的杭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湖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各人叫各人地方上的弟兄们，都要晓得中国现在的时势，是十分不好了，要大家赶快想法子，做个长久之计"，"望我们四川人，听了鹃声二字，就想起了亡国的惨历史，触目惊心，自然动了些感情，把这个报买一份来看看。究竟鹃声是说些什么？倘若是说得合理，就望看报的人，把四川的风俗习惯改良起来，四川当做的各种事业，大家出点钱出点力，把他整顿起来，无知愚人打教堂、打学堂，大家应该去阻止他们，把他们开通转来"[③]。

《大公报》的创办人有感于"中国文字太深，汲汲谋编辑白话书报以开通下流社会"[④]。因此，大力提倡多设立白话报馆，"俾粗识字者皆得从此而知政要，庶不致再如睡梦矣"[⑤]。《大公报》率先垂范，开创了在日报中附设白话一门的先例，"中国华文之报，附以官话一门者，实自大公报创其例。"同时还定期出版白话附张，以《敝帚千金》之名，免费随报附送，也单张出售。不久，白话附张又以同样的名字结集出版。这些白话文章"以其说理平浅，最易开下等人之知识，故各报从而效之者日众"[⑥]。《敝帚千金》由于文字浅显易懂，颇受百姓欢迎，因此销路甚好，到1906年已出版10册，到1908年为止，"《敝帚千金》亦积至三十册，除附报奉送外另行装订

① 蔡乐苏. 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M]//丁守和.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93-546.

② 蔡乐苏. 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部白话报刊[M]//.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史和，姚福申，叶翠娣. 中国近代报刊名录[Z].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③ 张枬，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563.

④ 参见《大公报》，1904年10月30日。

⑤ 参见《大公报》，1902年7月21日。

⑥ 参见《大公报》，1905年8月20日。

销售者亦至数万册之多"①。一时间,不同文学流派、政治集团的人纷纷采用白话撰述,使得晚清白话文运动出现了语言形式同一而思想倾向迥异的复杂局面。革命派用白话文传播反帝反清的火种,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大有助益。②

由于阅报成为一种新时尚,因此各地出现许多阅报社,读报、听报成为市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说,阅报社既是这样一种新型舆论传播渠道,又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阅报社于 1902 年就在天津出现了。起初是设立在创办人的家中,影响比较小。1904 年,由《大公报》等发起成立的阅报会,推动了它的发展。③

阅报处的大量设置是 1905 年、1906 年的事。讲报处也从这个时期陆续出现。阅报公会甚至定期给妇孺念报,往听者也不乏其人,每日听阅者击毂摩肩。有的社会贤达干脆出资买报并把报纸张贴在闹市供人阅看。有的宣讲处还用上了现代化的媒介技术,比如添演幻灯,自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常常吸引上千名的听众"④。尽管现在已难以找到材料说明当时百姓聆听了各种消息后究竟产生了什么感想,但是可以明确一点——他们的视野在不断开阔。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⑤。将民族历史、现实局势、各国兴衰之由等演绎成白话以教育特定或一般对象的作法,这些"开民智"工作无疑对这种想象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1907 年,西藏甚至也诞生了第一份藏语报刊——《西藏白话报》。无疑,在腹地兴起的"白话报"高潮,对催生《西藏白话报》产生了直接影响。"对联豫当时称之为'唐古忒'的藏文而言,'白话报'之称更具文化启蒙上的象征意义"⑥。再以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⑦为例,由于其反映的都是来自群众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说了群众想说的话,从而使群众与同志会之间拉近了距离,并产生息息相通、患难与共的情感。报纸不仅是人们交流的园地,也是表达自己意志、愿

---

① 参见《大公报》,1908 年 2 月 10 日。

② 夏晓虹. 晚清社会与文化[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17.

③ 侯杰,秦方.《大公报》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变迁[J]. 广东社会科学,2003(3).

④ 参见《大公报》,1905 年 7 月 26 日。

⑤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⑥ 周德仓. 历史语境中的中国藏语报刊[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2).

⑦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机关报,是保路运动的产物,创刊于 1911 年 6 月 26 日,每日出两张四版,单面印刷。

望的场所，在保路斗争中人们便特别重视、关心和需要报纸。因此，《报告》被广泛订阅、购置、传抄、散发。第1号“印出三千纸，仅两小时即便售罄”，不到半个月内，“发出印刷物已十六万有余件”①。为了尽量满足群众对报纸的需要，《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日出万张，尚不敷分布远甚”，只好“与印刷公司再三筹商，苦心设法，每日多出五千张”②。“印刷公司屡告用纸将罄，坚请少出”，但“又难减少”，只好“隔日一出，即从二十七日(7月22日)起，逢单日停版，双日照常发行”③。了解了上述《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受欢迎的情况，对保路运动的爆发也就不难理解，而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由此可见“开民智”工作的巨大功效。

《孽海花》第2回中的描写也可以使我们对“开民智”的效果窥斑见豹：“木生道：‘据兄弟看来，现在的天下虽然太平，还靠不住。外国势力日大一日，机器日多一日，轮船铁路、电线枪炮，我国一样都没有办，哪里能够对付他！’”④

至于那些和立宪有关的各种宣传，虽然和下层社会很难有什么关涉(毕竟他们连最起码的选举权都没有)，但透过频密的文字传布，在交通便利、讯息容易到达的地区，还是可能在人民生活中激起一些涟漪。⑤ 正如《申报》所指出的：“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⑥白话报刊以及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印刷品的出现，各种类型印刷机构峥嵘初露，铸造社会文化，连结不同阶层，开辟出一种全新的印刷文化。

当然，虽然以白话为开通民智的工具，既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也存在着根本的隐患。启蒙者的角色认定，使晚清白话文的作者自居于先知先觉的地位。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造成运动的不乏广度，却缺少深度。⑦ 这一缺点我们同样不该忽视。

白话报的出现及其说国民的话、为国民说话的文化趣味，虽说只是晚清社会变化中的一个微小细节，但它折射的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的非常趣味，并昭示着永

---

① 王绿萍. 四川近代新闻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277.

②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报告”栏)[M]//王绿萍. 四川近代新闻史.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281.

③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1号)[M]//王绿萍. 四川近代新闻史.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281.

④ 曾朴. 孽海花[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8.

⑤ 李孝悌.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46-47.

⑥ 参见《申报》，1872年4月30日。

⑦ 夏晓虹. 晚清社会与文化[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19.

恒的媒介文化使命。[①] 话语范式的这种转变，从表层看仅仅是人们的表达方式发生变化。但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的：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形式，又是一种特殊的权力争夺的对象。所以从深层次上看，从文言到白话的这种范式转换实际上影响了国人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的变迁，决定了国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转变。

三、晚清新出版与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中国历史上儒学思想在统治权力的支撑下，通过各种制度设计而成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因之亦成为一种制度化存在。干春松认为，这种制度化儒家表现为"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两个层面，所谓"儒家的制度化"是通过孔子的圣人化、儒家文献的经学化和科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儒家的独尊地位及其与权力之间的联系，而"制度的儒家化"则是儒家观念在社会控制体系和制度设计中的渗透和呈现，具体地说就是体现着儒家观念的国家意识形态、宗族制度、政治社会结构等现实的制度的建立。[②]

然而晚清以来，制度化儒家面对外来的冲击和日益激化的内在矛盾，逐渐失去其作为合法性依据的地位而走向解体。当然，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包含相当复杂的历史内容，其解体自然也涉及诸多因素。作为这诸多因素之一，晚清出版的发展对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1. 晚清出版的新发展

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出版发展史，人类一直在为寻求更及时、更有效和更生动的信息传播方式而孜孜努力。晚清时，由于电力和蒸汽动力的使用，出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印刷技术从手工发展到机械化生产，极大提高了印刷质量和印刷速度，既增加了印刷数量，又降低了印刷成本，并使其内容扩大到各个领域，这样一来书籍报刊就由少数上层人士的专有品变为广大民众都可以看到的读物，信息得以大规模交流，各类新思想、新学说广泛传播，带来知识内容的多元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晚清出版的这些突破性进展虽然称不上制度化儒家解体的根本原因，但至少对制度化儒家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建构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其解体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

2. 晚清出版对"儒家的制度化"的冲击

文字和书籍自产生起就具备记录、保存和传播文化的功能，这种功能和作用随

---

① 单波.救国的味道：中国早期白话报的文脉[J].新东方，2003(Z1).

②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着制作材料和印刷复制技术的改进以及社会成员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日益扩大。

古代中国曾把图书文字神圣化和宗教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惜字会。惜字虽然是道教文昌信仰所鼓励的行为，但这个信仰在明清时代已成为围绕着科举制的儒生文化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惜字是以举子业为志业的士人的宗教行为。在明代到清最初期，个别儒士以惜字作为修身、积德的一种手段，到了清中后期，惜字渐成为整个阶层的集体宗教行为。[①] 但在晚清，这种情况发生了180°的转变。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读书人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而且由于印刷技术发展的保证，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间出版力量日益壮大起来。他们开始从救国存亡的角度，设立译书学会，创办新型书刊，大量翻译和编辑出版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书籍。以运用新技术大规模出版社会广泛需求的普及性文化教育书籍为主的民营出版企业逐渐取代官书局和教会书局而大踏步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出版业内全方位推进，使中国原有的出版业进行了几乎脱胎换骨的改造。

虽然晚清出版的报纸也刊载科举的时文，但这并不表明办刊人具有传播儒学的信念，完全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内容能吸引那些谋取功名的人。“晚清之报纸适应读者需要，对于科考颇为重视，常刊载时文典范供士子揣摩”[②]。所以士子们哪怕身居穷乡僻壤，亦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在一些特别关头，人们对报纸所传达的信息的关注更是会有超常的表现。显然，报纸已经成为人们十分重视甚至特别依赖的信息渠道。有学者考证，连光绪皇帝也订阅了《万国公报》和八九十种书籍。[③]

由于新式印刷机给予的速度和质量的保证，越来越多的出版物需要优质的稿源，职业或半职业的写作者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尤其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后，大批失去科举之路的文人不得不改变生存方式，主动向报馆书局投稿，靠稿费养家糊口，“著书不为稻粱谋”的传统观念被彻底颠覆。

另外，大机器印刷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吸引了一批专门从事印刷出版和新闻报道的专业人员，丰富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职业结构，壮大了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仅各种报章杂志编辑，估计当在千人以上”[④]。这样很多文人就从传统的做官、入幕、教书、做生意的谋生之路中解脱出来，逐渐摆脱了传统文人对皇权的向心运动。

---

①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93.
② 罗志田. 权势转移[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173.
③ 孙燕京. 晚清社会风尚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3.
④ 行龙. 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95.

新式报刊书籍受到热捧的同时，传统儒家典籍作为不同于新学的旧学自然受到强烈冲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逐渐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体系，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也颠覆了儒家经典的独尊地位，这促使中国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儒家经典的唯一性被取代，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等方面传统图书不得不让位于可以批量生产、快速传播的报刊，图书作为首要传播文本的地位受到挑战。诞生不久的新式报刊的影响，迅速超过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家典籍。

最能证明儒家经典地位动摇的是，一大批京剧、戏曲、鼓词等民间需求旺盛的抄本在近代出版的冲击下日益衰亡。1900 年之前，戏曲抄本是清代南北传统市集庙会上销售的一个大宗品种，在北京历史悠久抄本世家有张姓百本堂、李姓聚春堂、老聚春堂和宝姓别野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百本堂，其主人姓张，自称“百本张”。据郑士德先生的研究，百本张从乾隆时期起，世传四代，在出售的抄本封面上，有墨印长方形图章，“别还价，百本张”，有的盖有朱印木记，“诸公子莫怪，由乾隆年起至今，少钱不买”，抄本经营可谓盛极一时。① 但进入 20 世纪后，由于石印、铅印戏本的冲击，经营四代的“百本张”很快歇业。“百本张”等一大批手工抄书业态的消失，预示着中国传统雕版生产技术在新型印刷出版面前的迅速萎退，建立在手工业图书加工方式上的传统印刷出版文化生态发生了一系列雪崩式的坍塌。

3. 晚清出版对“制度化的儒家”的冲击

传统的儒家传播模式与一切统制性的知识传播模式一样，它所要传达的是一种已经证明或者说是无须证明的真理系统，接受者不能对之做出否定性的评论。② 由于权力和地位的压制，这种状态下的传播是一种垂直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从单一或少数的信源来源传递给许多人，比如政府可以通过一般性信息将公共议题信息传递给普通百姓。在这种垂直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下，由于狭窄的传者准入渠道和把关导致的地位差异，传播过程中其实并没有“沟通”而只有“训话”，有效性是由权力中心单方面决定的。普通百姓无法持续参与议题的界定和议程的设定，自然就造成了信息控制的可能。人们对这种传播方式的长期认同也是建基于儒家文化传统之上。不过，由于晚清出版发展对制度化儒家的冲击，这种情况呈现出异态。

晚清是中国古代书籍由狭窄的士大夫消费走向大众消费的飞速转变期。报刊的机器化生产使得复制方便、发行迅速，印刷成本不断降低，再加上书局报馆的增

---

① 郑士德. 中国图书发行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518.

② 干春松. 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92.

加，报刊定价自然水落船低，例如，晚清发行时间最长的《申报》最初一份只卖 8 文钱，在当时相当于 3 两米价，这样的价格对于平民而言也是能够负担得起的。这就使普通民众也成了读者，成了信息和文化知识的分享者。1895 年之后印刷出版业更是走向高潮，这种高潮可以从洋纸输入情况得到侧面证明，“洋纸的输入在 1902 年为 260 余万两，到 1911 年，为 560 余万两，增长 1 倍以上”①。这些洋纸绝大部分都被用于印刷出版，当时印刷出版的发达可见一斑。

随着印刷品数量的激增，晚清知识的传播渠道也大为拓宽。进入 20 世纪后，传媒受众由以官吏为主转向以社会公众为主的现象更为明显。据 1903～1905 年南京、武汉、衢州等 11 座城镇的调查统计，共订购报刊 62 种，20 227 份，除《南洋官报》由江宁各级官府分摊派订，数额高达 9 000 份外，其余 11 000 余份多为私人订阅。② 也就是说，晚清报刊不仅直接催生了第一批职业作家，也催生了大众化读者群体。

“文化的特征，主要决定于在该文化中，偏重使用某种或某些媒介的人的比例”③。这一观点可以借助近代报刊出版得到验证：多种印刷媒介并存的传播格局、特别是使用报刊媒介的人口比例的增加，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制度的根本变革，也对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知识视野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时代政治的感应器，近代印刷出版成长为一种新的实业。近代中国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政治斗争日益复杂，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人士，都以出版活动来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政治立言”，为改造社会制造舆论。在近代中国，几乎所有政治事件都可以从出版活动中找到踪迹，而能否顺应社会变革往往成为出版业进步与否的政治标尺。④

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书籍出版数量大为增加，并且可以将作品当作商品通过复制、销售等手段来获取经济利益，各种复制本动摇了图书业内部原有的利益、结构均衡，对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那些新印刷出版的书籍“以社会大众读者为接受对象，创造公共的话语空间，打破了国家意识形态借助权力和利益配置方式对知识的绝对垄断”，⑤各种新观念通过它们畅行无阻，顺利到达社会各个阶层。

---

① 李泽彰.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M]//张静庐辑注.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9：386.

② 桑兵. 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J]. 近代史研究，1991(6).

③ 戴元光，等. 传播学原理与应用[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242.

④ 王建辉. 出版与近代文明[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7.

⑤ 王本朝.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转型的制度阐释[J]. 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6(6).

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些书籍的分类和整理，引起知识分类的革命和学术传统的变化，对传统儒家构成了强大的解构力量。

晚清时借助媒介新技术催生的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和杂志，不仅有了普适性的传播方式，而且“以读者需要为存在之本的特性使得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具有排他性和权威性的经典传播系统大异其趣”①。为了吸引读者，很多报刊文章都以反正统的面目出现，猛烈洗涮着人们脑中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儒家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吸附于经典之上的知识的神秘性和高尚感被纷纷“祛魅”，制度化儒家绵延已久、牢不可破的地位被不断撼动。报刊灌输给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评价体系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而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迁奠定基础。

“自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直到宣统三年都充满了革新运动的空气”②，维新思想在整个中国形成一股巨流，给许多人以醍醐灌顶之感，即使小县城和农村也深受影响。曾住在荣县农村的吴玉章在回忆中就提及：“那时四川还很闭塞，新书还未流行，因此我还没有接触到什么‘新学’。不过，我对当时国家危亡的大势是了解的，我正在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如焚。……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③，“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④。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晚清日益发达的印刷出版业引导人们从传统思想的羽翼下不断挣脱出来，增强了人们思维的创造力与丰富性，引发了清末民初异彩纷呈的各种思潮，为五四思想大解放打下了基石。

本章小结

传媒制度整体秩序的产生和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传播习俗。社会传播习俗越是具有影响和地位，越是能够自生自发地扩展长，那么相应的传媒制度的其他层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就越是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尽管正式约束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而在一夕之间发生变化，但嵌入在习

---

①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91-192.

② 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M]//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385.

③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4-5.

④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7.

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中的非正式约束可能是刻意的政策所难以改变的。这些文化约束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结起来，而且是我们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关键之所在。[①] 这些文化约束不是成文的立法，基本上属于未阐明的规则，没有成文化、条款化，也没有一种固定的、物质化的存在形式，而存在于某一社会每个具体的个人的心智和行为模式中，存在于社会成员的言谈举止中。[②] 但这些文化约束总是有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并调整其社会关系之功能——这是存在于社会集体层次之上的"集体无意识"，它会对个体行动者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

如果揭开历史的面纱，将晚清媒介技术对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一一加以指点，那么媒介技术发展的文化意义就得到了抽丝剥茧式的生动展示。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是科技进步而且是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如果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部生产工具发展史的话，那么，一部人类社会的新闻传播发展史，从根本上看就是一部传播媒介发展史，媒介技术的进步，不仅提高了传播水平，而且更新了传播意识，变革了传播观念。

印刷技术的变革和报刊书籍出版结合之后所造成的效果，绝不仅仅停留在印刷物数量增长的层面，而是在印刷文化的生产、销售到读者、作者认同的建立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新的印刷文化的场域。技术改进对印刷产品的价值稀释起到革命性的作用。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社会便分工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信息收集、整理出售的工作。随着越来越多报刊版面的开办，大胃口的印刷机嗷嗷待哺，对稿源的需要与日俱增，于是职业或半职业的写作群体应运而生。到20世纪初，出版业已初具规模，在对于近代文明包括社会和人的影响诸合力中，开始成为开智启蒙的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

媒介技术的发展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当然，这种影响程度"取决于传播的知识和信念的性质，取决于知识和信念系统化与多样化的程度，以及取决于我们个人对作为一种信息来源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依靠程度"[③]。任何一种媒介都会制约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媒介的运用会造成感

---

①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

② 秋风.通过市场学习规则[M]//汪丁丁.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52.

③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武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官比例上的变化，从而产生人体新的感应轮廓，从而使人形成新的知识结构。晚清时，媒介技术的引进和应用重塑了时空结构，从而影响和加快了文化的变迁。尤其是电报技术的运用能促成一种全新的“传播整合”状态，这种“传播整合”既包括传播时间与空间的整合，又包括不同认知观的整合。

虽然印刷文化的解放意义仍然是有限的，它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又形成了新的传播垄断，因为数量巨大的没有足够读写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传播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了知识本身。印刷传媒内容的复杂和理解循序渐进的特点，造成阅读群体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间交往的隔绝。① 但毋庸置疑的是，印刷技术大规模的展开，自然带来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文化变革。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得出版物得到迅速的批量生产，从而影响千百万手中的观念与思想。在这样一个“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中，印刷出版技术自是必要的前提。

当然，若要细分的话，晚清时报刊和书籍对受众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报刊往往可以起到“匕首”和“投枪”之功用。而书籍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来看都更为厚重，称得上集束型的武器——其中不少佳作更可称为重磅炸弹。晚清伴随媒介技术发展而来的书籍报刊的合力，对于广大受众影响之烈、效果之强，都是令人称道的。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晚清印刷出版界就是其时社会传播习俗转变的直接策源地。

---

① 陈力丹．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体”[J]．国际新闻界，2004(6)．

第五章　媒介技术
影响传媒制度的动因

就实践过程而言，媒介技术不仅仅是社会变革的一股动力，也是社会变革的一个因子，和社会变革的其他领域紧密缠绕。虽然有时候媒介技术也演绎着与社会发展异步的变奏曲，但总体上看它们是同步向前的。

那么，晚清时媒介新技术是怎样深刻而密切地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的？它是怎样巩固自己的位置的？更为关键的是，媒介新技术是怎样对其时的传媒制度发生影响的？或者说，晚清时媒介技术对传媒制度的影响是如何可能的？

第一节　活字印刷术为何长期未成主流

在公元 1500 年以前，跟西方相比，中国印刷出版的数量占绝对优势。但到了 16 世纪末，西方的图书产量已经后来居上，而世界科技文明的中心也逐渐从中国转移到西方。西方学者同样注意到，早在 7～8 世纪中国就发明了印刷术，然而印刷术“似乎没有产生解放思想的影响”，“这个率先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罗盘的国家”，“在设计 18、19 世纪的动力纺织机、蒸汽机和其他革命性机器中，这个民族没有走在前面，这实在是令人惊诧”①。尤其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文化不但无法保有主导地位，相反却饱受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这种冲击带给中国人的，可以说是对整个五千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文明的一种全盘性的挑战。

的确，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发明了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在古代出版印刷业长期领跑的中国，怎么会由盛而衰，从先进变成落后呢？或者，可以把这个问题置换成另外一个疑问：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古代为

---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96.

何长期未成主流?[1]

一、技术难关未能攻克

从字模制作来看,只要是熟练的木工都可以进行雕版的活计,印刷技术容易普及,而且雕版保存时间长久,便于收藏。而活字印刷工艺要求高,汉字常用字多达几千,笔画繁复,要"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火烧令坚",排版后要"字平如砥",的确不是易事。

从字模质地来看,铁在中国古代是官营的,受到官方控制。"活字印刷使用的活字往往局囿于木制或泥制。而无论是木活字还是泥活字,或者因收缩不均匀造成破裂、变形,或者因木理有疏密,造成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在印刷效率和印刷质量上同欧洲所使用的铅活字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同雕版印刷相比,金属活字印刷不仅要求有较高的冶金、铸造技术,而且对机械设备的要求较高。因为活字排版只有在结合机械化印刷的条件下,才能提高活字的使用率,从而充分发挥活字印刷的优越性。而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的"[2]。中国应用金属活字、使用活字用印刷油墨较晚,而这两项发明是保证活字印刷质量的关键。活字印刷要求字模一定要高低大小一样。不然就会影响印刷质量。但在当时,手工自造的活字字模,是无法保证活字模的大小长短完全一样的。[3]

从排版来看,因为汉字常用字太多,排版时技术复杂,很容易出现误差,而且字模相互之间容易粘连。再说一旦版被拆了,再印就必须再排版。活字印刷只适合印刷品字数较少的作品,印完拆去以后还能给继续使用。而雕版在重复印刷作品上比活字印刷节省时间和精力,而中国古代印刷的书籍大多是反复刊印的经史子

---

① 其实,这不仅是在中国才有的现象。欧洲刚开始出现印刷书时,也并非立即就受到欢迎。活字印刷在当时欧洲让人不肯接受的主要原因是宗教信仰的影响,所以也是费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才到达称得上普及的程度。不过这种普及花费的时间和遭遇的阻力相对中国的活字印刷推广来说仍算比较顺利。

② 肖三,王德胜.从传播技术视角解读文化的发展——兼论李约瑟难题[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2).

③ 人们虽采用了很多方法——如用蜡、松香、纸灰垫在活字地下然后加热的工艺——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效果仍不理想。所以活字印刷在印刷品质量上,始终无法与雕版印刷相抗衡。在鉴别是否是活字版书籍的时候,其字印刷有深有浅,是一条重要依据。活字印刷之所以在西方被大量使用,是因为它利于工业化大规模印刷。但是西方活字印刷的普及也是在其工业化之后。德国率先开始用机器生产金属活字(字母),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

集等,完全可以一次性制版重复翻印。

从印刷效果来看,雕版印刷出来的书籍,其印刷质量和美观程度,普遍好于活字印刷。而且,雕版在印刷图片方面有着活字印刷难以比拟的优势。所以,尽管明清时活字印刷已很常见,木活字、铅活字均已出现,但活字印刷一直很难达到雕版的精美程度,所以直到清朝仍是雕版占优。

二、成本巨大缺乏竞争力

汉字数量太多,制造活字成本高,出版商无力为每个汉字造金属字模。在传统的中国活字印刷中,最常用的汉字每个至少要准备 20 种不同类型的活字。雍正年间,为了印刷书籍,内府印刷厂铸造了 20 万个铜活字。显而易见,数量如此巨大的铸字原料是相当浩繁而且成本巨大的。

而雕版一次成型就可以一劳永逸,雕版能留住版,这对出版商来说有时成本反而更加低廉。雕版可以长期存放,随时加印。因此在印刷严肃书籍是用效果好的雕版印刷,印小说等价格敏感书籍时用便宜而质量较差的活字印刷似乎不难理解。同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的成本较高,如果不在规模和效益上做文章,活字印刷是没有竞争力的。而在当时的中国,恰恰就缺少这样的条件。

三、人员素质难以跟进

人员素质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说技术问题还可以解决的话,那么人员素质问题在当时来讲,简直无法克服了。中国古代可能为了做诗方便,形成了按字韵的文字分类习惯,因此印铺排字往往不是依据偏旁部首,而是依据音韵。一看到书稿,就要知道这个字念什么,知道到哪个韵部去选字,还要在众多的各不相同的反字中,挑出所需之字,这样的人文字功底必须十分扎实。而有这样扎实的文字功底的人,谁还愿意做排字工?

实际上活字印刷的普及还需要全民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才行。要大量的人都能读书识字,并且阅读文字产品成为一种广泛普遍的需要时,才会使活字印刷的便捷、迅速与高效充分地发挥出来。只有有了广泛的对更廉价的文字印刷品的需求,才会使活字印刷术因其低成本、高效率而取代雕版印刷术。还有当文化普及之后也可以为活字印刷提供大量具有一定文字功底的印刷工。这一切都是当时中国所无法达到的。

而现代当这些条件都具备了的时候,活字印刷的优势才发挥了出来。并且被广泛使用。相对于雕版印刷来说活字印刷更适合工业化生产的时代。这也就

是为什么在古代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活字印刷术，到了近现代反而大放异彩的原因。

四、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

尽管中国的理论水平在中世纪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高于西方同期理论水平，“但中国的文化结构却阻碍构造性自然观在中国古代科学理论中确立自己的地位。科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技术化和政治化都使中国古代科学理论长期停滞在有机自然观阶段”①。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鄙视投机取巧的人，所以对待印书，国人是宁可烦琐，也不愿亵渎。相反，人们更容易把活字印刷术视作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这就直接阻碍了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而且中国人做事讲究心诚，尤其是读书做学问，更被视为崇高之事，由于当时活字印刷术的限制，印刷过程中容易出现“印疮”，在读书人看来无疑是对圣贤书的亵渎而难以接受。

五、相关正式制度的缺位

首先是一个官方封锁的问题。中国历来是上尊下卑的社会，统治者往往限制和控制文化普及。活字印刷这种新生事物出现伊始即被官方垄断，普通百姓难以享受这一新的技术成果。

其次，封建教育体制对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也有阻碍。教科书是古代书籍出版中的重头戏，而中国古代长期处在封建王朝统治之下，朝代虽不断更迭，但以儒学治国之道始终未变，四书五经等儒学经书成为学塾必读之教材。隋唐以后，科举取士更使中国文人囿于狭窄的读书范围，并逐渐形成了长达千年的文化传统。由于文人所读经典千年不变，活字印刷术的优点无处彰显，甚至还不如雕版印刷的效果精美，所以活字印刷书自然难以推广和普及。

再次，中国古代印刷出版没有生产标准化、缺少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难以从技术发明中得到实际收益，也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活字印刷术的推广。

六、基础知识存量的欠缺

任何媒介技术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社会技术体系的支撑，这种社会技术体系包括三个方面：物质资源、智力资源和社会条件。其中智力资源指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及能力的状况等。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古代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

---

① 刘青峰.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42.

原因是基础知识存量的欠缺。因为只有基础知识的存量能够扩张,否则新技术的发展最终会陷入收益递减的境地。这种基础知识取决于自然科学规律的发现和运用。这里实际上涉及到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

近代科学技术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产生、演化是和一定的社会结构的演化相一致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必要条件:其一是原始科学结构的种子;其二是大一统型的通讯技术;其三是社会结构的转化,特别是新的社会结构要比旧结构有更大的容量。① 近代西方科技能够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代开放式的科学技术结构的出现。这种结构指科学理论、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得近代科学技术能在和整个社会的相互联系中具备了循环加速的发展机制。

而中国古代的许多技术发展常遇到两个重要的束缚:古代技术第一个束缚是技术和它的目的物——产品不能分离;第二个束缚是技艺和匠人的手和脑不可分离。这两个特点造成了古代技术的凝固性和封闭性。② 这里的凝固性和封闭性不是指内容或水平,而是指技术的结构。在一种封闭的技术结构中,也有可能出现高超的技艺,但它仍是个别的和封闭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长期未出现这种开放式的科学技术结构,这一点也使得活字印刷术的诸多缺陷未能通过整个技术体系的发展得到解决。

七、社会需求的不足

纵观传媒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传媒的发展,不仅是科学技术提供支持的结果,更是社会生活对传播内容需求不断推动所使然。③ "社会需要"刺激传播技术的创造,看来是一条规律。④ 欧洲活字印刷的快速发展就是适逢社会需求的强烈牵动。15、16 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的大旗已高高竖起,整个欧洲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由于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大量涌现,广大的知识分子纷纷著书立说以宣扬自己的观点言论。这客观上也为活字印刷的普及推广提供了绝好的外部条件。从 1445 年至 1500 年,欧洲先后建起 1 000 多个印刷所,出版了 35 000

---

① 刘青峰.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58.

② 刘青峰.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89-90.

③ 童兵. 论传媒技术与内容需求的互动[J]. 新闻记者,2006(3).

④ 陈力丹. 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体"[J]. 国际新闻界,2004(6).

多种印刷品，发行量多达 1000 万份。① 而中国古代长期缺乏新闻传播的规模化社会需要，对活字印刷术的推广无疑是个致命的障碍。

以宋代为例，其与文化发展水平及传播物的要求尚未达到急需活字印刷术的状况有关。泥活字“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反而是雕版印刷旋写旋刻，不必一一找字、布字，显得更方便些。况且，宋代传播量大的多为一些诗、词、小文或历书等，这些传播物往往篇幅短小，刻写方便，版印销售也很容易，而大部头的宏篇巨制印制数量并不多，如北宋初年规模空前的“类书之冠”《太平御览》凡千卷，当时的印制数就不会很多，市场上也没有这样大的需求量。同样，《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神医普救》也皆为千卷本，且字数繁多，如《册府元龟》字数就接近一千万字，像这类书若印“数十百千”本，尚能神速，否则，就难以体现活字印刷的优越性了。② 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不仅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甚至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所译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书籍的印刷，也都是以雕版为主。

关于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和欧洲不同的命运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无论从文字系统差异出发，还是比较技术成熟的水平，抑或分析不同的社会需求，这些不同的解释最终都指向了一点：任何媒介技术的发展都内嵌于特定时期的社会背景之中，而不可能独立于外。

第二节　晚清媒介新技术自身的扩散

美国学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指出，一项新技术要得以扩散，必须具备创新、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四要素。③ 那么，晚清时，中国媒介技术又为何能够获得迅猛发展，并且对传媒制度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呢？换言之，晚清媒介技术的创新又是如何能够扩散开来的？

一、创新

很显然，在新技术能够得以扩散的四要素当中，创新是先决性的要素。罗杰斯指出，可以从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试性和可观察性五个方面衡量一项新技

---

① 吴廷俊. 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85.

② 清飏.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宋代出版传播方式的变革[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5).

③ 埃弗雷特・M・罗杰斯. 创新的扩散(第 4 版)[M]. 辛欣，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0.

术的创新性。[①]

即使不谈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这三大要素，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和雕版技术相比，在创新性的5个指标上均不占优势，有的指标上甚至明显处于劣势，因此活字印刷新技术就很难迅速扩散开来，长期未占主流也就理所当然了。

晚清时期对报纸发展影响比较突出的新媒介技术毫无疑问应该首推近代活字印刷术和电报技术。这两项技术得以扩散并对印刷出版活动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取决于它们的创新性。

1. 相对优势

相对优势是一项创新比起它所取代的方法具有的优势。相对优势除了用经济因素评价外，还可以用社会声望、便利性以及满意度来评价。一项创新的相对优势越大，它被采用的速度自然也就越快。

19世纪初叶，欧洲的近代机械印刷术开始传人我国。当邸报、京报还在手抄、木刻活字(或胶泥活字)印刷的时候，外报已经利用近代科学技术传输稿件和排印报纸。首批中文近代报刊是木板雕印的，但很快就出现了石印和铅印。石印技术使得画面的准确复制成为可能，省却了雕刻师的艰辛与雕刻过程中的变异。石印作品明如犀角，毫发毕具，能把画家的细致笔触与恢宏场景逼真地再现。而且石印技术使用简便快捷，所以甫一传人中国旋即受到热烈欢迎，并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始终占有一定的比重。这项技术的盛行也带来了石印报刊和书籍在晚清的繁荣，为传媒信息走向大众奠定了基础。

在石印技术得以发展的同时，铅印技术也被引人国内并不断完善。1807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奉伦敦布道会之命来到中国，随后即开展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1834年美国传教士将一套汉文木刻活字送住美国波士顿，复制成铅铸活字后送回中国。1834年法国传教士也在巴黎复制了一套汉文铅字。19世纪50年代，外国人办的印书馆又制成电镀汉文字模和以24盘常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1858年，美国人姜别利(William Gamble)来到上海的美华书馆，以独特的方法研究和改进中文铅活字。1859年他首创了中文电镀字模的新方法。字模是铅活字的母体，母体字质量提高了，浇铸出的铅活字当然会更清楚，印刷的产品质量就会大大提高。姜别利的发明创造为中文铅活字的发展和储字方式的改进做出了巨大贡献。[②] 19

---

① 埃弗雷特·M·罗杰斯. 创新的扩散(第4版)[M]. 辛欣，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4-15.

② 陈燕. 超越时空——媒介科技史论[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5.

世纪 60 年代"美华字"[①]开始成为印刷出版行业的主要用字，此后几十年中一直都是中国最通用的铅字，在造华文铅活字上可说是一次革命。欧洲最初传入中国的印刷机是手板架，需要手工上墨，效率甚低，每天不过印数百张。不久，自来墨架传入中国，印刷速度大为加快。1861 年创刊的《上海新报》首先采用国外进口的白报纸，两面印刷。后改用蒸汽以及火力动力，印刷效率增加 1 倍。这些成果，逐渐为各报所采用。到了 70 年代前后，多数中文报纸已经改用铅字印刷。

1872 年(同治十一年)，上海申报馆已经开始设置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几百张报纸，用中国生产的连史纸单面印刷。率先采用煤气印刷机的是 1879 年 4 月 17 日在上海创刊的英文月刊《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而蒸汽印刷机和铸字机的使用，更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日本仿制欧洲的轮转机输入中国，因价格低廉，多为当时出版业所采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英国人发明的用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传入中国，每小时可印 1 000 张，俗称"大英机"[②]。

可以用雕版印刷的《海国图志》为例比较一下不同印刷技术的效率。[③] 在 1861 年前，该书先后由作者增订两次，因而有 50 卷、60 卷和 100 卷 3 种。前两种分别两次印刷，后一种印刷一次。这样共有 5 个版本。这 5 种版本均为木刻活字印刷。按照此时的印刷水平，木刻活字一次通常只能印 200 本，再多"字划就胀大模糊"。照此推算，该书在 20 年间虽 5 次印刷，仅印出 1 000 部左右。这种大部头的学术巨著(50 卷本即有 19 册之多)所拥有的读者不可能像报刊或畅销的通俗小册子那样多。倘若以每部有 10 位读者计之，20 年间读者总数也不过 10 000 人，年均才 500 人。《海国图志》每年的受众才占有阅读能力者的 1/7 000，若以全国总人口 4 亿计之，则就更微乎其微了。[④] 由上可见，采用西方引进的先进印刷技术，其工作效率

---

① 1869 年，姜别利离职返美途中，应本木昌造邀请前往日本传授技术，姜氏在日本铸造了字号完备的汉文、英文、日文三副字模，并传授了电镀制模、铸造活字技术等技术，由此，开始了中、日两国在铜模、活字商品和制造技术以及活字字体设计方面的相互交流的通用时代。与之前的戴尔字相比，姜别利的字在笔画设计上更加美观，曲线也更加流畅，笔画的粗细比例严谨协调，整字的字形接近现代的宋体，被称作"美华字"。

② 吉少甫. 中国出版简史[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262-263.

③ 当然，要精确计算 1861 年前《海国图志》的受众数无疑是个难题. 这里只能根据时人的记载和该书的出版情况大致推算。

④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99；黄丽镛. 魏源年谱[Z].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227；闾小波.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5.

已远非雕版印刷和中国古代活字术所能比拟的。

相对中国古代的信息传递技术，电报技术的相对优势更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是利用电磁波作载体来实现人类远距离传输与交换信息的通信方式，电报技术可使信息瞬间即达，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让时间战胜了空间。电报作为日后大众媒介的先声，对当时的社会有着石破天惊的冲击。电报通信的开设，立即显示出其技术先进的效益。电报在中法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改变了以往对外战争中清政府由于闭目塞听，消息不灵而被动挨打的局面，李鸿章在为电报员请奖时曾说，“中国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速神者”。另外，清政府还利用电报办理对外交涉，了解外贸行情，发展对外贸易。

简单总结可以发现，西方近代媒介技术所展现的效用与效率优势慑服了中国人，让中国人自惭于原有技术的落后。“在中国人的主观认知里，西方现代文明此一表现在器用层面的优势，随着他们之认知领域的扩大与加深，继而扩散至其他层面，如制度、思想、价值、信仰体系，终产生了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①

2. 相容性

相容性指一项创新与现存价值观、潜在接受者过去的经历以及个体需要的符合程度。比起与一个社会系统的价值观和标准相容的创新，不相容创新的采用速度慢得多。一项不相容的创新要被采用，通常要求该系统在采用一套新的价值观以后才能实现，而这往往是一个很慢的过程。②

一项创新被采用的机率涉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个社会系统中人的价值观、信仰、生活经验等的包容性。③ 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主流的雕版印刷的最大缺点就是，只能一次性制版重复翻印。古代印刷的书籍大多是反复刊印的经史子集等，雕版倒是比较适合，可在晚清新形势下，其与社会形势格格不入，显然没有了用武之地。

从比较中不难发现，外报是与中国古代报纸有着不同特点的近代报刊，产生这些不同特点的根本原因是物质生产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进步了，人们对新闻传播的需求自然也提高了。虽然近代报刊与古代报纸长期并存，但前者取代后者已是必然趋势。媒介技术体系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演进系统，因为我们不能不顾历史、

---

① 叶启政. 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揉搓[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6.

② 埃弗雷特·M·罗杰斯. 创新的扩散(第4版)[M]. 辛欣，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4-15.

③ 埃弗雷特·M·罗杰斯. 创新的扩散(第4版)[M]. 辛欣，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

文化、社会结构和生态系统等方面的因素，只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虑媒介技术创新的产生、认可、拒绝、扩散和封锁。晚清印刷出版活动好似一个巨大的坩埚，新趋势与旧传统在动态的张力之中进行斗争，传统印刷手段和媒介新技术在此融为一体。

3. 复杂性

复杂性是一项创新被理解或被使用的难易程度。有些创新可以很容易就被一个社会系统的大部分成员理解，而另一些创新则复杂得多，不容易被采用。①

前文已经提及，中国古代活字印刷工艺要求甚高，汉字常用字多达几千，笔画繁复，要"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火烧令坚"，排版后要"字平如砥"，但其只能一次性制版重复翻印，凡每次欲印新内容，都必须重头再来，颇费周折。

再看近代铅活字印刷术。从1815年起，马礼逊编写的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②，印制此书，大概需要中文铅活字10万枚——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采用中国传统的印刷方式，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当然，近代铅活字印刷术也是在不断的改进中日益彰显优势的。比如，活字版上机器印刷，经过1～2万次的受力磨擦会使活字的笔画模糊不清，印刷质量受到影响，如果要继续印刷，还要重新拣字排版，非常费时费力。1829年法国人谢罗夫发明了纸型这一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对铅活字印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用活字版打、压成纸型，然后翻成铅版上机器印刷。纸型可以多打几副，印刷一定次数就更换，大大保证了印刷的质量。③ 所以20世纪中期以前铅活字印刷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印刷方式。

4. 可试性

可试性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一项创新能够被实验的可能性。能够分阶段采用的创新比起那些"一锤子买卖"的创新采用速度要快得多。④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将中国近代报纸的兴起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纸，"是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故称之为创始时期。在此期

---

① 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4版)[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5.

② 也称《华英字典》)，由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这本中英文工具书是为在华的外国人服务的。此书共分3大部分，6大卷，约5千个页码。中文书名用草书体，正文部分用仿宋体。字号有2号、3号、4号，大小不同。

③ 陈燕.超越时空——媒介科技史论[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1.

④ 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4版)[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5.

内，报纸之目的，有传教与经商之殊，其文字有华文与外国文之别”。在西方报纸和新闻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自办报纸，“迨中日战争之后，强学会之《中外纪闻》出，始开人民论政之端。此后上海香港日本，乃成民报产生之三大区域。其性质又有君宪、民主、国粹及迎合时好之多种”①。

西方机械印刷技术和经营模式对晚清国内各式报刊出版机构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报刊出版结构纷纷引进西方印刷技术，效仿外报经营模式，尤其是中国新式民营印刷出版机构已经迥然有别于以往官报局和民间书坊。

西方近代印刷术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用机器来进行印刷。在中国，申报馆是机器印刷的推动者。申报馆对于近代中国出版的一大贡献，是它将先进的西洋印刷技术投入于近代中国出版事业，并为其他印刷出版机构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样本。

19 世纪 70 年代，《申报》就采用手摇轮转印刷机。美查还发表了题为《铅字印书宜用机器论》的社论，鼓动江南地区的书商们购买新式印刷机器。申报馆采用铅字和机器印刷相结合排印了许多中国古籍，称为《申报聚珍版丛书》。铅字的清晰度很高，比起木制雕版字体则要小得多，自然便于印刷和携带。诸多竞争者在技术上和编辑路数上纷纷效仿。

5. 可观察性

可观察性是指在多大程度上个体可以看到一项创新的结果。个体越容易观察到一项创新的结果，他们越容易采用它。② 外国电报的到来以及它在当时战争、外交中的运用，使中国传统的驿传系统相形见绌，并成为影响国家之间战略优劣的主要因素，促使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认真地加以考虑。

近代电报、邮政事业在逐步取代传统驿传系统的过程中，也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驿传系统下，清朝曾开疆辟土，拓展边地，但也仅局限于中国内部的发展。在以人力、畜力为主要方式的信息传递体系下，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联系非常困难。康熙时期，雅克萨之战胜利后，飞驰十一日告捷已属迅速；而索额图赴俄谈判，信差往返，数月才有音讯。中国社会所暴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使一些明智的士大夫敏感地觉察到潜伏的危机，可绝大多数的政府要员都是颟顼自大的封建官僚，不屑一顾地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斥为“奇技淫巧”。

在法国侵犯越南北方、威胁滇桂边疆时，应越南政府请求，清军于 1881 年底开进越南北圻。“其时电报未通，奏折往返须五十余日”。为保持滇、桂驻越军队与清

①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读书 · 生活 · 新知三联书店，1955：21.

② 埃弗雷特 · M · 罗杰斯. 创新的扩散(第 4 版)[M]. 辛欣，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5.

政府通信联络的迅速畅通,为了加强指挥调动的能力,清政府于1883～1884年批准修建了几条重要干线。①

由于中国拥有了电报这个先进的通信工具,在中法战争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闭目塞听、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学会利用中外联系便利的条件去广泛收集情报,利用中国控制全部大陆电报的条件从法国公使发电的频繁程度进行战略推测,改进密码通信等。中法战争爆发后,中国电报局公开通告,停止收发法国的密码电报和涉及战事的明通电报。这在一定程度上隔断了法国的耳目。②

李鸿章对电报局在中法战争中的通信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他对电报通信在战争中作用的高度评价也为清朝更高的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排除了统治者内部的人为阻力,使晚清电报出现了一个顺利发展的时期。中法战争后,中国电报事业迅速发展,据统计,"光从1884～1899年,便架设了电线55 000多华里(以杆程计算,不包括短途军用线),平均速度比创办时期增长二倍半。从1881年到1908年收归国有时为止,商办电报线路共计建成41 417华里,地方官办电报线路共计建成49 480华里,总计为90 897华里。官办电报局155处,商办电报局239处,共计394处"③。短短时间内,清政府的电报通信机构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电报通信的干线网大体形成。

二、传播渠道

显然,一项创新要被扩散和接受,仅有明显的益处是不够的。④ 从技术用途向社会用途的过渡,永远是一个棘手的行动。⑤ 摆脱传统主义并甘愿接受新事物是与接触的速率、数量和强度密切相关的。⑥ 因此,合适的传播渠道对于媒介新技术的扩散至关重要。

传播渠道是信息从一个个体传向另一个体的手段,一对个体之间信息交换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在什么条件下知情方会或不会将该创新传播给未知方,以及传播

---

① 主要有津京线、长江线和广州—龙州线。

② 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63-64.

③ 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65.

④ 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4版)[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7.

⑤ 帕特里斯·费里奇.现代信息交流史: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M].刘大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93.

⑥ 罗伯特·K·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71.

效果如何。[①] 那么晚清媒介新技术是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渠道传入中国，并渐成燎原之势的呢？

从西方活字印刷术的东传来看，我们不得不在客观上承认西方传教士的贡献。19世纪初大批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到中国进行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并将先进的印刷术带至中国。同时为了更好地从事他们的出版活动，他们开始对中文铅活字进行研究和创制，掀起了研究制造中文铅活字的热潮。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现代化的石印技术也被介绍到中国来。1838年9月在广州创刊的《各国消息》就是采用石印的。此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石印的报刊始终占有一定的比重，和铅印的报刊并存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西方印刷新技术普遍展开之后，印刷出版行业的运作逻辑已不再是家刻和官刻时期所能比拟的。它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夹杂着文化理想、社会责任和商业诉求等多重目的的运营模式中。

一种新的传播手段通常为小部分精英引入，然后变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最终发展成较专业性的传播途径。报纸最早经历了完整的发展周期，变成了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②] 晚清时亦是如此。一种或者多种报纸的流行，除了取决于其自身内在品质以及主导思想、文章内容等方面的因素外，还需要一些与之相配的、有效的传播渠道和途径，特别是在报纸刚刚问世的阶段。在晚清时期，由于阅报成为一种新时尚，因此各地出现许多阅报社，读报、听报成为市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说，阅报社既是这样一种新型舆论传播渠道，又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③]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private confessional form)。它给人以'观点'。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group confessional form)，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④] 随着印刷数量的剧增和印刷周期的缩短以及越来越多的白话报刊开办出来，新式报刊书籍成为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获取各种信息的主要来源，这就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事业与世界隔绝的封闭格局，也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和文化控制。

西方其他许多先进的媒介技术和器具往往也通过传教士或者中国留学生、海

---

① 埃弗雷特·M·罗杰斯. 创新的扩散(第4版)[M]. 辛欣，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6.

② Ray Eldon Hiebert, Donald F. Ungurait, Thomas W. Bohn. 大众传播媒介[M]. 潘邦顺，译. 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223.

③ 侯杰，秦方.《大公报》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变迁[J]. 广东社会科学，2003(3).

④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6.

员等带入中国，再经由多人口耳相传，直接或间接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比如照相机及照相技术就是由英国传教士德贞(John Hepburn Dudgeon)[①]带入并得以传播的。德贞于1860年来华后，在北京开办医院，用照相技术为人治疗，并到宣武门大街当众表演，引得许多人好奇观看，一时之下，京城内外广为传播。守旧人士斥其为异端邪术，认为照相是取“目睛之水”、“人心之血”。但有许多人亲自向德贞求教，并逐渐向下传播。1863年底德贞在北京崇文门内开设照相馆，1873年他用中文撰写的《脱影奇观》刊刻出版，该书全面地介绍了当时的摄影术，包括有关摄影化合物的名称、分子式，使照相技术正式传入中国。[②]

总的来说，引进器物机械是中国近代传播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重要形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和兴办学堂是中国近代传播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回国留学生是中国近代传播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生力军，传教士是向近代中国传播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一个特殊群体。[③] 而通商口岸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了西方媒介技术引进的第一站，也成了传播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前沿阵地。

三、时间

就时间因素而言，一项新技术的扩散需要经历以下三个过程：①创新决策过程，是个体知道一项创新，并且采用还是拒绝该创新所经历的过程；②个体或单位比其他系统成员采用创新更早或更晚的程度；③一个系统中创新的采用速度通常指结定时间内该系统中采用创新的人数。[④]

一件发明的历史就是一系列技术的、社会的转移的历史，但也同样是技术和社会之间转移的历史。信息交往的新体系是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传播才稳定下来的。[⑤] 也就是说，一项新技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逐步扩散直到真正嵌入到文化习俗中去。

的确，晚清时先进媒介技术的引进远非一蹴而就。如同对待其他西方事物一

---

① 英国传教医师德贞(1837～1901)于1860年来华，1863～1867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及北京英国教会医院院长。因其在国内喜玩照相，并携有“聚影匣”(照相机)来华。

② 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板摄影术[J]．中国科技史料，2000(2)；粟多树，杨德才．西方科技在中国近代传播的途径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4(2)．

③ 粟多树，杨德才．西方科技在中国近代传播的途径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4(2)．

④ 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4版)[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8．

⑤ 帕特里斯·费里奇．现代信息交流史：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M]．刘大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

样，晚清时期对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到来，最初是持排拒态度的。尽管与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相比，西方活字印刷术在速度、用料和效率等方面均有明显优势，然而它并没有很快取代雕版印刷，社会上长时期内仍以雕版印刷使用最广。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局面，一方面是由于刚引进时西方印刷术还未表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提到，由于活字排版印刷后即要拆版，重印困难，无法修改，而多印又占资金，反而不如木板印刷重印方便，所以该局虽有铅字印书架而"仍用古制而刊木板，以手工刷印"[①]。直到 19 世纪末，石印技术和纸型技术相继普及后，机器印刷的速度快、成本低的优越性才充分显示出来。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市场需求不足，缺乏印刷技术改造与革新的动力，人们已经习惯了沿用一千余年的雕版印刷技术，很难"移情别恋"，以至于西方教会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扩大自己的传教成果，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宣传推广铅板宗教印刷品。[②] 在这其中，作为意见领袖的早采用者(early adopters)[③]的作用相当关键。比如，京师同文馆后来用上铅活字印刷技术，也是"由于大学士文祥对于活字印刷的精美和工序的简便赞不绝口"。于是，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④]便把姜别利制作并送给自己的一些铅活字转赠给了文祥。这便是同文馆印刷所的萌芽，后来它专门为皇上和同文馆印刷书籍。应该说，丁韪良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同样，电报的引入与生根开花也是颇费周折。电报于咸丰初年传入中国，但并未引起时人注意。电报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俄、英、美等国为了利用电报这种全新的通讯工具，提高政令军情传达的速度和效率，加强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控制，都提出在中国铺设电线的要求。清朝统治者当时对电报电线尚是一无所知，自是疑惧交加，封疆大吏则大多持坚决反对态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铺设电线"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福建巡抚李福泰视电报为洪水猛兽，称之"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只有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提出因势利导、自设电线的主张。

---

① 傅兰雅.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M]//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7：18.

② 黄林. 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89.

③ 金兼斌. 技术传播——创新扩散的观点[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46.

④ 丁韪良，字冠西(1827～1916)，美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 62 年(1850～1916，期间有 4 年不在中国)，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是当时在华外国人中的"中国通"。

中国传说中早有“顺风耳”的神话，表达了古人对万里之遥却能瞬间互通消息的盼望；早有关于“日行千里”、甚至“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种种故事，表达了古人对万里之遥却能即刻到达的憧憬。然而，当把“顺风耳”变成现实的“电报”真的要来到中国时，却遇到了今人想象不到的巨大阻力，不仅没有被当作明察远见的“仙卿”和缩地成寸的“神灵”，反而被顽固派斥责为会污染中国文化的“奇技淫巧”而遭到强烈抵制。

1865 年，有一位英国人叫做 Reynolds 企图在上海与黄浦江口之间架设一条长约十二英里的电报线。当时，如果向中国当局申请，是一定不能得到许可的。因此他在各种事项准备停当之后，便试图在没有遭遇阻碍之先，急速进行安装电报线，试图制造一个“既成事实”。但是清廷官吏们厉色睨视，乡下的老百姓很快地把电线杆子拔掉了。①

1871 年，大北电报公司打算在香港与上海之间沿海岸安设一条海底电线。电线安设到扬子江的时候，官吏们显露了极大的不安，因此要把电线装到江去，并在上海上陆，便成了问题。他们便偷偷地在夜里把电线给接上岸去，在一个时期内，连外国人也没有人知道电线上岸的准确地点。中国当局的激荡情绪慢慢地消沉下去了。但这离清政府对电报的承认尚远——清政府连原则上都还没有加以承认。1873 年沿岸的海底电线的另一个环线也没有得到中国当局的许可而在厦门上陆了。一直到 1875 年，清政府才对这个既成事实予以承认。6 年以后，中国和沙俄之间所发生的伊犁纠纷给清政府一种压力，那就是不能不装设电报。于是 1881 年 6 月，清政府便批准了从天津到上海安设一条路上电报线，这条线实际上建立了北京和欧洲间的交通连紧。中央各部所称心合意的阻挠，曾使电线晚了 3 年才和北京连紧。但是一旦连系了起来，电线便迅速地伸张到中国各地。② 从此以后，建立的电线便环绕并横贯整个国家：西则由上海经中国中部至四川、云南；南则沿海岸至广州直抵越南北圻的边境；北则由天津经满洲至西伯利亚；台湾及海南两大岛则用海底电线与大陆相连。

四、社会系统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都曾提醒人们，不要只看到传播的内容，还要注意到媒介形

---

① 于德利. 中国进步的标记[M]. 张雁深摘译 //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 洋务运动(八).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444-445.

② 于德利. 中国进步的标记[M]. 张雁深摘译 //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 洋务运动(八).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445-446.

式本身。但是他们的观点后面还应该再续一句：不要只看到媒介形式本身，更要注意它所处的社会系统。因为一个技术系统从来不是纯技术的：它在现实世界上的应用包含着技术的、经济的、组织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成分。因此，创新的扩散不仅是个技术事件，也是一个社会过程，总得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进行。

就新技术的创新扩散而言，社会系统就是技术创新扩散的环境，“它由一群彼此互有联系且有某种共同目标或特征的单元组成。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有某种有形或无形的边界，并且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这是由其成员具有某种共同目标或共享某种特征而决定的”[①]。社会系统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影响新技术创新扩散的进程，包括系统结构对创新扩散的有利或不利影响、系统的社会规范对新技术扩散的制约，以及社会系统中的意见领袖所发挥的作用。而且，任何一项新技术的扩散总是有大大小小的集团参加的社会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大小小的集团必然为了自身利益而展开博弈。所以对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考量，都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系统之中，才能对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现实进行更清晰更客观的分析和认识。

“传播技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配合，而新的传播模式也往往影响了社会机构的互动，或许未必能导引社会关系的变化，却常是社会各机构、各阶层关系变动的加速器之一”[②]。所以对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一定要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正是整个社会系统支撑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社会系统在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把媒介新技术技术融会到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与整体中。任何一项媒介新技术，都只有在契合支持它的社会系统时才能被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媒介技术是处在人类文化环境中创造文化的复杂过程，它的发展是个复杂的文化问题，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晚清时的媒介新技术本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力量，只有在与社会系统的其他因素结合之后，才可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比如“知识群体有了思想上的认识，感觉到了新式媒体潜在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新生的技术工人掌握了新的印刷技术，有了新式印刷机，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生产能力，可以编印新式报刊、可以大量出书，生产此前完全不能想象的文化产品，这确实是一个此前未有过的新景象”，但这种新式印刷出版要想真正展开它的技术力量，释放出新技术潜在的改造社会文化之功用，还需要“通过具体的个人和实际工作的运作，形成与前此功能不

---

① 金兼斌.技术传播——创新扩散的观点[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49.

②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M].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14.

一样的组织结构，能够不仅仅依靠某个人在个别状况中实现，而是能具有普遍性地展开”①。

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洋务运动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洋务运动时期各种变化并非单纯的技术、器物变革，也不是个别、孤立的历史表象，而是系统的社会变迁，是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尽管这个过程不过刚刚启动，但它毕竟迈出了艰难而可贵的第一步，为尔后更大规模的变迁奠定了基础。

思想与思想的接触往往明显地刺激了观察与首创性。通过互动的媒介，观念和经验就可以变成创新和发现的要素。一旦有了社会相互作用，就有了一种可能性(更多的思想相互接触，就有更大的可能性)。② 在西方各种先进技术的感召之下，晚清时人们对先进技术的作用愈加重视，新知识群体纷纷成立各种社团，研究技术和工商之学，力求通过实业为民族振兴出力，一些科技界人士在发起成立工业建议会时表示：“深愿我学术家、资本家合群策群力，以企图工业之发达，国计民生胥有赖焉。”③作为先进技术系统的一部分，媒介新技术的发展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人们面对外来的陌生异质文化时，首先对接上的是沉淀长存在自己之经验仓库中的既有传统。传统是集体无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文化要素，也是人们学习新奇事物时不可或缺的稳定剂。若存在既有熟悉的事物作为基础，人们便能更为安心和踏实地接受新的事物。这是人性中保守的一面，也是传统这一文化要素扮演重要角色的心理基础。从这一点而言，能够在偌短时间内突飞猛进的晚清媒介技术并非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中国传统的印刷出版技术也为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譬如四川印刷技术的发展曾因明末清初的大动乱饱受冲击，但在乾嘉时期就又得到了迅速地恢复与发展，“已在实践中形成了包括备料、写版、画版、校对、清版、贴样、刻版、打样、校对、付印十项工艺流程”④。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层面和要素，媒介技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变迁，并对社会结构的其他层面和要素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

① 雷启立. 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54.

② 罗伯特·K·默顿.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 范岱年，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71.

③ 参见《申报》，1912年3月3日。

④ 陈世松，贾大泉. 四川通史(第5册)[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246.

第三节 媒介新技术的影响扩散——作用于传媒制度的方式

面对晚清的困顿局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原有知识方式的无能为力。他们将改造中国的希望放到已经呈现出新气象的传媒文化上。不过，一种新的传媒文化要想大规模地展开，从而影响整个社会，仅有知识阶层的焦虑和希冀是远远不够的，它要发挥力量的前提是媒介技术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运用。

那么，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文化的生产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对其时的传媒制度发生影响的？

一、媒介技术发展导致传播新观念的产生与扩散，促使非正式传媒制度的出现

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一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①

在媒介新技术的冲击下，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个体规则性知识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某种传播观念，某种传播形式，某种传播符号，某种传播媒体或某种特定的传播内容一旦相沿成习，具有了约定俗成性、模式性、稳定性而成为一种传播习俗，那么其对特定社会群体就有了强大的亲和力和强制性特征。传播习俗重要的应用价值正是由此而决定的"。②

不过，一项新技术只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才能发挥更大功用。同样，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是静态的实体性存在，而是在与社会观念持续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从而不断影响并促进人们观念的改变，造出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形成新的力量。比如早期对西方先进媒介技术有所反应者，多半是知识文化水准较低的一群人，官绅士人对这种西力入侵反而视而不见甚至竭力反对，以致统治阶级对西方的反应要远远落后于民间社会的变化。最早参与西方传播事业的华人，如蔡轩、梁发等人，多居住在沿海地带，且文化水平不高，扮演了印刷工人、夹带传递等角色。随着传播事业的发展，"有些敏感的士人也逐渐发现，这些新式传播工具形成

---

① 韦尔伯·施拉姆.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 金燕宁，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21.

② 杨立川. 论新世纪初大众媒介中的传播习俗现象[J].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2).

一个前所未有的管道，使其理想抱负与现实关怀可以藉之连接起来；此尚未完全被纳入常态规范的新领域提供有心之士跨越既有权力阶序、发展其个人理想的机会。无论是后来的维新派或革命派，都逐渐认识到新式传播媒体可作为改变甚至颠覆现状的政治工具”①。

1895 年之后，趋新之风渐起，对新学书籍报刊的需求如大潮涌动。比如上海，各种贩售、经销、出版新学的书店竞相出现，尤其在棋盘街、四马路、望平街一带聚集了相当多的书局、报馆。② 乃至《国民日日报》发出不无揶揄的批评：“数年来，上海书局之设立较粪厕尤多，林立于棋盘街、四马路之两旁，莫不借输入文明之美名，而造出种种新名目、新样式、新装订、新纸张之书。呜呼，是社会之进步乎，抑退步乎？举全国之旧读书人，一至书肆眼花心迷，莫知孰优孰劣、孰可读孰不可读。而无道德心之中国书贾，从中大得获利之方法，或张大其告白，或修饰其门面，获利弥多而出版之书日众，出版日重而其足附输入文明之美名者几希。”③

从熊月之描述的上海新型文化人汇聚，致而产生群体的现象中，也可以看到新学蓬勃的上海对外地士人的吸引力。④ 无论是内地士人、留日学生或学堂学生，他们往往抛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背井离乡，聚集于上海，从事各种新式文化事业。他们一方面受新式文化事业的吸引，一方面更扩大了此事业的规模，甚至使其性质发生转变。“这当然不是说上海因此进入无政府状态，而是上海秩序的运作，要比内地城乡经历更多复杂而精微的权力折冲。……在转换交接之处留下凿圆枘方的模糊地带，成为有意者游走反复的空间”⑤。

就这样，“无数个体的微妙的变化累积起来，就逐渐地调整着本身群体的内部规则，使制度和传统在不同的方向上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无数个体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互相调适，熟悉新的规则，达成某种新的规则认同，从而自发地实现规则的演进，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秩序”⑥。当然，由个体的自发选择到社会层面的成文制度的变革，中间还有多个复杂的环节，但这已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另待撰文

---

①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M]．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102.

② 详情可参见上海市黄浦区档案局（馆）．福州路文化街[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③ 新书评骘[N]．国民日日报，1903-8-15.

④ 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J]．近代史研究，1997(4).

⑤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M]．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231.

⑥ 秋风．通过市场学习规则[M]//汪丁丁．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59.

讨论。

再以电报为例，19世纪的电报相较今天的通信技术似乎早已不值一提，但在晚清却可衍生出一段活色生香的传播文化史：从各个细微之处发掘电报如何改变人类的互动模式，如何产生新的概念体系、新的社会关系结构，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媒介技术成了人类思想、行动和社会关系的真实缩影，媒介技术的发展过程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产生与扩散过程。

概言之，晚清时媒介技术的发展引起社会主流传播形式的变化，主流传播形式的变化又促使主导话语形态的更迭，主导话语形态的更迭自然导致传播观念的更新，传播观念的更新往往会冲击旧有的传播格局。正是通过这样曲折多重然又确凿无疑的内在动力学机制，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晚清传媒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媒介技术发展对正式传媒制度变迁产生需求

1. 文化论的视角

从广义的角度看，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作为文化结构表层的器物层面，它所反应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第二是作为中间层的制度层面，它是人类精神产品的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第三是在文化结构中位于深层位置的心理层面，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民族精神等。

就文化变迁的内在逻辑而言，制度是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之间，也即器物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的中介。所以只引进先进的媒介技术而不进行传媒制度革新，是无法改造国民心理或价值观念的。洋务派只从器物层入手力求直接进行社会变革没有取得成功便是明证。晚清时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对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也形成了巨大冲击，但要想引起全社会的变革还需要传媒制度这个中介的变迁。

不过相对于媒介技术发展，正式传媒制度的变迁每每呈现出“滞后调整”，这种滞后，正是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所认为的那种“文化滞后”①，但它们“正是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②。或许处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晚清政府不愿对传媒制度进行革新，但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要求传媒制度的变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被迫之下晚清政府只能对传媒法规进行调整，一系列报律和《著作权章程》的出台便是明证。

---

①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 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 王晓毅，陈育国，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06.

② T·W·舒尔茨. 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M]. 陈剑波，译//R·科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51.

2. 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是实施制度的各个组织（包括自我实施）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变化的情况下，为谋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重新谈判，达成更高层次的契约，改变旧的规则，最终建立新的规则的全部过程。① 由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而引起的劳动工具的革新，不仅通过影响劳动方式来推动制度变迁，而且还导致了不同产权主体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处地位的变化，逐步占主导地位的产权主体自然要求更多的剩余分配，这样他们之间的博弈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晚清时媒介技术发展通过分工、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带来收益的增加，也会引起不同阶级和群体在社会中相互作用和相对地位的变化，促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自然对传媒制度变迁提出了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制度变迁的实质也是对传媒核心资源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主导地位的承认和在剩余分配上向其拥有者倾斜的过程。而且，媒介技术专业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愈高。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尖锐的紧张关系，也在促使传媒制度加以变迁。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度选择主体识辨与预期制度安排创新中的成本与收益的确定性和程度高低的能力越强，制度创新的成本将越小，利益就越大。② 晚清社会是由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经济向以自由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更，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变化，使晚清社会处于非常态的制度变迁过程之中。因为要自发地形成与媒介技术发展过程相适应的正式传媒制度安排，成本太高，时滞漫长，而移植一种制度安排较之制度“发明”会缩短其时滞和降低其成本，所以晚清系列传媒法规中相当一部分皆自日本传媒法规移植而来。这种移植显然也从侧面支持了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其对传媒制度的影响进一步成为可能。

三、媒介技术发展会降低传媒制度变迁成本，从而有利于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即指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安排的创新过程，是制度主体通过创建新的制度安排获得追加利益的活动。同时，只有当制度创新所设立的目标与既定的制度遗产距离较近时，其变迁成本才较低，制度变迁的目标才

---

① 林红玲. 西方制度变迁理论述评[J]. 社会科学辑刊，2001(1).

② 张东刚. 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安排与变迁[J]. 南开经济研究，1994(5).

更易实现。

晚清时，印刷技术和印刷材料设备的引进，使印刷复制技术从手工生产到机械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书报刊等印刷媒介的印刷质量和印刷速度，增加了书报刊的数量，降低了印刷成本。而电报等先进通讯技术的运用则大大降低了建立在大量个人参与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的组织成本，这也使创办报刊变得有利可图，于是不断有人加入报刊出版的行列，尤其在1895年以后形成了两次办报高潮，报刊数量迅速增加。① 正是由于晚清新式出版使成本降低，书籍报刊由少数上层人士的专有品变为广大民众都可以看到的读物，各类新思想、新学说能够广泛传播，营造出新的传媒文化环境，增强了传媒制度变迁的供给力量。这样一来，晚清时传媒制度变迁的目标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新的传媒文化环境，统治阶层已无法对其变迁设置障碍，其变迁成本自然大为降低，变迁目标自然也更易达成。

四、媒介技术与其他因素产生合力，共同作用于传媒制度

由于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的变迁方式不同，所以均衡的制度只是一种局部均衡。因为均衡是局部的，所以制度总是要变迁的；因为局部是均衡的，所以制度变迁又总是渐进的。② 传媒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也是具有不同偏好、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制度变迁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

1. 其他技术的助推

传播媒介的影响都来自于一个简单的技术事实：每一种现代化的媒介都提高了控制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它们通过缩减传播者和受众、信息和介质之间的距离来实现这一点。比如晚清新式的印刷出版技术解决了快速生产和标准化传播的问题，并能以足够的发行量满足广大地区的需求。但是媒介技术本身并不拥有一个有效的发布系统，它必须依赖与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才能实现快速而广泛的流通。

晚清"凡铁路设站、电报设局之各处，均添设邮政官局"，显然铁路运输速度快、运量大、运费低为印刷物的快捷广泛流通大开方便之门，而电报虽然"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时效远胜于文书传递，但电报最终还是要经过投递，必须借助邮政现

---

① 据《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的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出版了500多种中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集中在上海(33种)、香港(6种)、广州(7种)、北京(6种)、天津(5种)等地。而在1911年，创刊的又超过200种。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3-4.

② 林红玲.西方制度变迁理论述评[J].社会科学辑刊，2001(1).

成的网络与人力方能顺利进行。也就是说，晚清先进的媒介技术必须在交通运输等技术的助推下，方能为信息的传递提供更好的平台，并进而影响传媒制度的变迁。

2. 技术与政治的一致内因

由于传媒制度与政治体制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媒介技术作用于传媒制度可以通过一种“间接途径”，即通过作用于政治体制再传导到传媒制度上来。晚清“新政”后，传媒制度的变迁急遽提速，便是一个佐证。

归根结底，就技术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技术是政治的影子，政治则是技术的灵魂，技术的产生依赖于政治的推进和影响。实际上，技术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政治所表明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中国的变革传统中，政治权力中心往往才是制度创新的决定力量。政府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极为深刻地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轨迹。所以，晚清时媒介技术的发展要对正式传播法规产生影响，显然离不开权力中心的主导。同样的，晚清政治的有效统治也离不开媒介技术的支撑，媒介技术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技术与政治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和工具，内在的动因是一致的，只是两者的指向物有别而已。

3. 历史契机中的关键节点

很多史书中的归纳和演绎可能导致我们产生一种误解：误以为所有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都是一种预计和深思熟虑的结果。以致我们回顾历史上某种事件或某个现象是如何达到其现状的时候，我们总能诠释出其为什么发生的客观规律。但事实上，历史不是一部事先写好的剧本，而是一支杂乱无章的即兴曲，在发展的每一步中，都蕴藏着无限多的插曲。细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况也能把历史发展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

也就是说，尽管历史具有某种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意识为转移，但历史并无预定路线或模式，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要得以实现，很多时候要取决于已经存在的偶然因素，特别是某些关键节点和重要契机。

中国的近代文化运动既然不可能是由内而外、自下而上的自发演进过程，而是一个外烁的、引进型的文化运动过程，那么，“近代文化运动的发起，就有待于这个当时中国唯一之精英群体的士夫阶层的行动；既然士大夫们‘雨过忘雷’、‘仍复恬嬉’，那么只能让更大的‘雨’和‘雷’来惊醒他们”①。

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的心理活动有一种“恐惧唤醒”的功能，一旦国家民族出

---

① 汪林茂.晚清文化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1.

现重大危机和社会问题时，人们的观念常常在短期内发生极大的改变。康有为在中法战争失败后就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症结所在："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君上之尊宜矣，然自督抚司道守令乃至下民，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级难通。夫太尊则易蔽，易蔽则奸生，故办事不核实，以粉饰为工，疾苦不上闻，以摧抑为理。至于奸蠹丛生，则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①]康有为之语不幸竟成谶言，甲午一战，堂堂中华不堪蕞尔小国一击，惨败收场，对此国人莫不惊诧万分。

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在此前的中国的上层文化人中，很少有人特别地把日本放在眼里的，关于岛国虾夷的印象和想象，始终滞留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给他们带来自大、傲慢还加上无端的鄙夷。"东洋"在近世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不可以与"西洋"相提并论的。[②] 这场为期不长，但却令中国羞愤以终的战争，不但令中国的朝野人士体认到明治维新的厉害，同时也使他们开始认真考虑中国为何会失败这个严肃问题。

康有为曾上书皇帝说："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赔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列国皆启觊觎，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③]吕思勉也有类似的回忆，"余年十一，岁在甲午，而中日之战起，国蹙师熸，创深痛巨；海内士夫，使群起而谋改革。于是新书新报，日增月胜"[④]。

因此，就近代中国报刊的演变而言，虽说自鸦片战争失利后西方文化即源源而入，大幅侵蚀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肌体，但真正的关键节点并不在鸦片战争之后，这个一般都认为是近代史开端的历史事件，其实对报刊的生成只造成部分的影响。相比而言，中日甲午战争就比鸦片战争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马关条约的苛刻条件非常明显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势，甚至可以说，从 1895 年起，任何振兴的希望都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排除了。因为甲午之战除了舰队被重创、战略要地被占外，还有巨额的战争赔款。就在清廷气息未喘之际，紧接着又是庚子国变带来的更为巨额的赔款。中国既没有充裕的时间，也没有平静的心情和必要的手段来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潮水般的入侵。当时的整个中国负担益重，经历着

---

① 康有为. 上清帝第一书[M]//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1：59.

② 葛兆光. 1895 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J]. 开放时代，2001(1).

③ 康有为. 上清帝第三书[M]//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1：139.

④ 吕思勉. 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M]//吕思勉遗文集(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373.

令人窒息的考验。

而清廷的改革决心，被庚子国变的"巨额之代价"①进一步推动。正如梁启超所言，"庚子八月，十国联兵，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舆播荡，神京陆沈，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②。庚子国变造成了全民族的灾难，加重了全民族的危机感，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统治者，经历了播迁逃亡、豆粥难求的苦难以后，以巨额代价，增一层见识："时经大创后，太后已恍然于国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后行政之方针，不能不从事于改革，以图补救，乃以决行新政之谕旨，布告中外。"③

于是，彻底改革突然成了上下的"共识"，激进情绪突然成了普遍的"心情"，曾经是顽固保守的官员、给中国带来压力的洋人、对国家积弱状况并无深切了解但是有切肤体会的平民百姓，以及始终自觉承负着使命的知识阶层，似乎在1895年的刺激中，一下子都成了"改革者"，而改革趋向竟是相当一致地向西转。④

本章小结

因为技术、经济、人员素质、传统道德观念、社会需求和相关正式制度的缺位等多种原因，活字印刷术虽然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但是长期未占主流，自然也未能对传媒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影响。而晚清媒介技术为何能对其时的传媒制度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或者说，晚清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制度的影响是如何可能的？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应该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媒介技术发展导致传播新观念的产生与扩散，促使非正式传媒制度的出现；第二，媒介技术发展会对正式传媒制度的变迁产生需求；第三，媒介技术发展会降低传媒制度变迁成本，从而有利于传媒制度变迁；第四，媒介技术与其他因素产生合力，共同作用于传媒制度，并促使其变迁。

因此大致可以复出这样的结论：传媒制度绝不是空泛的、毫无生命力的书面条文，而是由社会主体的实践所建构并不断重构的行为规范。任何传媒制度的产生、维持与变迁，皆须有相应的媒介技术体系作为支撑。

---

①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515.

②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N].清议报(第100号),1901-12-21.

③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515.

④ 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J].开放时代,2001(1).

当然，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的关系不能被当作一个普遍的有效声称，其有效性必须有相应的历史条件作为支撑方能成立。与古代社会背景相比，晚清社会的一个殊为相异之处就是出现了特定的历史契机。细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发展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洋务运动时期各种变化并非单纯的技术、器物变革，也不是个别、孤立的历史表象，而是系统的社会变迁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革。媒介技术在晚清的发展离不开洋务运动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若缺少了这样的时代背景，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传媒制度的变迁或许又会呈现出另样的路径与态势。

第六章　传媒制度在媒介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分析

一种技术通常被嵌入到一个社会结构之中，这一社会结构影响技术的发明、发展、扩散，影响技术对于社会的作用。[①] 技术的发展也是一种制度化的过程，"当我们希望技术'冲掉'我们所有的制度难题，将我们提升到一个几乎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更高的生存状态时，我们是否是正确的？我认为，这即是一个令人慰藉的想法，也是一个非常令人误解的想法"[②]。显然，媒介技术并不能无限制地自由发展。它的发展进程是由有势力的集团的活动和社会的利益决定的。[③] 我们应该揭示其背后隐而不显的后设权力。

正如钱存训先生指出的："印刷术在社会上的功能是相互影响的，并不完全是印刷术影响社会变革，各种社会因素也是促使印刷术发展或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④] 媒介技术的影响虽然是巨大而持续的，但在中国没有什么能比传统更具有影响力了，各种受制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而形成的文化惯性一直制约着媒介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而传媒制度就是文化惯性中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重要规则体系之一。

第一节　晚清传媒制度变革前对媒介技术发展的阻滞

新闻传播历史久远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新闻活动为什么始终没有结出近代大众

---

① E·M·罗杰斯. 传播学史[M]. 殷晓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510.

② 赫伯特·席勒.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 刘晓红，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44.

③ 戴维·巴勒特. 媒介社会学[M]. 赵伯英，孟春，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80-81.

④ 钱存训. 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60.

传媒的果实，而是在西方传媒的直接导入下，才完成了传媒的近代化进程？为何造纸术和印刷术在中国的改进只是促使知识逐步民众化，而没有像它们在西方社会那样催生出现代文明？换言之，造纸术和印刷术对古代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显然都无法让人满意，从制度角度寻找原因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制度是国家这个权力容器的基本单元，主要制度单元的相互作用决定着权力容器的基本走向，型塑着社会结构。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了技术的选择和组织形式。因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必然会使其增长机制内生出某种资源配置偏好，进而造成选择性的技术发展。而且，制度总是带有保守性，"人们对于现有的思想习惯，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要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因此遗留下来的这些制度，这些思想习惯、精神面貌、观点、特质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个保守因素"①。

归根结底来看，制度是人们行动的产物，绝不只是事先安排的结果。路径依赖理论告诉我们：在历史长河中，有那么多的十字路口，每一步选择都可能是影响深远的一步。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每一步选择都与过去的选择分不开。

一、传统制度遗产对晚清的影响

作为已有社会惯例、结构的储存，传统制度使"集体记忆、表述、价值、标准、规则等外部化，以使它们比我们人类更持久"②，它们是经常被复制的规则和资源。而且，人们过去做出的制度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作为一种既定的存在，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会按照其内在规律和特点相对独立地运作下去，即所谓的路经依赖。改革路径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是政治制度本身，还是信仰制度都与历史密切相关；它们的产生和演变受过去的影响，同时也限制了当前和过去改革路径方式的选择。

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旧结构处处都对由技术、生产手段、交通和运输的发展所引起的相继变化造成了强有力的抑制。在一个像中国那样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其历史包袱当然会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令人感到更大的压力。③ 明清以来业已千锤百炼的政治制度、皇位制度、文官制度、宗法制度等巨大的礼法制度文化惯性，碾

---

①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M]. 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40.

② 马克斯·H·布瓦索. 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M]. 王寅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390.

③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M]. 耿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70.

碎了一个个有识之士的梦想，断送了一个个仿佛存在的现代化契机。①

1. *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制度*

尽管关于中国自秦以降的社会是否属封建社会的问题，学界尚存争议，但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官—民”二重结构的社会，②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结构中，官与民在权利上极不对称，民很少有与官谈判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莱克(E. Black)称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结构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中央政府的控制没有深入到乡村一级，官僚体制没有跟着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而进行修改。中国的行政制度还被认为是循环性的，因此到十九世纪末，中国陷入了混乱状态”③。这种中央集权的统治最主要就是突出了皇权的专制。“皇权制度是在资源配置的家庭化过程中，构建其生存基础的。由此而产生的开放流动的精英政治结构，和分散独立的小农个体家庭经济结构，成为皇权制度得以立足的两个新基点”④。

这一结构一直延续至晚清，构成了当时社会的基本制度环境。在这种结构中，“政治规则规范着一切经济规则，而政治规则并未按照效率原则来规范社会及个人的行为，它受到政治的、军事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约束。这一基本制度框架进而决定了社会其他制度安排，其他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官僚政治的衍生物”⑤。

或者换个说法，中国古代社会留给晚清的政治制度遗产是典型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度。它的基础不是官方的义务，而是个人的目的，不是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一种严格的个人效忠。这种挟巨大文化惯性的制度使得晚清“时弊”丛生。所谓的“时弊”是与清朝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相伴生的。尽管清朝有相当严厉的管束官僚的正式制度，但由于一方面监督成本巨大，另一方面监督权自身的腐败，这些正式制度在执行时大大地走了样。而且，清朝是个人口较多的朝代，⑥社会事务浩繁，高度中央集权下的皇权做出有效决策的难度更是进一步增大。

因此，“时弊”其实乃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长期博弈后形成的均衡。这些塑造日常生活指引普遍世俗活动的时弊，乃是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加上其执行

---

① 李宝臣. 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90.

② 张杰. 二重结构与制度变迁[J]. 社会科学战线，1998(6).

③ 西里尔·E·布莱克，等. 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M]. 周师铭，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59.

④ 陈庆德. 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97.

⑤ 谢咏梅.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J]. 学术交流，2006(5).

⑥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和田赋统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附)历代人口比较图.

的方式的错综影响的共同结果。它们虽低效，却具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媒介技术要取得发展，不仅要与其时的传媒制度，而且要与整个政治制度进行较量。

2. 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制度、土贡制度和官工业制度

抑商政策是作为重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古代到近代，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替的一个传统政策，是历代王朝力求实现的一个政治的和经济的目标。所以在每一个时代都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他与此有关的经济思想和政策，都是由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政策派生出来的。①

有关抑商政策和抑奢政策的言论、建议和法令等虽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真正使抑商政策收到了效果的是禁榷制度、土贡制度和官工业制度。

在抑商政策的指导下，国家直接介入工商业活动，并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禁榷制度。所谓禁榷，就是某些工商业禁止私人经营，完全由政府以垄断方式官营。据考证，这一制度首先在周初由齐国发明，在汉朝得到充分发展，首先官营的是与人们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的盐和铁，在以后的朝代中逐渐扩展到其他许多行业。② 禁榷之制，使国家直接涉于市场经营，以共分市利之手段，把市场力量附着于皇权机体。土贡制度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把本来可以当作商品来生产和当作商品来贩运的大量物品，现在都越过商业程序，不从公开市场上购买，而以任土作贡的方式，直接向民间索取。

禁榷制度既可抑商，又能保证政府充足的财政来源，同时自然而然催生出官工业制度。"真正的官工业从汉代开始发展起来，汉王朝在周秦官制的基础上，把官工业系统加以扩大，除了在京设立各种作坊或工场外，还在各种重要产地设立宫官，监督生产。此后，各个朝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官工业的规模和种类"③。应该说，禁榷制度和官工业制度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本质上不是对技术活动的保护和激励。这种情况一直到晚清依然存在。

3. 意识形态问题

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构成了国家赖以创建社会秩序的条件。一个社会的特定

---

① 傅筑夫. 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C]//中国经济史论丛(下).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608.

② 傅筑夫. 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C]//中国经济史论丛(下).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654-665.

③ 谢咏梅.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J]. 学术交流，2006(5).

结构造就了不同的人群，而意识形态则确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适当角色和前程。[①]

意识形态在清代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统治的工具和国家的思想观念，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有两大特色：在哲学上以程朱理学为骨干，在思想上以“君尊臣卑”和“华夷之辨”为核心。历康、雍、乾三世，统治者通过发布上谕、甄别官吏、编纂文献、科举考试、文字狱等政治和文化手段，把意识形态观念编织的完备而沉重，清代学者称这套观念体系是“以理杀人”（戴震），后代学者则形容为“刀锯鼎镬富贵利达”、“从我者乃正学，背我者即大逆”（钱穆）。在清初和清中叶，这套意识形态体系对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到了晚清，这套意识形态体系又转而成为历史进步的沉重阻力。[②]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1792 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 80 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 29 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根本没有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

4. 古代的新闻传媒制度

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独霸舆论话语权的同时，凭借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限制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出版行为。秦始皇在公元前 213 年颁布的“焚书令”，可以说是揭开专制社会言论出版高压的序幕，以后各种“禁言”、“禁书”、“禁报”的新闻查禁制度一直沿用下去。戈公振也曾指出：“自汉唐以迄清末，以邸报为中心。在此时期内，因全国统于一尊，言禁綦严，无人民论政之机会。”[③]清初伊始，政府便加强了在意识形态各层面的严格控制。民众文化中的戏曲、小说、演剧赛会等，都在严禁之例。在《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六部处分则例》等法令中都有关于传播活动的苛令。

不过一般情况下，上述制度遗产“难以完全自主、自衍、具完整‘体系化’的实体姿态展现自己的”，它们“势必一再地被搓揉、形塑，在人群中以各种不同样貌展现出来。”[④]这种“体系化”在正常状况之下往往隐而不显，但在其功能失灵时总能以负面的姿态被人感觉出来。

---

① 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 李伯重，连玲玲，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1.

② 郝晏荣. 中体西用与晚清意识形态[J]. 河北学刊，1998(3).

③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21.

④ 叶启政. 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搓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3-104.

二、晚清正式传媒制度对媒介技术变革的明拒

在“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的古代中国，非正式的规则体系已经加大了人们创新的代价，作出“微小的背叛”尚属不易，若再碰到具备正式惩罚机制的阻挡，真的是无可遁逃了。这样的结构性障碍内生地阻碍着媒介技术的创新。

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广大平民既没有参政议政权，也没有对朝政的知情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语，在专制时代可以说不失为千年一贯的施政要则，上下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隔膜。民众也无言论的自由，一切对统治者不利的宣传，都可以被指认为“造言”惑众，被法定地禁止和制裁，这一直到清代也不例外。

清代言禁极严，尽管朝廷允许民间报房存在，但是对其抄发内容限制颇多，尤其对伪造政事、御批、奏章的不实报道更是严加惩办。① 不过，因为 20 世纪之前上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清廷对危害其统治的报刊及其宣传报道主要依照《大清律例》“造妖书妖言”条进行严厉制裁。针对不利的传闻舆论，统治者一概斥为“愚民无知，造谣生事”，申令须“严行查办”之类的官方文告更是时常发布。民间所被要求听讲于官方的，也就是“圣谕广训”之类的“纶音”和有关礼法而已。②

清政府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办报，但《大清律例》禁止“妄布邪言”、“煽惑人心”的条文像一把利剑高悬在报人们的头上。地方官吏对民间报馆的说三道四极为厌恶，稍有不满便肆其威虐，重则惩办，轻亦封闭。为了避免官府的迫害，有的报纸请外商代为出名，挂起了“洋旗”，有的则迁入租界出版，托庇于外人的治外法权。办

---

① 比如，雍正四年(1726 年)，民间流传“小钞”，揭露皇帝在圆明园与王公大臣们从早到晚饮酒作乐，消息严重失实。结果被雍正发现，认为是政敌有意构陷，查得出版小钞的报房经营者何遇恩、邵南山，将两人处死。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因办报获罪被杀的首例案件。乾隆年间发生的“伪传邸钞案”，主犯为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他们列举“五不解，十大过”，反对乾隆帝南巡，并以吏部尚书孙嘉淦奏稿的名义，伪造“朱批”，假借为内阁发抄的“邸钞”，交给提塘传抄。这可谓利用原始形态报纸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而遭到杀害的新闻传播案。此案不但主犯被凌迟处死，而且株连甚广，凡是抄发者均受牵连，处罚极重。参见杨师群.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

② 按照清代定制，民间设立“讲约处所”，“每月朔望，咸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及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该州县教育仍不时训行宣导。如地方官奉行不力者，督抚查参”。及至晚清时期，这种活动在许多地方已是日久旷废，不过官方还是力图坚持，将此作为加强民间教化的重要措施。时有官员作这方面的奏请，得到清廷的肯定和颁谕推行。如光绪元年清廷就御史陈彝所奏有关事宜，即布谕“着再申明旧例，令实力奉行”。参见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Z]. 北京：中华书局，1958：121.

报被人们视为畏途，一般不敢冒罪开设。[①]

19世纪50年代起，先是在香港，稍后是在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纸，它们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但是"这些报纸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动辄得咎，经常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政府两方面的冲击"，"事实上这一时期除了在香港出版的几份报纸以外，中国人自己在内地各城市出版的报纸，很少有长命的。《汇报》只出版了一年半，《昭文新报》、《述报》连一年还不到，《新报》、《广报》算是较长的，也只出版了五、六年，终于难乎为继，一个自动停刊，一个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的罪名被地方当局查禁了事"[②]。国人办报如此艰难，对媒介新技术的扩散自是一个致命的障碍。

三、晚清非正式传媒制度对媒介技术变革的暗斥

从数量和使用频次来看，人们生活中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选择，构成人们的"约束条件集"。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保守色彩往往更为浓厚。闭塞与顽固的非正式制度也是制约媒介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无论怎样地努力，它并未必能够完全被剔清，而使之消失无踪。这是文化传统所具有的迟滞特质，也正是它所以发挥社会功能的关键所在"[③]。

传播的一个困难在于，"文化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总要保持协调和平衡。当一个新的文化特征纳入后，必然要带来文化整体的再调适或改变"[④]。许多非正式制度"作为形塑社会集体意识的要素，其最重要的任务在于提供定义与规范象征意义与价值……它来时，需要经过长期的染濡学习、浸淫感受。同样，它要去时，也必须经过漫长时间，历经不少世代的冲刷、洗涤、稀释、替代、消除，才可能缓慢地淡化、退位、乃至消失无踪"[⑤]。所以罗杰斯也曾说："让人们接受一个新观念，常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即使这个观念有明显的可取之处。许多创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会被广泛接受，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多年。因此许多个人和团体面临的共同问

---

① 陈玉申.晚清报业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66.

②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61.

③ 叶启政.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搓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0.

④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90.

⑤ 叶启政.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搓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0.

题是如何加快一项创新传播的速度。"[①]而且，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制度不会对正式制度的变化立即作出反应，因而，已改变了的正式制度与持存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对理解传媒制度变迁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曾有论者对中国社会中的文化阻滞力的日常生活结构和基础，作了一个概览式的简要描述：

第一，中国成熟的传统农业文明孕育了异常发达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而发达的日常生活世界又使农业传统文明的文化精神绵延不绝。

第二，传统日常生活的内在图式形成了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孕育着"以过去为定向"、抑制内在的理性反思的保守的传统文化精神。

第三，自然性、经验性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不仅构成了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图式，而且渗透和同化了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②] 所以，一项媒介新技术在扩散时需要较量的，"并不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而是在该体制运行过程中，由于某些正式制度长期失效或供给不足，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或者说是官僚体系内经过长期权力博弈而形成的'潜规则'。而这些恰恰是真正得到了执行、影响了历史的制度"[③]。晚清以前如此，晚清时亦是如此。

直到晚清，中国的宗法制社会都属于换瓶不换酒的状况，即由宗法血缘关系维系，政治与伦理一体化，"家国同构"的制度。该体系自上而下地实行愚民政策，限制文化的下层交流。在技术层面，只能向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宗法制妥协，难以逾越手工制作的鸿沟。[④] 这些"规则"蕴含在我们的行为中，深深地嵌在我们的习惯和潜意识的心理历程中。然而我们之遵循这些规则乃是有序的社会生活之本质。[⑤] 洋务派曾在传统的制度框架中进行了有限的媒介技术变革，但传统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新技术的引入遇到重重障碍，因而变革异常缓慢。媒介新技术要么成为御用的，要么成了是奇技淫巧，其发展难以逾越小农经济所决定的社会范畴，维持现状成了最好的选择。

---

① 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4版)[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

② 衣俊卿.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J].学术月刊，2006(1).

③ 龚虹波."制度中人"与制度的较量——也说张居正改革悲剧[J].浙江学刊，2002(6).

④ 邵培仁，海阔.宗法颠覆论纲——传媒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3).

⑤ 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下)[M].于嘉云，张恭启，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1：541.

正如美国学者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所言,"由文人组成的中国式的官僚士大夫对科学、商业和实用之物极少有兴趣,也不大同情、支持"①,面对新的媒介技术和传媒形式,清政府起初出于蔑视和害怕而加以抵制,长期的积习使得他们害怕变化,害怕在变化中丧失主动权。士绅阶层对媒介新技术的抵抗自然也有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的成分,但是其中的利益因素也不容忽视,因为新技术的引入总会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

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关系主义②三种不同文化制度胶合粘连的影响下,中国传统行政体制的制度性文化惯性为晚清媒介技术的变革制造了许多障碍:君主权威与个人专权,文官集团的行政模式与政治观念,普通民众中间浓厚的血缘、地缘意识和自然经济的财产观念不利于经济协作精神的成长和社会普遍信任机制的建立。除了极特殊的个别个体以外,守旧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最佳选择,社会结构只能停留于劣位帕累托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非正式传媒制度与正式传媒制度结合后造成的结构性障碍在激励导向上背离了革新方向,并内生地压制着一切创新,羁绊了媒介技术发展的脚步。

四、其他制度的间接阻碍

有些制度虽然不能直接列入传媒制度之列,但它们和传媒制度关系密切,而且也对当时的媒介技术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比如,在传统的生育观的影响下,再加上清廷税收政策的刺激,③在经过数千年的缓慢增长之后,18、19 两个世纪中国人口急剧增长,④到 1840 年人口总数达到 4.1 亿多。⑤ 从数量上看,中国已经成为人

---

① 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M].周光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90.

② 边燕杰认为,个体主义文化以满足个人需要为先决条件,通过协商、共意和契约达成群体整合。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人利益的实现存在于集体目标的达成中,先集体后个体。集体主义可能存在"极权专制"和"分权民主"两种整合管理模式。而关系主义文化则将个人欲望的满足放在人际网络中,是一种特殊的小群体取向的互惠整合。参见周怡.共同体整合的制度环境:惯习与村规民约——H 村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6):注释.

③ 嘉道年间是清代历史上水患频仍的时期,黄河、运河、永定河、汉水等或漫溢、或决口,南北各地几乎均遭水灾,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影响人口的增长。但这一时期人口仍能明显增长,主要就是"摊丁入亩"等经济政策在起作用。参见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0.

④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和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附)历代人口比较图.

⑤ 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5.

口第一大国。人口既多，人口问题随之而来。人口问题集中表现在人口素质低下、人口分布不平衡和人口过剩严重三个方面。[①] 至为关键的是，人口过剩的压力限制着生产技术和工具的改进——因为劳动力大批过剩，连那些各有专能的技术工人，也只得“立桥以待”、“延颈而望”，因此只要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便可榨取利润，而不必用较高的价值去改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使得社会难以生长对媒介技术创新的需求。

而且，晚清时的“自强”本身就是一种基于民族全体生存意识之上的民富国强的构想，是一种“群体富强”，所以，人们在考虑引进机器生产时，也自然而然地从全体生存意识出发，要权衡机器对于全体生民的利害，考虑人口压力下的人民生计问题。[②] 这种新的机器生产方式，将会损害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因而出现“夺民生计”的现象，这就成了一些人反对引进西方近代先进技术的一大理由。

1901 年，清廷明令废止八股，改试策论。1905 年，科举完全废除，石印科举用书一下子失去了市场。在社会竞言新学的情况下，一般读书人对于传统典籍的兴趣减弱，石印古籍销路大减。《扫叶山房石印书目序》有云：“科举既废，新政律兴，革装书籍，挟新思潮以输入，治板印刷，盛极一时，故籍陈编，束诸高阁，而石印书亦受影响。”另一方面，石印需要的印机、石材、油墨，需求量大，完全依赖进口，不少纸张也是由进口得来，成本消耗很大，没有相对大而稳定的市场是很难维持的。由于石印“其兴也勃”，甲午战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很快冒出近百家石印书局，碰到科举废除这样的大事件，像鸿文书局、蜚音馆等不少书局顿时就垮了，真可谓“其亡也忽”。而“其兴也勃”与“其亡也忽”恰恰生动展现了社会其他制度对媒介技术发展的掣肘。

第二节　晚清传媒制度变革后对媒介技术发展的推动

技术并未决定社会，社会也没有编写技术变迁进程的剧本。[③] 技术存量规定了人类活动的上限，但其本身决定不了人类的成功。反之，“制度管辖着技术，它持续的时间也许会远远超过人类个体的生命期限”[④]。正是制度安排决定了知识和

---

① 史革新. 中国社会通史 · 晚清卷[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78.

② 李长莉. 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22.

③ 曼纽尔 · 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王志弘，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6.

④ 赫伯特 · 席勒.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 刘晓红，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44.

技术的增长速度。传媒制度的变迁绝不只是对媒介技术变动的一种滞后回应，它有时对媒介技术发展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排除制度创新的动态性和能动性是不合理的。制度设计的任务在于建立技术的共有和私有之间的平衡，既保持私人刺激以激励创新，又保持公有性以促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从20世纪初报刊的迅速增长可以对制度对媒介技术的支撑作用作一个侧面了解。自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开放"报禁"、"言禁"以后，国内新闻事业再次步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民间办报数量年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新创办的报刊，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新闻事业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每年都新创办报刊百余种以上，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1908年为118种，1909年为116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为209种。报刊出版以上海与武汉为两大核心基地，然后扩散到六十多个城市或地区，几乎遍布全国。①

当然，这种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官方新闻政策与法规"犹如一道厚重的闸门，启闭的大小直接影响报业之河的流量"②，很显然，尽管晚清报律出台的目的在于对当时印刷出版事业进行规限，但如果一味忽视它的某些积极作用，就无法圆满解释晚清报刊发展高潮这一客观现象。

一、传媒制度结构的复杂性和层次性

传媒制度结构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既涉及正式的制度安排，又关联到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既涉及政治经济制度，又关联到思想文化制度；既涉及针对媒介技术发展而作出的专门性的制度安排，又关联到大量并非专为促进媒介技术发展、但对媒介技术发展切实发生重要作用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亦如相关论者指出的，"任何新闻(报业)制度，均为政治制度之一环。换言之，一个社会的政治哲学决定它的新闻哲学；而新闻哲学又直接决定它的新闻政策、新闻制度与新闻观念的价值标准。所以任何国家的新闻事业，必须服务于它所依附的政治制度，及其生存社会的价值标准，此乃一项必然的选择"，"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③。也就是说，传媒制度结构是有层次性的，各种传媒制度安排在重要程度上有所差别，如根本性制度、重大性制度和辅助性制度在媒

---

① 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396-419；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4.

② 李斯颐．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1).

③ 李瞻．报业与政治制度关联性问题论纲[J]．中国传媒报告，2008(3).

介技术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大不一样的。根本性制度是指对技术创新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持续稳定的技术创新就不可能产生；重大性制度是指对技术创新起重大促进作用的制度安排。辅助性制度则是指那些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弱于前两者或者虽然作用较大但以非正式制度形式存在的制度安排。

二、正式传媒制度对媒介技术发展的激励作用

知识和技术确立了制度创新的上限，而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确乎需要知识、技术的增长；反之，制度则确立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上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创新总有一天要被遏止，正是制度创新在此时成为技术进步的前提。[①] 落后的传媒制度会成为媒介技术发展的巨大阻滞，造成媒介技术停滞不前，而设计良好的传媒制度能使媒介技术发展的可能性边界不断扩大，对其产生强大的助推作用。

制度体现着理想的存在和力量，它们之为理想服务是靠着把理想从容易滑坡的主观地带转移到理性的事实、需要和兴趣的坚实地基上面来。[②] 它们与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互为条件：制度是实践活动所倚赖的规则和资源，又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而体现。

1. 提供产权激励

从理论上推论，凡有巨大应用价值的新发现或新发明或者（更广泛的）新知识，其发现者或发明家必定有很强的动力去保守秘密，以从中获取租金；除非有诱导性的制度设计足以补偿他披露这一信息而损失的租金，发明或发现才可能被公开。事实上，前一种途径成为科学发展走过的途径，后者则是知识产权制度所经历的道路，所以，在思考科学的起源时，如果没有外部实施的补偿机制，公开披露肯定首先发生在那些没有直接应用价值或者应用价值不那么明显的领域。[③] 投资于新知识和发展新技术的盈利性需要在知识和创新方面确立某种程度的产权。如果缺乏产权，新技术就不可能唾手而得。[④]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技术的巨大进步，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专利法及一系列保护产权的制度的实施，给技术变迁提供了外在激励

---

① 庄炯涛，张晓姝.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分析和思考[J]. 技术经济，2007(6).

② 阿诺德·盖伦.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M]. 何兆武，何冰，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148.

③ 范世涛. 技术创新的制度分析[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38.

④ 道格拉斯·C·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0.

框架,从而增强人们对技术变迁的需求。

而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下的私有产权远远不同于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私有产权。自然经济下的私有产权只是所有者对生产要素获得的产品的排他性使用,却不包含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自由使用这些要素生产产品满足消费者以换取自身需求的自由。所以,中央集权下的中国古代私有产权的享有是不充分的,创新可以被人无代价地模仿,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起系统的产权,这大大降低了人们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中国古代社会活字印刷术长期未得到大规模推广的原因中,因缺少激励因素、人们难以有动力去对印刷术进行改进创新也是至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制度变量集合中,明晰的产权界定为媒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提供了保障。传媒制度的有效安排保证了能给媒介技术创新主体带来预期收益,从而可以尽量减少技术变迁的外部性,避免创新利润溢出,从而造就了引导和确定媒介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这对媒介技术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之作用。晚清时,政府的鼓励激起了人们开办公司、创办实业的热情。而资本的社会化,则有利于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商务印书馆从 1897 年创建时的区区 3 750 元资本,成长为拥有股本 100 万元的庞然大物,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就应当归功于这种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①。

2. *提供市场激励*

国家的产生是为了节约社会交易费用,其权威性在于生产博弈的基本规则。为了兼顾主体的创新能力和社会效益,国家必须保持一种使创新的私人收益率趋同于社会收益率的平衡。②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③。人们对技术变迁的需求必须是建立在这种变迁能够给变迁主体带来变迁收益大于变迁成本的预期下才会发生。对于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而言,合适的传媒制度的作用不但可以建立这种预期,而且可以提供市场激励。

甲午战争前的 20 年间,国人先后自办了约 20 家报纸,除在香港的几家,内地报纸的寿命都不长,销量亦有限,没有多少社会影响。各种阻力,来自文化、经济、政治诸方面。如社会上九成为文盲,对购读新闻一事淡漠,报馆经营惨淡。工商业

---

① 黄林.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94.

② 王霆.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互动性[J].科学与管理,2008(3).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5.

不发达,投资报业者少,做广告者少,报纸难以盈利。[①]

20世纪初这种情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间,一共出版小说133部,平均每年2.2部,而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的十年中,却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529部,平均每年48部。[②] 在明清两代(1368～1911)的543年中,一共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1146部,而其中1901～1911年的11年中,就产生了529部;短短11年的创作总量,竟占了540多年的46%。而这46%显然离不开当时巨大的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的背后显然又凝聚着20世纪初晚清传媒制度的巨大推力。

图书出版行业中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广泛使用,不仅引发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也为图书出版企业由手工作坊向工业化大生产过渡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清政府的相关改革举措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戊戌时期《振兴工艺给奖章程》的出台到晚清新政时期《奖励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爵赏章程》等规章的颁布,表明了清政府在振兴工商业方面政策的连贯性;而由政府出面来对各类公司(局、厂)创办人进行奖励,这在有重农主义传统的中国也是罕见之举。[③]

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出版业内全方位地推进,也渗透到出版者和作者的关系之中。出版者和译作者通过经济合同来形成协作关系,如1903年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出版合同,规定版税率为40%,实现了报酬支付手段的资本主义化。出版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广告的开发,商人出钱登广告,广告又给商人看,对于出版业来说,销售是市场,广告是利润。商业广告促进了大上海商业的繁荣,大商埠的风车也就这般加快了旋转。[④] 而市场的繁荣自然对媒介新技术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自然也就推动了媒介技术的发展。

3. 提供税费优惠

晚清政府能够对某些市场失效方面的活动提供税费优惠,对之加以激励。其中不少税费优惠和传播活动密切相关,对媒介技术发展的促动自是不言而喻。

对于报馆而言,邮政部门的收费直接决定了新闻采访的成本。电报技术引入之初费用异常昂贵,有线电报开通后,由天津拍到上海的"上谕"部分,费用"由报界与官界分任之"。1894年各省电报机构设立后,报纸常用电报拍发"乡试榜名",其费用与其他电报收费相同:"其纳电与商电同,每字一角起,每间一局递加一分。当

① 杨师群.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6.

② 欧阳健. 晚清小说史[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2.

③ 黄林. 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93.

④ 王建辉. 出版与近代文明[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6.

时系以线路之远近，定收费之多寡。”①

1896 年 3 月 20 日，清政府创办国家邮政局，规定报纸的邮费标准为：中文报纸每张每厘，外文报纸每张一分，这对扶持刚刚起步的中国民族报业十分有利。1897 年 3 月，清廷决定修改邮局章程，进一步减低新闻纸邮费，按货样标准纳费投寄报纸，邮费略低于普通信件。

报律颁布之前，曾有一些地方对报界实行邮电减费，但是并不普遍。1907 年底，北京 8 家日报联名请求邮电减费，引起清廷重视，遂由邮传部分咨各部大臣妥议办法，制定统一规章通行全国，同时在《大清报律》中列为专条（第 37 条），使邮费电讯费减收成为定规。1908 年，原按全价收费的报馆密码电报也减半收费，1909 年又在此基础上减价 20%。这些规定从经济上对报馆给予支持，但是这种扶持是有目的，清政府以控制新闻的传递渠道为手段，来规范和约束“其有确遵报律，有裨治安”的报馆，并指出凡遵守报律的报纸，减半收费。

晚清“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图书发行业税收和运费的减免则基本上是出于积极的考虑，差不多可算是一种主动行为。这些费用的减免，表明了清政府对书业的一个基本态度，也能有效降低图书的发行成本，使出版者可以更优惠的价格进行推销，最终有利于促进图书的广泛流通。

1902 年 12 月 16 日，《大公报》报道：“上海书籍贩运过牛庄时，例须报纳关税。实按斤厘以为之的。凡书籍重至百斤者，纳书税银七钱。近日，洋关为输入文明起见，特颁示谕，将书税一项悉行豁免云。”②王维泰在《汴梁卖书记》中记载：1903 年农历二月初四日，一当他们一行人到达汉口后，“承施润翁饬人转问洋关，知书系免税之物”③。可见，到 1903 年初，图书免正税已开始实行。

“招商局轮船装运官书，向免半价”，既然是称“向”，那自然是由来已久、有所依据的，或有成文规定，或依据惯例。不过民营书局在这方面是享受不到优待的。但

---

①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309.

② 当然，1903 年农历三月十一日《大公报》的一条要闻却说的是另一回事。“京师大学堂总办处自本月初二日选派藏书楼供事夏傅鼎前赴天津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提取书籍、仪器、标本等件，共二十四箱。外有管学大臣一函致津海关道唐少川观察，商请免税放行”。如果图书等教育用品免税已成定例，那又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商请免税放行呢？因此，图书免正税是否在此时已成为一项定制并在全国得到执行，这本身仍有很大的疑问。但是不论怎样，图书作为教育发展的必需品，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它的运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清政府及地方大员的税收减免支持，这还是可以肯定的。

③ 王维泰. 汴梁卖书记[M]//张静庐辑注.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4：410.

文明书局的廉泉也曾以“书籍为教育用品、启迪百姓智识”为理由，要求免于纳税，但这一要求遭到了海关洋人的拒绝，他又转而向袁世凯陈说，“时袁世凯方握直督篆……闻之颇韪其说，遂令廉以书贾名义，正式禀求，即日为之奏请，得旨报可，遂著为定案；惟濬浦捐发生于奏案之后，未能援免”①。依靠自己的努力，依仗直隶总督袁世凯、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当轴诸公”的关照，文明书局支付“招商局轮船运费按四成核收，津榆、芦汉两铁路运费减收半价。”减免运费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各书局在“售卖所运书籍”的时候，可以“格外从廉”②。

4. 为媒介技术使用主体提供权利保障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凭一己之愿任意对报刊治罪已非易事，而这对于业报者来说，就是有了明确的活动范围乃至自我保护的依据，增加了安全系数。否则动辄得咎，甚至丢掉身家性命，人们对报业恐怕会避之唯恐不及，清末报业的发展也就无从提起了。这涉及人治与法治的问题。③ 清政府虽没有明令禁止办报，但《大清律例》禁止“妄布邪言”、“煽惑人心”，地方官吏对民间报纸说三道四，稍有不满便肆其威虐，重则用罪名惩办，轻则将报馆封闭。所以，报人路途艰难，往往寻求相关庇护。如寻求官方的庇护，要有大官员作后台，或直接参与，否则难以立足；或寻求洋人作为名义上的主持人，以求得治外法权的保护；或迁入租界，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躲避清廷的势力。④

但是，随着晚清传媒制度的变迁，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98 年 1 月，强学会虽被查禁但旋即被改建为官报局，这无疑是清廷“报禁”政策有所变化的一个征兆。一批维新志士也正在清廷对办报态度暧昧之时投身到近代报刊的创办之中，并且得到一些官员的认可和支持。《时务报》、《湘学新报》、《国闻报》、《湘报》等纷纷创刊。“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的革新建议和其地一些改革要求，通过光绪帝发布的上谕传向全国上下。光绪帝先后发布有关的改革法令，计有 180 条左右，平均每天颁发 1.7 条。最多的一天即 9 月 12 日竟颁发 11 条维新谕旨。光绪帝改革的心情是急迫的，改革的内容是全面的，其中有大量上谕涉及准许民间创办报馆，准许平民上书言事，官吏不得阻碍，正式承认官报、民报均有合法的地位，“报禁”、“言禁”的藩篱被冲倒，官绅士民破天荒第一次得到办报的自由。这比前一阶段对近

---

① 王维泰. 汴梁卖书记[M]//张静庐辑注.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4：414.

② 参见《大公报》，1903 年 8 月 7 日。

③ 李斯颐. 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1).

④ 杨师群.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6.

代报刊的默认支持是一重大进步，掀起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第一个办报高潮。

与第一次办报高潮相比，晚清第二次办报高潮的办报主角由改良派逐渐转换为革命派，其战斗力增强，分布地区也明显放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开始办报，且白话文报纸增多，扩大了读者面。在内容上，报纸逐渐具备新闻、评论、副刊和广告四大要素，其中新闻报道量有很大增加。在形式上，大多数报纸由近代形态发展到现代形态，"报"摆脱书册的痕迹，而与"刊"开始分家，从而使报纸的特点和优势得到不断的发挥。①

20 世纪初，以《大清报律》为代表的系列新闻传播法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较接近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新闻法：在保护还是限制新闻自由这一点上，突出了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侧重于权利本位。它在认可报刊的合法地位、规定报业管理以及新闻活动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则的同时，不仅使报界有了明确的活动范围和自我保护的依据，客观上也使得清王朝权力的任意行使受到了一定的规范制约，极大地促进了晚清报业的发展。

比如，政事、军情、灾异一直是封建社会新闻报道的禁区，晚清报律取消了部分限制，其中规定的禁载事宜只有毁谤和教唆，记者的采访自由及言论自由有所放宽。1907 年经清廷民政部批准，在司法审判时专为记者添设了旁听席；1909 年各省咨议局先后成立，均允许记者旁听辩论；1911 年资政院召开首次会议即有 20 余名记者被允许到会采访。有些地方还给记者以特殊待遇，如广东巡警总局特邀记者每周一次列席巡官会议，以谋求社会的信任和报界的监督。

自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报官话一统天下的新闻言论专制局面被打破了，报章上出现了大量披露政府内政外交、揭露地方官吏腐败的文字，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言论之苛为中国数千年间所仅见。一向被鄙为"文人之末路"的记者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升。② 连宪政编查馆在考核报律的奏折中也明确指出："报纸之启迪新机，策励社会，俨握文明进行之枢纽也。"③

此外清政府还制定了一些含有调整与规范新闻事业内容的其他法律，主要有 1908 年 8 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其中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④。这是从国民权利的角度对表达自由做出的规定。

---

① 杨师群.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6-77.

② 孙季萍，王军波. 清末报律：在创新和守旧的夹缝中[J]. 政法论丛，2001(5).

③ 刘哲民. 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G].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35.

④ 钦定宪法大纲[G]//陈荷夫. 中国宪法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58.

比较看来，晚清这一系列传播法规减轻了对违法者的处罚，大大缩小了刑罚的适用范围。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狱，因思想言论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例子俯拾即是。但是在清末报律中，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体现出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以行政处罚和民事处罚为主，以刑事制裁为辅，甚至是泄漏国家机密这样严重的行为都只是仅做罚款处理，只有鼓动反对皇室和推翻现行政权的言论须依照刑律治罪。在实践中，《大清报律》颁行以后，尽管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的言论比比皆是，但处以刑罚的案件很少，并且量刑也不重。处刑最重的是《京华报》的馆主，因该报转载海外革命派的文章而被判刑 2 年。①

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合力

传媒制度是共同作用于传播活动、传播现象和传播秩序的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系统。组成该系统的每一要素都外生地影响着人们的选择。这些要素共同激励、促使和引导人们根据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s）采取某种媒介技术实际上该技术或许只是众多可行技术中的一种。

传媒制度结构是一个分层次的约束体系，正式传媒制度的演化表现为政府命令、法律条文的改变，非正式传媒制度的演化则表现为“千百万次微小的背叛”。人们由于对利益的追求而产生对原有制度结构的突破性行为，这类行为最容易在原有制度结构的边际上取得进展。正式传媒制度可以促进或阻碍这种“微小的背叛”，从而可以加快或减缓非正式传媒制度变迁的步伐。当然，正式传媒制度与非正式传媒制度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很多时候两者只存在实施方式或程度上的差异，因两两者之间常常发生良性互动，产生合力。对于从外部世界引入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接受或拒绝的原因取决于它能否与自己构成新的博弈均衡。也就是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关键看两者能否在逻辑体系上达到“自洽”状态。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就一般意义而言，是指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体系经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制度互补性”②，使制度结构达致新的“双适态”③。当

① 屈永华. 宪政视野中的清末报刊与报律[J]. 法学评论，2004(4).

② 一种制度的存在、运作导致另一种制度更加巩固，也就是说，一个制度的存在成为另一个制度存在的理由时，便称双方为制度上的互补关系，即形成了“制度互补性”。参见青木昌彦，奥野正宽. 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M]. 魏加宁，等，译.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31.

③ 任何两种具体制度都不存在互斥关系，而是相互适应协调，称制度的“适调态”；任何个人或群体不存在改变现存制度的动机和行为，称制度的“适意态”。制度体系既“适调”又“适意”，称制度的“双适态”。参见张旭昆. 论制度的均衡与演化[J]. 经济研究，1993(9).

然，正式传媒制度与非正式传媒制度能否形成良性互动，最关键的还是正式制度构建上的互补和配套。没有正式制度间的相互协调，媒介技术创新领域中这种良性互动就无法形成。而媒介技术在晚清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种种矛盾冲突、协调、再冲突再协调的博弈过程。

从晚清传播大环境来看，正式传媒制度与非正式传媒制度之间的互动可以说是逐渐向良性状态发展，这自然也为媒介技术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尤其在1895年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于中国，并成为知识分子的信仰重心，这种由生物界的竞争而衍生出来的“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观点，对身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界有着莫大的警醒作用。为了“启民智”，办报办刊显然是个良策。及至维新运动期间，新式报刊的兴办开始出现雨后春笋之势，及至辛亥革命风潮涌起后，其势更盛，仅革命派所办新型报刊为数即颇为可观。仅据冯自由在一篇文章中统计列示的，“昔年海内外各地各种革命书报，自乙未年(1895)以讫辛亥，约千数百种”[①]。

由上可见，当时“开民智”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竞相追求之事，这种大环境无疑大大推动了媒介技术的引进与应用。即使在偏远的四川，这种情况亦得以反映。比如，创办《渝报》时，宋育仁[②]考虑用铅字排印，但蜀中一直较为封闭，向无排印设备和人才。宋育仁便指定参与办报的江瀚[③]与上海《时务报》经理汪康年联系，代为购买办报所需的铅印设备及聘用熟手。江瀚在1896年农历六月四日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承示铅字六枚，兹欲购三号与五号者各一具。……将全模二具购就，点明字数，仍交天顺祥票号带渝，或托招商局亦妙。总期从速，是所切盼。”“字模务望速购寄渝，至恳至恳”。同年农历七月十一日又函：“前蒙开示铅字价目，三号字每磅一百个，约一千六百磅，每磅价洋四角，合计两副共需洋九百六十元。但五号字系备夹注之用，未审宜否，或六号字方合，务祈代为酌定，迅速装妥，剋期交天顺祥

---

① 冯自由. 开国前海内外革命报刊一览[M]//革命逸史(第3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1：136.

②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维新运动倡导者，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1894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回国后，参加维新组织“强学会”。1896年，到重庆主持四川商务矿务。设立商务局，兴办洋烛、煤油、煤矿、玻璃、白蜡、卷烟、药材等公司，为四川绅商领袖。1897年创办《渝报》，树起了维新宣传的旗帜，兴起了四川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③ 江瀚(1853～1935)，福建长汀人，名一作江翰，字叔海、朿澥，别号石翁山民，室名石翁山房。清末历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致用书院讲习，长沙校经堂校书，江苏高等学堂、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学部总务司行走、参事官，京师大学堂教授，河南布政使。

带渝。""印机必不可少,其价几何?即望议定,并字模寄渝。总之,既以此事托左右,则当有全权也"。"蜀中向无排印,必须觅一熟手前来。其工价、路资并乞费心议妥,促其速行,至要至要"①。江瀚1897年离川后此事6月后便由四川学正张之洞的学生、巴县举人潘清荫接办。他与汪康年信函颇多。1897年农历七月十日信中说:"春间宋芸子拟在敝郡踵设报馆,招弟襄事,所有托购字模及中西报篇,已由江君未澥函电往复,弟皆与览。惟字模第五号可用为第三号之夹注否?如可用故佳,否则请酌改第几号之合度者。又排印虽有印机,敝处少娴熟习者,拟请尊处代雇一人来以引导,俾下手资以学习,来往川资及月薪若干得示照给,其人必偕字模同到,庶易于开办也。"

同年农历九月朔日又函:"铜模及铅字各购两套。铅字无论上海有无现成,制备自属尚易,铜模如何?是否上海有现成之物?抑可制造?或必须购自外洋?如购自外洋,由订购日至交货日约计几时?乞先示。倘需时尚多,即恳将铅字先寄,以便开办,铜模续寄可也。""铅字前惠寄者凡六号,商定请购第三第五两号,以备印报、印书、直行夹注之用。如第五号不堪作第三号夹注,请别购一号,总期双行与独行耕合,不相龃龉为主"。农历九月十一日三鼓再函:"印机大小,既以贵报为准,即可酌定用某样为合,此机不知仅印铅字版耶?抑可印寻常木刻之版耶?如可以印木版,即恳将印机于九月得信后购成即寄。""如早有印机至,其印法必较人力为速便也"。紧接着次日又在函后加写:"又如印机可兼印木板,则管机友人必须雇定,与印机同时来川。今暂寄合同一纸,以昭大信。"另外还致函汪康年委托正在日本的留日学生监督孙淦购买日制的印机、制字机、铜模、铅字。"芸子检讨来渝,以铜模到蜀需时商定,暂用木刻试办,已于十月十一日开馆"②。尽管由于印刷设备终归未能及时抵渝,《渝报》只得采用木板雕印,但这充分说明了媒介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是社会所需,而且也已深入人心。

各种书籍报刊不遗余力地为"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制造舆论,终极其旨归则是强种保国。"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运动所要完成的是一种社会个别成员与国家的完美结合,以创造国族竞存的根基,"达尔文主义在这里所提供的想象和视界,就更显得关键重要"③。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革命派或保守派,"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当时是一个均

---

① 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59-261.

② 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896-2902.

③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42-43.

可以接受——事实上也不可能不接受的结果。这一点对晚清新闻传播法规的制定显然也有着深刻影响。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从维新运动开始，进步社会群体把开启民智作为进行社会改造的要策之一，民办报刊业的逐渐兴盛即与此密切相关，在形势的促迫下，也是为争取民众的需要，清方在开放民间言路方面也作了一些表示。①

晚清政府出台的五部报律，可以说是"越往后越是宽松"，刑事处分的范围和量刑程度也不断缩小，后期甚至对泄露军事、外交机密等也改用罚款这样的民事手段进行处置。从1907年开始清政府甚至开放了报界对司法审判、军事活动和重要会议的采访权限。至于报道和评论，只要不是直接号召暴力革命，即使是对清廷内政外交和皇室的尖锐批评，报律也都不加以限禁。即便晚清政府后来所制定的报律，其执行力度日趋"宽松"，但还是遭受各方抵制。各报馆不仅对报律的禁条根本不予理会，甚至连注册的手续也不去办理。②

在《大清报律》出台以后，各报馆甚至发表宣言书，申明不承认该律第七条规定的新闻检查办法，并表示将于某日同时停版的方式，坚决予以抵制。《大清报律》第七条规定的"报纸在出版前必须将报样送官署审查"也无人执行。个中原因，想来也是简单无外乎两个：①他们想抵制；②他们敢抵制。而他们既想抵制又敢抵制恰恰表征了当时宽松的非正式传媒制度。无疑，这种非正式传媒制度和正式的传播法规一道推动了当时媒介技术的狂飙突进。

第三节　传媒制度非中性与媒介技术非中性

如果说技术逻辑源于技术形式特有的规定性，那么制度逻辑则充分体现着人类作为技术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对工具的支配态度。③ 但是，正如怀特海（A. N. Whitehead）所指出的，"一个社会制度是被本能行为，以及丛生在习惯和偏见周围的本能情感的盲目力量结合在一起的"④，制度中蕴涵着文化基因，是人的伦理关系、价值关系及其评判尺度的现实凝结物。因此制度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非中性。

---

① 董丛林. 晚清社会传闻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0-41.

② 陈柳裕. 形同虚设的晚清报律[J]. 浙江人大，2003(11).

③ 于小川. 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数字技术与媒介产业发展[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6).

④ A・N・怀特海. 宗教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M]. 周邦宪，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94.

一、传媒制度的非中性

最初提出“制度非中性”①这一概念的张宇燕认为，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② 简而言之，如果说中性制度是对社会的每一个人而言有益或至少不受损的制度，那么具有非中性的制度就是给社会的部分成员带来好处但使另一部分人受损失为代价的制度安排。

传媒制度的非中性尤其明显，“不同集团在制度面前被区别对待，在分配和享受制度保护的实际利益时获得的份额不同，甚至此消彼长。在同一个制度框架内生活的群体和个人不可能享有性质相同或强度相等的产权保护。一来，制度、法律和政策通常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两者，在划分和界定产权的过程中，即便表面上平等适用于所有对象的规则，不同阶层、集团或个人从中的受益和受损状况也不尽相同”③。因为成文规则是组织历史中的一种特殊因素，它们在型塑组织事件的同时也受到组织事件的影响。它们被创建、修订和废止，这些行为方式留下了历史痕迹。④

“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ed）、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⑤，“为了达到控制空间和人的目的（有时也出于宗教的目的），更远、更快地扩散（spread）、传送（transmit）、散播（disseminate）知识、思想和信息”⑥。所以，传播活动总是与特定的境况结合在一起，同时，特殊的境况也决定了任何的传播活动都不是对其他境况的简单复制，而是利益主体加以筛选和改造的。

---

① 除了在《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中首次提出“制度非中性”外，张宇燕和高程曾以西欧和晚明中国为案例，讨论了产权制度非中性与大国长期增长的关系，并得出如下结论：在特定历史阶段，国家是否对具有生产性的商人集团的财产权利实施非中性保护，是一国能否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相关内容详见张宇燕. 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J]. 改革，1994(2)；张宇燕，高程.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张宇燕，高程. 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J]. 经济学，2005(1).

② 张宇燕. 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J]. 改革，1994(2).

③ 高程. 非中性制度与美国的经济“起飞”[J]. 美国研究，2007(4).

④ 詹姆斯·马奇，马丁·舒尔茨，周雪光. 规则的动态演变：成文组织规则的变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

⑤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

⑥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6.

晚清时，政治派系林立，报刊为之喉舌，皆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筛选信息，发表言论，进行论争甚至相互指责。即使政治色彩不是特别鲜明、面目相对平和的报纸亦如此。比如《大公报》，就惯在"传闻如是"的提示性小标题下登载一些消息，时常还特别加以"传闻如是，未知确否"类的说明。有时因所载传闻不实，引发交涉。像1903年五月间该报载闻涉及一所学堂管理上的弊情，被该学堂指为"误传"，"人将概以捕风捉影目之"，说是这会致使人们对该报所有载闻产生不信任感，"将尽疑其为虚妄"。

当时，在华外国报刊对信息采集利用也具有明显的利己性，而且它们在媒介技术和方式方法上更具优势，以致它们不仅与中国民间而且与清朝官方也存在抵牾。

上述情况也正是传媒制度非中性的表现之一。不消说有的报刊主观上即有根据自己的需要，不问虚实，采登传闻，甚至造作虚假消息的故意，即使刻意求实求真，为信息大环境所限也未必做到。平时如此，在有重大事变发生、动荡混乱的情势下，有关详确的消息来源渠道更或无从谈起。不仅对于报刊的信息来源是这样，而且更应视之为特定时候的一种颇为普泛化的信息环境条件。[①]

即使就传播习俗来看，它们也不是打补丁似的随便凑在一起。它们只有在能配合一个文化的设计或能重新剪裁或染色以配合文化设计时才会被采借。它们除了必须配合文化的象征模式外，还得在特定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下的轨道上运行。

二、媒介技术的非中性

技术的价值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和争论不休的话题。

技术中立论者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在他们看来，技术变迁却往往被描述为超越社会影响而存在的，即使是技术选择也常常被认为是由技术的内在逻辑所决定。

而认为技术非中性论者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把技术视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并进而认为技术与伦理、政治无涉的技术中性论虽然符合直观，并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却并不全面"[②]。日本学者星野芳郎（Yoshiro Hoshino）对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进行过研究，认为"科学技术的革新如果掌握在社会的统治阶级

---

① 董丛林.晚清社会传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44.

②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4.该书在第一章专门列出第2节对技术中性论进行了批判。

之手，就成为捍卫权力结构的重要手段"这种说法"令人拍案叫绝"①。美国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Lewis Feenberg)在《技术批判理论》的前言中提出："我们都知道，现代技术跟中世纪的城堡或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都不是中性的；它体现了一种特定的工业文明的价值，特别是那些靠掌握技术而获得霸权的精英们的价值。"②各种个人、集团和社会机构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这一错综复杂的过程，实际做出决策的那些人并不是孤立行动的。③ 不同的主体对技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技术角度的参与者更重视技术的先进性与效率性等，社会角度更重视技术对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生活生产方式等产生的影响，调节角度则要兼顾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

仅仅就本体的意义("元技术"的或自然属性的)而言，技术自身的价值显然应该是"中立"(neutrality)的。④ 但是毫无疑问，"技术不是赤裸裸地来到的。它不是中立的。它也绝不是简简单单、直截了当到来的"⑤，所以解析技术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对其自然属性分析的阶段，必须要在制度层面对其社会属性加以剖析。技术的发展本身在制度环境下会出现与制度的性质相对应的价值偏向特征和技术的选择性发展，所以技术中立论是站不住脚的。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技术的自然属性不能取代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本身的有用性不等于技术在制度环境下的价值偏向性。技术的社会后果必须在技术成为制度或组织调控的对象时才具备价值的倾向性。如果说技术会产生什么特殊的政治与伦理问题的话，那么，其责任并不在于自然属性的技术自身，而恰恰在于技术运行的社会环境——制度和组织过程之中。这就是说，制度是"技术理性"产生的真正根源。⑥

传播媒介当然是中立的。但它被赋予的目的却不是中立的。⑦ 媒介技术是在传媒制度条件下存在的，一定传媒制度下的媒介技术将为该制度服务，因而媒介技术也将不可避免地带上政治和伦理的色彩。所以媒介技术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作我

---

① 星野芳郎.未来文明的原点[M].毕晓辉，董守义，译.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5：50.

②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③ 郝凤霞，陈忠.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张力[J].中国科技论坛，2004(6).

④ 陆江兵.中立的技术及其在制度下的价值偏向[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5).

⑤ 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M].陶庆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16.

⑥ 陆江兵.中立的技术及其在制度下的价值偏向[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5).

⑦ 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刘晓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0.

们所用的对象。它是某种特定的利益和可能性的体现，甚至起到了构建我们的选择和偏好的作用。

技术这一最实在的物质产品，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彻底是文化的产物：它所展现的观点和灵感实质上是一种创造与表达。传播媒介不仅仅是某种意愿与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种有机体，是我们思想、行动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的真实缩影(miniature)。① 媒介技术是生产和消费它的社会体制中的一部分，其生产与消费牢牢地嵌入到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的母体之中。脱离了社会背景，媒介技术发展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的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维持和接受媒介技术的人的价值观、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媒介技术之中。

三、传媒制度参与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

1. 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媒介技术发展

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或称社会建构主义)是一股盛行于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思潮。社会建构论视角的技术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初首先在西欧兴起，之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如今已成为 STS② 领域的重要潮流。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主要是从方法论上引入了建构主义，强调要考察技术被"建构"的过程。

媒介技术的社会建构意味着：媒介技术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社会行动中形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关于媒介技术的多种价值观之间，在媒介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冲突和调和，社会因素全面深入技术内部，形成了技术与社会的"无缝之网"(seamless web)。

当然，强调媒介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无缝之网"，并不是否认媒介技术的客观实在性，它只是表明"一种特定的观察视角，即认为技术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建构中产生的，强调对技术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技术性'的结构、效率、功能等，社会因素是理解技术创新的必需变量。这样，对技术的成功和失败就不能简单地根据其效用性或内在结构作出功能主义的说明，而需要用社会因素来解释"③。

---

①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引言.

② STS 在国外大致有两种含义，其一是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其二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相关背景可参见殷登祥. 试论 STS 的对象、内容和意义[J]. 哲学研究，1994(11).

③ 邢怀滨.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46.

2. 社会对媒介技术的部分建构

将媒介技术界定为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势必引发下列疑问：这一界定是否能够包括媒介技术的全部内容？媒介技术中具有必然性的客观规律如何用社会建构来解释？

实际上，“社会建构论者所指的技术内容主要侧重于技术的外在形式”[①]，技术中有些具有必然性的客观规律，当然是无法被协商或建构的。比如，社会因素可以决定电报费用的高低，从而影响电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但是社会因素不能对电磁波的速度进行协商或建构。显然，社会对媒介技术的建构只是部分的。换言之，媒介技术和其他技术一样，具有“可塑因”与“不可塑因”两部分。

当然，如何识别可塑因与不可塑因，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这里只是尝试性地提出一种前提性的分析框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剖析。

3. 媒介技术被建构程度受制于其与权力中心的距离

社会建构论并不等于社会决定论。媒介技术中既有可塑因，又有不可塑因。而相比之下，媒介技术的可塑因比例更大。这是因为媒介技术所处的新闻传播场离资本和权力中心更为接近的缘故。

何谓场域？布迪厄(P. Bourdieu)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架(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②]很显然，正统与异端之争旨在争夺对于解释场域合法游戏规则的垄断权。而任何一方对于游戏规则的制定都是根据自己的位置和利益来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调节。[③]

正如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所指出的：“新闻业的惯例是以新闻组织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兴趣为基础的，往往从对各种社会现实的筛选中得到体现。”[④]新闻

① 邢怀滨.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60.

②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134.

③ 朱国华. 权力的文化逻辑[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83.

④ 托德·吉特林.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M]. 张锐，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1.

传播场域和其他场域一样，由不同位置形成开放性的关系网络，但新闻传播场和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易受制于资本和权力。尽管新闻传播场也可被视为一个文化生产场域，但是比起其他较自律的文化生产场而言，它更接近经济和政治场，所以更容易受场外力量的影响和控制。

4. 传媒制度参与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

“技术演化是建构的演化，即技术发展具有演化特征，其动力源自于各种力量的建构作用，技术多样性源自于行动者的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协商构成了选择环境。技术发展是技术与社会相互适应、协同演化的过程”①。也就是说，社会建构论不再把技术与社会作为分离的元素，而是探讨两者的互动，认为技术本身就是社会的体现，将技术与社会加以有机统一。

同时，社会建构论将技术界定为社会行动，表明了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相互融合。这意味着传媒制度政策不是要根据媒介技术发展而决定，也不是决定媒介技术发展，而是参与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②制度也许最终会被发展变化中的技术所侵蚀，但是这可能是一个深刻的历史进程。而且这种侵蚀也许是不均匀的，当然也许是致命的，即制度仍然没有受到触及，而其他方面却发生了变化。剩下的那些毫发未伤的制度仍然指挥着事物的总的发展方向。③

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形成新的传媒制度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也深深嵌入在传媒制度的惯性之中，深受制度惯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媒介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过程，它涉及许多结构、功能、组织、行动的问题。因此应在传媒制度背景下分析媒介技术的建制问题。

在媒介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已经具备而尚未实现媒介技术发展的理想状态时，重要的问题或许应当转移到社会方面，关注的焦点也应相应地集中于传媒制度，切不可就技术而技术，自然也不能脱开技术谈技术。

---

①　邢怀滨.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136.

②　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

③　赫伯特・席勒.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 刘晓红，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44.

四、传媒制度与媒介技术的内在一致性

实际上，我们在细分制度与技术的同时，也会发现两者存在着互通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制度的一种，因为技术系统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制度结构。企业所处的特殊技术水平、技术结构、技术环境本身就是另外一种含义上的制度；在制度可以作为技术理解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人的激励、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其合理的组织管理协调，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技术。只要技术和制度无法脱离人的存在而存在，它们就一定会带上生存的烙印，对其分析也应置人社会系统这样的背景之中。

相同的正式传播法规，其效率却可能由于周围辅助性的非正式传媒制度的差别而大相径庭。显然，传媒制度不仅包括行为和组织结构，还包含着文化结构模式。同样，媒介技术同文化惯例、政治经济力量甚至人们使用技术发明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

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① 在传媒进步的历程中，人类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技术和制度两大要素的支撑。正是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传媒制度的不断变迁，才推动人类的传播事业不断向前。在晚清的现代化进程中，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也正是桴鼓相应。

本章小结

传媒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两部分。正式制度安排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非正式制度安排则是指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行为规范，由文化演进所形成的行为的伦理道德、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对于现实社会契约关系是否正义或公平的评判都是至关重要的。

制度变迁发生在结构和心理两个层次。变迁最主要的障碍是结构性障碍，而不是心理或文化的障碍；改变态度和观念十分重要，但它们本身不足以真正改变乡村文化中普遍的不平等结构。发展问题常常在于制度，而非个人心理。② 人是制

①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② 柯克·约翰逊.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M]. 展明辉，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

度性存在物，人通过制度而存在。制度既有主体性规定，又有客体性规定。制度作为固化的、客体化的社会关系制约并标志着人的发展及其程度。①

一种文化秩序也许是我们作为个人在我们日常行动中最容易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大部分情况下，它是一种含蓄的结构，它已经被我们所内在化，并无意识地指导我们对待交易和管理的态度。② 纲常解纽的晚清蕴藏着丰富复杂的思想和文化因子。亦如钱穆先生所言，“历史上没有无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媒介技术的发展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权力结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习俗等等。人们创造历史所凭借的全部资源，包括他们所依赖的生产力、社会交往形式和各种精神财富，也无不是先前全部历史的积累与遗存。

这些历史的积累与遗存深植于人们心灵底层，盘错于社会根柢，根深蒂固。它们不可能不制约着媒介技术发展的进度以及所能达到的限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制度总是一个“混合袋子”(mixed bag)，在其中，“既有促使生产能力提高的因素，也有降低生产能力的因素。同样地，制度变迁也总是能为上述这两种轨迹相反的运动提供机会”③。

从传媒制度对媒介技术发展的阻滞来看，社会的博弈注论形成劣位帕累托均衡，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结合后造成的结构性障碍在激励导向上背离创新方向，这种障碍内生地压制着一切创新，阻滞了媒介技术发展的脚步。

从传媒制度对媒介技术发展的推动来看，它可以从合理性(发展的理性依据)、合法性(发展的秩序依据)和合情性(发展的情感依据)三个方面为媒介技术创新和发展提供支持。设计良好的传媒制度能使媒介技术发展的可能性边界不断扩大，对其产生强大的助推作用。

正式传媒制度和非正式传媒制度的良性互动，可以达成“战略性互补”的关系，使制度结构达致新的“双适态”。当然，正式传媒制度与非正式传媒制度能否形成良性互动，最关键的还是正式制度构建上的互补和配套。没有正式制度间的相互协调，媒介技术创新领域中这种良性互动就无法形成。而媒介技术在晚清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种种矛盾冲突、协调、再冲突、再协调的博弈过程。

---

① 王海传. 人的发展的制度安排[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8.

② 马克斯·H·布瓦索. 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M]. 王寅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471-472.

③ 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

结　　语

翻开人类传播进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传播活动的进步取决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一部人类传播发展史，归根结底是一部媒介技术发展史，媒介技术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会影响到传媒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媒介技术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不可或缺的因素，媒介技术的发达状况决定了媒介的发展水平，它的发展使得传播活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缓慢向快捷不断推进。当然要指出的是，"对媒介技术的分析不是对媒介的技术原理和制造工艺分析，那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工作。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视野中对媒介技术的分析是指作为一个既成的媒介，它在传播过程中对传播行为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是说，它对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所起的作用的过程和效果"①。

一、媒介技术发展受制于整个技术体系

媒介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特质，由此决定着媒介技术发展的自主和可控的双重特性。作为技术构成要素的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和信息产品都具有社会性，任何媒介技术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社会技术体系的支撑。这种社会技术体系包括三个方面：①物质资源，指原材料、能源、机械、人力等；②智力资源，指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及能力的状况等，除非它们的存量能够扩张，不然新技术的发展最终会陷入收益递减的境地；③社会条件，指市场机制、政治和法律约束等。

如果我们把四大发明看作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代表，那么就会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四大发明主要是技术创造，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中技术成果占主导地位，并且它是在封建"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中转移和发展的。我们可以把古代中

① 李庆林. 传播技术塑造文化形态——一种传播学的视野[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7).

国的技术结构概括称为"大一统型"技术。[①] 中国的媒介技术发展自然一直受制于这种"大一统型"技术体系。

二、晚清媒介技术革命成为传媒制度变迁至关重要的推力

由于电力和蒸汽动力的使用，晚清媒介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突破。媒介新技术提高了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增强了传播效果，降低了传播成本。更重要的是，这种革命性突破冲击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促使了国民传播观的变革。

晚清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溢出效应将会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各个层面，自然也会促动传媒制度的变迁：①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传播新观念的产生与扩散，促使非正式传媒制度的出现；②媒介新技术自身也对传媒制度变迁产生了需求，而且媒介技术发展会降低制度变迁成本，从而有利于制度创新；③媒介新技术与其他因素产生合力，共同推动传媒制度变迁。

当然，技术并不是规定社会前行的唯一力量，"我们需要抛弃各种技术决定论和媒体中心主义。传播史并非一部机器史，而是一部新兴媒体促成权力体系重构和社会关系网络重组进程的历史。要想了解这个历史过程，我们就必须避免工具主义"[②]。虽然技术逻辑为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但这股力量究竟能否实现或是怎样实现还有待于社会对它的选择。

三、晚清时媒介新技术影响传媒制度的动因

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古代为何长期未成主流，也就是说未能对传媒制度形成真正冲击，那么为何晚清时媒介技术发展能够对传媒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呢？

从晚清媒介新技术自身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创新的扩散来看，是因为它们跟以往媒介技术相比，无论在技术的创新性、传播渠道，还是在传播时间以及作为新技术扩散环境的社会系统方面都具备了明显优势。

从晚清媒介新技术对传媒制度的作用方式来看，晚清媒介技术的发展引起社会主流传播形式的变化，主流传播形式的变化又促使主导话语形态的更迭，主导话语形态的更迭自然导致传播观念的更新，传播观念的更新往往会冲击旧有的传媒制度格局。正是通过这样曲折多重然又确凿无疑的内在动力学机制，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概言之，媒介技术的发展通过利益结构的变更、符

---

① 刘青峰.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14.

② Graham Murdock. Communicat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 15(4), 1993. pp. 521-539.

号体系的改变、社会性质的变化而推动传媒制度变迁。

当然，即使有媒介新技术对传媒制度变迁的强烈需求，传播新制度和传播新格局的形成仍然需要时间和其他因素的合力。作为社会制度变革的一部分，传媒制度的变迁十分复杂，既涉及媒体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也关联媒体与广大受众的关系问题；既包括言论出版的自由与权利问题，也包括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问题；既有成文的正式社会规范体系，亦有不成文的、非系统化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传媒制度的变迁涉及到政府、媒体和社会民众三方面的利益，是这三种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结果。

四、传媒制度参与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

社会建构论将技术界定为社会行动，表明了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相互融合。媒介技术的社会建构意味着：媒介技术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社会行动中形成的。当然，社会对媒介技术的建构只是部分的，也就是说，媒介技术和其他技术一样，具有“可塑因”与“不可塑因”两部分。社会行动对技术逻辑的“可塑因”行使着选择的权利，其选择作用最终体现于该技术实现社会化扩张的进程之中。

传媒制度参与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从传媒制度对媒介技术发展的阻滞来看，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结合后造成的结构性障碍在激励导向上背离创新方向，从而使得除了极特殊的个别个体以外，守旧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最佳选择，社会的博弈均衡解停留在劣位帕累托均衡上。这种障碍内生地压制着一切创新，锁定了媒介技术发展的脚步。从传媒制度对媒介技术发展的阻滞来看，它可以从合理性（发展的理性依据）、合法性（发展的秩序依据）和合情性（发展的情感依据）三个方面为媒介技术创新和发展提供支持。设计良好的传媒制度能使媒介技术发展的可能性边界不断扩大，对其产生强大的助推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提供产权激励；第二，提供市场激励；第三，对媒介技术使用主体的权利保障；第四，提供税费优惠。

媒介技术在晚清发展的同时，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种种矛盾冲突、协调、再冲突、再协调的博弈过程。

五、媒介技术与传媒制度两者关系之分析

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是推动媒介发展的两大力量，技术逻辑源于工具特性，制度逻辑则体现着作为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对工具使用的选择。人类生活的演进，依赖于技术和制度这两大变量的进步。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演进的图景。

"现代的变迁大多是物质条件改变在先，适应文化改变在后"①。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媒介技术变化的速率要早于传媒制度的变迁。

当然，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都没有充分揭示问题。从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中可以得出：他们都承认技术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区别在于强调的主次有别：技术决定论强调制度滞后，正因为如此，制度"瓶颈"的打破将为技术发展提供机会；制度决定论强调制度前提，而制度分析表明，制度安排的变革是对获取机会的应答，而不少获取机会是由技术变革带来的。知识和技术确定了制度创新的上限，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的确需要知识、技术的增长；反之，似乎也可以说，制度则确立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上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创新总有一天要被停止，因此，制度变迁又成为技术进步的前提。

实际上，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范畴，它们相对于同一个经济主体而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没有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就缺少支撑环境及保障；而没有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就成了"无米之炊"。两种变迁只有协调一致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发展，否则必然导致效率的损失。② 无论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还是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技术相对落后的后发国家在制度安排方面都不得不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由于技术变迁相对滞后而导致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一方面因技术变迁或技术赶超引致对制度变迁的强烈需求。③

从长期的历史角度看，制度与技术之间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累积因果的关系，两者之间"谁决定谁"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分阶段的、循环的。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都不能单独实现，必须与文化因素一起，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基本因素，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同进化"(co-evolution)④动态结构。

实际上，制度与技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互通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

---

①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 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 王晓毅，陈育国，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11.

② 比如，拉美诸国虽然引入了美国的宪法体系，但它们依然不甚发达；我国有的企业引进了世界第一流的生产设备，还是无法取得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因此可能这么说，只有制度与技术的合理匹配才有可能出现经济的繁荣。

③ 何宏. 产业革命制度经济学思考[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8).

④ Zhou, xueguang. Reply: Beyond Debate and Toward Substan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105), pp. 1190-1195.

理解为制度的一种，因为技术系统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制度结构。在制度可以作为技术理解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人的激励、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其合理的组织管理协调，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技术。在良性的互相适应性过程中，媒介技术创新和传媒制度创新是相互依赖、互为因果、共同进化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创新具有持续不断的性质，而制度创新则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即使可能存在着良性互动，并不意味媒介技术创新和传媒制度创新总要对应性发生。

六、对当下的启示

技术与制度，古今中外它们总是与人同在。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和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它们的生发成因、盛衰态势、文化蕴涵既有相似的一面，又必然都有着独异的特征。

漠视和遗忘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温故所以知新，只有我们了解了数百年来媒介技术如何深刻影响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才更有可能对媒介技术的未来发展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形成战略性的预测和思考，从而在科学理性和技术道德的层面对媒介技术的发展予以掌控。术业有专攻，我们不必也不可能去掌握有关各种媒介技术复杂的工作原理，但至少要记录下技术的更新换代，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成果及其发挥的作用、产生的效益。总之，就是要给予媒介技术应有的重视。

严峻的现实和令人感慨不已的历史，迫使我们去思考媒介技术发展自身的规律及其与社会结构间的深刻联系。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不断轮回的朝代更迭中，日益走到了辉煌历史的尽头，纵使改革也难以挽回其衰败之发展态势。在最后一幕中，晚清上演了一出出历史悲剧，剧中媒介技术与传媒制度的互动留下了诸多经验教训，“制度中人”①与制度较量生发出不尽无奈和遗憾。但愿这一切对今天的传媒制度改革产生些许启示。

晚清面临的诸种问题是历史造成的，历史是要由所有过去和当前的人共同负责的，不能单纯指责哪一部分人或哪一代人，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尽可能发现和认识历史，其次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思考其对于今天及将来的启示，而不是一提及晚清不容分说就扣上一顶意识形态的高帽。事实上，“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

---

① “制度中人”意指，在一定制度中，行为者的目标和偏好受制度约束。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生存于社会中的人，都是“制度中人”。

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①]。所以对媒介技术发展与晚清传媒制度变迁的分析并不在于得出一个抽象性的结论，重要的是剖析实际中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为当今传媒制度改革所能提供的参考作用，以便今天的我们能够做出合理而又适当的选择。

一个国家乃至一个经济组织的发展究竟是技术决定，还是制度决定，与这个国家、组织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有关。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制度变革对于技术进步就是决定因素；反之，在社会相对稳定时期，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制度瓶颈的打破将为技术发展提供机会，制度环境的改善将会促进技术的进步。因此，要特别重视技术进步的制度变革。

那种片面地论述究竟是媒介技术还是传媒制度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或者想回到历史的起点去探寻最初的决定力量的努力都是不明智的，不仅容易陷入循环悖论的逻辑误区，而且对解决问题亦无裨益。历史有它自身的运作逻辑，对之真正理性的态度“不是如何阻止历史之河，而是如何同人类苦痛引起的历史之河的水污染做斗争，如何引导历史之河迈向它携带的更平等的利益分配”[②]。媒介技术和传媒制度以及行动主体共同组成的传播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我们接受现代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以媒体为中介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的，那么，不强调传播系统在构成其各种主要的制度的、符号的和经验的形式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加以定位就计划它的变革是不可能的。[③]

传媒制度当然是可选择的，但并不能随心所欲，必须以尊重技术因素为前提。媒介技术依然在不停发展，很难想象它的进步会有终点。伴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前所未闻的问题和先前不可想象的问题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挑战。所以，对于变数丛生的未来，今天的我们只怕还要经历漫长的思想探险，才能做出更精确的预言。

七、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第一，许多极其重要但人们却司空见惯的事物，长期以来在文明史中的意义常

① 费正清，刘广京.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66.

② 齐格蒙特·鲍曼. 被围困的社会[M]. 郇建立，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1.

③ 格雷厄姆·默多克. 以媒体为中介的现代性：传媒与当代生活[J]. 庞璃，译. 学术月刊，2006(3).

遭忽视，很多学者（比如钱存训先生等人）认为印刷术便是其中之一，这也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活字印刷术究竟有没有想象中那么伟大？倒是以发明活字为荣、使用雕版为耻的这种心态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印刷传媒制度变迁的关系，除了从显功能和正功能的角度对媒介技术加以考察外，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其隐功能和反功能。

第二，正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言，“只有通过人本身的改造，社会重建才成为可能”，“没有人格的转变，社会的转变是不可思议的”[①]。所以有待进一步从“硬技术”和“软技术”的角度对媒介技术分别加以考察。而且，媒介技术的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解放的现代性。比如，近代印刷术并没有改变书籍的形式、内容、材料，以至创作的质量。先进的印刷术虽能使书籍的产量增加，传布广远，但并不一定就增进书籍内容的高度和深度。即使时至今日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依然还没有产生一部著作，其体例、规模和创见能超越约用 5 万枚竹简写成的《史记》。人类思维的能力和文字载体的方式，其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这是值得我们继续深思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三，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对传播的基本立足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②] 以往对晚清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总是把视角放在受西方文化影响大的大城市，认为这些城市的变化代表了中国社会变化的方向，不去关注或很少关注广大城乡在什么时候、什么程度上沿着这个方向变化。甚至用政治变革、制度变迁简单地替代社会变革、文化变迁，以为政治革命必然带来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而且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更新。“对民间多数人而言，变化小甚至没有变化是普遍的现象”[③]。在相当一部分内地城乡，由于旧的生产关系没有变化，退一步说，甚至连生产关系的基础——旧的生产力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不仅经济十分落后，生活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新风气显然是难以形成的。那我们该怎样既去关注受政治以及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城市，也去考察远离政治中心的广大内地城乡，从而相对完整地展示晚清媒介技术的进展与传媒制度的变迁？

第四，媒介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的关系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永恒命题，思考媒介技术的发展到底给人类的交流、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何种影响，这是传播学不断向

① 卡尔·曼海姆.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M]. 张旅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2.

②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0.

③ 程歗. 晚清乡土意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8-9.

前发展的动力所在。那么媒介技术发展与中国的传媒制度之间的关系和西方又有着怎样的区别，或者说是否应该又如何能够和西方的模式有所区别？相对而言，媒介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更为普遍的原则，而传媒制度则始终是民族式的。所以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要始终保持自己的距离，始终应该从中国政治的具体经验出发去选择、检验和修正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非削足适履地用西方的尺度来简单套裁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之关系是否能够提供与西方模式不同的另一生动的案例？

参 考 文 献

一、著作部分

A・N・怀特海. 宗教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M]. 周邦宪，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B・A・艾尔曼.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M]. 赵刚，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4.

E・M・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 殷晓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Elizabeth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Jennifer Slack Dary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4.

John Mingers，Leslie Willcocks ed. *Social Theory and Philosophy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John Wiley & Sons Ltd，2004.

M・卢瑟福. 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M]. 陈建波，郁仲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Neil Postman. *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

Peter Isaac and Barry McKay ed. *The Mighty Engine：the Printing Press and Its Impact*. St Paul's Bibliographies，2000.

R・基辛. 当代文化人类学[M]. 于嘉云，张恭启，译.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1.

R・科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 刘守英，胡庄君，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Ray Eldon Hiebert，Donald F. Ungurait，Thomas W. Bohn. 大众传播媒介[M]. 潘邦顺，译. 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6.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Kelly & Walsh Limited, 1933.

Schudson. 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M]. 何怡颖,译. 台北:远流出版社,1993.

T·F·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M]. 吴泽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Tony Schwartzs. 传播媒介——第二位上帝[M]. 蒯亮编,译.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85.

W·J·T. 米歇尔. 图像理论[M]. 陈永国,胡文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阿夫纳·格雷夫. 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M]. 郑江淮,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阿兰·图海纳. 我们能否共同生存? [M]. 狄玉明,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M]. 刘北成,郭小凌,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埃弗雷特·M·罗杰斯. 创新的扩散(第4版)[M]. 辛欣,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 麦克卢汉精粹[M]. 何道宽,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敬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安东尼·奥罗姆. 政治社会学导论(第4版)[M]. 张华清,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安东尼·吉登斯.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M]. 郭忠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 李康,李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M]. 田佑中,刘江涛,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白寿彝. 中国交通史(插图珍藏本)[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伯纳德·巴伯. 科学与社会秩序[M]. 顾昕,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仓理新. 书籍传播与社会发展[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曾小华. 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常立农. 技术哲学[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

陈昌凤. 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陈庆德. 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陈堂发. 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陈卫星. 传播的观念[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陈永森. 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4.
程予诚.新媒介科技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M].邵志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戴维·巴勒特.媒介社会学[M].赵伯英,孟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戴元光.传播道德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
戴元光.戴元光自选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M].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丹尼斯·古莱特.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迁移中的价值冲突[M].邾立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武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丁和根.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董丛林.晚清社会传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方汉奇,史媛媛.中国新闻事业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方晓红.中国新闻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费夫贺,马尔坦. 印刷书的诞生[M]. 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费正清,等.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M].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M]. 邓正来,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 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M]. 黄辉,杨健,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傅大友,袁勇志,芮国强. 行政改革与制度创新[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干春松. 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高亮华.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高旺. 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格雷姆·伯顿. 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 史安斌,主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格鲁内尔. 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M]. 隗仁莲,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三卷本)[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史革新. 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郭嵩焘. 伦敦与巴黎日记[M]. 长沙:岳麓书社,1984.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与帝国[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郝朴宁,陈路,李丽芳,罗文. 中国传播史论[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何明星.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赫伯特·阿特休尔. 权力的媒介[M]. 黄煜,裘志康,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赫伯特·席勒.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 刘晓红,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胡大泽.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黄瑚.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黄瑚.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黄金麟.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黄宗智. 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黄宗智.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霍华德·裘伯. 传媒政策与实务[M]. 昝廷全,等,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宾厄姆·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 曹沛霖,

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贾植芳.近代中国经济社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姜希河.中国邮政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杰弗里·C·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及其后[M].彭牧,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金梁.光宣小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康无为.读史偶得:学术演讲三篇[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M].展明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匡导球.中国出版技术的历史变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来新夏,等.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M].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郎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李宝臣.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李宏,李民,等.传媒政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李华兴,等.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插图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刘青峰.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罗伯特·K·默顿.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 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闾小波.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吕思勉. 吕思勉遗文集(上)[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马光仁.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马光仁. 上海新闻史(1850~1949)[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M]. 张和声,程郁,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马克斯·H·布瓦索. 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M]. 王寅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韩水法,莫茜,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M]. 张汇文,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九版)[M]. 展江,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迈克尔·哈特.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M]. 苏世军,周宇,译.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闵大洪. 传播科技纵横[M]. 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
尼古拉斯·加汉姆. 解放·传媒·现代性[M]. 李岚,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尼克·史蒂文森. 认识媒介文化[M]. 王文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欧阳健. 晚清小说史[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帕特里斯·费里奇. 现代信息交流史[M]. 刘大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潘伟杰. 制度、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庞朴.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皮埃尔·布尔迪厄. 科学的社会用途[M]. 刘成富,张艳,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皮埃尔·布尔迪厄,等. 关于电视[M]. 许钧,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皮埃尔·布尔迪厄,等.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 包亚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秦晖. 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秦绍德. 上海近代报刊史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秦英君. 科学乎 人文乎: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之两难[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M]. 周黎安,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让·拉特利尔. 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 吕乃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让-诺埃尔·让纳内. 西方媒介史[M]. 段慧敏,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芮玛丽.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M]. 房德邻,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塞伦·麦克莱. 传媒社会学[M]. 曾静平,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桑兵.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史蒂文·瓦戈. 社会变迁(第5版)[M]. 王晓黎,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斯坦利·J·巴伦. 大众传播概论:媒介认知与文化(第3版)[M]. 刘鸿英,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苏全有. 清末邮传部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苏镇. 编辑出版系统论[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孙藜. 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 香港:集贤社,1985.
唐力行.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陶鹤山. 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陶菊隐. 政海轶闻[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田启波. 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汪丁丁.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汪丁丁. 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汪林茂. 晚清文化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汪荣祖. 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王尔敏.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王尔敏.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 李伯重,连玲玲,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王海传. 人的发展的制度安排[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王建辉. 出版与近代文明[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王林. 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2004.
王绿萍. 四川近代新闻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王文利. 近现代新闻图像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
王燕. 晚清小说期刊史论[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 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 王晓毅,陈育国,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威廉·麦克高希. 世界文明史[M]. 董建中,王大庆,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韦尔伯·施拉姆.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 金燕宁,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韦森. 文化与制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文森特·莫斯可. 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M]. 胡正荣,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吴帆.集体理性下的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吴飞,王学成.传媒·文化·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吴廷俊.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夏晓虹.晚清社会与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肖燕雄.微观新闻制度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小摩里斯·N·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M].顾昕,张小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M].王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耿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邢怀滨.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徐登明.编辑出版家叶圣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徐复观.中国学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徐培汀.中国传播思想史(近代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徐琴媛.中外新闻发布制度比较[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许正林.中国新闻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薛君度,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杨光斌.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杨光辉,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杨幼炯/瞿同祖.近代中国立法史/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叶启政.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搓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选.叶圣陶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电话的社会影响[M].邓天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尹铁.晚清铁路与晚清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尤尔根·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童世骏,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于翠玲.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袁军. 新闻媒介通论[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袁庆明. 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分析[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袁伟时. 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约翰·彼得斯.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 何道宽,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 肖志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詹姆斯·马奇,马丁·舒尔茨,周雪光. 规则的动态演变:成文组织规则的变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张博树. 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章开沅,等. 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 中华印刷通史[M]. 台北: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2004.
张咏华. 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张宇燕. 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张育仁. 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张召奎. 中国出版史概要[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张仲民. 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赵冬. 近代科学与中国本土实践[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赵汀阳. 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赵旭东. 反思本土文化建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郑大华. 晚清思想史[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郑观应. 郑观应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郑涵,金冠军. 当代西方传媒制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支庭荣,邱一江. 外国新闻传播史[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中华书局编辑部. 魏源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周佳荣. 苏报及苏报案[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周良霄. 皇帝与皇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周晓虹. 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朱从兵. 李鸿章与中国铁路[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
朱国华. 权力的文化逻辑[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朱勇. 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邹谠.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和微观行动的角度看[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佐藤卓己. 现代传媒史[M]. 诸葛蔚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二、论文部分

Clifford Geertz.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The Indonesian Case. *Man*, New Series, Vol. 19, No. 4. (Dec., 1984), pp. 511-532.
Graham Murdock. Communicat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 15, 1993(4), pp. 521-539.
R·威廉斯. 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二)[J]. 陈越,赵文,译. 世界电影,2000(3).
R·威廉斯. 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三)(续完)[J]. 陈越,赵文,译. 世界电影,2000(6).
R·威廉斯. 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三)[J]. 陈越,译. 世界电影,2000(5).
R·威廉斯. 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J]. 陈越,译. 世界电影,2000(2).
Robert T. Craig.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Communication Theory*. 1999(5), pp. 119-161.
Thomas A. Koelbl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5(2).
白磊. 对媒介技术的传播学浅析[J]. 大众科技,2006(8).
卞冬磊,张稀颖. 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
布里恩·温斯顿. 技术发展的原因及其对传播内容的影响[J]. 新闻大学,2001(冬).
曹正汉. 将社会价值观整合到制度变迁理论之中的三种方法[J]. 经济科学,2001(6).
陈创生. 论制度及其社会意义[J]. 现代哲学,2001(3).
陈春光,郭琳. 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双向互动[J]. 社会科学,1996(10).
陈峰. 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的辨证分析与实证考察[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4).
陈福初.《大清著作权律》的立法背景及历史意义[J]. 江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3).
陈力丹. 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体"[J]. 国际新闻界,2004(6).
陈平原.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J]. 书城,2008(8).
陈阳凤. 中国出版现代化进程探析[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陈志强. 编辑中心制与现代管理制度的博弈[J]. 新闻界,2007(6).
成庆. 思想史该如何书写? [J].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1).
楚永生,杨春霞.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J]. 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5).
崔希福. 制度与社会发展[J]. 学术交流,2006(3).
戴念祖. 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板摄影术[J]. 中国科技史料,2000(2).
戴元光,尤游. 媒介角色研究的社会学分析[J]. 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6).

单波. 救国的味道:中国早期白话报的文脉[J]. 新东方,2003(Z1).
丁未. 电报的故事——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札记[J]. 新闻记者,2006(3).
董春晓:《从画笔到照相机:媒介技术对图像特性的影响[J]. 美术观察,2006(8).
董贵成.《湘报》与科学技术的传播[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1).
董智颖. 简论中国出版近代化对晚清小说出版的影响[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2).
范世涛. 技术创新的制度分析[D]. 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方汉奇.《清史·报刊表》中有关古代报纸的几个问题[J]. 历史档案,2007(2).
方平. 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兴起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
傅怀锋. 试析清末民众的政治参与[J].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2).
高炜. 新闻传播失范与制度[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5).
葛涛. 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J]. 史林,2003(4).
葛兆光. 1895 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J]. 开放时代,2001(1).
葛兆光. 近代、学术、名著以及中国[J]. 读书,1999(4).
龚新琼. 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一种社会文化的视角[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1).
韩强. 传播体制选择与经济机制效率(上)[J]. 当代传播,1997(2).
郝凤霞,陈忠. 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张力[J]. 中国科技论坛,2004(6).
何宏. 产业革命制度经济学思考[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8).
胡甲刚. 利益、利益集团与宪政制度非中性[J]. 人文杂志,2006(6).
华锦阳,许庆瑞,金雪军. 制度决定抑或技术决定[J]. 经济学家,2002(3).
淮茗. 体制内的革命[J].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8).
黄旦. 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J]. 新闻大学,2007(1).
黄旦. 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J]. 新闻大学,2008(2).
黄鹤,李仕明,兰永. 论制度变迁的实质[J]. 经济体制改革,2001(4).
黄瑚,范书杰. 新发现的欧洲第一份华文报刊《飞龙报篇》考[J]. 新闻大学,2004(春).
黄继光. 中国近代电报与"裁驿设邮"[J]. 集邮博览,2004(8).
黄锡景. 西藏的第一份报纸[J]. 新闻爱好者,2007(11)上半月.
江怡. 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启示[J]. 江汉论坛,2002(12).
蒋宝林. 我国第一条向公众开放的电报电路——津沪电报线[J]. 上海档案,1993(1).
雷启立. 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雷颐. 晚清电报和铁路的性质之争[J]. 炎黄春秋,2007(10).
李彬. 从传播史到新闻史——唐代的新闻传播及其历史意义[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1).
李宏宇. 政治权力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J].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6(5).
李明山.《大清著作权律》是"没来得及实施"的法律吗? [J]. 中国出版,1998(4).

李明山.北洋官报局盗版与晚清版权律的制定[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3).
李庆林.传播技术塑造文化形态——一种传播学的视野[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7).
李三虎,赵万里.社会建构论与技术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9).
李少波.黑体字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李斯颐.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1).
李艳华.传媒制度选择的经济学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8(3).
李雨峰.版权的中国语境——一种历史的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
李玉虹,马勇.互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比较[J].经济学家,2001(1).
李瞻.报业与政治制度关联性问题论纲[J].中国传媒报告,2008(3).
连英祺,杨宏伟.经济史中的技术与社会变迁[J].财经问题研究,2000(11).
林岗,刘元春,张宇.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3).
林红玲.西方制度变迁理论述评[J].社会科学辑刊,2001(1).
刘宏.传播的场所[J].青年记者,2006(19).
刘世锦.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J].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5).
刘兴民."晚清"的含义及意义[J].广西社会科学,2005(6).
刘永文.晚晴报刊小说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刘元满.近代活字印刷在东方的传播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3).
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J].近代史研究,2000(2).
陆江兵.中立的技术及其在制度下的价值偏向[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5).
陆俊元.论地缘政治中的技术因素[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6).
罗宾·威廉姆斯.技术研究与技术的社会形成观[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1).
马杰,马珺.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J].经济学动态,1996(9).
梅琼林.传播技术理论的现代历程及其文化反思[J].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4).
闵大洪.对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多写几笔——新闻史研究中的一点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莫杨.中国技术创新进程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良性互动机理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南振兴.中国历史技术演变与知识产品制度变迁的绩效[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
潘祥辉.论媒介技术演化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
裴丹青.《点石斋画报》和中国传媒的近代化[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3).
彭攀.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双向互动的自组织模型[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4(2).
彭小瑜.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J].历史研究,2004(4).

齐爱军.新闻文体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探讨[J].新闻界,2006(4).
青木昌彦.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6).
清飏.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宋代出版传播方式的变革[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5).
屈永华.宪政视野中的清末报刊与报律[J].法学评论,2004(4).
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J].近代史研究,1991(6).
申重实.《儒林外史》刊刻、传播说略[J].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7(5).
沈小白,罗宾·威廉姆斯.技术的社会形成观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挑战[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1).
石鸥,吴小鸥.中国第一套国家统编教科书——学部图书编译局《国文教科书》分析[J].湖南教育,2008(5).
石鸥.我国最早的白话教科书——彪蒙书室出版的教科书[J].书屋,2008(3).
史宝龙.清末中国对日本法学的引进[J].历史教学,2006(3).
粟多树,杨德才.西方科技在中国近代传播的途径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4(2).
孙季萍,王军波.清末报律:在创新和守旧的夹缝中[J].政法论丛,2001(5).
孙瑞祥.对传播技术作用力的社会学认识[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
唐兴霖.制度创新:主体、过程和途径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1).
唐兴霖.制度资源·制度短缺·制度创新[J].学术研究,1996(11).
田露汶.电报进入晚清朝廷[J].紫禁城,2004(6).
田玉仓.近代印刷术的主要特征、形成时间及对传入的影响[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1996(1).
童兵.论传媒技术与内容需求的互动[J].新闻记者,2006(3).
王本朝.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转型的制度阐释[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6(6).
王鹤亭,苏全有.晚清中外海底电报交涉述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
王鸿生.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2).
王敏."中间地带":晚清上海报人与立宪运动[J].学术月刊,2003(11).
王明科.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中的五大弊病[J].河北学刊,2005(2).
王润泽.技术、制度与新闻的互动[J].国际新闻界,2007(11).
王希锋.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的电报战[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王小蓉.道教与我国早期雕版印刷术关系浅探[J].宗教学研究,2005(2).
王忠民,高树枝.制度和技术共同决定论[J].人文杂志,1997(3).
韦森.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J].社会科学战线,2006(1).
邬焜.论人类信息活动方式与文明形态、价值观念变革的一致性[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
吴果中.中国近代画报的历史考略——以上海为中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
吴廷俊,韦路.传播技术的演进模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吴燕.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J]. 江海学刊,2004(1).
吴予敏. 传播学知识论三题[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6).
项翔. 划时代的传播革命——有线电报的发明及其对社会历史的作用[J]. 历史教学问题,1996(1).
肖三,王德胜. 从传播技术视角解读文化的发展——兼论李约瑟难题[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2).
肖燕雄. 我国近现代新闻法规的变迁(1906～1937)[J].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8(6).
谢咏梅.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J]. 学术交流,2006(5).
辛景亮. 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民族主义[J]. 教学与研究,1998(5).
徐桂权. 传播图景中的制度——由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谈起[J]. 国际新闻界,2004(3).
徐国亮,武中哲. 社会变迁中的科学技术及其后现代反思[J]. 学海,2006(5).
徐沛,周丹. 早期中国画报的表征及其意义[J]. 文艺研究,2007(6).
徐松荣. 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J]. 广东社会科学,2006(1).
许纪霖. 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 学术月刊,2006(11).
许仲举. 制度创新:动力与阻力[J]. 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1).
杨奎松. 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J]. 历史研究,2004(4).
杨敏. "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J]. 学习与实践,2007(11).
杨念群. "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J]. 天津社会科学,2004(6).
叶继红,雷德森. 科学技术的社会变迁:一个社会学的分析[J]. 科学管理研究,2004(5).
衣俊卿. 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J]. 学术月刊,2006(1).
殷莉. 中国第一部新闻法考证[J]. 当代传播,2007(6).
尹伊文. "制度决定论"的神话[J]. 读书,2008(7).
于沛. 历史学的"界限"和历史学的界限何以变得越来越模糊了[J]. 历史研究,2004(4).
远德玉. 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J]. 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6).
约翰·斯道雷. 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J]. 学术月刊,2005(9).
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 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5).
张昆. 媒介发展与政治文明[J]. 新闻大学,2006(秋).
张茂元. 近代珠三角缫丝业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互构视角[J]. 社会学研究,2007(1).
张伟. 关于传媒伦理问题的制度学思考[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3).
张小莉.《大清著作权律》述论[J]. 学术研究,2005(9).
张旭昆. 制度的定义与分类[J]. 浙江社会科学,2002(6).
张宇燕. 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J]. 改革,1994(2).
张仲民.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 史林,2007(5).
赵建国. 1905—1912 年《申报》对革命的态度演变[J]. 广西社会科学,2004(8).

赵靖伟，司汉武. 关于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综述[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赵晓耕，崔锐. 从《申报》看清末传媒对法制进步的影响[J]. 浙江学刊，2007(1).
赵晓兰. 19世纪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演变及其近代化进程[J]. 世界宗教研究，2008(1).
赵旭东，卢晓光. 超越本土化：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J]. 社会学研究，2001(6).
赵旭东. 制度如何思考？[J]. 西北民族研究，2007(4).
郑大华. 西学东渐：晚清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J]. 河北学刊，2006(6).
周德仓. 历史语境中的中国藏语报刊[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2).
周忍伟. 内地城市近代报刊兴起与大众传媒发展特征[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
周彦. 最早编印白话教科书的彪蒙书室[J]. 钟山风雨，2007(3).
庄炯涛，张晓妹.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分析和思考[J]. 技术经济，2007(6).
邹薇，庄子银. 制度变迁理论评述[J]. 国外社会科学，1995(7).

三、其他资料

《点石斋画报》
《东方杂志》
《大公报》
《申报》
《时务报》
《万国公报》
《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
陈友政. 编辑出版辞典[Z].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刘哲民. 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G].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邱沛篁，吴信训，等.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Z].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金炎午. 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知识大全[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史和，姚福申，叶翠娣. 中国近代报刊名录[Z].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方汉奇，李矗. 中国新闻学之最[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Z]. 北京：中华书局，1979.
丁守和.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黄鸿寿. 清史纪事本末[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黄天鹏. 新闻学刊全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李天纲编校. 万国公报文选[G].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戚其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Z]. 北京：中华书局，1996.
宋原放. 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Z].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孙毓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Z].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夏新华等整理. 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Z].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徐载平,等. 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Z].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邮电史编辑室. 中国近代邮电史[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
张静庐辑注.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54.
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57.
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57.
张静庐辑注.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57.
张静庐辑注.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59.
张星烺,朱杰勤编注.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GZ]. 北京:中华书局,2003.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 洋务运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中国史学会. 太平天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中国史学会. 鸦片战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Z]. 北京:中华书局,1958.
Wolfgang Donsbach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Ⅰ-Ⅻ).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后　记

周星驰曾说，逗大家笑和思考如何逗大家笑是很有意义的。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总可以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在书的最后我想说我也是幸运的，因为在工作十年之后还能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享受美好的读书时光。

不过，读书的乐趣并没有消减写作的难度，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远甚于预想。书中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切入，使原来以革命、政治、经济等为焦点的分析，让位于技术这个出发点。在反思如何将媒介技术与传媒制度有机勾连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将其凑成一个理想化的文化合成模型——因为这样一来势必过度诠释其关联性和一致性，但知易行难，在具体行文中是否远离了这种危险，自己的底气远远不足。

写作过程中翻阅了颇多的史书，也查找了细琐的资料，可探赜索隐之后心中往往泛起一种无中生有的感觉。书中的引用，虽多有据可查，但经由资料的串连和编织而出现的这个文本，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创造”。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初发生的事离今天也不算太远，但毋庸置疑的是，自己如知识的稗贩一般在图书馆或办公室中闭门造车的过程，恐怕仍是对异时异地或人或事的一种未必真切的想象。

我想说自己是幸运的更因为这些年在校园内外有幸结识了诸位师友，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

尘世需明今古意，出师莫忘育花人。能够师从戴元光教授和朱存明教授是一种缘分，更是我三生之幸。戴元光先生睿智豁达，博学多才，不嫌我愚钝而将我收至门下。先生居高自远，经常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予以学术上的诲教，三言两语便让人茅塞顿开。朱存明先生遍览群书，学识崇博，治学严谨，不仅为我开列阅读书目，指点学习方法，还鼎力支持我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即使毕业工作后，两位先生对我仍十分关心，他们的恩情无以言表，唯有深铭在心。

风吹耳畔师尊语，月挂梢头学子心。丁淦林教授、金冠军教授、郑涵教授、许正林教授、吴信训教授、张咏华教授等诸位老师启我于冥顽，惠我如春风。他们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师道品格，耐心细致的言传身教，都深深地激励着我。也要感谢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复旦大学黄旦教授、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复旦大学殷

晓蓉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郭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等各位老师，他们或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从不同角度、不同形式提出了精审的意见，或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提供了莫多的指导与帮助。

校内繁花几度红，相逢一见太匆匆。结识了徐托、丁德惠、蒋继华、郝敬波、梁成功、李萍、陈鹏、季杰、王光海、张春龙、周涛、周春发、徐红、李晓梅、潘国美、杜梅、刘辉、刘祥、董敬畏、戴榆、吴小永、司文等志趣相投的朋友和尤红斌、尤游、赵为学、韩瑞霞、许建、周鸿雁、倪琳、邵静、孙健、李敬等诸多同门亦是我这些年来的重要收获。虽然不能在这里一一写下他们的名字，但在心底永远感谢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中一段快乐的时光。

博士毕业后来到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工作，这里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融洽的人文氛围为我构筑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方卫平教授、刘宣文教授、田中初教授、慈波博士、王国均博士、仇秋生教授给予了很多关心与帮助，使我刚到陌生之地内心依然倍感温暖。与研究院各位同事的交流常携弥漫的茶香，大家纵论天下，时事学问，畅所欲言，虽无觥筹交错之喧哗，却在轻松尽兴中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学识。

特别要感谢的是马元连先生，从考研后得以成行到博士毕业之后，马先生屡屡在关键时刻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借此机会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还要感谢的有徐金城先生、徐庆国先生、王美林先生、杨淑娟女士、汪会女士、蔡桂如先生、常康先生、费元汀先生、李慧祥先生、孙再明先生、刘祥丰先生、高建宁先生、袁光华先生、徐志成先生、黄彬先生、殷凯彬先生等人，他们帮我解决了许多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扰，使我能将精力更多地集中于学业。

鞠景如先生、李其社先生、高桂明先生、董明先生、陈文奇先生、黄应龙先生、刘明荣先生、丁国旺先生、吉友山先生、薛义河先生、刘峻先生、张虎林先生、陆曙堂先生、申明秀先生、程忠良先生、陈士武先生诸君是交往多年的朋友，他们的友情如兰芝之馨，清香而幽远，一路陪伴着我，使得我能在挫折面前重新振作，继续前行。

不能不提及的是伯父陈延先生。伯父勤奋进取、事业有成，同时还不忘敦促和勉励后辈。从十四岁考入中师到二十年后博士毕业，整整二十年的时光我一直行走于南北奔忙于学业，伯父在身后的支持从来没有缺位。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和妻女，感谢他们生活上对我的照顾和精神上对我的鼓励。没有他们的支持，要完成这本书稿是难以想象的。妻子翟爱梅一贯任劳任怨，持家有道，在我读书期间，独自承担了一个家庭里里外外的大事和琐事，帮助我解决了学习和工作的一大半牵挂。女儿陈诗凡的健康成长也让我格外欣

慰，这是一种生命继承的快乐，给了我源源不竭的前进动力。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特别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黄强强先生，他的热忱和细心使我的感谢难以言表。当然还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其他参与本书编审的编辑与工作人员，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忱。